

著

【英 国】史密斯

【加拿大】彭迈克

【土耳其】库查巴莎

译

严文华

权大勇 等

跨文化 社会心理学



UNDERSTANDING
SOCIAL PSYCHOLOGY
ACROSS CULTURES

LIVING AND WORKING IN A CHANGING WORLD

Peter B Smith, Michael Harris Bond
and Çiğdem Kağıtçıbaşı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我非常喜爱这本书，我也很乐意向那些想了解跨文化心理学的人推荐此书……我从未见过能够把问题分析得如此清楚明白的理论著作。这本书材料丰富、内容广泛、可读性强，包含了最新的资料并且强调实用导向；书中所引用的全部资料都在充分考虑其背景的前提下经过审慎解读。真是一部杰作！

——霍夫施泰德（Geert Hofstede）

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管理学家，跨文化管理研究权威。
代表作有《文化的影响力》《文化与主题：思想的远见》《文化的后果》

北京新曲线出版咨询有限公司

网址：www.ncc-pub.com



分类建议：心理学

人民邮电出版社网址：www.ptpress.com.cn

ISBN 978-7-115-20961-0



9 787115 209610 >

ISBN 978-7-115-20961-0 / F

定价：48.00元

跨文化社会心理学

[英 国] 彼得·史密斯
[加拿大] 彭迈克 著
[土耳其] 齐丹·库查巴莎

严文华 权大勇 等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文化社会心理学/ (英国) 史密斯 (Smith P. B.), (加拿大) 彭迈克 (Bond M. H.), (土耳其) 库查巴莎著 (Çiğdem Kağıtçıbaşı), 严文华, 权大勇等译

-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115 - 20961 - 0

I. 跨… II. ①史… ②彭 ③库 ④严 ⑤权 III. 社会心理学 IV. 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6229 号

Peter B. Smith, Michael Harris Bond, Çiğdem Kağıtçıbaşı

Understanding Social Psychology Across Cultures

ISBN 978 - 1 - 4129 - 0366 - 0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Peter B. Smith, Michael Harris Bond & Çiğdem Kağıtçıbaşı, 2006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和 Sage Publications Ltd 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 - 2008 - 454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跨文化社会心理学

◆ 著 彼得·史密斯 彭迈克 齐丹·库查巴莎

译 者 严文华 权大勇 等

策 划 刘 力 陆 瑜 陈浩莺

责任编辑 刘 力 常玉轩

装帧设计 O. E. T.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 14 号 A 座

邮编 100061 电子函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电话 (编辑部) 010 - 84937150 (市场部) 010 - 84937152

(教师服务中心) 010 - 84931276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4

字数: 390 千字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08 - 4541

ISBN 978 - 7 - 115 - 20961 - 0/F

定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电话: (010) 84937149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讨论社会心理学重要命题的专著。

第一编是基本概念和框架，介绍了几个重要的文化理论及其研究、跨文化研究方法、跨文化分析和研究的层面；第二编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五个社会心理学话题：发展与家庭、社会认知、人格、沟通和建立关系、组织行为；第三编侧重于世界各国的互动：跨文化互动、群体间关系、全球化与文化发展。

本书可供心理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使用；也可供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其他跨文化学科的研究生使用；同时还可供研究跨文化问题的学者和移民及跨国工作生活的人士参考。



本书从文化的角度来讲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命题，如发展、认知、情绪、动机、人格、沟通等在本书中都有一席之地，只是所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跨文化上。第一编关注基本点，如重要的文化理论及其研究、跨文化研究方法论、跨文化分析和研究的层面；第二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五个社会心理学话题：发展与家庭、社会知觉、人格、沟通和建立关系、组织行为；第三编侧重于世界各国的互动：跨文化互动、群体间关系、全球化与文化发展。以下谈谈这本书涉及到的重要概念。

重要的文化理论实证研究

“世界文化到底有多少种？尽管对这个问题人们有不同看法，但人们都同意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些文化，一种方式是了解每一种文化的描述；一种方式是找到一种抽象的理论，它通过几个特征描述世界上大多数文化，只要抓住这几个主要特征，就可以描画出世界各国的文化地图，其本质是找到描述文化差异的尺度。第二种方式吸引了很多学者。但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严文华，2008）^①。”重要的文化理论为我们描画出文化地图，让我们方便而直观地看到各种文化的位置。本书介绍并评价了以下几个重要的文化实证研究。

一是霍夫施泰德（Hofstede）的文化维度研究。霍夫施泰德是位荷兰学者，在1968～1972年期间，他所在的研究团队为IBM公司进行全

^① 严文华. 跨文化沟通心理学.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7页.

球士气调查。通过对获得的 11600 张问卷进行数据处理，他提出了国家层面的文化四维度理论。本书不仅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更对其方法论进行评价，既分析到他的开创性和科学性，如采用了多语言的问卷，确保了被试群体的可比较性，处理了默许反应偏差，采用了国民均值的数据统计，也提出：在关注国家层面文化差异的同时，不能无视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他找到国家差异的四个维度并把它们分别命名为：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或女性气质。权力距离是指老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下属的行为以及下属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老板的行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Hofstede, 2001, p. 83）。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回避不确定性或模糊性，它和避免风险的含义不同。个人主义文化被定义为那些其个体认为他们具有相对独立身份的文化，而集体主义文化是那些更多地以持久的群体成员的关系来定义身份的文化。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主要是一个文化重视自信、注重抚育的程度。尽管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霍夫施泰德这里是国家层面的概念，但后来很多学者是在个人层面上使用这个概念，与霍夫施泰德的初衷不同。

二是施瓦茨（Schwartz）的价值观调查。施瓦茨是一位以色列学者。他认为，个体价值观是非常基础性的文化表现，从价值观入手，对具有价值观相同结构的国家进行比较，国家层面的文化比较才是有意义的。一些国家价值观结构不相同，研究者应该关注其差异，并探究其原因（Schwartz, 1992）。施瓦茨进行了这样的研究。首先他列出了 56 个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主要来自于罗基奇（Rokeach, 1973）在美国开展的早期调查，但增添了来自其它文化传统中更多的价值观，以便尽量减少强加式客位研究测量手段的影响。为保证各国被试在同一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词组，他在每一个价值观后面附了简短的说明，如“成功（实现目标）”、“社会公正（纠正不公平现象，关心弱者）”等。他请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学生和老师回答：在多大程度上以下项目是你生活中的指导原则？接下来，对每一个国家的数据，施瓦茨采取了最小空间分析法（smallest space analysis），对各价值之间的距离进行了分析。他画出了一个二维图，各价值之间的距离一目了然。他最后命名了 10 种不同的价值观类型。这 10 种价值观类型也可以被简化为两个极化的维度，纵

向维度为对变化的开放性与保守性，两个端点分别为对创新和自主性的赞同以及对传统和顺从的赞同。横向维度为自我提升对自我超越，两个端点分别为为个人目的进行的个人奋斗、为达到超越个人目的而同他人合作（Schwartz, 1992）。后来施瓦茨和萨奇夫（Schwartz & Sagiv, 1995）将这个研究拓展至 40 个国家。他发现，在这个广泛的国家样本之中，他最初的 56 个项目中有 44 个具有充分的等值含义。

三是英格尔哈特（Inglehart）领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1997）。在 1981 年开始调查时包含了 22 个国家，这个调查每过几年就重复一次，在 1990 ~ 1993 的第二次调查中扩展到了 43 个国家，其中每个国家中抽取 1000 个被试。在个体层面的因素分析和国家层面的因素分析中，他都得出了两个相同的因素：第一个因素被称为理性合法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对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他理解的理性合法就是现代性，其主要含义是成就动机、节俭、决断力、对政治感兴趣和接受堕胎。后现代性是英格尔哈特特别关注的一个概念，他认为是富裕国家特有的价值观，由这个价值观所表现出的行为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二个因子被称为幸福（Well-being）对生存（Survival）。后来他把第二因素命名为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对生存。

四是彭迈克（Michael Bond）的“中国文化联系（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研究（1987）。他请一批中国学者给出一些中国社会中重要的价值观。然后他以这些价值观作为基础对来自于 23 个国家的大学生样本进行施测。接下来，他按照霍夫施泰德的统计分析程序，对数据进行了国家层面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有三个维度与霍夫施泰德的维度接近，但不确定性规避维度并没有得到验证，而是发现了一个被邦德称之为“儒家工作动力（Confucian Work Dynamism）”的维度，它主要包括了传统中国价值观，例如恒心和节俭。霍夫施泰德（Hofstede, 2001）肯定了这个维度，并把这个维度加入到他的理论中，形成第五个维度，但他将这个维度命名为长期导向（Long Term Orientation）。

五是罗伯特·豪斯（Robert House）领导的 GLOBE（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Effectiveness，全球领导力和组织行为有效性）项目。这个庞大的项目涉及到来自 62 个国家的接近 200 名合作

者 (House et al., 2004)。在 10 年期间, GLOBE 的研究者们调查了来自各国电信行业、金融服务、食品供应行业 17000 余名的管理者。他们要求被试从一张特质清单中选择他们认为有效的领导者的特征, 并描述自己目前所在组织和国家的现状, 以及自己理想的组织和国家的状态。从其结果来看 (Den Hartog, House, Hanges, Dorfman & Ruiz-Qintanilla, 1999), 在全世界范围内, 人们喜欢那些被认为是可信赖的、精力充沛的、鼓舞人心的, 并且有才华的领导者; 而排斥那些不合作、自我为中心和易激惹的领导者。为了更加清晰地概括他们的复杂结果, 研究者在其样本中又形成了 10 个国家簇, 这些簇是根据价值观彼此相对近似来加以判别。在所有簇中, 被标明为有个人魅力的和团队取向的领导风格得到了积极强烈的认可, 而那些自我保护和独断专行的领导是最不受欢迎的。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是: 多大程度上, 能够根据这些簇中的主流价值观来解释每一簇国家中被认为有效领导风格之间的差异。研究者在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上都发现了显著的不同。

作者不仅用以上实证研究来勾勒出文化地图, 而且还对这些研究进行评价。读者要想理解这些评价, 建议阅读这些实证研究的论文或书籍。

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指南

贯穿全书的主线之一就是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在第 2 章, 作者集中提出了 11 条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指南。纵览全书, 作者反复强调的重要方法有: 主位法和客位法; 数据分析的不同层面。下文将详细讨论这两点。此外, 作者还提出一些跨文化研究指南。在观念上, 作者强调: 跨文化心理学家不应指望所有的相关研究都是用英文发表的, 一些关于跨文化的研究是用研究者母语发表的, 这些文献不应该被忽视; 最有价值的研究是那些对文化如何影响研究结果的相关理论予以检验的研究。在描述文化异同的基础上, 研究者如果能发展出理论, 将会从更高的角度揭示出内在规律。

关于测验在跨文化中的应用, 作者特别强调: 第一, 如果我们希望

探测跨文化差异，我们就要采用能够有效找出这些差异的测验。研究者必须小心谨慎地设计测验，确保测验能够验证差异是否存在。不完整的测验设计会把研究者带入歧途。第二，取样的人口应该具有可比性。如果取样的样本在不同文化单元中是有偏差的，样本的差异就会造成结果的差异，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研究者仍把差异归因于文化，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研究者要确保取样的样本在不同文化中是平行的、可比较的。第三，跨文化研究需要确保不同文化中的被试对刺激材料和施测的反应是等值的，即测验和功能的等值。研究者要检验测验本身的文化公平性，测验的含义和难度对不同文化中的被试具有相同性。第四，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必须小心地解释研究，不能对所得数据的有效性造成损害。研究者对被试该如何解释研究的性质、目的和程序？需要在研究的伦理道德、解释对被试的启动效应之间作平衡考虑。第五，把测量工具施用于新的文化情境，必须报告其信度和效度。在原文化中的信度和效度，并不能天然证明它适用于新的文化情境。第六，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要考虑到默许反应偏差。默许反应偏差指被试对研究者呈现的大多数或所有的陈述和问题，都有一种给予同意而不是反对的倾向。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偏差而直接分析数据，最后的差异可能来自这种反应偏差，而不是来自文化差异。对默许反应偏差的处理既可以通过在项目中设置正向题和反向题来控制，也可以通过对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来校正。

文化研究的主位法和客位法

“主位法”（emic）和“客位法”（etic）是来自语言学的术语。语言学认为，所有人类的语言从语音区别意义的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单位是音位（phonemic），音位反映的是语音的社会属性，音位分析是从发音人的角度，对具体语言的音素所进行分析和归纳；而从音质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单位是音素（phonetic）。音素反映的是语音的物理属性。音素分析是从声学的角度，对人类语言的声音所进行的客观的、准确的记录和分析。美国著名结构语言学家派克（Pike, 1967）引申出主位研究

和客位研究两个概念，并指出这两个概念对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哈里斯在其《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1979）等一系列著作中系统分析了主位研究方式与客位研究方式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者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用在其它文化中得到的概念、理论来对其进行概括和总结，这样进行的研究称之为客位法；研究者也可以从当事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行为，这样的研究称之为主位法。哈里斯同时指出，客位研究不等于客观，主位研究不等于主观。到目前，主位法和客位法已成为跨文化心理学中完整而重要的研究策略。主位法研究往往是由熟悉本文化的研究者来操作，只研究特定的自己的母文化，并且得出的研究结论只适用于母文化；而客位法研究往往是由不属于本文化的研究者从外部对一种或多种文化进行研究，研究所用的框架、理论和概念是在其它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得到的结论适用于被研究的文化单元。目前大多数跨文化实证研究都同时用到客位法和主位法。如先在本文化中抽象概括出一个理论（主位法），然后将其运用到其它文化中，对其在其它文化中的适用性进行验证（客位法）（严文华，2008）^①。”在本书中，作者给出的定义如下：主位研究是从研究的直接背景中抽取材料，对其发现的跨文化的普遍性并不做假设。而客位研究是做出一个暂时的假设，认为正在研究的现象是可比较的和普遍的。

在本书中，作者强调：一个好的研究会表明其吸收了来自主位和客位两方面的观点。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强加式客位法”，指研究者把在一个文化中的概念和理论直接在另外一个文化中应用，而没有检验在新文化情境中它是否在概念上等值。一个跨文化研究可能经历主位—客位—主位的研究过程，从一个文化为起点，走向在多个文化中验证，但最终会回到每个文化中去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文化分析的层面

要想使不同文化中的研究能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必须做到四种等

^① 严文华. 跨文化沟通心理学.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12 页.

值，即概念等值、功能等值、语言等值、测验等值。一个研究即使全部做到了各种等值性，也并不等于不同文化间的数据可以直接比较。本书作者反复强调和区分的是两个层面的分析：个体层面的分析和国家层面的分析。个体层面的研究把每一个被试的数据当作一个单独的个案，国家层面的研究则把每一个国家的多个样本中获取变量的所有数据先平均，再把每个国家当作一个个案来分析。有一些研究是把两者混淆，就会犯生态谬误的错误，即认为在不同的分析层面，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仍然相同。有一些研究是这类错误的范例：研究者对不同国别的个体进行测量，然后把国家之间个体层面的均值进行比较，并且得出结论：这些差异进一步验证了霍夫施泰德的理论。其错误在于国家层面的特征并不完全表现在该国每一个个体层面上。如果研究是在个体层面上进行，却试图验证在国家层面进行分析的霍夫施泰德的理论，这显然是荒谬的。

在本书中，作者对数据分析的三种情况进行了阐述：一是个体层面上，把一个被试当成一个个案，求出每个量表上被试的均值，然后对不同国家之间的均值进行比较。可以看到，这种方法不对量表的结构进行检验，也不检验各国的量表结构是否一致。这种比较出来的结果是无效的，因为没有奠定比较的基础。二是在国家层面对个体或心理的分析，首先对每一个国家内组成一个量表的项目单独进行因素分析，然后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因素分析结构是否相同，如果因素结构稳定，可以比较国家之间的均值。由于是在国家层面上，所以每个国家有一个单独的分数描述各国被试的平均状况。三是在国家层面进行文化或生态的分析。具体做法是：首先分别计算出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项目上的均值，每个国家在每一个项目上有一个惟一分值，然后再对不同国家的项目均值进行因素分析。通过这些分数，可以看到个体在其中定位的国家的特征。

已有研究表明，如果项目越细致，所得到的个体层面结果与国家层面结果就相差越大。“在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起作用的因素会不同，如在个体层面，遗传因素、个人的经验、社会化过程、家庭等就更为重要；而在国家层面，经济发展、政治结构等就更为重要。如果一个研究没有说清楚是在哪个层面上进行的分析，其结论就不可靠（严文华，

2008) ①。”基于此，本书作者指出：跨文化心理学家需要清楚地了解个体层面分析和文化层面分析之间的区别。普遍性规律的证据，更有可能从一系列在不同国家中完成的、用于探索一个概念意义的多项平行研究中发现，而不是从直接对该概念的跨国家均值比较中得出。数据的比较必须有基础，必须和研究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

文化中的个人：自我诠释

“自我诠释” (self-construal) 是在本书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对自我诠释的探索性研究从开放性“二十项陈述测试” (简称“TST”) 问卷开始，要求被试用 20 个句子描述自己。研究表明，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常用特质来描述自己，而提及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则在集体主义国家被试的回答中占了很高比例 (Bochner, 1994; Bond & Cheung, 1983; Triandis, McCusker, & Hui, 1990)。后经更结构化的量表测量研究，学者们区分出两种自我诠释：独立型自我诠释，即强调一个人的自主性和与他人相分离的自我知觉；依赖型自我诠释，即强调一个人与他人相互联系自我知觉 (Singelis, 1994; Gudykunst, Matsumoto, Ting-Toomey et. al., 1996)。这种二分法及其测量一度非常盛行。而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塞迪基德和布鲁尔 (Sedikides & Brewer, 2001) 提出了将自我诠释分为三部分的证据。他们指出：人们可能将自己看作是个体自我 (individual self)、关系自我 (relational self) 以及集体自我 (collective self)。个体自我在这里等同于独立型自我诠释，但把依赖型自我诠释区分为从关系或从集体上认同。研究者们据此增加了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它既重视自主行动的能力，又强调与他人关系的重要性，它可能更能描画集体主义文化中处在较发达社会经济背景中的个体。

由于自我诠释涉及个体如何看待自我，所以自我诠释和认知、情绪表达、动机、社会化等都有一定联系。在本书中，作者是把它作为一个

① 严文华. 跨文化沟通心理学.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 16 页.

重要的文化取向进行描述和阐述。在第5章中，作者试图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探讨不同类型的自我诠释形成过程。有学者分别用人际距离和能动性作为横坐标和纵坐标，构建出独立型、依赖型、心理依赖型和忽略等级型家庭模型，从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关系中挖掘自我依赖形成的原因。

回归文化本来的面目

心理学专业人士在阅读本书时，会发现很多主题是自己熟悉的，如社会知觉、人格、沟通等，但有可能会发现作者的切入点是自己不熟悉的，作者在每一个主题中都会讨论这些问题：这个主题在不同文化中是否有相似的表现？如果有差异，是哪些差异，怎样表现出来？这些差异是怎样影响到它的概念？那些具有文化特定性的概念和测量，真的在其他文化中不适用吗？

本书的特点是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每一个问题。这种全新的视角会让这些似曾相识的主题变得生机盎然。作者在本书中介绍了如何界定文化、如何界定和研究文化的不同层面；除了心理学的变量之外，还有哪些宏观变量和文化有关（如国民财富、移民数量等）；文化如何和社会、经济、变迁等发生关系，如何从生态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文化曾经是一个背景，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它已经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要想把文化的影响从其他因素中剥离出来，要想建立起文化与其他变量的影响模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本书是讲跨文化的，但作者并没有在讲述文化变量的同时，夸大文化的作用。回归文化本来的面目，这是作者的目标之一。

本书的特点

我自己三次使用过本书作为研究生教材。在使用过程中，我发现本书有一些独特的优点：

一是它的高度和批判性：三位作者对专业领域非常熟悉，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回顾已有研究，能引导读者具有批判性。目前很多著作和教材只限于描述和介绍，但缺少批判性，而本书恰恰有这个优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可能是学习过本书后的感受之一。

二是它兼顾理论和实证研究，读起来有血有肉，对大学生、研究生和研究学者来说，都能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养分。

三是它既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也介绍东方学者的研究。这可能和作者队伍的组成也有一定关系：史密斯教授为英国人，熟悉欧洲的研究；彭迈克是加拿大人，长期在香港工作，谙熟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国的研究，库查巴莎是土耳其人，对非西方的研究非常关注。同时他们自己又是跨文化心理学领域的资深研究者，每个人都有很多研究成果，有很多研究心得，所以其论著很有份量。

四是它的适用范围较广，它的专题既关注跨文化心理学，又关注社会心理学，把心理学放在生态—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来阐述，更具立体性。

基于以上特点，学生如果想要学好本书，可能需要增大阅读量，需要阅读本书提及的那些实证研究，阅读每一章推荐的拓展阅读文献，查阅一些相关的中文文献。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带着思考和批判。

导读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对本书有一个更清晰的脉络，在读之前对一些关键点能够有所了解。希望此导读能达到这个目的。

严文华

2008年10月于金秋的华东师范大学



感 谢

本书取代了我们以前两版的《跨文化社会心理学》。该书第一版的发行已经过去有 13 年了，在这段时间内，心理学中跨文化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因此，这本书的文本是全新的。新版保留了原有的框架，但是涉及的范围更广，我们力争对跨文化心理学领域内新出现的各增长点进行清楚的解释，这些增长点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挑战息息相关的。跨文化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展，我们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所能够进行的跨国合作也随之扩大。作为一个三人团队，我们因各自观点的不同而获益良多，我们将那些经常孤立考虑的方面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在你和其他人一起讨论这本书的内容时，我们相信你在念 Smith 和 Bond 的名字时毫不困难，但是在念 Çigdem Kağıtçıbaşı 的名字时可能会有一些发音上的困难，因为这是富有特色的土耳其语。你或许会欣赏我们的帮助：可以试着念成 chee-dam kut-chabasha。

感谢 Dianne van Hemert 同意让我们对专栏 3.7 和专栏 4.3 中未公开发表过的内容进行引用，同样也感谢 Michele Gelfand 同意我们对专栏 4.7 的内容进行引用。

感谢 Pawel Boski、Joris de Bres、Mary Jiang Bresnahan、Rolando Diaz Loving、Ronald Fischer、Marta Fulop、Michele Gelfand、Gert Jan Hofstede、Heidi Keller、Mansur Lalljee、Elias Mpofu、Ype Poortinga、Floyd Rudmin、Shalom Schwartz、Andy Tamas、Nathalie van Meurs、Patricia Ro-

driguez Mosquera、Jim Nelson、Peter K. Smith、Evert Van de Vliert、Vivian Vignoles、Susumu Yamaguchi，感谢他们富有洞见的评论和慷慨的贡献；感谢 Anne Cathcart 的耐心和支持。阅读和使用这本书前两版的读者朋友们，是你们的热情和坚定支持，使我们为提高对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理解而持续努力。谢谢你们每一个人。

彼得·史密斯

彭迈克

齐丹·库查巴莎



中文版序

理解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心理学：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生活和工作

理查德·斯奈德

克拉克·

詹姆斯·丹尼

1998年8月

在我们为这本书的中文版撰写前言的时候，2008 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刚刚结束。在为期两周的奥运盛事期间，中国，中国人，还有中国的历史风貌展现在几十亿世人面前。许多人都是在观看了让人惊叹的奥运会开幕式后第一次认识到了中国、中国人以及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这种新鲜、与众不同的文化会给世界带来什么？而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时期内不论是通过媒体报道间接地接触外国人，还是直接在北京的街头、鸟巢或水立方内接触外国人，这些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正是这些“相遇”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激发了本书中所报告的跨文化研究的诸多理性观点。我们将目前的跨文化文献进行整合，以期能够回答以下的问题：“中国人是谁，或者任何一个文化群体的人是谁，以及他们可以怎样与其他文化群体的人作比较？”“他们和哪些人相似，是以怎样的社会心理学方式与之相似？”随着世界越来越开放，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相互依赖，回答这些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

现在这本书有了中文版本，我们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严文华教授的辛勤工作，感谢她和她的团队共同完成了这项工作。关于中国人的研究在跨文化心理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全球性现象和地区性特殊现象的理解。我们相信当前中国心理学研究和教学的飞速发展不仅受益于对人类共同点的全面思考，

也受益于对占世界人口相当大比例的中国人独特之处的思考。我们期望能够有那么一天，中文的心理学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因为中国学者独特的视角对于心理学整体而言是重要的。

彼得·史密斯

彭迈克

齐丹·库查巴莎

2008 年 8 月



目 录

导 读	1
感 谢	11
中文版序	13

第一编 建立框架

第 1 章 跨文化心理学面临的紧迫问题	1
小 结	12
拓展阅读	12
思考题	12
第 2 章 提高跨文化心理学的有效性	13
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社会人类学视角	14
心理测量视角	16
实验的视角	22
小 结	32
拓展阅读	33
思考题	34
第 3 章 定义方法:理论和框架	35
文化、国家和社会	35
价值、信念及行为	38

霍夫施泰德项目	40
研究个体与研究文化	46
作为共享信念体系的文化	57
作为行为模式的文化	59
一个全景视图	60
小 结	66
拓展阅读	66
思考题	67
第4章 作为文化的国家以及它们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68
国家文化的心理学特征描述	70
国家的生态—政治—社会—经济背景	76
整合性的模型	89
小 结	94
拓展阅读	94
思考题	94
第二编 核心问题	97
第5章 文化的形成和再塑：一个发展的视角	97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发展的视角	97
人生阶段和文化	100
子女价值和家庭的变迁	105
三种家庭模型	107
自主性—关系性自我诠释	111
家庭控制	116
移民的背景	119

自我诠释、自主性和发展的道路	121
小 结	124
拓展阅读	125
思考题	125
第6章 理解各自的世界	127
个体层面的自我表征	130
为失控的马减速	134
依赖型与认知	139
依赖型与情绪	144
依赖型与动机	149
作为一套持久启动效应的文化	154
小 结	156
拓展阅读	156
思考题	156
第7章 跨文化视角下的人格	158
为个体和个体所属的文化群体绘制人格地图	160
人格的组织中是否存在泛文化相似性	162
小 结	185
拓展阅读	186
思考题	186
第8章 与他人沟通和建立关系	187
沟通的类型	187
与他人建立关系	201
小 结	213
拓展阅读	213

思考题	214
第9章 一起工作	216
工作动机	216
公正理论	224
冲突与谈判	228
在团队中工作	236
领导者和领导力	240
作为文化的组织	246
小 结	248
拓展阅读	249
思考题	249
第三编 变化中的世界	251
第10章 应对差异	251
语言问题	255
理解跨文化互动	261
接触的类型	269
小 结	274
拓展阅读	275
思考题	275
第11章 群体间关系	277
社会认同过程	277
国籍刻板印象	280
种族刻板印象	286

个人主义群体对集体主义群体	290
移 民	294
评估文化适应	295
文化适应的过程	302
接触假设	304
小 结	305
拓展阅读	306
思考题	306
第 12 章 全球变迁	307
趋同与现代性	308
英格尔哈特项目	313
关于文化变迁的其他数据来源	318
小 结	326
拓展阅读	327
思考题	327
第 13 章 未竟之事	328
讨论的话题	328
关键术语表	341
参考文献	347
译名对照	349
后 记	356

跨文化心理学面临的紧迫问题

惟一真正的探险，惟一真正的快乐源泉，不是去外国，而是去拥有他人的眼睛，藉由他人的眼睛去看整个世界。（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在这本书中，我们力图展示心理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空前的社会变化进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因为它需要我们将注意力均等地分配到两个经常被分别对待的问题上：第一，我们需要展示心理学家如何最佳地应对现今世界人口的多样性。心理学经常通过标准化和简化的设置来开展其研究。研究只是在有限群体中取样时，才会形成清晰的见解，但要将这些见解运用到不同文化情境中时，就会产生问题。第二，我们需要像关注稳定一样关注变化。那些在某个时间点上对事件取样的实验方法——这种方法为大多数研究者所采用——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稳定”的错觉，尽管个人经验告诉我们事物是在“变化”着的。

在本章中，我们首先定义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后面的各章将为跨文化心理学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个视角。我们关注的焦点能够通过下面的几句话来加以界定：在过去的一万年中，人类的进化产生出了一系列相对较小和相对分离的群体，我们将这些群体描述为各种社会或各种

文化。人类依靠这些文化适应一系列形态各异的、敌意的环境。根据我们对文化的定义，可以推定现今的世界已经存在上千种文化。在 20 世纪早期，社会人类学家对许多这样的群体做了非常详细的人种学研究。他们把这些观察记录了下来，并且总结进耶鲁大学的《人类关系的区域档案》，其中包含了 863 个文化群体的信息（Murdock, 1967）。

人类学家能够访问并记录下这些文化群体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进化过程的标志。而这个进化过程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就发生了，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处于加速发展之中。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快捷、越来越方便地去世界各地旅行，并且基本上消除了世界上任意两地之间信息传递在时间上的延误。新技术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新经济发展使得人类的进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几千种产生于各种鲜明的文化情境和传统中的语言正在消失的过程中。随着语言多样性的减少，少数几种语言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许多人类学家先前研究的文化群体已经不能再免受各种现代化的影响。大众传媒使得少数几个工业化国家的文化产物已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许许多多的人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参观旅游，他们中有旅行者，有非政府组织或外国组织的员工，还有学生和商人。许许多多的人移居到其他国家，他们中有外国劳工、经济移民，还有难民和逃避迫害的人。有更多的人从农村移居到城市，有些城市已经变得非常庞大了。

专栏 1.1、1.2、1.3 展示了这种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专栏 1.1 列举出 1995 年到 2000 年之间，按照其自身人口的比例来计算，平均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和国家。有一些在这段期间内接受过大量难民的国家并没有出现在这张表格中，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国家的邻国发生了战争。绝对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其他一些大国，如德国、俄罗斯，在这段期间平均每年也要接受超过 20 万的移民。当然，当这些移民到达目的地后会发生什么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而这些因素我们会在第 10 章和第 11 章进行讨论。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由高移民率所带来的问题，这张表中所出现的那些小国更能说明问题。移民有他们的出发地和到达地，那些流失大量人口的国家容易受到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解体的影响，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些流失的人口中通常包括那些高素质的人才，这些国家因而被剥夺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在 1995 年到 2000 年期

专栏 1.1

世界在流动：永久的移民

国家/地区	永久移民的数量（每年）	占现有人口的比例（每千人）
新加坡	74 000	19.6
中国香港	99 000	15.1
科威特	20 000	11.1
卢森堡公国	4 000	9.4
以色列	52 000	9.1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 000	8.1
巴林	4 000	6.6
哥斯达黎加	20 000	5.3
澳大利亚	95 000	5.1
爱尔兰	18 000	4.9
黎巴嫩	16 000	4.8
加拿大	144 000	4.8
美国	1 250 000	4.5

资料来源：联合国（2002）。移民数量为移入移民数减去移出移民数。

间，平均每年流失人口超过总人口数百分之一的国家包括萨摩亚群岛、阿尔巴尼亚、哈萨克斯坦、圭亚那、苏里南和塔吉克斯坦。

专栏 1.2 列出在 1997 年入境者绝对人数最多的 18 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国家没有报告人们进入他们国家的原因，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游客是这些数据的组成部分；而在其他情况下，主要组成部分则是商业人士或学生。重申一下，最有趣的统计量是入境人口和现有人口的比例。当入境人口大大超出居民的人数，我们可以期望看到最为明显的社会转型信号，无论这种转型是以紧张和冲突为基础，还是基于东道国自愿把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融入本国。最容易受到这种类型影响的国家就是那些与强大而富有的国家相邻近的小国。

专栏 1.2

世界在流动：入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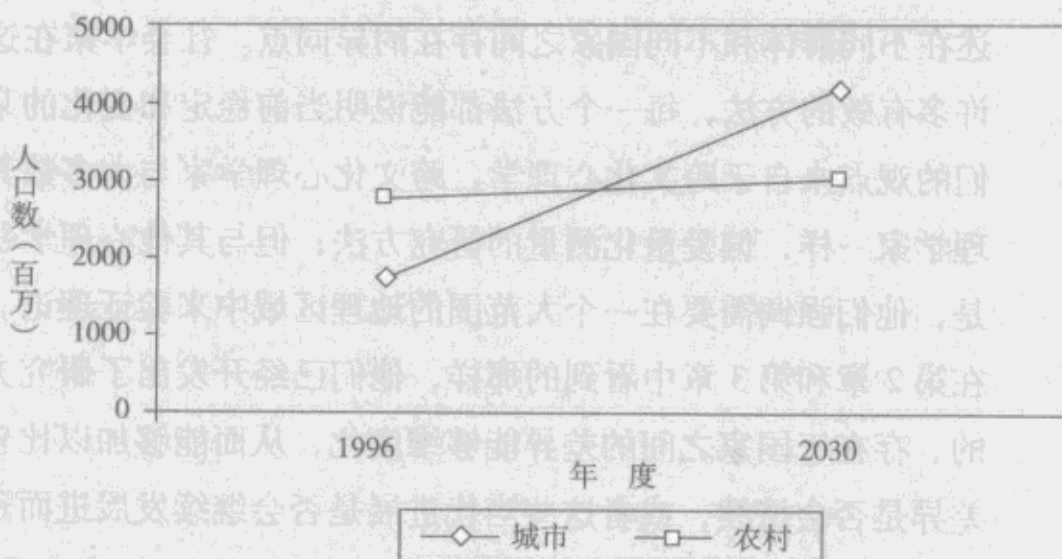
国家/地区	至少停留一个晚上的 入境者/以百万为单位	占现有人口的百分比
奥地利	16.447	204
匈牙利	17.248	173
中国香港	10.406	152
瑞士	10.600	148
法国	67.310	114
西班牙	43.252	108
葡萄牙	10.172	102
希腊	10.070	95
意大利	34.087	59
加拿大	17.636	57
波兰	19.520	51
英国	22.995	39
墨西哥	19.351	20
德国	15.837	19
美国	47.754	17
土耳其	9.040	14
俄罗斯	17.463	12
中国	23.770	2

资料来源：世界旅游组织（1999）

世界旅游组织（1999）指出，入境者是指那些在入境时持有有效护照或旅行证件，并在入境后停留至少一个晚上的人。入境者的人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奥地利和匈牙利是入境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分别达到16.447百万和17.248百万。中国香港和瑞士紧随其后，分别达到10.406百万和10.600百万。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是入境者人数较多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入境者人数相对较少，仅为23.770百万，占现有人口的比例仅为2%。

专栏 1.3

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农村人口变化图



资料来源：世界能源理事会（1999）

专栏 1.3 展示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以不断增长的高比率从乡村流动到城市的概况，并且对这一趋势的持续作出的预测。在今后的 20 年中，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口增长预计可达 20 多亿。当然，这些人口增长一部分要归因于已经居住在城市中的那些家庭，但是，那些从乡村移居到城市的人口将多到足够完全抵消乡村地区的人口增长。因此我们有望看到大量的人口将会居住在与他们的父辈以及祖辈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并且这个数量一直在快速地增长中。现在，我们无法确定这些进程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但是我们能够预见这些进程的结果将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和稳定过程？当今的世界被组织成一个含有 200 或更多个国家的系统，而非拥有成千上万文化群体的系统。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和人文历史差异非常大，而这些地理位置和历史造就了这些国家现在各自不同的环境。国家是从政治上加以定义的实体，包括范围广大的人口，而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国籍，但是他们却更愿意选择用不同的性别、职业、种族起源和肤色来描述他们自己。在一些情况下，一个人的国籍说明了他的族性，但是也经常涉及到肤色、先前的移民历史和地域忠诚。一个国家

是否能被很好地理解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或一个多种族的混合体？这一问题将会在第3章中予以讨论。在此之前，当我们涉及到这点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国家，而不是文化。

为了理解当代的变化，我们首先需要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研究和描述在不同群体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异同点。社会学家在这方面形成了许多有效的方法，每一个方法都能说明当前稳定和变化的某个方面。我们的观点来自于跨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家与大多数其他领域的心理学家一样，偏爱量化测量的研究方法；但与其他心理学领域不一样的是，他们强调需要在一个大范围的地理区域中来验证理论。就如我们将在第2章和第3章中看到的那样，他们已经开发出了研究方法，使现有的、存在于国家之间的差异能够维度化，从而能够加以比较。但是这些差异是否会持续，或者这些当代进展是否会继续发展进而逐渐形成一种世界性的单一文化？我们可以以一个更加基本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根据个体社会化的特定途径，什么是人性的根本和基础？什么更具有伸展性并可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

社会化一般被作为儿童时期的一个过程来研究，在第5章中，我们将考虑不同国家的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差异。然而，在个体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偶尔也会从一个国家来到另外一个国家，这将使社会化过程变得更加复杂。跨国公司寻求使其员工社会化的方法，从而使得他们能在全球性的组织文化中工作。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提供多种族背景下有关的学校教育，而这些学校反过来又执行了社会化中介物的功能。政治性的联盟和冲突会对特定的社会变化产生压力。旅行者对当地的居民有特定的要求。人们有时候会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合作者建立关系，甚至结婚。在这些过程中，他们必须面对与以前在社会化过程中所习得的完全不同的假设和价值观。专栏1.4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心理学家通常将个体作为他们研究的焦点。他们的研究方法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更适合以个体作为研究焦点。然而，如果我们脱离了个体所在的物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来研究个体，那么我们将无法理解人们何以如此行事。也正是因为这样，作为对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个体自身测量的一个补充，跨文化心理学家最近还发展了对个体文化背景的测量，例如人们所生活在其中的国家系统。

专栏 1.4

当简遇到玛丽亚

简是在荷兰的一个新教徒家庭中长大的。在他完成了荷兰一所大学的博士预备班(doctorandus)课程后,就像他的同学一样,他能说非常流利的荷兰语、英语、德语和法语。他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途径来表达他的国际主义价值观,并获得在英国完成博士学位的奖学金,去研究与巴西的发展相关的问题。玛丽亚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个天主教徒家庭中长大。她在学校中学习英语,在圣保罗完成了高级心理学学位后,她很幸运地获得了巴西政府的奖学金,到英国继续博士学位的学习。

在英国大学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来自于世界各地,他们很快就发现朋友圈子中有来自英国、美国、德国、瑞典、日本的学生。在与这些朋友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互相告诉对方,彼此不同的背景是不重要的,他们感到的是一种个人的自由感。简被玛丽亚的热情和自然所吸引。他说当他说英语的时候能够比在荷兰时说得更自然。玛丽亚则是被简对巴西的关注和了解而吸引的。他们成为一对恋人,或按照他们朋友的说法,“形影不离”。

随着学习生活的进行,他们决定结婚,并且在巴西定居。简为了他的学位论文,在巴西作了实地调查。等到完成博士课程之后,他们结了婚,并且在圣保罗住了下来。玛丽亚的母亲马上开始对其施压,让他们生孩子。最初的时候,简发现玛丽亚的家庭很热情,他也感到愉快。然而,不久他开始感到他们对玛丽亚的要求以及他们包办一切的社交方式让他感到窒息,他无法施展自己的个性,并且感到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受到了干扰。简用自己习惯的方式直截了当地向玛丽亚表达了他的不满,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他开始意识到他不仅仅是和玛丽亚结婚,同时他也选择了生活这样的生活环境:这个环境对他“我是谁?”的整体感觉提出了挑战。如果想让彼此的关系继续下去,他需要用不同于以往的方法来和玛丽亚交谈和互动,而这在他们学生时代却是不必要的。

个体和环境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是贯穿本书的一条重要线索。将这种相互作用当成研究焦点的一些理论家和研究者将自己界定为文化心理学家。跨文化心理学家与文化心理学家不同的地方在于,跨文化心理学家更倾向于对个体和对个体所居住的更广泛的背景(诸如国家)分别

测量。不同层面的分析会告诉我们人类行为模式的不同信息。在第4章中，我们会直接关注心理学中新产生的国家层面的分析领域。

对于我们所关注的情形，不同层面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本书后面关于跨文化情形的章节中尤其重要。当来自于一国的我与来自另一国的你相遇时，会发生什么？你所处的文化环境中的某些因素是否会对你我的交流造成困难？在我们解读对方、运用语言和动作的时候，我们是否有所调整？有没有进行调整会影响到某次特定互动的成功和失败。你我作为个体之间的互动，其成功或失败将决定我们个人人生经验的质量以及我们所组建的合资企业的成功与否。专栏1.5说明了一些可能产生的文化问题。专栏1.5中故事的特殊之处在于，说英语的一方也会说另外一方的语言。精通对方语言的程度是决定跨文化互动成败最根本的因素，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常常低估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两个国家成员之间发生的数百万次的互动是否成功，将影响这些国家的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它们是融合，极化，还是维持现状？国家之间何种层面的接触可望使得他们成为独立、自立的实体，又是何种层面的接触能够促使他们彼此融合呢？

专栏 1.5

先生，这太英国化了

保罗是一名英国的高级管理者，负责一项向一家大型法国企业出售仪器的谈判。在巴黎需要开一系列的会议，作为英国公司的惟一代表，保罗经常和法国公司的一个团队见面。保罗感到谈判很顺利，说自己已经“对法国人有了感觉”，而且还利用这个好机会提高了自己的法语能力。他努力设想在达成协议时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难题，最后他自信地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为谈判的下个阶段作准备时，保罗根据之前会议所达成的共识，让人准备了一份标准化的法律合同。对于法国的合作方来说，将这份合同的内容翻译成法文是没有困难的。在接下来的决定性的会议上，法方拒绝了他草拟的这份合同，他们说：“先生，这太英国化了”。这令保罗感到非常震惊。

在那之后，保罗联系了一名法国的商务顾问，试图找到一条途径将合作继续下去。考虑了讨论中出现的问题之后，保罗得以和法国公司重新开始谈判并签下合同，没有再遇到其他困难。顾问点出了存在的六个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最初的失败：

专栏 1.5 (续)

1. 保罗忽略了等级制度对法国人的重要性，并且没有确认他打交道的人是否有签署合同的权力。
2. 保罗想当然地认为合同的条款不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并且只是简单地要求按照字面意思将英语翻译成了法语。
3. 这份合同草案的表达方式更符合英国人对迂回和灵活性的偏好。它措辞不明确，例如，将来可能遇到的问题会以诸如“届时可再达成协议”的程序来加以处理。而对于法国人来说，这破坏了信任的基础。
4. 保罗没有安排相关的英、法两国律师见面，没有对法国法典中更为严格的要求进行讨论。
5. 这份合同是冗长的，对许多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了详细的说明，但意思表达含糊，以至于法国一方无法找到他们能够提出质疑的重点内容。
6. 保罗负责了整个项目，但是对于法国人来说，有各种不同专业职能的代表参与进来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对于法方来说，和他们的专业力量相比，保罗更像是个外行。保罗认为他一个人单独去法国是降低成本的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们会认为英方没有派完整的团队前来，没有表示出对他们的尊重，并且在合作中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以确保成功，也没有体现出他们的合作诚意。

资料来源：Harper & Cormeraie (1992)。

本书随后的章节主要关注的是当代交流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社会心理后果。这些影响在那些跨国旅行的人、从农村到城市的人以及跨国交流的人中非常明显，并且很多研究也是在这些人群中进行的。回顾人类这一部分群体之间发生什么事时，我们还需要注意这些进程几乎没有涉及所有国家中那些至今仍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们。的确，现代性的一些方面，诸如艾滋病的传播，食品、木材的远距离运输，全球的武器交易可能加速贫困的增长，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并造成了环境的退化。要对什么是人性的共同点进行全面理解，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人类是如何应对现代化情境的，也需要关注他们是如何处理贫困的情境以及如何处理文化群体之间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

在这本书中，我们无法回答之前段落中所提及的所有问题。如果现

在有可能作出全部回答的话，那么还需要来自于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人口统计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贡献。我们想要达到目标是，运用跨文化心理学家们在过去 30 年里发展出的观点来了解我们之前所列出的那些问题。在本书的前 9 章，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心理学在这个世界上的现状，因为这能为我们理解其余几章提供一个必要的基础。在每一章内容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列出小结、扩展阅读的建议和各章的思考题。在本书的结尾我们还提供了一个关键词语表，在该表中能找到对于跨文化心理学家非常有用的一些技术性术语的定义，表中所出现的术语在整本书中都会以粗体字来表示。

在第 2 章中，我们将对以下过程作出解释：为何一些心理学家会反对单一文化视角，他们为什么要发展新研究方法以更好解释全球文化差异。已经得到认识并且需要不断温习的一个教训是，研究者并非不受他们所试图研究的这些进程的影响。心理学家有着自己的文化和教育背景，这会对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产生影响。许多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或者本身就是移民，或者是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结婚，这使得他们能从与不同文化的相遇中获益（Bond, 1997a）。为了减少个人成见，研究者需要与那些社会化历程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这有助于弥补研究者在某些观点上的不足。

因此，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们依据的是我们以北美、欧洲、亚太和土耳其为背景的工作所得来的经验。为了进一步对我们知觉中的种族中心主义进行校正，我们让来自许多国家的跨文化心理学领军人物简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跨文化心理学能够作出积极贡献的、在其各自所在地区中的一到两个重要问题。他们的回答总结在专栏 1.6 中。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同意其他人所提出来的问题。总的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关键问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关注跨文化学者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在随后的两章中，我们将对跨文化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进行探索。在第二编中，我们将回顾跨文化心理学能够作出主要贡献的五个核心领域：社会发展、人格、社会认知、人际关系以及组织心理学。最后，在第三编，我们将依据在第二编所勾画出来的视角来探究当前的全球性动荡。

专栏 1.6

跨文化心理学在各个国家/地区的贡献

国家/地区	潜在的贡献
加拿大	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文化多元主义是一项生活事实，政府已经找到一些方法来弱化其制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 在多样性较小的地区，支持多样性和机会平等。
德 国	提供相关信息以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社会； 帮助管理文化内的冲突，提供方法处理德国历史中有争议的内容。
中国香港	帮助由英国、美国和中国香港人组成的多元文化工作团队，使他们更有效地工作； 提高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的教学。
匈牙利	使得匈牙利更受关注； 阐明匈牙利的文化特点是什么； 将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的作用区分开来。
以色列	帮助各群体理解其他人的世界观，寻找管理他们差异的方法。
日 本	像镜子一样，帮助日本人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
墨西哥	提供理解区域性现实和当地现实的方法； 以一种敏锐的方式解决以下问题：个人和社会发展、贫困、暴力、更好的生活方式等。
南 非	帮助解决发展问题，尤其是财富、冲突解决和促进和平； 支持传统的、有利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例如灵性关怀和对老人的尊敬。
土耳其	提供与土耳其现实相适应和相关的心理学，从而使得土耳其的心理学家能够进行与土耳其社会发展规划中优先考虑的问题相一致的心理学研究。
英 国	克服媒体对少数族群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对“寻求避难的人”的刻板印象； 促进关于欧洲融合的理性辩论。

小 结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跨文化心理学家所取得的成果提供最新的分析，并说明如何用这些成果来解决相互依赖、人口流动和沟通所引起的问题的。

拓展阅读

这里有一个网站，包含了许多当代跨文化心理学家所写的文章。这个网站挂在美国西华盛顿大学，是由罗那博士和他的同事共同建立的。罗那同时也是《跨文化心理学杂志》的创刊编辑，《跨文化心理学杂志》是跨文化心理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一本杂志。网站是免费的，网址为 www.wvu.edu/~culture。可以看一下关于这个网站的介绍。在之后的每一章中，都会有来自于这个网站中的相关文章。

思考题

1. 你会如何用国籍和族性来描述你自己？你能找出你拥有的国家认同感和种族认同感对你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吗？
2. 当你和不同国籍或不同种族的人进行交流时，会产生哪些问题？
3. 对文化的理解能够提高我们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能力，你认为会有哪些问题适用这一判断？

在这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那些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的典型内容，但又不限于这些内容。实际上，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理解特定行为时，不能不考虑该行为存在的环境。所以人们可以争论说所有的心理学（或在某种程度上，应该）都是社会心理学。但是，行为的某些方面会比其他方面有更高的环境依赖性，而正是这些方面需要我们的仔细审查。在本章中，我们探索目前进行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所需要使用的方法，这个任务需要我们回顾历史并聚焦于研究方法。在我们对跨文化调查者所使用的技巧和方法有一些信心之后，我们才对理论和结果的细节进行考虑。在整章中，我们将强调一系列从过去经验中得出的有关方法论方面的观点。

已出版的关于心理学研究起源的描述通常以一种特定的方式书写，暗示通向当代特定研究方法的线性发展过程。那些喜欢实验研究的人强调实验室的建立，如冯特于 1879 年在德国莱比锡建立的实验室。那些喜欢质性或推理研究方法的人会指出斯坦塔尔和拉扎勒斯在德国开创的社会心理学杂志（Lück, 1987）和法国对群众行为的描述性说明（Le Bon, 1985）。英语作者会将麦独孤（McDougall, 1908）在英国和罗斯（Ross, 1908）在美国出版的社会心理学教材作为最早的相关著述，而不会提及早先塔得（Tarde, 1898）用法文、奥雷诺（Orano, 1902）用意大利语写的教材。同样地，特里普利特（Triplett, 1898），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学者，常被认为是在社会影响过程方面做了第一个实证研究，其实林格尔曼早在 10 年前就对同样的主题进行了研究（Kravitz & Martin, 1986），比奈和亨利（1894）也做过同样的事。甚至更早还有来自意大利的报告，讨论如何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行为（Cattaneo, 1864）。尽管这些研究只具有档案意义，在此提及这些研究并不是为了卖弄学

问，而是为了强调我们的第一项告诫：**指南 1：跨文化心理学家不应指望所有的相关研究都是用英文发表的。**

很明显，心理学没有权威的历史，而只有一系列的历史，在其中不同的作者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引向他们所偏爱的现实（Lunt, 2003）。我们自己的考虑亦有一个相似的选择性视角。虽然上面大多数研究含蓄地假设人类行为可以通过在某单一地区取样而得到有效研究结果，我们却寻找那些通过某种比较而对普遍性进行检验的工作。可以区分出通向这一视角的三个相对独立的路径。一条路径带领我们走到社会人类学，一条由心理测量学视角组成，而第三条则基本上产生于北美社会心理学。我们依次来考察它们。

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社会人类学视角

通过对冯特心理实验室的研究以及那些访问他的人的描述，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当代的社会科学专家们所研究的热点问题在那时并不存在。冯特是一个通才，在他后来的出版物中，他采纳了 *Vöelkerpsychologie*（民族心理学——译者注）的术语，而且他的访问者就包括那些逐渐成为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的人，如德克海姆和马利诺夫斯基。冯特对民族心理学的考虑并不是在观察的基础上，而是关注在对语言、神话、习俗、宗教和艺术等问题的分析上。经过 20 世纪上半叶，发展中的社会人类学学科在各种非西方社会民族志学方面斩获颇丰，但是冯特从未利用过这些材料。起初，简单记录给定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实践和社会关系就被认为是值得的。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得以发表，人们不可避免地尝试构建理论，以解释社会差异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呈现。

这就诞生了**文化与人格学派**（culture and personality school）。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用“偏执狂”（paranoid）这样的词汇来表达所有文化的特征，这些词汇也许可以应用在个人身上，在对一个文化中典型的个体进行整体观察时可以衍生出来。她是这样写的：

人们已经认识到，全部人格的组织在了解或者仅仅在描述个体人格时都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一点在个体心理学中成立，那么在

社会心理学中更是如此。须知在个体心理学中个体差异由于人类生命的短暂而受限制，而在社会心理学中，因为超越了时间的局限和从众性的局限，其整合程度也许要比在个体心理学中大。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是按巨大的比例和一个长的时间周期把个体心理学投放到大屏幕上的。(Benedict, 1932, p. 24)

根据这一视角，本尼迪克特主张日本人的国民性是建立在“羞耻”(shame)基础上的，这与西方国家所说“罪”(guilt)的理念形成对照。她承认一些个体也许不符合整体的模式，但她主要关注的是给定社会的总体概貌。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心理人类学家强烈地受到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Piker, 1998)。一旦能够建立人类关系领域档案的庞大数据库，就可能检验不同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实践和特定儿童抚养方式有联系的假设。例如，有来自心理分析的证据支持这个假设：断奶相对晚的社会更倾向于口服治疗疾病的药物(Whiting & Child, 1953)。研究者发现，文化与人格学派特别适用于那些小且具同质性的社会。

当我们试图理解那些生活在当代社会中人们的社会行为时，需要区分个体经验和个体在其中生活的文化环境。在同一个文化群体中，有太多的个体变化，以至于很难证实对文化和人格传统所做的简单化概括是否正确合理。我们在第7章将会更充分地讨论作出这种区分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只简单地记录从该领域的历史发展中得出的第二条方法论指南。**指南2：跨文化心理学家需要清楚地了解个体层面分析和文化层面分析之间的区别。**

另一个田野工作的观点来自于俄罗斯的维果斯基。维果斯基研究中亚的农民社区，聚焦于这些人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他强调这种观点：学习来自儿童发展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例如，儿童从与之互动的更有能力的成人实践者那里获得语言技巧。这些模式阐明了一些比孩子已经掌握的言语和思维方式略微复杂，但仍在“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的言语和思维方式。儿童首先学会用从他或她的社会化榜样那里观察到的新方式说话，然后内化这些技巧。对儿童认知发展中文化传递的关注已经是当代文化心理学(culture psychology)的一个重要前兆(Cole, 1996; Valsiner, 1989; Rogoff, 1990; Segall, Dasen,

Berry, & Poortinga, 1999; 在拓展阅读中 Valsiner 的文章)。文化心理学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儿童, 而是强调一种互惠程序, 通过这种互惠程序, 个体之间的日常互动传递和重新组织着我们对发生在周遭事物的感觉。

心理测量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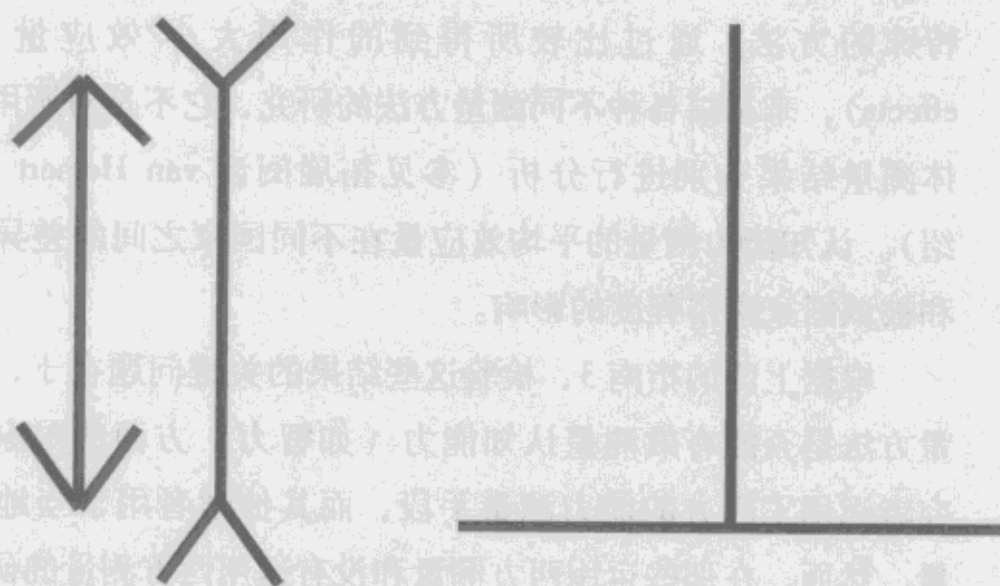
心理学开始与邻近的社会学分道扬镳, 始于以下基础: 心理学强调在控制的情形下研究个体样本, 而不是聚焦于更大的群体、组织和国家。实验者检验在控制环境中对个体施加不同条件后所产生的特定效果, 但也发展出同样强大的只建立在个体心理测量基础上的程序。如果说心理学研究的起点是以这些方法的使用为标志, 那么跨文化心理学的起点就在托雷斯海峡 (Torres Straits) 探险成员开展的研究中。在 100 多年前, 一队社会学家访问了托雷斯海峡的岛屿, 那些位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岛屿。研究团队成员里弗斯把他的研究聚焦于岛屿居民的认知过程。里弗斯把他的被试称为“野蛮人” (savages), 而且被当时流行的观念所影响, 即由于“野蛮人”的智力比白种人 (Caucasians) 低, 他们可能拥有更好的视觉能力:

当地人曾被告知, 一些人说黑人比白人有更好的听力和视力, 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到底有多聪明…… (Rivers, 1901)

不管里弗斯持有什么先入为主的观点, 他得到了一些令人相当震惊的结果。比如他报告说观察者的族性不同, 对视错觉的感受性也会不同。与白种人相比, 土著居民确实对缪勒-莱耶尔错觉 (即在专栏 2.1 中的向内箭头或向外箭头的竖线, 其长度的差异) 感受性较差。但是, 他们对专栏 2.1 中的竖线比横线更长的视错觉的感受性却比白种人更高。近来跨文化心理学已经对不同种类视错觉的感受性进行了大量研究 (Segall, Dasen, Berry, & Poortinga, 1999)。结果虽然不完全一致, 但看起来对错觉敏感性的差别是个体所生活的特定环境类型的产物。在环境中某种特定类型的日常视觉刺激的存在或缺失, 会支持人们发展出相应类型的知觉辨别力。这方面的研究指出与跨文化心理学相关的两个更

专栏 2.1

视错觉



深层指南。第一个，指南3：如果我们希望探测跨文化差异，我们就要采用能够有效找出这些差异的测验。

里弗斯用了大量不同的测试，不仅仅是这里提到的那些。他的幸运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两个不同的视错觉测验。如果他只用了一个，也许就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种族主义的结论，认为一个群体对错觉有更大感受性。其次，在对被试解释他的实验过程时，他选择了欺骗被试。确实这些测试对土著居民来说比较奇怪，显然需要提供某种形式的解释。在后来的研究中，心理学家有时也对其被试说谎，希望这种欺瞒能够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从而更有效地评估被试的反应。

告知被试与研究有关的事项而给跨文化心理学家带来的特殊问题是：如果告诉被试他们是跨国比较研究的一部分，这是否会引起他们的反应有所不同？对托雷斯海峡岛屿上的土著人知觉过程研究来说，答案也许是否定的，但对与社会行为相关的研究来说就不那么清楚了。例如，一个跨文化社会心理学家告诉其被试研究目的是比较跨国间助人行为的水平，将会发生什么？这个挑战带来指南4：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必须小心地解释研究，以不对所得数据的有效性造成损害为前提。取得有效性并不要求欺瞒，但要求给出一个解释，哪怕只是部分的解

释。

近年来针对个体认知能力测试的心理学研究非常多，经常用到一些不同类型的智力测试。范德维弗尔（Van de Vijver, 1997）报告了一项包括 251 个跨国认知能力比较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元分析是一种特殊的方法，通过比较所得到的作用大小/效应量（magnitude of effects），来总结各种不同测量方法的研究，它不是对所用到的每一个具体测量结果分别进行分析（参见拓展阅读 van Hemert 对元分析的介绍）。认知能力测量的平均效应量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受到被试年龄和被试国家富裕程度的影响。

根据上面的指南 3，检验这些结果的关键问题在于，运用不同的测量方法是否能够有效测量认知能力（如智力）方面的国家差异。一些研究者运用了西方的能力测量手段，而其他学者用了当地发展出来的测量。然而，在那些运用西方测量和没有运用西方测量的研究当中，范德维弗尔没有发现效应量方面的显著性差异。对更多的社会产物，测量的来源地不同，结果也可能会有差异。

某些民族群体和来自某些国家的人的智力测试分数较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的人高，对于这些发现有许多争论。它涉及是否运用了“文化公平”（culture-fair）的测量工具。视错觉的研究结果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预期产生于不同地区的不同种类的智力依赖于这些地区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根据与当地环境相关的有效加工信息的能力来定义智力，而不是用一个人拥有某种绝对品质来衡量。西方风格的教育可能强调逻辑和抽象思维，而其他特定情境下也许要求其他的思维方式。芒迪—卡斯尔（Mundy-Castle, 1974）对西非人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智力组成成分的认识，发现他们把社会技巧视为与技术性技能同等重要的智力。西格尔（Segall, 1999）等人注意到进一步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与其把认知能力当作一个一元的特质来对待，不如倾向于研究人们在各自的环境中为生存所需而发展出各种适应不同环境所需的认知能力（Sternberg & Grigorenko, 2003）。尽管在大多数跨国调查中所用的认知能力测量仍然强调西方对抽象推理的关注，但很有意思的是，近来西方国家对“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表现出极大兴趣（Goleman, 1996）。这个发展表明：首先在非洲区分出来的社会

专栏 2.2

什么时候的差异是文化差异

在智力分数上的国家差异聚焦于能力而不考虑情境。如果我们把情境包含进来进行比较,会发生什么?在上了一年学后,芬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儿童全部达到了由研究者构建的单词阅读和非单词测试的90%以上的准确率;而葡萄牙和丹麦的儿童只能达到70%的准确率;而英国的儿童只达到了40%,他们需要花三到四年才能达到90%的准确率。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是因为英国的孩子通常是四到五岁就开始上学,而其他欧洲的国家儿童都更晚?是因为英国的老师在阅读方面的教学缺乏特定技能?或是英国教师更缺乏激励?

对此差异的主要解释是英语是一门较难读的语言。西班牙或希腊的儿童更容易学习阅读,因为他们的语言是语音一致的。也就是说,给定字母的组合总是发同样的音。在英语中,元音的发音常常取决于和它们组合的辅音。比如在“cap”、“call”和“car”中“a”的发音,在“go”和“do”中“o”的发音。

由于语言各不相同,比较阅读学习的准确率不同于比较智力,然而智力测试者试图让他们的测试“文化公平”。在阅读学习中的差异应该被看作一个文化差异,还是只能被归因于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吗?这些问题将在第3章讨论。

资料来源: Seymour, Aro, & Erskine (2003); Goswami, Porpodas, & Wheelwright (1997)

智力,确实不只与技术落后社会中的有效运用相关。

测量认知能力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可以用派克(Pike, 1967)提出的、后经贝里(Berry, 1969)加以推广的一种有用的方法来解决。在试图研究一种墨西哥印第安语言时,派克发现不同语音和语调的使用影响该语言中特定发音的意义。按照语言学中所使用的概念,语音产出(phonetic production)影响具体音素(phoneme)的含义。利用这一区分,贝里对比了跨文化研究的两种方法。首先,人们可以假定存在着普遍性,并且用此方式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发现有证据表明存在着差异。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客位法”(etic approach),与普遍主义者在语音学——对声音的研究——上做出的假设一致。作为选择,人们还可以从

研究一个特定文化群体的特色属性入手。他把这种方法称之为“主位法”（emic approach），因为它聚焦于本土的含义，最容易倾向于依赖那些该文化群体中的人们所提供的信息。这种取向和语言学中对特定语言的音素属性的聚焦相平行。

贝里提出大多数跨文化研究起初是“强加式客位法”（imposed-etic），也就是说，它们以西方概念为基础，并且在非西方国家的情境下运用和测量。其假设是：概念和测量在新情境中有同样的含义。全球对智力测量的运用，如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 WISC）、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 WAIS）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芒迪—卡斯尔的主位法研究凸显出强加式客位法测量带来的局限。随着研究领域的全面发展，更多的主位研究改进为“衍生的客位法”（derived-etic）测量，这种衍生的客位法测量能够使结果在更广泛的情境中具有同样的效度。

对情绪再认进行的跨文化研究中可以找到此方面的例子，我们会在第6章讨论这方面的内容。在早期的研究中，要求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辨认照片上美国人面部所呈现出的表情。这个程序假定所有可能的情绪表达类型都可以在美国人脸上发现。在后来的研究中，来自所有被试国家的人脸都被放进去了。贝里的理念带领我们得出**指南5：跨文化研究需要确保刺激材料和测量在每个地区都可以得到可比较的理解。**

编制在世界不同地区都能够以相同程度和相似方式理解的测量工具，并不仅仅要求所用的项目对被试来说是熟悉的问题和任务，还要确保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能够意义等值（equivalent meaning）。为达此目的，最广为接受的方式是往返翻译法（back-translation）（Brislin, Lonner, & Thorndike, 1973），也就是说，首先把测验从最初开发时的语言翻译到即将施测的国家的语言。第二个双语人士在不看原始版本的情况下，把项目再翻译回最初的语言。比较翻译版和最初版，可以发现有问题翻译，并通过两个译者之间的讨论产生一个改进版本。

两个译者之间的讨论常聚焦于直译法对去中心化（decentering）翻译的相对优缺点上。去中心化的翻译是指其所使用的术语不是精确的语言等价，而是运用翻译者的文化知识找到在两个文化间具有等价含义的短语。如，说英语的人说到从不幸运中看到希望时可能会说：“每一片

云都有一条银衬”(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而说中文普通话的人可能会说“每一片云都有一条粉红边”。一个去中心化的翻译会倾向于用一个相类似的更普遍的说法而不是采用特定的描述语, 如“不幸的事中也有好的一面(something good comes from any misfortune)”。在编制一种能在不同地区被人们以相似的方式理解的测量时, 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参见专栏2.3的说明。

一旦对一个问卷中所有项目都作出了令人满意的翻译, 下一步就需要确定, 被试对一个量表中各个项目的反应, 是否与在原语言中的反应相同。在原语言国家中建立测量工具的程序也必须在新的适用国家中重复进行。翻译的量表是否有足够的**信度**(reliability), 换句话说就是对测量同一品质的项目是否具有一致性的反应模式?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失去了**信度**。其次, 对不同量表作出不同反应的方式是否与原语言国

专栏 2.3

表达愤怒

斯皮尔伯格与其同事开发了一个工具, 用于测量人们处理其愤怒感受的方式。在美国, 他用此工具区分出压抑愤怒的人、让愤怒爆发的人、意识到愤怒并能积极控制的人。他用**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的方法开发出“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 STAEI)”。这个测量工具随后被翻译成各种语言, 作为一种强加式客位法的测量手段, 用于在加拿大、挪威、奥地利、意大利和新加坡进行的研究。但是, 他发现在挪威语中描述体验和表达愤怒的词汇比英语中少。在STAEI中运用的英语中关于愤怒的比喻(例如“火气上来了”, burning up)在挪威语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表达。相反, 一些挪威语中的隐喻“Jeg r forbannet”(我被诅咒了)在英语没有直接的对应表达。在新加坡, 他发现“压抑愤怒”(anger-in)的项目“I am secretly quite critical of others(我背地里批评别人)”负荷在“发泄愤怒”(anger-out)的因素上。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新加坡华人被试把它理解为在别人背后说坏话, 而西方被试把它解释为怨恨在心、但不去谈论他们。为了比较的目的而设计具有跨文化效度的测量手段时, 应当甄别并删除那些有歧义的项目。

资料来源: Haneth (1996); Tanzer, Sim, & Spielberger (1996)

家的因素分析中所显示的结果相同？最后，是否有证据（如与其他量表的相关性）支持新情境中这些测量的效度（validity）？指南 6：研究者要有证据表明其测量在每个新的文化设置中具有效度和信度。

实验的视角

虽然田野工作和心理测量视角都为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但最独特和更有心理学研究特色的方法是实验法（experimental method）。心理学家偏爱实验方法，因为它提供了确定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最好机会。如果一个人想对实验有足够的控制，必须做出简化的设置，但为了发展真正科学的心理学（一种能够建立起因果关系的心理学），人们认为值得付出这样（简化）的代价。

尽管实验方法在早期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影响，但在奠定当代社会心理学的过程中，很多关键性人物都是那些真正偏爱实验的人，尤其是在美国的那些研究者。20 世纪 30 年代政治动荡使得一些卓越的研究者，如勒温和谢里夫等人都到美国避难。其他一些关键人物，包括弗里茨·海德和所罗门·阿什在更早时就移民到了美国。而且，尽管社会心理学的起源在欧洲，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普遍的破坏和混乱，社会心理学的实践有一段时间基本上局限于美国（Farr, 1996）。勒温、谢里夫和阿什都赞同这样的理论，都强调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美国的下一代研究者们继承了他们的观点，寻找用实验性途径来阐明这种环境作用的方法。为此他们创造了简化的设置，让实验被试暴露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经过多年，这些程序和他们想验证的理论越来越复杂，但他们都寻求探索环境性社会领域变量对那些在这些设置环境中互动的人的不同影响。

北美实验社会心理学家和那些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心理学家一直在寻求方法来理解他们研究结果之间的异同，这一寻求过程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最初，美国研究者主动与世界各国的学者合作，试图复制他们在美国得到的结果。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这些研究结果存在很多问题。当社会心理学在世界范围内有了更广泛的实践，第二个阶段开始出

现。各种对实验方法的批评已经成形。在一些国家，研究者开始进行有利于“本土（indigenous）”心理学的论证，遗弃实验方法，而采用在文化上更合适的方法。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欧洲，批评集中在如何改进实验方法而不是遗弃它。第三阶段，即目前的阶段，来自各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增进合作，建立和发展解释文化差异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依次来看这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重复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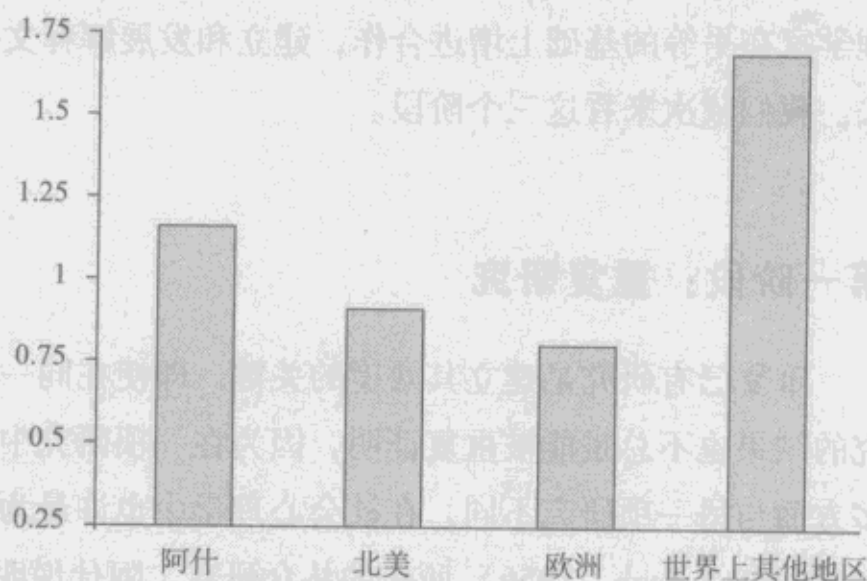
重复已有研究是建立其效度的关键。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一项研究的结果也不总是能被重复证明，因为在一项研究中的被试可能会在很多方面与另一项研究不同。在社会心理学中也许最为广泛重复的实验研究是阿什（Asch, 1956）所作的从众研究。阿什说明当一个实验小组的多个实验者同谋都对几条线中的某条与另一条线的匹配给出错误判断时，不知情的实验参与者也常给出不正确的反应。阿什把这些效应用从众来解释，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不知情的被试作出的反应中只有 38% 确实表明了从众。这个研究也可以用其余 62% 的反应，按照独立性来加以解释。

邦德和史密斯（R. Bond & Smith, 1996）对 134 项已发表的阿什从众效应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在这些研究中，有 97 个是以美国人为被试的，而其余的研究以来自世界上 16 个其他国家的人为被试。邦德和史密斯用美国数据来评估产生于不同试验程序、不同被试及不同研究日期的差异效应。当他们检验在北美之外进行的研究时，他们就能区别出来源于这些因素的方差。如同专栏 2.4 所表明的，群体对从众反应的影响在欧洲要比在美国小，但在世界其他各国的从众反应要比在美国高。

这个大范围分析的结果提出两个问题。首先，一个标准的实验程序在世界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即使把那些在美国重复的研究中能够发现的所有差异都扣除之后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在效应大小上存在差异。邦德和史密斯检验了各种以文化为基础的解释，在第 3 章中介绍了各文化理论后，我们将会再回到这项研究。

专栏 2.4

在重复阿什研究中的平均效应大小



资料来源: R. Bond & Smith (1996)

第二,有必要考虑阿什取得的具体实验效应叫什么。阿什称之为从众,随后的研究者也跟着用。但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可能同样的行为有不同的含义。调查这种行为的一个可能方法是通过问那些参加实验的人为什么这样做。阿什这样做了,从他的美国被试那里获得了各式各样的回答。有人说他们认为自己的视力出了问题,有人想避免难堪所以不想在公众面前给出“错误”的答案。我们缺乏来自其他国家的访谈资料。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给出错误答案的被试不是为了避免他们自己陷于难堪,而是为了避免让其他人难堪!面对一群显然是给了错误答案的人,有些人会更圆滑或更敏感,因而会选择给出错误答案来减少他人的羞辱。

其他很有名的美国研究也常在美国之外的地方被重复,产生了和阿什发现相一致的结果。例如,米尔格兰姆 (Milgram, 1961) 关于服从权威人物的研究在世界其他 8 个国家重复过 (见 Smith & Bond 1992 年的回顾,第 2 章)。重复实验所发现的服从水平不同,但在所有的研究中都有效应。然而,当许多其他的研究在新地方被重复时,结果有时不显著,有时甚至和在美国得到的结果方向相反。阿米尔和沙龙 (Amir &

Sharon, 1987) 试图评估不可复制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他们没有关注那些著名的研究, 而是选择了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6项研究, 试图重复它们的结果, 以以色列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为被试。他们有意选择了在方法和设计上适合于以色列被试的研究。原来的6个研究共产生了37个显著效应, 而在以色列的两个样本中, 只有16项显著效应得到了重复, 还有9项结果只在其中的一个样本中得到重复。他们还发现了27个显著效应, 而这些效应是在原先的研究中所没有发现的。这样, 看起来可重复性问题是重要的, 即使在两个被许多人看作相对类似的文化体系中评估亦是如此。

一个特别惊人的例子来自于称之为社会懈怠效应 (social loafing effect) 的研究。研究已表明: 在美国, 当人们与他人一起工作时, 个人对任务付出的努力要比单独工作时少。卡劳和威廉斯 (Karau & Williams, 1993) 对来自美国的147项和来自亚太国家的15项关于社会懈怠效应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在简单任务上, 如拍手或喊叫, 社会懈怠效应在亚太国家和在美国是相等的。在较复杂任务上, 亚太国家的研究表现出完全反向的结果: 在团体中工作的人们比在单独工作时更努力。厄尔利 (Earley, 1993) 对这些结果进行了更深入的洞察。厄尔利研究了从事某项工作任务的美国、中国和以色列管理者。当以色列和中国管理者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团队工作的一部分时, 他们会更努力, 而当美国人认为他们是在独立工作时, 工作更加努力。另外, 在团体中工作的一些被试被引导相信他们是和那些他们认识的人组成团体, 而其他参加者被告知他们是在和陌生人一起工作。以色列和中国管理者只在与自己团体工作时有更多的社会付出, 在与陌生人工作时没有发现这一效应。这项研究开始为文化差异的本质提供线索, 而文化差异的本质可以解释跨国社会懈怠效应的反转, 而且在第3章讨论了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和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 概念之后我们将会进一步探究。

实验方法的一个要求是实验者需要那些很容易就能出现在心理学实验室的被试。这个考虑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做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家常在学生中取样。学生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普通的人群, 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也是如此。跨文化比较建立在学生样本上有额外的风险: 学生样本在不同的国家差别很大。在西方国家, 大学教育占同龄群体相当大的一个比

例，但在许多国家，进入大学教育的人只是同龄人中很小的比例，是不成比例地来自精英家庭。比较学生样本可能带来误导的结果。运用其他人口群体可能更为可取，如同厄尔利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样。指南7：取样的总体应该具有可比性。

第二阶段：去中心化研究

在上文中我们注意到研究材料的翻译者常需要使用去中心化的方法来让翻译在另一个语言中有意义。与此相似，早期尝试在其他地方重复美国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方法需要去中心化。在社会心理学实验中要求参与者把舞台事件当作是“真实”发生的那样来对待，这种舞台事件要求参与者在短时间内与一个或多个陌生人进行典型性互动。在一个人们通常不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背景下，在这样的设置中得到正确反应的可能性较小；而在一个人们习惯于与陌生人打交道的背景下，得到正确反应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研究者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时，强调有特色的或“本土”视角的重要性。例如马库斯和北山（Markus & Kitayama, 2003）曾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所知的心理学还不不是一个综合性的心理学；它像是美国本土心理学，或更确切地说，是世俗的、中产阶级盎格鲁美国人的心理学”（p. 280）。通过检验其他的本土视角和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我们能够就不同的方法是否适合不同的国家背景，或关于方法论的争论能否超越国家的界线形成一个看法。

我们首先来考虑欧洲的例子。二战后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最初恢复归功于来自美国的访问者（van Strien, 1997）。阿盖尔（Argyle, 2001）在回忆很多早期美国来访者访问他在英国牛津的研究团队时写道：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信息和帮助。我们的团队成为一个把美国社会心理学传递到英国的重要途径。但我们还是与美国社会心理学保持距离。他们早已把我们变成了殖民地，大概是有意为之，但我们改变了这个模式。我们对他们的本土的和精心设计的

实验印象深刻，但我们也发现它们过于人工化、不足以与真正的行为相联系。我们看不到这种研究怎样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我们正在寻找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做研究。我们偏爱的方法也许会在美国的几个地方发现，但不是在主流中。(pp. 340 - 1)

阿盖尔对解决实际问题 and 避免过于人工化问题的关注得到早期美国一些研究的回应。例如，谢里夫和他的同事进行的组内冲突现场实验系列，每一项都持续了几个星期 (Sherif, 1996)。但是，这些研究只是特例。随着欧洲社会心理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发展，批判的视角以这种方式形成了：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忽略了研究进行的社会情境 (Israel & Tajfel, 1972)。塔杰夫是支持这个批判观点的带头人，他们批评说这些实验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仅仅关注个体以及个体对一个临时人为设计的、不现实的社会情境的反应。他认为小群体和大群体的从属关系在决定社会行为时起着更为重大的作用。这使得他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和随后发展出的自我分类理论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Tajfel & Turner, 1979; Turner, Hogg, Oakes, Reicher, & Wetherell, 1987)。这些理论在欧洲社会心理学家中非常流行。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继续使用实验方法，但他们着重检验真实世界中群体从属关系影响的假设。

第二个也是更激进的对社会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批评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斯科维奇 (Moscovici, 1972) 清晰地表达出来的。莫斯科维奇提出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社会表征 (social representations) 观点。回顾维果斯基的工作，他提出社会知识不是存在于个体身上，而是在人们共同分享的关于外部环境中人物、观点和物体的表征中。研究社会表征的研究者大多抛弃了实验方法，更多依赖访谈和观察，以阐明一个或另一个概念是如何被社会表征的。例如，用具体的研究检验对健康、疾病、欧盟或个人的社会表征。社会表征的研究在欧洲和拉美一些地区较为盛行。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表征方法都可以被看作起源于欧洲的本土化理论，但现在两个理论都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拥护者 (Smith, 2005)。

本土心理学的大部分其他尝试已演化为对实验方法的激进拒绝以及在单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出的研究心理学的合适方法 (Kim & Berry, 1993; Sinha, 1997)。这方面大量的工作目前出现在中国台湾和菲律

宾 (Church & Katigbak, 2002)。Syklohiyang pilipino (菲律宾心理学) 使用了基于团体参与的数据采集的独特方法, 并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本土概念, 其中 kapwa 据说是描述菲律宾社会关系的最佳概念。恩里克斯 (Enriquez, 1993) 提出警告说在这些概念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有不足之处。他注意到当 kapwa 被直译为“他人”(others) 时, 其英语单词的内涵具有排除性, 但在塔加路族语 (Tagalog) 中 kapwa 暗示着包含那些认识的、支持性的他人。

部分本土心理学家的的工作只具有示例的作用, 因为它们很少是用英语写的。很多中国台湾人的研究都发表在中文期刊《中国社会本土心理学研究》(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上。从一些中国台湾学者的研究中, 杨国枢提出了“十要”和“七不要”。在专栏 2.5 中列举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请注意杨国枢把西方心理学描述为一种本土心理学, 而不是主流心理学或共通的心理学。

然而, 对那些据称为本土性的概念的翻译并不总是证明其具有独特性。例如迪亚兹—格雷罗 (Diaz-Guerrero, 1993) 区分出超过 100 个在墨西哥得到广泛认可的“历史社会文化前提”, 这些前提形成了他和同事创立的墨西哥本土民族心理学 (ethnopsychology) 的基础。这些前提

专栏 2.5

怎样进行本土心理学研究

- (在处理理论的、方法论的和实证的研究问题时) 要容忍在理解上的不清晰或模糊状态, 不要急于下结论, 直到在研究过程中你的头脑中出现一些本土的东西。
- (作为一个研究者) 要成为是一个典型的文化意义上的本国人。
- 要考虑所研究的心理的或行为现象, 以及它的社会文化背景。
- 要优先研究那些文化上具有独特性的现象。
- 要把你的研究建立在你自己文化的知识传统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西方文化基础上。
- 不要忽视西方心理学家在发展其自己本土心理学中的重要经验, 这些也许对发展非西方本土心理学有用 (加以强调)。

资料来源: 摘录自 Yang (2000)

是由态度陈述所组成，倾向于支持由迪亚兹—格雷罗所命名的归属服从（machismo）——对爱的尊重和贞洁。但是，艾思赛齐（Aycicegi, 1993）把挑选过的一些词翻译成土耳其语，发现土耳其被试也认同所有这些陈述。在这本书的不同地方，我们将讨论几个其他概念，这些概念具有不适用于其他文化的意义。也许这样的概念还有很多，还没有在心理学文献中被提及，而且对本书的读者来说，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有肥沃的土壤可以探索是否可能存在与这些概念的重叠。

目前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本土研究中不断提出的方法论两难困境。我们怎样知道从不同语言中提取的概念是否有同样的含义？比如 kapwa 的例证中，存在着不证自明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发展出一个最终统一的心理学来说是一个主要威胁吗？或者这些差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细枝末节，尽管很重要却不会遮蔽更一般的人类普遍规律？我们可以为这些问题提出一个暂时的回答。指南 8：普遍性规律的证据，更有可能从一系列在不同国家中完成的、用于探索一个概念的意义的多项平行研究中发现，而不是从直接对该概念均值的跨国比较中得出。

这条指南要比其他已经给出的指南更具争议性。许多跨文化研究都涉及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均值的直接比较，如前文所提及的阿什的“从众”研究。这类研究在区分文化差异方面很重要，但并不能告诉我们在不同文化情境下听起来相似的概念是否具有同样的含义。为发现一个概念的含义，我们需要在每个文化情境中确定其相关概念。这个概念的相关概念限定它的“基则网”（nomological net），这一套含义会让词的用法具有意义，并帮助社会学家构建关于这个概念的理论。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现象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具有同样的相关概念，那么我们可以更有信心认为正在研究的是同样的现象。例如，我们回到厄尔利对社会懈怠的研究。如果我们发现尽管在一个国家中团体工作存在更多的懈怠、在另一个国家中个人工作存在更多的懈怠，同样的预测指标与两个情境中懈怠的出现或消失均相关，那么我们能够自信地认为我们正在比较同样的事物。例如，我们也许会发现，不同国家对某些价值观的认可水平也许可以解释被试独自一人或在一个群体中时懈怠行为的变化。

第三阶段：当代跨文化研究的基准点

在前面的部分，我们阐述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对全球范围内基于实验方法的心理学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保留观点，他们认为实验法是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所偏好的方法。范德维弗尔和梁觉（Van de Vijver & Leung, 1997）对跨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全面的讨论（见拓展阅读中 Van de Vijver 的文章）。我们的立场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特定的方法论，每个人都可以说明另一些方法可能遗漏的一些方面。我们已经暗示过运用某些研究方法开展的研究可以架设桥梁，至少可以部分地弥补目前应用的多种方法之间的鸿沟。这里我们强调一些在近几十年跨文化研究的成就，这些内容对评估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所报告的各项研究的质量是有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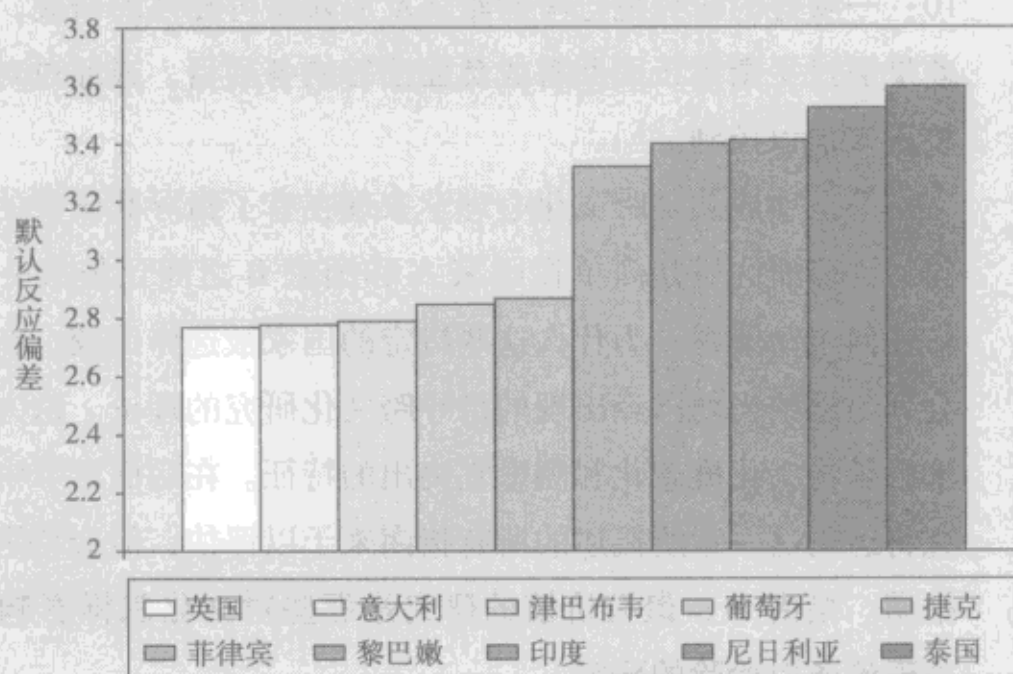
第一项将要予以关注的成就是，在一项跨国研究中所包含的多个国家之间，国内与国外的学者进行平等协作，这样的研究越来越多了。在了解社会行为的模式时，外部和内部的观点都是有价值的。对主位研究者来说，很容易错误地认为他们文化的一些方面是独特的；对强加式客位研究者来说，同样很容易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测量抓住了一个文化中所有的重要方面。他们在一起能够相互纠正对方的盲点。平等不是很容易取得的，因为一些研究者会根据资历、假想中更高的专业程度等顺从他人。但是，就内部对外部的视角而言，没有人比其他人更能称得上是专家。指南 9：一项好的研究会表明其吸收了来自主位和客位两方面的观点。

第二项成就关注于测量。在本章中详细讨论的两种研究类型都非常强调客观测量。在阿什的研究中，通过实际记录来判断来测量社会影响。在社会懈怠的研究中，使用了实际工作绩效的测量。然而，绝大部分跨文化研究者报告的都是运用态度、信念、价值观或抽象判断的测量量表。所有这些反应都记录在评定量表上，最典型的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利克特量表（Likert scales），通过诸如“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或“很多”到“一点儿也不”这样的短语来锚定反应。

专栏 2.6

说“是”还是说“不”

此研究调查了来自 43 个国家的经理。被试要回答在处理八种独立的工作事件时他们对八种指导资源中每一种的依赖程度，要从五点评分中选择。这样，每个被试提供了 64 个评分，每个经理不大可能在处理八种事情时都依赖八种指导资源。下面是研究者称之为“文化均值”的最高分和最低分。这种 64 个评分的均值——是对总体陈述同意或不同意的净倾向。请注意最高分和最低分的差异 0.82，在国家间跨度占整个五点评分量表的 20%，这表明默认反应偏差可能是解释跨国比较上的一个主要误差源。



在一项深入研究中，对默认反应偏差的预测从七种不同调查中得出，每一项调查至少有来自 34 个国家的被试。就哪些国家倾向于评分高，哪些倾向于评分低而言，在不同国家间发现了真实而一致的倾向。评分最高的国家是那些强烈认同集体主义家

a, Peterson, Schwartz 等 (2002); Smith (2004a)

资料来源: Smith

霍夫施泰德 (Hofstede, 1980) 的研究对跨文化心理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会在下一章展开讨论。霍夫施泰德研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

他识别了世界各国的被试在利克特量表的“同意”或“不同意”选项上有着不同的倾向性。霍夫施泰德通过分数的被试内标准化 (within-subject standardization), 有时也被称之为自比 (ipsatization), 克服了这一难关。换句话说, 他推论当给予很多相互矛盾的陈述时, 一个被试不可能逻辑上全部同意所有的陈述。结果, 为了有效地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均值, 一个被试在每一个项目上的回答必须是相对于其在所有其他项目上的分数而言。霍夫施泰德把这种矫正用在了整个国家的层面上, 但它完全可以用在个人上。下面章节会讨论那些没有进行这种矫正的研究, 它们所得出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更有可能反映了默认反应偏差 (acquiescent response bias) 的差异, 而不是这些研究所声称的其研究对象上的差异。专栏 2.6 阐述了最近一项研究中需要矫正的文化差异。指南 10: 一项好的研究是已考虑默认反应偏差可能性的研究, 而默认反应偏差是通过平衡需正面回答或负面回答的各项目, 或通过对偏见的评估和校正来加以控制。

第三项成就是跨文化心理学家现在有了指导其研究的理论。在早些年, 许多研究只是简单在国家 A 和国家 B 之间比较某一个作用, 不会作任何主动解释: 为什么这些特定的国家被选作比较。在下一章, 我们会列出那些当前已经出现的指导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这方面的进步已要求必须将文化概念化和测量它突出的特征。在后面章节中选来讨论的研究将运用这一章所概述的所有指南来予以评估, 但会特别关注最后一个指南。指南 11: 最有价值的研究是那些对文化怎样影响研究结果的相关理论予以检验的研究。

小 结

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研究心理现象比在单一总体中研究需要更多的技巧。本章总结出了有效研究的 11 条指南, 这些指南得自于先前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方便参考, 我们在这里列出它们。

1. 跨文化心理学家不应指望所有的相关研究都是用英文发表的。
2. 跨文化心理学家需要清楚地了解个体层面分析和文化层面分析之间

的区别。

3. 如果我们希望探测跨文化差异,我们就要采用能够有效找出这些差异的测验。
4. 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必须小心地解释研究,以不对所得数据的有效性造成损害为前提。
5. 跨文化研究需要确保刺激材料和测量在每个地区都可以得到可比较的理解。
6. 研究者要有证据表明其测量在每个新的文化设置中具有效度和信度。
7. 取样的总体应该具有可比性。
8. 普遍性规律的证据,更有可能从一系列在不同国家中完成的、用于探索一个概念意义的多项平行研究中发现,而不是从直接对该概念均值的跨国比较中得出。
9. 一项好的研究会表明其吸收了来自主位和客位两方面的观点。
10. 一项好的研究是一项已考虑默认反应偏差可能性的研究,而默认反应偏差是通过平衡需正面回答或负面回答的各项目,或通过对偏见的评估和校正来加以控制。
11. 最有价值的研究是那些对文化怎样影响研究结果的相关理论予以检验的研究。

这些指南能够帮助我们对本书后面待讨论的研究予以评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在设计和实施能够达到此等标准的研究上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还远不能宣称我们已经全面了解了文化对社会程序和行为的影响,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

拓展阅读

1. Replications in other nations of early US studies are discussed in much fuller detail in Smith & Bond (1998, Chapter 2).
2. Bond, R., & Smith, P. B. (1996). Culture and Conformity: A meta-analysis of studies using Asch's (1952b, 1956) line judgement task.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 111 - 137.

3. Valsiner, J. (2004). Culture and its transfer: Ways of creating general knowledge through the study of cultural particulars. www.wwu.edu/~culture
4. Van Hemert, D. A. (2004). Cross-cultural meta-analyses. www.wwu.edu/~culture
5. Van de Vijver, F. J. R. (1997). Meta-analysis of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test performanc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8, 678 – 709
6. Van de Vijver, F. J. R. (2002). Types of cross-cultural 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www.wwu.edu/~culture

思考题

1. 在研究不同文化时是否应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有没有对所有文化情境都适用的方法？
2. 哪一种研究方法更有利于我们了解跨文化的问题：田野工作、心理测验和调查，或是实验？
3. 从 11 条跨文化研究指南中挑选一个并解释为什么它对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是重要的。



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有用。

——科特·勒温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探索了跨文化研究中最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现在我们需要面对我们所探索的领域中最核心的一些问题。在本章中我们讨论如何更好地定义一些概念，我们需要这些概念来指导跨文化研究者的工作，然后在讨论如何运用这些概念来解释文化之间的相似和差异的过程中，对我们所取得的初步进展进行评价。

文化、国家和社会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关于文化概念的有效定义，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在人类学家早期成果的基础上，心理学家较晚才加入了这场争论。人类学家在文化这个概念中发现了特殊的价值，他们对相对较小和相对孤立的人类群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认为通过文化这个概念可以将他们对这些人类群体的理解糅合在一起。但对于如何从概念上定义文化，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泰勒（Tylor, 1871）早在 1871 年就提出了一个有影响的定义。他将文化视为“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他可以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表现出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的整体。”（Tylor, 1871, 卷 1, 第 1 页）。由于后来的批评者们更青睐于那些各不相同，又不那么包罗万象的定义，导致了大量狭义的定义，以至于到 1963 年克罗伯和克拉克洪（Kroeber & Kluckhohn, 1963）能够分辨出的定义多达 161 种。赫斯科维茨（Hersk-

ovits, 1948) 从人类学视角提供了一个精巧而又简洁的总结, 将文化描述为“人类环境中人造的那一部分”, 这里的“人造的”包括实际的人造物品和社会体系。例如, 在研究太平洋中超卜连群岛居民的过程中, 马利诺夫斯基 (Malinowski, 1927) 调查了岛上居民所创造的行为和实物结构, 二者的结合限定和维持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超卜连群岛居民创造了一种特色文化, 这种文化可以同其他地区的文化进行对照和比较。

再后来, 心理学家 (以及不少人类学家) 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较为现代化的社会中的人类行为。为了这个不一样的目的, 他们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考察文化。至少从政治的含义上来讲, 现代社会被划分为国家, 很多国家幅员辽阔, 不同的国家之间彼此有着实质性的接触。国家和社会有没有区别? 我们能够说一个国家拥有一种文化吗? 罗那 (Rohner, 1984) 探索了如何在现代和变化着的社会中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文化”的精髓在于个体用共享的方式解释他们周遭的事物。这些可以共享的解释不仅包括个体的行为, 而且还包括这些行为所发生的环境。如果你和我能够就一个特定的姿势表示友好而不是表示侵犯达成一致, 或者我们都认为那个姿势是美丽的而不是丑陋的, 我们就是以相似的方式在解释我们周遭的世界。如果在我和你之间这样的相似之处不可胜数, 就可以说你和我共享一个文化。

请注意, 原则上说, 这项判断可以运用到所有层次上。我们可以认定一桩婚姻、一个核心家庭 (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家庭)、一个工作团队, 一个完整组织或是整个国家为一个文化。在每一种情况下, 我们都需要找到一项标准, 依据这项标准可以判断到底需要多少相似之处, 我们才可以说“一种文化存在 (而不是不存在)”。由于涉及的个体的数量不同, 在确定一个家庭是否拥有一个文化时, 应当比确定一个国家是否拥有一个文化设置更高的标准。随着时间变化, 对文化的定义从强调行为模式转变为强调可归因于行为的意义共享, 这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向认知心理学变迁的发展是同步的。在人类学中也发生着类似的革命。因此, 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格尔茨这样写道: “因此, 对文化——此种 [行为] 模式积累起来的全部——的研究是对一种机制的研究, 个体和由个体组成的群体通过运用这种机制在这个世界中为他们 (它们) 自

已定向，没有这套机制，这个世界对他们就是模糊不清的”（Geerts, 1973, p. 363）。

以这种方式来定义的文化是相互联系的实体所拥有的一种特点，而不属于组成实体的个体。我们有时候说个体接受了教化，但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化只能从集体的角度给予定义。如罗那所说的那样，文化是“由人类总体或由可以确认的人类总体的一些层面所维持的习得意义的总和，这些习得意义是等值的而且是互相补充的，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承”（Rohner, 1984, pp. 119 - 20）。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可能会经常地指出个体具有某种特定的“文化定位”（cultural orientation）。“文化定位”是指个体在解释周围环境时同某个文化维度保持一致的倾向性，我们将在本章中对这些文化维度予以探索。谈及个体“文化定位”的同时，我们也就承认了在文化和个体之间的一种连续的互动关系，个体在一种文化中达到社会化，又反过来维持这种文化。对于那些自称为文化心理学家（culture psychologists）的人来说这种互动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施韦德（Shweder, 1991）将文化心理学的目标定义为对“心理状态”的研究，并将心理状态同等地定位于个体之中以及更大的总体之中。他的立场可以按照两个主要的原则予以阐明：

存在的不确定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existential uncertainty）声称，人类从出生开始就有很强的从社会文化环境中抽取意义和资源的动机，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安排就是为了向他们提供可以用来把握和使用的意义和资源。意图性（或构成性）世界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tentional worlds）声称，主体和客体、实践者和实践活动不能被分析为独立变量和相依变量。对它们的认定是相互依存的，在假想的对比中，如果不从一方中借取具体的规定，另一方自身也无法定义。

施韦德干净利落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廓清文化心理学家和跨文化心理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之间的区别。文化心理学家强调个体和文化难解难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方式，跨文化心理学家看到了使用不同的术语去刻画个体的视角（文化定位）的好处，以及他们对周遭事物的理解被他人所分享的程度。

罗那同时强调说，区分一个文化和一个社会系统很重要。一个社会

系统包含“一个由文化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中多个个体的行为，包括他们的互动模式以及社会关系的网络”（Rohner, 1984, p. 126）。社会系统可以小至一个家庭或大至一个国家，但它们是按照行为模式，而不是那些行为所赋予的意义来定义的。

大多数行为的意义并不能仅由行为本身而证明，如果我站得离你很近，在一种文化中你可以把我的行为解释为是友好的，在第二种文化中你可以把它解释为侵犯性的，而在第三种文化中你可能把它看成是性骚扰的一种形式。即使如“我打你一拳”这样的事情，你可以依赖许多不同的情境线索将这种身体接触解释为嬉戏、意外事件或是敌意。社会体系定义行为模式，文化背景提供这些行为模式的意义。社会系统具有文化，而文化则不具有社会系统，文化只能使社会系统变得可以理解。

当代的跨文化心理学家经常以被试的国籍为基础对样本进行定义。很明显，国家是一个社会系统，因为国家是由互相联系着的人们之间的密集关系网所组成的。但能把国家看成是文化吗？有几个国家，如日本，在其人口的民族性（ethnicity）上是非常同质的；但许多其他国家，如美国、德国、巴西以及新加坡，它们的民族多样性非常可观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以中国为例，其境内为官方所认可的少数民族就达 50 多个。按照在这里所提出的定义，一个国家，同其中的民族群体一样，只有在有证据表明该国家的成员以相对一样的方式解释他们周遭的事物时，国家才能被视为文化。下一步，我们来看一看跨文化心理学家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体系中，如何对前述同质性的观点进行测试。

价值、信念及行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文化感兴趣的心理学家通常可以分为两类。那些关注文化中动态的自我创造和再生的人通常喜欢给自己贴上“文化心理学家”的标签（Cole, 1996; Shwede, 1991）。那些更关注文化中长期一致性的人大多喜欢给他们自己贴上跨文化心理学家的标签。很明显，本书主要是立足于后一种视角。对于那些发现两种研究方法有互补性的观点（Kashima, 2000; Kagitcibasi 和 Poortinga, 2000），我们表示

赞同。在探究特定的文化群体如何对发生在他们周遭的事物赋予意义，以及他们对事物的理解是如何变化和发展的时候，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尤其有用。跨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已经被证明对社会心理学家更有吸引力，主要是因为它开辟了一条道路来解释在更普遍的过程中的文化差异。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还需要讨论世界上的国家文化是如何兴起和延续的。现在，先让我们假定某种特定文化是以一种稳定的状态存在的。该文化的成员如何解释他们周遭所发生的行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跨文化心理学家不能够假定一种特定的行为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含义。然而，特定文化中的一个成员可以经常对行为赋予意义。施加在儿童和成人身上的社会化进程教会一个人去解释特定行为最有可能的意义。研究者在决定一个国家能否被看成是一个文化时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方法，那就是调查其文化成员并决定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特定行为中的含义达成共识。这可以是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主位”研究设计类型的一个例证。然而这种方法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在成千上万种可能的行为中，哪一些才能成为我们最好的研究对象？

应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更为简约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着眼于具体行为的意义，而是把视角放在文化成员所“持有”的更有组织的观念框架，他们对具体事件的解释很有可能是受到这个观念框架的指导。随着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最流行的选择就是关注一个文化成员所持有的价值观。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价值观是指导一个人追求他最心仪目标的指南，它们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因此更容易测量。第二个预测的基础是文化成员所认可的信念类型。价值观与人们想要得到的事物相关，而信念与人们认为是真实的事物相关。如果一个社会体系的特点就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信念，那么很有可能其成员会以相似的方式解释他们的行为，这正好满足了我们所定义的一种文化存在的标准。

作为一门学科，心理学高度重视提出假说和验证假说的价值。许多跨文化心理学家都认同这一观点。因此，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讨论多项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一个文化自变量（通常被定义为价值或信念）会对一个因变量（通常是行为）产生可以预测的作用，然后对这些假说进行验证。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社会体系并不是按照实验室实验的方式组成的。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确信一个变量会引起另一个

变量的变化。只要假以时日，一个文化中的多重因素均会互相影响。新的行为模式可能会产生，并引起价值和信念的改变，正如改变了的价值或信念能够引起行为的变化一样。然而为了进入社会体系并着手理解这一复杂、动态的互动情形，我们需要对体系中的相关因素进行可靠有效的测量。作为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出发点，我们探索了在过去的30年里涌现的一系列关键性的实证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们致力在主流价值观、主流信念和主流行为的基础上对国家进行分类。

霍夫施泰德项目

毫无疑问，在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进展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单项研究首推荷兰社会心理学家霍夫施泰德开展的一项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霍夫施泰德是美国IBM公司研究团队中的一员。该团队在该公司70多个国家的雇员中开展了一项全球性的士气调查，最终累积成拥有116 000名被试的巨大的数据库。霍夫施泰德对这些数据开展了大量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于1980年出版了他的经典研究——《文化的结果》(Culture's Consequences)。

霍夫施泰德对文化概念的提炼类似于本书中所采取的立场。他将文化的概念定义为“一种集体的心灵程序编制过程，这个过程能够将一个群体或一个类别的成员同另一个群体或类别的成员区分开来。”(Hofstede, 2001, p. 9)。他的目标是甄别出一些维度，这些维度可以表现出不同特点，使得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霍夫施泰德寻求在文化上为不同的国家建立起同样的定位尺度，类似于地理上用经度和纬度来确定不同国家的位置。也就是，建立一个有用的坐标系作为工具，为不同的国家定位。

在开展其研究的过程中，霍夫施泰德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IBM调查的设计所提供的信息是用来满足公司需求的，而不是用于跨文化研究目的。这无疑限制了霍夫施泰德的研究。大多数的项目触及价值观，一些项目则涉及行为或者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事的动机的描述。尽管如此，现存数据库的规模仍为他提供了一些优势。例如，他能够为人口

统计学上比较接近的每个国家建立样本，这样他就可以确定，他所发现的所有差异都可归因于国家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工种之间或性别之间的差异。一旦建立起具有可比性的样本，他的数据就被缩减为 72 215 名被试，国家的数量则减少为 40 个。然而他无法控制来自不同国家被试数量的差异，被试人数最多的是德国，11 384 人，人数最少的是新加坡，58 人。

霍夫施泰德所采取的下一步骤非常关键。他的逻辑是，因为他测量的是整个国家的特点而不是个体的特点，他必须在**国家层面**（nation-level）而不是在**个体层面**（individual-level）上进行数据分析，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生态”（ecological）层面上。换句话说，就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答案来说，他将来自每一个特定国家的所有受测者的得分加以平均。IBM 调查中的有一些项目要求在利克特量表上作答，这种量表以诸如“同意”和“不同意”这样的表述来锚定。霍夫施泰德清楚在“默许反应偏差”方面存在着文化差异的问题。这一问题我们已经在第 2 章中讨论过了。因此，他对每一个项目上的平均反应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为达此目的，在每一个国家中，他从每一个个别项目的平均数中减去了这个国家在所有项目上的平均值，所得的分值再除以项目平均数的标准差。在这个标准化过程完成之后，他就可以确定能否沿着某一特定维度对每个调查项目上的平均答案的差异方式加以分类。

通过对特定项目得分之间的相关进行比较，以及对问卷项目中一些经标准化的国家均值进行因素分析，他成功地找出了国家差异的四个维度，并把它们分别命名为：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那些熟悉个体层面因素分析的人会提出异议，认为 40 个案例不足以进行有效的因素分析。然而，在他国家层面的分析中，大多数数据点是数以百计，在有些情况下是数以千计的反应的均值。这样的数量大大地提高了这些数据点的稳定性，减少了测量误差，并使得最终的分析具有可靠性。每一个维度由采自原始调查中的三至六个问题的回答予以界定，定义每一个维度的项目如专栏 3.1 所示。

专栏 3.1

霍夫施泰德维度的定义

维 度	项 目
权力距离	1. 雇员害怕向他们的经理提出异议。 2. 我的经理总是独断专行的，或善于说服的/有家长作风的。 3. 我喜欢独断专行的或有参与精神的经理，但不是那些遇事商量，然后却自行做出决定的经理。
不确定性规避	1. 公司的规矩是不可以随便破坏的，即使当雇员认为是为了公司的最大利益时也是如此。 2. 我打算在这个公司至少呆五年时间。 3. 在工作时我感到紧张不安。
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	对我来说拥有下述事项很重要： 个人的时间、使用我自己的方法以及挑战性。 对我来说拥有下述事项次为重要： 良好的物质条件、培训的机会、个人技能的发挥。
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	对我来说拥有下述事项很重要： 高薪酬、对良好工作表现的赏识、提升和挑战。 对我来说下述事项次为重要： 与上司的良好关系、与他人的合作、合意的生活区域及工作保障。

注：措辞并不确切严格，为了表达更加清楚进行了一些修改。

资料来源：Hofstede (1980)。

如同其他的因素分析一样，在决定如何命名所得到的因素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主观性。霍夫施泰德的选择对后来人们对每一种类似的因素如何做出反应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他给最先找到的一个维度贴上了权力距离的标签，并定义为“B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 S 的行为以及 S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 B 的行为方面存在的差异”（Hofstede, 2001, p. 83; B 和 S 分别指老板和下属）。通过最初的分析，霍夫施泰德提供了更多国家的更多分数。从这些数据中得出，在权力距离方面得分最高的国家是：马来西亚、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巴拿马、菲律宾、俄罗

斯；得分最低的国家是奥地利、以色列、丹麦、新西兰和爱尔兰。

第二个维度被称为不确定性规避。这个维度被定义为对模糊性的避免。霍夫施泰德（Hofstede, 2001, p. 148）指出很多研究者把他的这个概念理解为回避风险。然而他指出，这是一个错误的阐释，在不确定性规避高的文化中，有时候也可能仅仅为了逃避不确定性而冒险。从数据中发现不确定性规避高的国家有希腊、葡萄牙、危地马拉、乌拉圭、马尔塔；得分最低的国家地区有新加坡、牙买加、丹麦、瑞士和中国香港。

第三个维度被命名为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被定义为那些其个体认为他们具有相对独立身份的文化，而集体主义文化是那些更多地以持久的群体成员的关系来定义身份的文化。这个维度的定义方式为个体层面研究中的应用所借鉴，这些个体层面的研究在第6章有广泛的讨论。然而，对霍夫施泰德本人而言，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是国家的属性，而不是个体的属性。我们知道，最具个人主义特点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荷兰和加拿大；最具集体主义特点的国家据称有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

国家在集体主义上的得分与它们在权力距离上的得分具有较强的正相关，但霍夫施泰德认为将它们区分开来在概念上来说是有用的。跨文化研究者对这个维度上的文化差异产生的兴趣是最强烈的，这个维度为后面章节中将要讨论的许多项研究提供了基础。如专栏3.1所示，霍夫施泰德为定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所使用的实际调查项目关注的是对不同工作动机的相对偏好。在定义为个人主义的国家里，人们最偏爱的是“个人”时间、自由和挑战；然而在那些被定义为更多集体主义的国家里，人们更强烈地认同技能的发挥、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培训机会。这些项目与霍夫施泰德及后来的研究者们所使用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概念并不能恰如其分地匹配。然而，我们会看到，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之间的区别已经被证明有多么明显。

霍夫施泰德的最后一个维度被命名为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这个维度区分了重视自信价值的国家和注重抚育价值的国家。如同其他维度一样，霍夫施泰德所关注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体，他还指出他的标签不应被视为暗示着与女性相比，男性总是以更加男子气概的行为方式行事，

或者同男性相比，女性以更加女性化的行为方式行事（Hofstede, 2001, p. 284）。尽管如此，后来的许多评论者都很难接受他对这个维度所贴的标签，因为这些标签似乎对一种性别区分加以具体化，但这种性别区分在近来引起了很多争论。具有男性气质的国家有斯洛伐克、匈牙利、日本、奥地利和委内瑞拉；而最具女性气质的国家有瑞典、挪威、荷兰、丹麦和哥斯达黎加。

进展一览

霍夫施泰德的研究产生了四个维度，可以用来给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定位。霍夫施泰德本人通过检测这些维度与其他可用来刻画国家特征的测量之间的相关，并进而检验了这些维度的预测效度。我们将在第4章对这一类型的效度检验的使用进行全面的讨论。

目前，我们需要探索他的研究所提出的一些其他问题。在跨文化心理学发展成为目前让人感兴趣焦点之前，这项最初的研究就已经完成了。确实，这项研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个丰富的概念性结构，在引发此发展势头方面，这项研究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Bond, 2002）。以第2章中所列的高质量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它又是一项怎样的研究呢？就其积极的方面，我们可以指出，采自不同国家的样本得到了很好的匹配；调查被翻译成了当地语言；默许反应偏差得到了控制；适当的分析层面得到了正确的定义，并且受测者并不知道他们在参与跨文化比较的研究。从消极的方面来看，此研究所选取的调查项目是用于其他目的的，很有可能遗漏了文化差异的重要方面。同时，这些项目也属于强加式的客位研究，很有可能反映了美国公司先入为主的一些看法。实际上，有意思的是这家公司当时正在寻求创造一个统一的全球公司文化，基于这个原因，霍夫施泰德对文化差异性的发现使得他使用了一个虚假的公司名称“赫尔墨斯”来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每个维度均以很少的几个项目来定义，因此增加了不能准确确定其意义的风险。

鉴于霍夫施泰德的研究很好地达到了绝大多数的标准，对测量的改进只能在更新近的研究中达到，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行简短的讨论。我们先来考虑一些更进一步的问题。一些批评者认为霍夫施泰德所取得的

国家分数时间太早，以至于在 21 世纪，它们已经不再能为国家间差异提供有效的指南。然而，霍夫施泰德认为文化差异是相当牢固的，不大可能很快地改变。在他 2001 年修订版的书中，他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表明对于迟至三十年之后的其他研究者，他的国家分数仍然是一个显著的预测指标。

在此之后，许多学者开展了研究项目，对来自两三个国家的样本就某种属性进行比较，所得到的结果在霍夫施泰德测得的这些国家数值基础上进行了解释。如果一项研究中调查的实际样本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或任何被用来形成一项假设的文化维度上确实显示出差异，则这样的解释会比较可靠一些。如果因为 35 年前采自 IBM 雇员的样本以某种方式显示出差异，就推断出在一段时间之后，采自当代同一些国家的样本，譬如说学生的样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显示出差异。这样的推论则是危险的。

我们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与一个国家之内存在的多样性有关。霍夫施泰德在进行国家层面分析时，对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多样性进行了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他的数据中不会发现多样性。他报告中的附加分析显示了在性别和职业角色方面的多样性。在一个国家之内，我们可以预期存在着基于地域、社会阶层、职业、民族以及基于性别的亚文化。这些差异均是有意义的，但不可能按照已发现的那些表现文化差异特征的同样维度加以定义，出现的维度将是不同类别间差异的一个产物。例如，当霍夫施泰德等人（Hofstede, Neuyan, Ohayv, & Sanders, 1999）研究在荷兰和在丹麦的组织之间的文化差异时，他们发现定义组织文化差异的维度与那些定义国家文化间差异的维度差别很大。所研究的“文化”单元将决定表现其文化特点的维度的性质和类型。

对霍夫施泰德项目，我们需要进行更多讨论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基础性的，同时将把我们带回到本章开篇时所进行的关于定义的讨论。如果文化是用共享的意义来定义的，那么 IBM 的调查数据是否确实向我们提供了关于特定价值的意义在不同的国家被共享或未被共享的信息呢？一个具有特定民族文化的社会体系，其自身并不能表明意义共享。共享或不共享意义的是个体。如果我们能够展示出一个特定国家中的个体确实共享特定的意义体系，那么我们就处于一个更稳固的位置来进行更大

的组织之间，例如国家之间的更有效度的文化比较。但是意义的共享是如何得以建立的呢？最显然易见的方法就是比较一个文化单元的成员之间意见一致的水平，以建立起被研究的价值观或信念的共识。如此，我们需要进行个体层面的分析，以便为更有效度的更高层面（higher-level）的分析铺平道路，无论那些更高的层面是婚姻、家庭、组织，还是国家层面上的分析。

我们也可以选择首先测量共同认可的结构，也就是规则、规范、社会习俗及类似物，通过这些来鉴别和比较不同文化。依照这种方法，个体的价值、信念等等都是这些人为的“文化培养”过程的社会化产物。在社会体系的心理结果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共识，但却不存在同一。但是，由于以社会体系为特征的每一个文化群体中同质性的影响作用，两个文化群体中对一种价值或信念的认同的平均水平可能存在着差异。然而，由于心理学上的“个人主义偏差”（individualistic bias）（Sampson, 1981），对那些使得文化群体成为文化，而不是只成为个体的简单集合的变量，如规则、规范和社会习俗，我们只是进行了很少的文化比较。我们将在第4章中对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探索。

研究个体与研究文化

霍夫施泰德认为进入文化差异研究的最好途径是聚焦于国家层面上的价值差异，然而，在过去的15年里，以色列的沙龙·施瓦茨（Shalom Schwartz, 1992）开拓出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施瓦茨强调，就价值的偏好而言，一个研究者除非首先对个体所持有的价值观结构进行更为基础性的研究，否则他不能有效地比较国家层面上的差异。通过检验世界上不同地区个体所具有的价值观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就能够检验出一项价值观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是否具有相同的心理学涵义。鉴于跨国界的调查必然会涉及许多不同种语言的翻译问题，涵义的变异范围必然是巨大的。当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声称他们赞同某种价值观，诸如正直、自由或忠诚时，我们怎样能够确定他们指的是同样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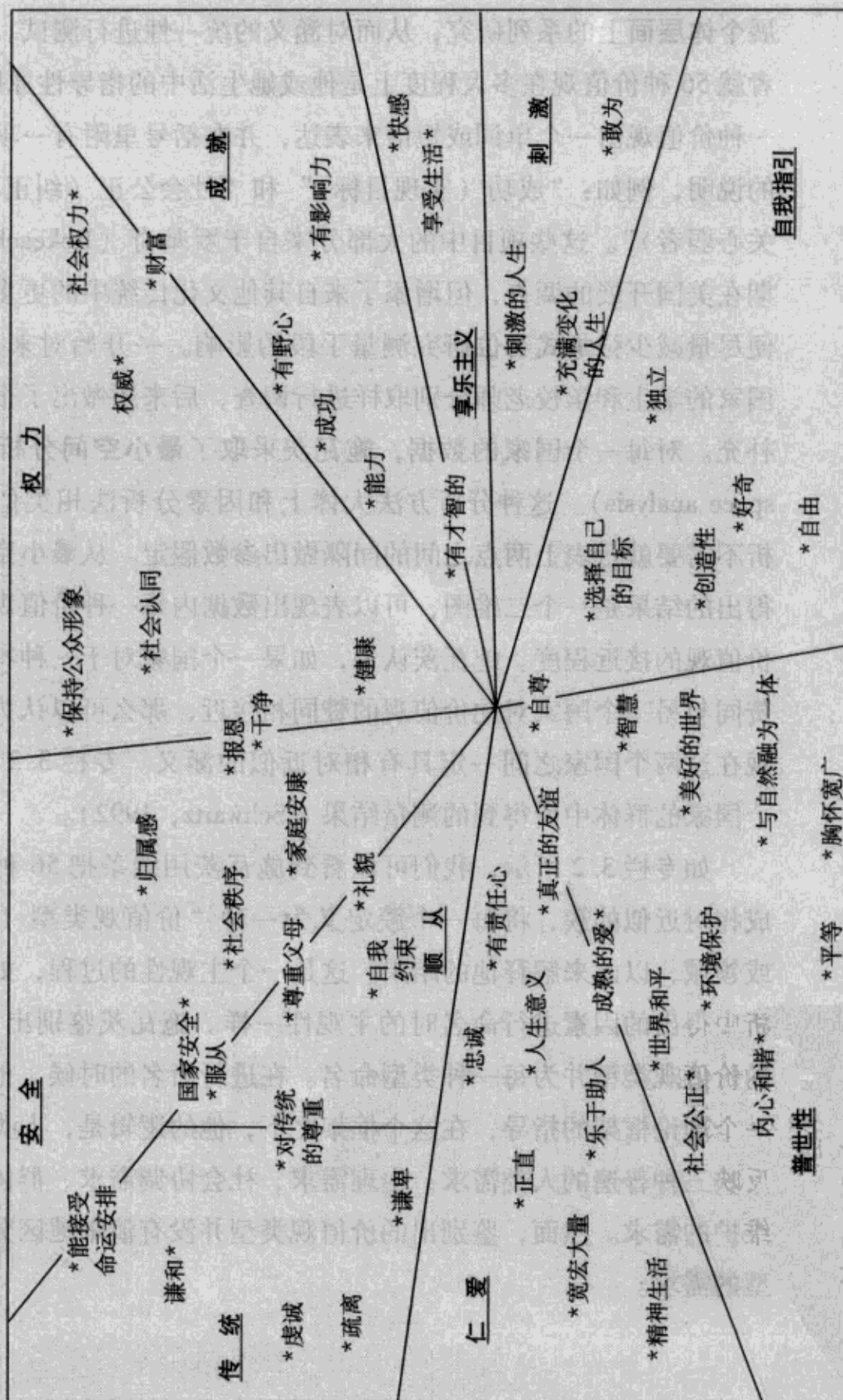
施瓦茨的价值观调查

施瓦茨提出，研究者可以在不同国家之中，就一套确定的价值观开展个体层面上的系列研究，从而对涵义的统一性进行测试。他要求受测者就56种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是他或她生活中的指导性原则做出评定。一种价值观由一个单词或短语来表达，并在括号里附有一项或两项简短的说明，例如：“成功（实现目标）”和“社会公正（纠正不公平现象，关心弱者）”。这些项目中的大部分来自于罗基奇（Rokeach, 1973）早期在美国开展的调查，但增添了来自其他文化传统中的更多价值观，以便尽量减少强加式客位研究测量手段的影响。一开始对来自于20多个国家的学生和学校老师分别取样进行调查，后来还做出了很多进一步的补充。对每一个国家的数据，施瓦茨采取了最小空间分析法（smallest space analysis）。这种分析方法大体上和因素分析法相类似，但因素分析不需要就量表上两点之间的间隔做出参数假定。从最小空间分析法中得出的结果是一个二维图，可以表现出数据内每一种价值观和任何其他价值观的接近程度。施瓦茨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对于一种特定价值观的赞同与另一个国家对此价值观的赞同相接近，那么可以认为，这些价值观在这两个国家之间一定具有相对近似的涵义。专栏3.2展示了从20个国家的群体中所得到的测量结果（Schwartz, 1992）。

如专栏3.2所示，我们可以看到施瓦茨用线条把56种价值观划分成相对近似的簇，将每一个簇定义为一种“价值观类型（value type）”或领域，以此来解释他的结果。这是一个主观性的过程，如同对因素分析中得出的因素进行命名时的主观性一样。施瓦茨鉴别出了10种不同的价值观类型并为每一种类型命名。在进行命名的时候，他最初是接受一个理论框架的指导，在这个框架之下，他的逻辑是，人类的价值应当反映三种普遍的人类需求：生理需求、社会协调需求、群体福利和群体维护的需求。然而，鉴别出的价值观类型并没有清晰地区分出这三种类型的需求。

专栏 3.2

施瓦茨的个人层面价值观结构



这10种价值观类型也可以被简化为两个极化的维度，这两个维度在专栏3.2中表现为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在纵向维度——对变化的开放性与保守性上，对比了创新自主性和传统顺从性。在横向维度——自我提升对自我超越上，对比了为达个人目的而进行的个人奋斗和为超越个人目的而同他人进行的合作。

在20个国家样本之中，施瓦茨发现一个样本中有75%的个人价值观可纳入其他样本中所发现的同样的价值类型之中。施瓦茨和萨齐夫（Schwartz & Sagiv, 1995）将这项分析拓展到采自40个国家的88个样本。据施瓦茨、梅里齐和莱曼（Schwartz, Melech, & Lehmann, 2001）等人报告，通过使用一种更新的、更简单的测量方法——价值画像问卷（Portrait Value Questionnaire），他们得到了一个相似的价值观结构。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施瓦茨对其调查中所使用的往返翻译法进行关注之后，大多数的个人价值观项目在大多数国家具有同等的涵义。他得出结论认为，在一个广泛的国家样本之中，他最初的56个项目中有44个具有充分的等值涵义。如专栏3.3所示，对其余12个项目的差异

专栏 3.3

日本式的友谊和澳大利亚式的忠诚

施瓦茨和萨齐夫（Schwartz & Sagiv, 1995）发现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涵义的价值中包括了“友谊”和“忠诚”。在专栏3.2中所展示的价值类型中，“真正的友谊”通常会出现在仁爱的价值类型之中。然而，对来自于542个日本学生的数据分析却将“真正的友谊”归入了安全的价值类型项下。这表明它在这个样本中的涵义与那些定位于安全价值类型的其他价值更加接近，包括“归属感”和“健康”。在其他的样本中，与“真正的友谊”比较接近的价值有“成熟的爱”和“人生意义”。因此，这表明在日本，友谊更多地隐含着容纳而不是亲密的意思。

在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学生数据中，对忠诚和责任的赞同更多地与对服从和礼貌的偏爱联系在一起，而在其他地区忠诚和责任是与正直和帮助联系在一起。这种涵义上的差异或可以用鲜明的澳大利亚观念“伙伴之谊（mateship）”来解释。为人正直或乐于助人显然不被认为是一种要求或义务。这些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施瓦茨的数据何以能够为更加集中的主位研究提供一些想法。

进行分析，能够对特定国家的独特性提供一些主位研究的洞见。大多数价值涵义的一致性，意味着基于这些价值的量表确实提供了一个比较国家和文化的有效途径。这为他的项目在下一个阶段进行国家层面上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这个层面上的研究比霍夫施泰德所做的研究更具可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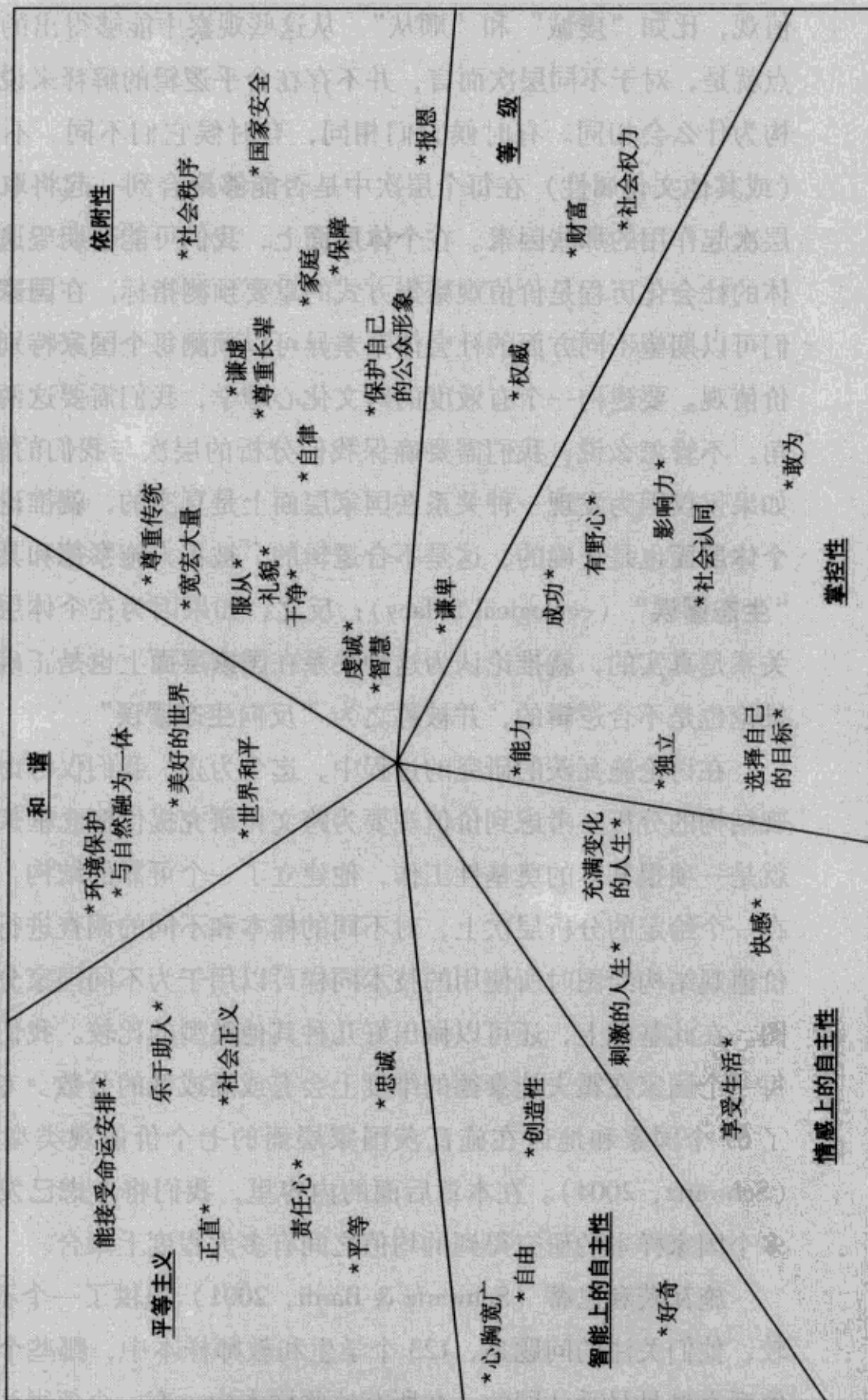
在调整了因默许反应偏差对分数的可能影响，并在每一个国家内对每一种不同的价值观做出的反应求得平均数之后，施瓦茨进行了国家层面的最小空间分析（Schwartz, 1994），如专栏 3.4 所示，所得出的结构与个体层面的分析所得到的并不完全一致，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它基于 44 个而不是 56 个数据点。他鉴别出了七种国家层面的价值类型，这七种类型可以被归结为三个两极化的维度。这三个维度被分别命名为自主性—依附性、等级性—平等性、掌控—和谐。施瓦茨对他的国家层面的维度与个体层面维度选择不一样的标签，是因为他想强调区分不同层次的重要性。

施瓦茨所提供的两种不同层次的分析使得我们能够应对当代跨文化心理学中最为核心也是最为令人烦扰的问题之一，这也是一个使很多人感到难以理解的问题。同样的一些数据在不同层次进行分析怎么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仔细看看专栏 3.2 和 3.4 中谦卑和权威这两个价值的结果。在专栏 3.2 中，“谦卑”出现在传统的价值观类型之中，而“权威”出现在权力的价值观类型之中。这两种价值观位于图示的相对两侧，这表明对这两种价值观的认同是呈负相关的关系。换句话说，那些把权威作为他们生活中一项指导原则的人，不大可能同时也会将谦卑视为他们生活中指导原则。将此结果与专栏 3.4 中所得到的结果相对照。在国家层面上，“谦卑”和“权威”同时出现在价值观的等级类型之中。那些对权威具有强烈认同的国家，似乎趋向于同时也是那些对谦卑具有强烈认同的国家。

将两个层次的结果放在一起，整个画面就清晰起来：在某个特定的国家里，有一些个体认同权威，而另一些个体则认同谦卑，这两方面都表现出一种相对的优势。这些人很有可能通过一个等级秩序角色的系统来彼此联系在一起。可以预期，这些国家一定会被霍夫施泰德认定为具有较高的权力距离。反过来说，在另外一些国家认同权威和谦卑的个体数量都比较少，可以认为这些国家的权力距离相对较低。然而，在任何

专栏 3.4

施瓦茨的国家层面价值观结构



一个给定的国家，那些认同权威价值观的个体不会去认同谦卑这一价值观，反之亦然。国家不等于个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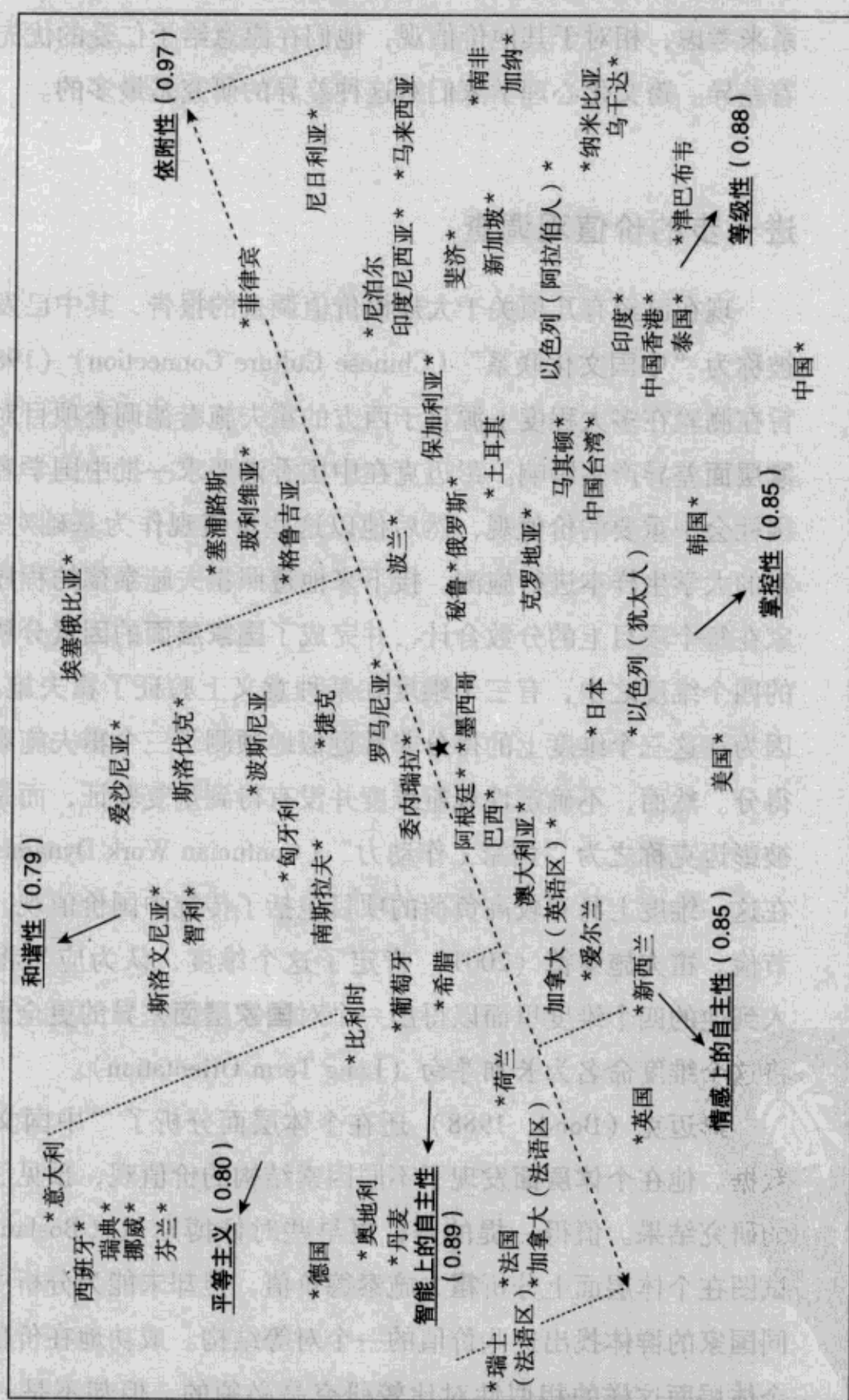
施瓦茨两项分析中对价值观的定位并非在两个层次之间全都不同。不同的是那些在等级性较强的国家中所发现的与互补角色关系相关的价值观，比如“虔诚”和“顺从”。从这些观察中能够得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对于不同层次而言，并不存在合乎逻辑的解释来说明价值的结构为什么会相同。有时候它们相同，有时候它们不同。不同的价值观（或其他文化属性）在每个层次中是否能够聚合到一起将取决于在这个层次起作用的那些因素。在个体层面上，我们可能会期望遗传分布和个体的社会化历程是价值观聚集方式的重要预测指标。在国家层面上，我们可以期望不同方面的社会体系差异可以预测每个国家特别鲜明的那些价值观。要建构一个有效度的跨文化心理学，我们需要这两种不同的视角。不管怎么说，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分析的层次与我们的假设相匹配。如果仅仅因为发现一种关系在国家层面上是真实的，就推论这种关系在个体层面也是正确的，这是不合逻辑的，被霍夫施泰德和其他人称之为“生态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反之，如果因为在个体层面发现一种关系是真实的，就推论认为这种关系在国家层面上也是正确的，这样的推论也是不合逻辑的，并被称之为“反向生态谬误”。

在讨论施瓦茨的研究的过程中，迄今为止，我们仅考虑了他对价值观结构的分析。考虑到价值观要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概念框架，他的研究就是一项很基本的奠基性工作，他建立了一个可靠的结构，研究者可以在一个给定的分析层次上，对不同的样本和不同的调查进行比较。在为价值观结构绘图时所使用的技术同样可以用于为不同国家分值的分布绘图。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好几种其他类型的比较。我们已经说明了每一个国家在霍夫施泰德的维度上会有或高或低的分数。专栏 3.5 显示了 67 个国家和地区在施瓦茨国家层面的七个价值观类型相关的位置（Schwartz, 2004）。在本章后面的内容里，我们将考虑已发表的、包含多个国家样本的研究得到的均值之间有多大程度上聚合。

施瓦茨和巴蒂（Schwartz & Bardi, 2001）提供了一个不同类型的比较，他们关注的问题是，123 个学生和教师样本中，哪些个体层面的价值观类型是最受认同的。在所有这些样本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致：

专栏 3.5

施瓦茨研究结果中，7种文化倾向上67个国家或地区的分布图



两种最受青睐的价值观是仁爱和自主性，两种最少受到认同的价值观是传统和权力。鉴于跨文化的心理学家最经常研究样本之间的差异并试图做出解释，这些结果有助于提供一个必要的全面视野。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成员赞成仁爱，但是就他们认同的其他价值观与仁爱之间的关系来考虑，相对于其他价值观，他们在愿意给予仁爱的优先选择上存在着差异。跨文化心理学家们对这种差异的研究是最多的。

进一步的价值观调查

现在已经有几项关于大规模价值调查的报告，其中已发表的有一项被称为“中国文化联系”（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1987）的研究，旨在测验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于西方的霍夫施泰德调查项目对已发现的**国家层面**差异产生影响。彭迈克在中国香港要求一批中国学者找出一些中国社会中重要的价值观，然后他以这些价值观作为基础对来自 23 个国家的大学生样本进行施测。接下来他遵照霍夫施泰德的程序，将每个国家在每个项目上的分数合计，并完成了**国家层面的因素分析**。在所得出的四个维度之中，有三个维度在某种意义上验证了霍夫施泰德的维度，因为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得分非常近似地预测了三个霍夫施泰德维度上的得分。然而，不确定性规避维度并没有得到重复验证，而是发现了一个被彭迈克称之为“儒家工作动力”（Confucian Work Dynamism）的维度。在这一维度上具有较高负荷的项目包括了传统中国价值观，例如恒心和节俭。霍夫施泰德（2001）肯定了这个维度，认为应当将这个维度加入到他的四个维度里面以得出一个对**国家层面**差异的更全面描述，但他将这个维度命名为长期导向（Long Term Orientation）。

彭迈克（Bond, 1988）还在个体层面分析了“中国文化联系”的数据。他在**个体层面**发现了不同因素结构的价值观，预见后来施瓦茨的研究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更早些时候博斯兰（Bosland, 1985）曾试图在个体层面上分析霍夫施泰德价值，但却未能为分析中所包括的不同国家的群体找出这些价值的一个对等结构。成功地在价值结构中发现个体层面这样的相似性对比较研究是必须的，但却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项目越是明确和具体，在项目分类时就越没有可能发现一个跨文化

的对等物。

另一个能够得出**国家层面**价值观均值的大型数据库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Inglehart, 1997)。“世界价值观调查”由一套同等的民意调查所构成,每过几年就重复一次,数据来自于有代表性的国家。该调查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现在已经扩展到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97)分析了随着时间而产生的与政治倾向最为相关的变化。通过对个体回答的47个变量进行分析,他发现了国家差异的两个维度:重视自我表达对重视生存,偏爱理性—合法对偏好传统权威。在67个国家中,每一个国家内部,受测者以同样的方式对上述两因素中的项目进行回答。如此,也就满足了施瓦茨所强调的要求:只有那些对所有文化群体的个体都具有同样意义的项目的国民平均值才能进行比较。

最后,史密斯、杜根和特罗姆皮那斯(Smith, Dugan, & Trompenaars, 1996)分析了一个对43个国家中的员工进行的价值观调查数据库。然而,这些研究者并没有对于不同的分析层次进行严格的区分。在不考虑受测者国籍的情况下,对所有**个体层面**的数据进行的多维度分析揭示出了两个主要的维度。第一个维度对比了那些基于忠诚而参与到组织之中的个体和那些基于功利目的而参与到组织之中的个体。第二个维度对比了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史密斯等人计算了每个国家在这两个维度上的平均分数。这项研究在**个体层面**上进行,没有使用霍夫施泰德、施瓦茨和英格尔哈特的**国家层面**的分析类型。基于这个原因,史密斯等人为每个国家计算出的分值不能被视为有效计算出的**国家层面**分值。许多研究者计算出的分值都属于这种类型,在本书中我们将它们称为“**总体均值**”(population means)。

在了解了个体层面的均值和国家层面的均值之间的区别之后,我们就有可能把最好地理解文化性质的讨论向前推进一步了。如果共享的价值观是一种文化存在的一个指标,那么知道一个个体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将仅仅向我们提供一个很弱的关于这个个体背景的信号。如果我们对价值观在总体中的分配情况知道更多的话,我们就能够做得更好。

专栏 3.6

霍夫施泰德的诸维度具有可重复性吗？不同调查之间的相关研究

较新的维度	权力距离	不确定性规避	个人主义 (对集体主义)	男性气质 (对女性气质)
中国文化联系				
道德修养	.55**		-.54**	
融合	-.58**		.65***	
仁爱				.67
儒家工作动力				
施瓦茨				
自主性(对依附性)	-.52***		.64***	
等级性(对平等主义)	.41**	-.29*	-.50***	
掌控性(对和谐)	.29*			
史密斯等人				
忠诚参与	.67***		-.77***	.37*
保守主义	.63***		-.74***	
英格尔哈特				
自我表达(对生存)	-.72***	-.55**	.74***	-.39*
理性权威	-.56**		.49**	

注：这些相关的方向是就括弧外的维度名称而言的。

上述五项大范围的价值调查的取样都来自于较为不同的国家。英格尔哈特的数据来自于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调查，而所有的其他研究均取样于国家之内互相区别的分样本。它们还使用了不同的测量手段，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施测，它们分析数据的方式也不一样。这样大范围的差异使得想要认定在多大程度上它们的结果相互证实或相互矛盾变得困难起来。如果它们的结果能够相互验证的话，那当然是一件非常值得称道的事。

然而，如专栏 3.6 中所示，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相互验证现象。

如霍夫施泰德最初的分析所表明的，他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和权力距离维度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后来的每一项研究都识别出与这种极化高度相关的维度。尽管两种测量工具之间 +0.6 的相关意味着它们之间所共享的方差不到一半，这样的相关程度已经足以鼓舞人心了。正如霍夫施泰德指出的那样，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上的国家分值与该国家的财富高度相关。这样看起来，我们所进行的国家层面上的价值观调查，其成功之处根本上在于甄别出了那些在富国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与之相对照的不那么富裕的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也有一些证据支持了霍夫施泰德其他维度的可重复验证性，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迄今为止，同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维度相比，这些维度对后续研究的影响并不那么大。

作为共享信念体系的文化

有一些研究者并没有关注价值观，而是转而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国家可以由一套共享的信念体系来描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价值观的研究进展是齐头并进的，从那些纯粹的强加式客位研究的测量手段发展到具有更多主位内容的测量手段，同时考虑到对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数据加以区分。在美国，罗特（Rotter, 1966）开发出了一个“控制点”的测量，这也就是对事件的内控和外控反应的一种概括化的信念。简单地说，被试期望发生在他周遭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他们自身的影响，而不是由外部原因诸如有权势的人或命运等造成的？罗特的量表在很多国家的研究者中很受欢迎（Dyal, 1984）。史密斯、特罗姆皮那斯和杜根（Smith, Trompenaars, & Dugan, 1995）分析了来自 43 个国家的控制点数据。在标准化之后，个体层面的多维度测量揭示出了信念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对比了对个人效能感的信念与对政治家效能感的信念。这一维度上的得分与施瓦茨在掌控价值观上取得的国家得分具有很高的相关。第二个控制点的维度对比了对个人自主性的信念和需要依赖他人的信念。在这一维度上的得分同施瓦茨在自主性上取得的国家得分以及霍夫施泰德在个人主义上取得的分值具有很高的相关。这就对

不同国家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和信念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些初步的信息。但是,由于它们所指的是不同的分析层次,总体均值和国家层面均值不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有效的比较。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那些正确应对了不同分析层次的研究。

近来,有人针对广泛认同的社会公理或信念设计了一项调查。最初,梁觉、彭迈克和德卡拉斯奎尔(Leung, Bond, de Carrasquel, 2002)使用一张在委内瑞拉和中国香港流行的、包括好几百个社会公理的清单,并增补了一些来自于现有量表的内容,譬如罗特量表,经过翻译和预备测试之后,在中国香港、委内瑞拉、日本、德国和美国展开调查,让学生对这些社会公理中的60条做出回答。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中均得到了具有可比性的个体层面的5个因素。这项调查又在41个国家和地区的更多学生被试中重复进行(Leung, Bond et al., 2004)。在个人层面受到广泛支持的信念中的五个因素被确认为社会犬儒主义(Social Cynicism)(对人性的一种消极看法)、社会复杂性(Social Complexity)(相信对问题有多种的解决方法)、天道酬勤(Reward for Application)(相信努力和知识最终会得到回报)、虔信宗教(Religiosity)(相信宗教实践和宗教组织具有积极的功用)和命运控制(Fate Control)(相信事情是事先注定了的,但能够对它们施加影响)。

为了决定在国家层面上的信念结构,同样的数据后来被合并到国家层面(Bond, Leung, et al., 2004)。如同施瓦茨的价值观分析中所遇到的情形一样,国家层面的信念结构在某些方面同个体层面的结构不尽相同。在国家层面上,五种个体层面因素中的四种合并成了一个强大的因素,这个因素被彭迈克等人命名为“外在动态性”(Dynamic External-ity)。这一簇的信念集中在虔信宗教和一种相信努力将最终导向正义的信念。第二个国家层面的因素被命名为社会性犬儒主义(Societal Cynicism),几乎完全由个体层面上定义社会犬儒主义因素的那些项目所构成。在与价值观的关系方面,当一个国家在施瓦茨的依附性价值上得高分时,在外在动态性上的得分也是最高的。对社会性(Societal)的犬儒主义的认同与霍夫施泰德的集体主义量度有显著相关。在国家层面上,又一次发现了对价值的认同和对信念的认同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

鉴于霍夫施泰德的集体主义和施瓦茨的依附性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这些结果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个初步印象：价值和信念的调查均指向文化差异的单一维度，这个维度将那些富足、个人主义的、世俗的并对人性持积极看法的国家，与那些不那么富足、更集体主义、更传统、更虔信宗教、更愤世嫉俗的国家形成对比并区分开来。然而，这是对有些结果的一个过于简单化的解读。两种测量方法之间的相关达到了 +0.5 或 +0.6 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同的。两种相关为 0.6 的测量方法之间共享的方差为 0.6 的平方，也就是 0.36，或只有 36%。我们将在第 4 章中探讨信念和价值的国家差异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解释其他测量方法中的独立方差。

我们怎样解释在两个不同分析层次上信念结构的聚合呢？社会性犬儒主义结构的跨层次一致性意味着在那些社会犬儒主义得高分的国家里，有那么一些个体认同构成整个因素的所有愤世嫉俗信念，而其他人们对所有这些信念均不予认同。与之相对照，在外在动态性高的国家里，我们可望发现那些不同的亚文化或个体组成的族群，譬如说那些认同虔信宗教的人和那些更坚定地相信天道酬勤的人并不一定是同样的一批人。

作为行为模式的文化

与我们迄今考虑过的所有研究相比，有两项大规模调查的报告，每一项中所产生的总体均值所依据的测量手段均更直接地与行为相关。史密斯、皮特森和施瓦茨（Smith, Peterson, & Schwartz, 2002）对 47 个国家的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要求被试回答在处理工作中的不同事件时，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同的资源。史密斯等人计算得出了一个垂直性指标，用之反映一名管理人员如何依赖于他的上级和正式的规则而不是依赖于他自己和他的下属。对那些在霍夫施泰德的权力距离和施瓦茨的等级、控制和依附性量表上得分较高的国家，其垂直性也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我们又一次看到，在国家层面上的研究结果中的聚合，而这些聚合是富有意义的。

豪斯等人 (House, Hanges, Javidan, Dorfman, & Gupta, 2004) 研究了 62 个国家中的管理人员与领导力有关的行为。要求被试在由 9 个国家文化维度所组成的评定量表中对他们的国家“实际是怎么样”和“应当是怎么样”进行描述, 这 9 个维度中有许多是来自于霍夫施泰德和其他人的早期研究。可以将“应当是怎么样”视为对价值的测量, 但对“实际是怎么样”的评定则构成了迄今为止关注行为描述的最为广泛的调查。豪斯等人在对“应当是怎么样”和“实际是怎么样”的回答之间发现了显著的差异。

在该项目中的另一个创新是, 被试除了在一些量表上记录他们自己的评定之外, 还要求就他们的国家里其他人如何反应也做出评定。基于对后一种评定的测量, 就一个国家中行为背后共享意义的探测可能有更大的潜力可挖, 因为被试是就典型行为进行描述。典型性可以反映一个文化系统中的规范性压力, 这样就使我们的测量手段更靠近文化本身的定义。这项调查与本章中所讨论的所有其他调查都不同, 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它没有对个人指导自己生活的信念和价值进行评定, 而是关注他人被认为如何行为或应当如何行为的知觉。除此之外, 还发现了等于或高于 +0.6 的显著相关, 在豪斯等人的“实际上怎么样”问题中, 在集体主义与权力距离上的得分和同样名称下霍夫施泰德的分数之间表现出了特别的相关。

一个全景视图

总结一下我们所使用的术语

当您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本章中探讨了一种定义文化和社会体系的特殊方法, 回顾了一系列研究, 从中可以学习到对前述定义的运用。然而,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比我们已经解决的问题还多。特别是, 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如何将我们对于个体的理解和我们对于大的文化实体如国家等的理解联系起来。回想一下我们已经回顾过的那些研究, 为描述从跨文化比较中得来的数据, 我们甄别出的方

法不是两种，而是三种。首先，我们可以研究一个个体样本。被试可以是来自于一个单一的国家，但在跨文化心理学的领域中，他们通常是来自于两个以上国家。如专栏 3.7 中所强调的，即使数据来自于两个以上的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就甲国和乙国的平均分数之间的比较是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比较。如果在分析中将每一个个体视为一个单独的案例，这就是在个体层面上就总体均值进行的比较。这一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已经有很多，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相关的例子。只有在所使用的测量方法在个体层面上在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结构，并且考虑了默许反应偏差可能造成的差异之后，才有可能对不同国家的总体均值进行有效的比较。

在检查量表结构的相似性时，最经常用到的程序就是因素分析。我们在前文中还提到施瓦茨喜欢使用“最小空间分析法”。不管使用何种方法，要首先对每个国家的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如果发现了聚合效果，也就为国家层面上的比较奠定了基础。下一步就是在检验假设之前，对

专栏 3.7

研究者比较不同的国家而创造出的测量方法以及它们的运用

测量的类型	何为一个案例？	如何计算？	运用/ 缺陷
总体样本	一个个体	对组成量表的项目进行平均处理，然后对均值进行比较，对在不同样本中这些项目的结构是否相同不做检验。	跨国界的比较可能是无效的
国民均值（个体或“心理学”层面）	一个国家	对个体施测的每一个量表中的项目在每一个国家分别进行因素分析。如果因素是稳定的，比较不同国家的均值。	可以为每一个国家提供一个单一的分值，用于描述每一个国家中的平均被试。
国家层面均值（文化或生态层面）	一个国家	分别对每一个项目计算出一个国家均值，然后再对不同国家的项目均值进行因素分析。	总结个体所在的国家背景

每个样本的数据进行合计。合计的结果会使我们得出每一个样本的**国民均值** (citizen means)。从一个样本中得出的量表均值就是它的**国民均值**，但如果我们将**国民均值**作为一个数据点，则我们对于每个取样的国家只能有一个分数。因此，只有当取样的国家数量较大时，才能对**国民均值**进行统计上的比较。

霍夫施泰德 (Hofstede, 1980) 开创出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程序，那就是首先将个体的反应进行累加，然后再测试项目的**国家层面**结构。我们将使用这种方法计算出的均值称为**国家层面**均值。已经发表的文献中有许多项研究要么没有说明他们所采取的是哪一种类型的分析，要么在说明他们使用的方法时使用的术语含混不清。专栏 3.7 中亦包括了一些作者在区分他们的分析层次时使用的一些术语（如生态均值、心理学均值）。

把个体与文化联系起来

那些不同类型的数据都有什么用呢？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如果以共享的意义来定义文化，那么简单地告诉我们关于个体的价值、信念或其他属性并没有用，有用的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意义的共享。**总体均值**的差异使我们认识到：将一个国家特征化地描述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最多只是一种方便的速记。对**总体均值**的测量同时也不能用来检测一个研究者采自不同国家的具体样本同先前**国家层面**的研究者的分类情形是否相类似。例如，人们是否能预期，那些经常被研究者作为被试的学生，在整体上能表现出霍夫施泰德的**国家层面**所提出的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第 6 章中我们将会发现，奥伊斯曼、科恩和凯默梅尔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记载了令人吃惊的与前述期望相反的结果。

只有数据是从国家的大范围多样性样本中得出时，**国民均值**才是有用的。**国民均值**可以让我们估计出是否在一个给定的总体中有相当可观的人数具有一种特定的心理属性。较高的均值必然意味着该属性为相当多的人所共有。基于对心理属性如价值、信念和行为的测量，**国民均值**适合于那些与心理学理论密切相关的比较类型，因为心理学理论基本上

是针对个体而不是针对更大的实体的。然而它们却不能为我们指明一个文化中的元素是如何相互整合到一起的。

国家层面分值的涵义就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了。尽管秉承这一传统的研究者先对如价值观这样的心理结构进行测量，再将所得到的反应进行平均，然后对所得的结果进行因素分析，由此而创造出非心理学的更高阶的分类，在这里是指国家分类。这些分类与那些经个体层面分析所得到的分类不一定具有逻辑的或实证的联系（Leung & Bond, 1989）。由于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在个体层面建立结构度量等值（metric equivalence）的要求，国家层面分析已经被许多社会科学家所采用（例如，“中国文化联系”，1987；House et al., 2004；Smith et al., 1996）。这些研究者经常给他们的国家层面结构起一个听起来很“心理学”的名字，如“仁爱”、“沟通自信”、“忠诚参与”等，这就有可能造成更多的混乱。因为，个体可以拥有前述品质，国家则不能，如此对国家层面的因素错贴标签只能使混乱绵延不绝。

为了更通俗地表述这一两难问题，施瓦茨（1994）论证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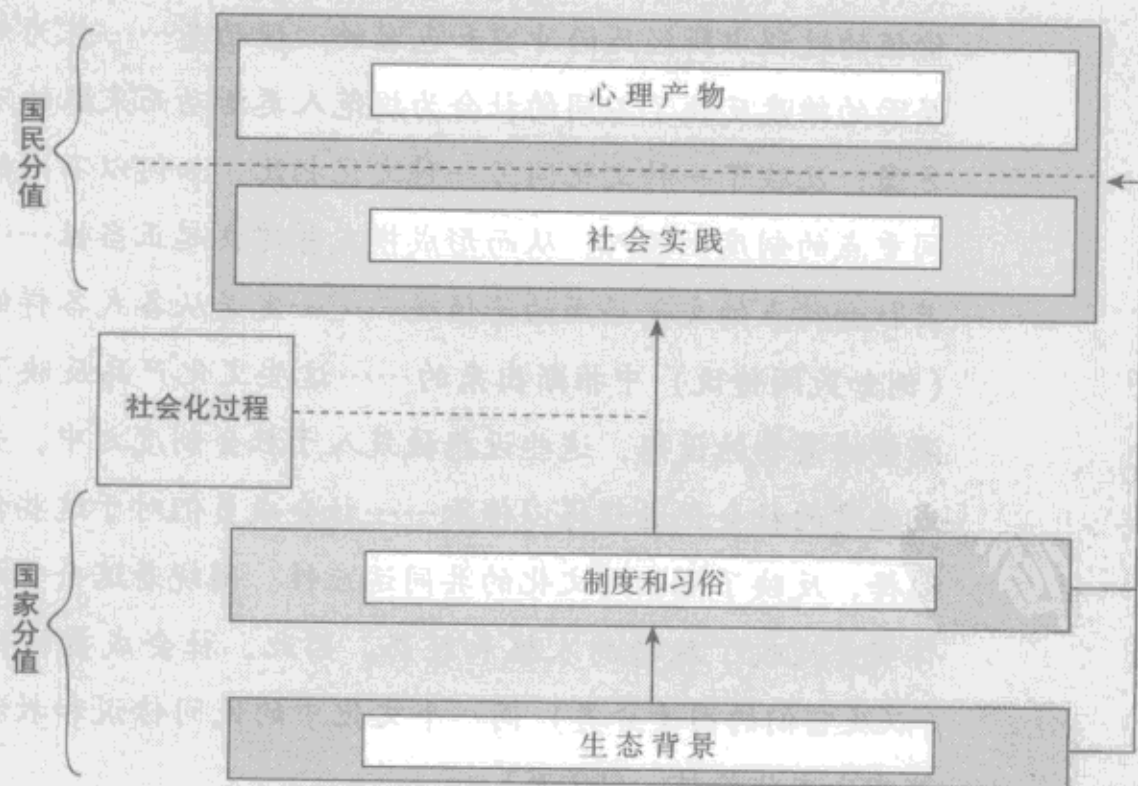
个体层面的价值维度也许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在追求不同价值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冲突和包容的心理动态……作为对照，文化层面的维度反映了不同的社会为规范人类活动而采取的不同的解决方案；反映了一种文化同另一种文化相比，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重点的制度上投入，从而形成模式并建立起正当性……形成具有其社会特点的文化层面的价值观……一定是从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例如民间传说）中推断出来的……这些文化产品反映了人们对所渴望的事物的设想，这些设想被筑入于社会制度之中，并通过有意或无意的社会化进程得以传承……社会成员们对于这些价值的优先选择，反映了他们对文化的共同适应性。围绕着这个平均水平的个体变异反映了独特的人格和经历。因此，社会成员的平均价值观（以及它们的因素分类）同一个文化中的民间传说和教科书一样能够指向文化价值。（92页）

因此，目前跨文化研究者对国家层面的分值的使用，实际上是研究者在使用真正的心理学测量方法——如国民均值——和直接从国家的社

会结构产生的测量方法——诸如财富、社会阶级和制度性结构等——之间达成的暂时妥协。心理学家对于个体所处更宽泛的社会背景给予持续关注的仅有的一个方面就是家庭。对于社会系统的其他方面的详尽研究基本上都已经放弃，让位给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等去研究。然而，如果跨文化心理学想要实现其学科的意图，揭示出文化是如何影响个体的，则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去发现跨文化研究者计算出的价值和信念方面的国家层面均值如何与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发现的更广泛的国家品质相关联。正如怀廷（Whiting, 1976）很久以前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对文化的概念“拆包装（unpack）”，从而发现不同的元素是如何组成整体的。我们将在第4章和第5章着手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为了对这项探索做好准备，我们在专栏3.8中概括出一个模型来说明我们讨论过的不同测量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

专栏 3.8

国家分值和个体分值之间的联系



资料来源：Van Hemert（个人交流）

在该图的底部，我们看到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制度是基本生态背景（这个背景是制度所要应对的）的一个反映。生态和制度上的过程只能表示为**国家层面**的变量。在第4章中，我们将探索这些**国家层面**的属性与图中上半部分所列明的因素是如何发生关系的。在第4章中，你将看到一个更详尽的图示，对专栏3.8图示中所提供的抽象模型予以“拆包装”处理。**国家层面**的属性对国家中个体的实践和心理产物影响的过程组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化过程。我们将在第5章中对这些社会化过程集中进行讨论。

对进展的评价

本章的回顾揭示出各种调查发现中存在着一个惊人的共同之处。尽管调查的方法不同，调查内容和样本各异，调查结果却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尽管这一切是鼓舞人心的，但我们对现有的成就还需要考虑其局限性。首先，我们不知道已经找到的关于文化差异的维度是不是那些最重要的维度。可能它们只是最容易找到的，特别是当它们与国家财富这样的主要属性具有相关关系的情况下。其次，我们需要考虑观察者在判断构成我们现有的文化测量方法时的精确程度。如海因等人（Heine, Lehman, Peng, & Greenholz, 2002）所指出的，我们只能做出与我们自身经验相关的判断。与在讲求平等的国度中长大的人相比，一个在等级制度文化中长大的人可能认为具有等级特点的行为不那么专横。最好是能找到这样的测量手段——它们更牢固地锚定于那些足以进行客观评判的现象。第三，我们需要更多地考虑生活的多样性背景。我们可以展示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集体主义或更具等级制度，但在国家之内也许存在着同样强烈的差异来源。例如，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工作组织比家庭组织要更加讲究等级秩序。基于价值观和信念的行事方式，可能会受到日常生活中不同背景的调节。第四，本章中所回顾的研究中很少考虑到取样国的**内部民族多样性**。与群体成员所看到的其他群体内的差异性相比，群体成员会更多地知觉到他们自己的群体内部的差异性（Linville、Fishcer 和 Yoon, 1996），并且这一效应在国家之间与小群体之间同样具有典型性。尽管存在着这种对差异的知觉上的强化，当我们在单个国家

里进行跨民族群体的比较时，不同的民族群体所表现出的差异之小令人吃惊。例如，分别在德鲁兹教派、穆斯林、基督教阿拉伯人或犹太人的总体中，使用施瓦茨调查（1994）制图，得到的关于以色列价值观的轮廓图大体相同（Bond, 1996b）。同样地，卡什莫尔和古德诺（Cashmore & Goodnow, 1986）的研究表明，在社会经济地位保持恒定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的父辈与子辈在种族分歧方面的价值观差异消失了。财富是否是一种与文化相分离的因素并且应当把它从文化中剥离出去？或它是否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共享信念和价值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我们将留待下一章讨论。

小 结

我们可以把文化定义为在一个给定的社会体系之内发现的共享意义。心理学家们通过对价值、信念的认同和行为的差异进行调查，已经为涉及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跨文化心理学以往的研究进展已经在不同分析层次取得一个清晰的概念结构。只有当先前的个体层面研究表明测量手段在不同的样本之间具有对等性，国家层面的差异特征才能实现有效的描述。对个体进行预测时，需要采取的测量方法应当得自于个体层面研究而不是国家层面研究。国家层面的测量方法规定了个体社会化得以进行的背景。这些测量方法与源自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指标的关系是我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

拓展阅读

1. Kagitcibasi, C. (1997).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In J. W. Berry, M. H. Segall, & C. Kagitcibasi, (Eds.) *Handbook of cross-culture psychology* (2nd ed., Vol. 3, pp. 1 - 49).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2. Smith, P. B. (2002). Levels of analysis in cross-culture psychology. www.wvu.edu/~culture.
3. Smith, P. B. & Schwartz, S. H. (1997). Values. In J. W. Berry, M. H. Segall, & C.

Kagitcibasi, (Eds.) *Handbook of cross-culture psychology* (2nd ed., Vol. 3, pp. 77 – 108).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思考题

1. 在你所居住的国家里，你认为最明显的价值观和信念有哪些？这些价值观和信念与研究者所发现的文化差异的维度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2. 以共享的价值、信念和意义来定义文化是不是更好？是不是应该更加强调行为的作用？
3. 心理学试图理解个体，那么国家层面的维度对心理学家有什么价值？
4. 作为本章中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国民分值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举一个例子，并思考一个国家的国民分值与其国家制度的哪些方面是有关联的，以及是如何相关联的。



作为文化的国家以及它们 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内化就是把客体化的世界重新吸收到意识中的过程，其所采用的方式是这样的：这个世界的结构决定了主观意识的结构（彼德·贝格尔，《神圣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1967，p. 14-15）。

心理学中的跨文化研究越来越多地变成对各国及其居民的研究。这——一时兴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许多跨文化心理学家在西方接受训练，然后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实践心理学，用他们国家的国民来做研究。西方和西方人的心理学，特别是美国及北美人的心理学，变成他们比较其研究和实践结果的潜在标准。这个过程致使两个国家之间的比较成为20世纪最后30年里跨文化研究的标准模式。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更多的国家收集数据，这使得我们更有信心做出这样的结论：国家对社会心理进程有切实的影响。

在许多国家，除了居民从出生起便学习的母语外，语言政策还规定在教育 and 政府中使用一种混合语（*lingua franca*，一种或多种通用语言）。某些国家非常小，只有相对一致的地理条件、生态支持和弱势地位。国家的教育政策通常覆盖了初等和中等教育，不同地区在课程和程序上只有少许的不同。法律系统和执行政策同样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核心，但也可能存在地区间差异。在所有这些方面，国家可以被看作一个约束和供给的系统，换句话说，各国家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些社会：其社会制度将其居民推向更大程度的文化统一，尽管它们的种族和民族多样化日渐扩大。

在第3章，我们提到国家是社会系统，但也指出了只有找到证据证明某个国家的成员用共同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经历的各种事件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认为这些国家有一种文化。按照这个定义,大多数国家并不是只有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各种文化组成的拼盘,受到不同社会制度所产生的社会化力量的限制,这种限制的有效性程度不一,这样说是不是更好一些呢?将某个特定的国家看作只有一个单一文化是不是一种歪曲呢?我们在这里给出一些论据,说明为了某些目的,把国家当作一个分析单位不仅是方便的,而且是合理的。特别是,通过关注国家,我们可以矫正心理学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环境的忽视。

联合国当前有191个成员国。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都在这些国家的疆域和司法管辖范围内。国家作为政治单位,其边界和政治特权已经在历史中逐渐得以确立。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中,制度和习俗提供了人际交流的途径,保障人际交流的实现,并影响其居民的社会化进程。由于地理上的分散和集中,由于其传统习惯、工作要求、军事影响或者宗教组织的融合,他们对融合观念的态度以及国家政策和措施的作用,有些族群(ethnic groups)比其他族群更多地参与到他们的国家制度中。通过不同程度的参与,一个国家中的族群或多或少地响应了制度结构塑造其成员的社会化过程。当然,每个社会内部都存在着差异,就像不同国家间或一个国家内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特征一样(例如, Kohn, Naoi, Schoenbach, Schooler, & Slomeczynski, 1990)。事实上,许多族群不仅仅是在族性本身区别于其他群体,而且还在它们的社会阶层、职业概况和教育上与其他群体不同。在一些国家,这样的模式导致了明显的族群特殊化。

尽管有这么多造成差异的可能性,与其他国家的各族群相比,一个国家内形形色色的族群常常在心理学的相关测量中呈现出更为相似的轮廓。例如,施瓦茨(Schwartz, 1994)报告说:“在中国不同地区的三个教师样本呈现出相当相似的面貌”(p. 118),虽然这些群体存在着地理语言的分隔。在情感经验的自我报告上,一个国家内不同样本间同样存在相近性,即使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Kuppens, Kim-Prieto, & Diener, in press)。这些结果促使社会科学家去探寻国家对其居民在心理面貌上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确保记录被试的族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将它们归类到文化起源不同的群体里,族性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也得到了体现。辛格利斯等(Singelis, Her, & Aaker, et al.,

2003) 在测量梁觉和彭迈克 (2004) 提出的社会公理的五个维度时, 将他们的美国被试按照族性进行了分组。他们发现, 墨西哥裔美国人、美国黑人、亚裔美国人和高加索血统美国人被试存在着信念上的差异。当用聚类分析法 (cluster analysis) 分析日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和其他 40 个国家群体的心理面貌时, 日裔美国人表现出和高加索血统美国人非常相似的特点, 然而华裔美国人却没有。实际上, 华裔美国人和中国香港人更加相似, 他们所属的更大组群与高加索血统美国人的组群之间有相当的距离。

所以, 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族群是否表现出相同的心理面貌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结果可能取决于所考虑的心理结构的类型以及特定的取样族群。然而, 从这些结果中得到的结论是清楚的: 社会科学家必须尽可能广泛地从组成一个国家的各族群中取样, 并且为了将来分析的目的, 记录他们的族性。

为了得到一个国家心理面貌的特点, 理想情况下应该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仅仅依赖在数量上占主导的群体来确定这个国家在心理空间上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位置, 只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类似地, 我们从科恩及其助手的开拓性工作中得知, 在保守性和开放性这个轴上, 美国的各阶层在价值观念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这个差异同样表现在同时参加了取样的加拿大和波兰等国家 (Kohn et al., 1990)。许多跨国家的心理数据的比较是从大学生中抽取样本,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到上层阶级的样本。我们用这个局部性的群体去代表它们的普通国民时, 必须非常小心。只有在理论上有意义时, 在他们的确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做研究时, 才可以为了方便而暂时使用这些数据。

国家文化的心理学特征描述

准确性问题

作为国家真实分数的第一个接近性测量, 社会科学家经常会采用一个同等的但不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来描绘被研究的心理特征的国民均

值。在跨文化的研究中，获得完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是不可行的，而且只有极少的项目，如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Inglehart, 1997），能够接近这样的要求。要使用等效但不具有代表性样本的研究结果，必须判断它们的效度——是什么国家特征预测了作为结果的心理面貌？这些制度和习俗的特征与心理结果之间的联系是不是有理论意义？

作为一个这样的例子，可以考虑霍夫施泰德（Hofstede, 1980）报告的国家财富和个人主义之间的 +0.81 的相关。他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来测量国家财富，而个人主义的得分则来自 IBM 雇员的报告。他说这样的结果是有意义的，因为越多的国家财富流向全国居民，就会给那个国家的每个居民带来更多的购买力。这种个人财富促进了他们在消费选择、职业选择和休闲选择中的个人权利。这样的自由与一个国家公民的个人主义一致，并且鼓励了个人主义。施瓦茨（Schwartz, 1994）在自主性价值观与 GNP 之间只发现了一个稍弱的相关。其他的学者（例如，McClelland, 1961）用相反的方式解释了所发现的这些相关，他们认为是个人主义价值促进了经济的活跃。然而，基本问题是清楚的：不管来自于哪一个群体中的被试，跨文化的数据能不能令人信服地检验这些社会科学的假设？

当然，相关并不代表因果关系，也不能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影响的方向。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重复做的调查研究可以用来支持一个人的论证。所以，霍夫施泰德（Hofstede, 1980）分别于 1976 年和 1971 年采用了两套人均 GNP 和个人主义的测量。通过使用交叉滞后平面分析技术（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例如，Yafee, 2003），我们有可能决定是时间一的 GNP 更可能导致时间二的个人主义，还是反过来。通过这个逻辑，霍夫施泰德得出结论，是财富刺激了个人主义。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建立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是这样处理数据的结果，使得两个影响方向中的一个变得更加可能。既然这些结论听起来有些道理，我们可以提出，霍夫施泰德的取样非常有可能准确地代表了国家。我们将在第 12 章探究全球财富变化对文化造成的影响。

稳定性问题

重复调查需要大量资源，如果没有强大的机构支持或者研究者不能持之以恒，这样的研究很少能够完成。而重复调查一旦完成，国家之间的相对位置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例如，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77）收集了个体报告的两个维度的价值观：传统对理性—合法的价值，生存—自我表达的价值。英格尔哈特和贝克（Inglehart & Baker, 2000）的报告认为，在过去 20 年里，不同国家在这些维度上国民均值的排序高度稳定。同样，施瓦茨等（Schwartz, Bardi, & Bianchi, 2000）在六到八年的时间里运用横断比较法研究东欧和西欧国家的价值观变化规律，发现国家层面的价值观轮廓的顺序非常相似。因此，国家价值观看上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

国家特征的概念性分组

受到这一稳定性证据的鼓舞，社会科学家开始比较在不同时间用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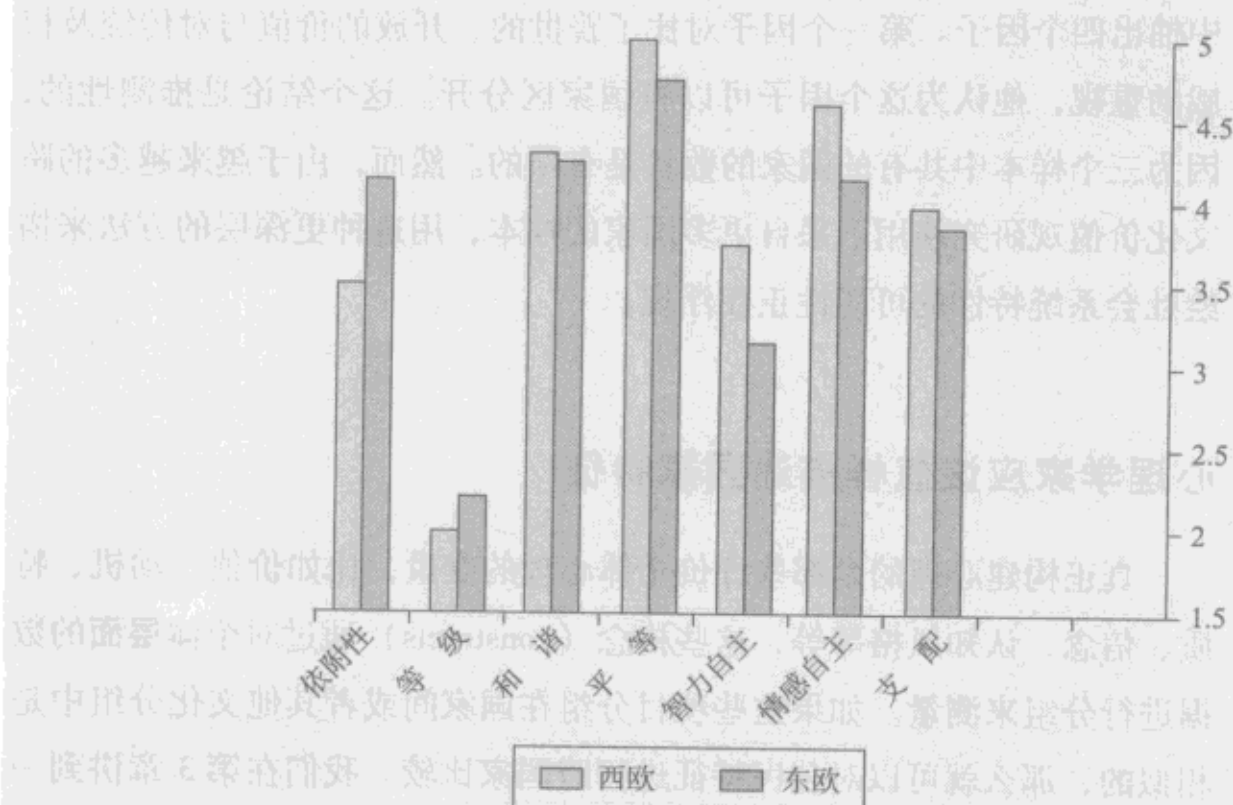
专栏 4.1

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

施瓦茨等（Schwartz, Bardi, & Bianchi, 2000）探索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否影响它的国民对基本价值观重要性上的判断。为此，他们对中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的国家层面上价值观进行了测量。他们认为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会改变国民从事社会活动的方式，并最终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特别是：

物质福利和安全等价值能否得到满足远远超出了个人控制，一个补偿性的机制就会运作……剥夺增加了需求的强度，并相应增加了某些价值目标的强度……例如，遭受经济困难和社会动乱的人，认为获得财富和维护社会秩序更加重要。（p. 219）

专栏 4.1 (续)



和这一分析相一致，这张图表显示，与西欧的样本相比，东欧国家的教师认为依附性和等级更重要，而认为平等 (egalitarianism)、智力自主性和情感自主性较不重要。当东欧不同国家之间相互比较时，会出现同样的结果……自主性和掌控性价值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显示了这些国家的国民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冒险，不愿意努力工作而不能自信地发挥个人才能。(p. 232-3; “保守主义”改成“依附性”以反映施瓦茨现在的用词。)

研究者用“人们对不同社会制度下呈现出的奖赏不确定性和机遇的适应”(p. 232)来解释国家价值观中的这些差异。在控制了其他可能的影响之后，比如经济、历史、宗教，施瓦茨等人得出结论：“不同社会制度足以影响人们的基本价值观”(p. 233)，并且使得欧洲的某些地区“不适合发展民主，[因为]维持一个民主制度需要用平等和自主性等价值观来提供社会责任的道德基础”(p. 233)。

同的样本和不同的调查得到的结果。如专栏 3.6 所示，在现有的多国调查中，我们在国家层面的均值间发现了显著的高相关。高相关在国家层面的研究中并不少见，这就促使了社会科学家去探究所测量的潜在的国家构念的意义。彭迈克 (Bond, 1996a) 用这个方法作了进一步的研

究，他用因素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三项有价值的研究：霍夫施泰德的研究，中国文化联结，以及施瓦茨的研究。他从这个较高水平的因素分析中抽出四个因子。第一个因子对比了普世的、开放的价值与对传统及权威的重视，他认为这个因子可以将国家区分开。这个结论是推测性的，因为三个样本中共有的国家的数目是有限的。然而，由于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价值观研究使用了采自更多国家的样本，用这种更深层的方法来描绘社会系统特性的可能性正在浮现。

心理学家应该怎样描述国家特征

真正构建心理的是那些评价个体心理的变量，比如价值、动机、特质、信念、认知风格等等，这些构念（constructs）通过对个体层面的数据进行分组来测量。如果这些项目分组在国家间或者其他文化分组中是相似的，那么就可以对公民特征进行跨国比较。我们在第3章讲到一个国家所有个体的平均数应该叫做**国民均值**。正是这些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特征，组成了在社会化的文化过程中典型的个体产物。这个概念就是伯格（Berger, 1967）以及前人（Durkheim, 1898; Freud, 1923/1971）所称的“内化”，我们将在第5章更加完整地探索这个过程。

实际上，**国民均值**怎样和国家层面的构念相联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开发出一个可以在个体层面上定义和测量的泛文化的心理学概念体系。实现这个基础目标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对所取样的多个国家中每个心理结构都建立等值结构或者至少是相似结构，以避免强加式客位的危险。据我们所知，在5个以上国家中已经建立起等值结构的只有以下测量：价值观（Bond, 1988; Schwartz, 1992; Inglehart, & Baker, 2000）、信念（Leung & Bond, 2004）、一般自我效能感（Scholz, Dona, Sud, & Schwartz, 2002）、人格（Allik & McCrae, 2004）、集体主义/个人主义（Triandis et al., 1993）、独立型和依赖型自我诠释（Gudykunst et al., 1996）、抑郁（van Hemert, van de Vijver & Poorthinga, 2002）、主观幸福感（Diener & Oishi, in press）和子女价值（Kagitcibasi, 1982a）。即使这些少量的研究也会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他们提出比这些研究者已经取得的相似性更严格的要求。

专栏 4.2 列出低于 0.01 的概率水平上与彭迈克所调查的**国家层面**上的信念分值存在着显著相关的一些指标。这个表格排除了和价值测量的联系。我们已经在第 3 章指出，**国家层面**测量的价值和信念之间确实存在实质性联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证据证明，这些描述国家特征的方法与一些不那么“心理学”的国家层面指标相聚合。

专栏 4.2

国家层面的指标和国家层面的信念维度

外在动态性	社会性犬儒主义
较低的人均 GDP	较低的工作满意度
白天气温高	较低的生活满意度
女性多于男性	生活节奏更快
每间房居住的人口多	更少去教堂
较高的人口增长率	
较低的平均寿命	
较低的人类发展指数	
较少的人权	
女性地位较低	
较少的“自由”	
较少的失业	
更多的每周工作时间	
更少的用于健康的 GDP 百分比	
更少的酒精消费	
较低的“生活质量”指数	

资料来源：Bond 等人（2004）。

基于单个项目测量的国民均值，如英格尔哈特（Inglehart，1997）测量的信任，对于这种方法而言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不清楚单个项目在不同的文化或者国家中到底测量了什么构念。“信任”在不同的人口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只有在接受测验的不同群体的人口中，在它与其他相关项目进行分组的过程中，通过建立一定的相似性程度，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在可以用实证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在做跨文化研究中，在解释用单个项目测量的任何一个社会心理现象时，一定要谨慎。

国家层面上的构念（如个人主义）和个体层面上的构念（如独立型自我诠释）之间的联系，是将来需要研究的问题。同样，一个社会的制度（习俗）性特征，与心理学上在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上的各心理学构念之间的关系也亟待研究。为了帮助理解不同分析层面的构念，专栏4.3对第3章结尾提出的表格给出了一个更完整的版本。这个模型把生态背景作为基本的因果媒介，以理解这些制度性结构是如何建构的，以及这些制度性结构反过来如何引起特定的心理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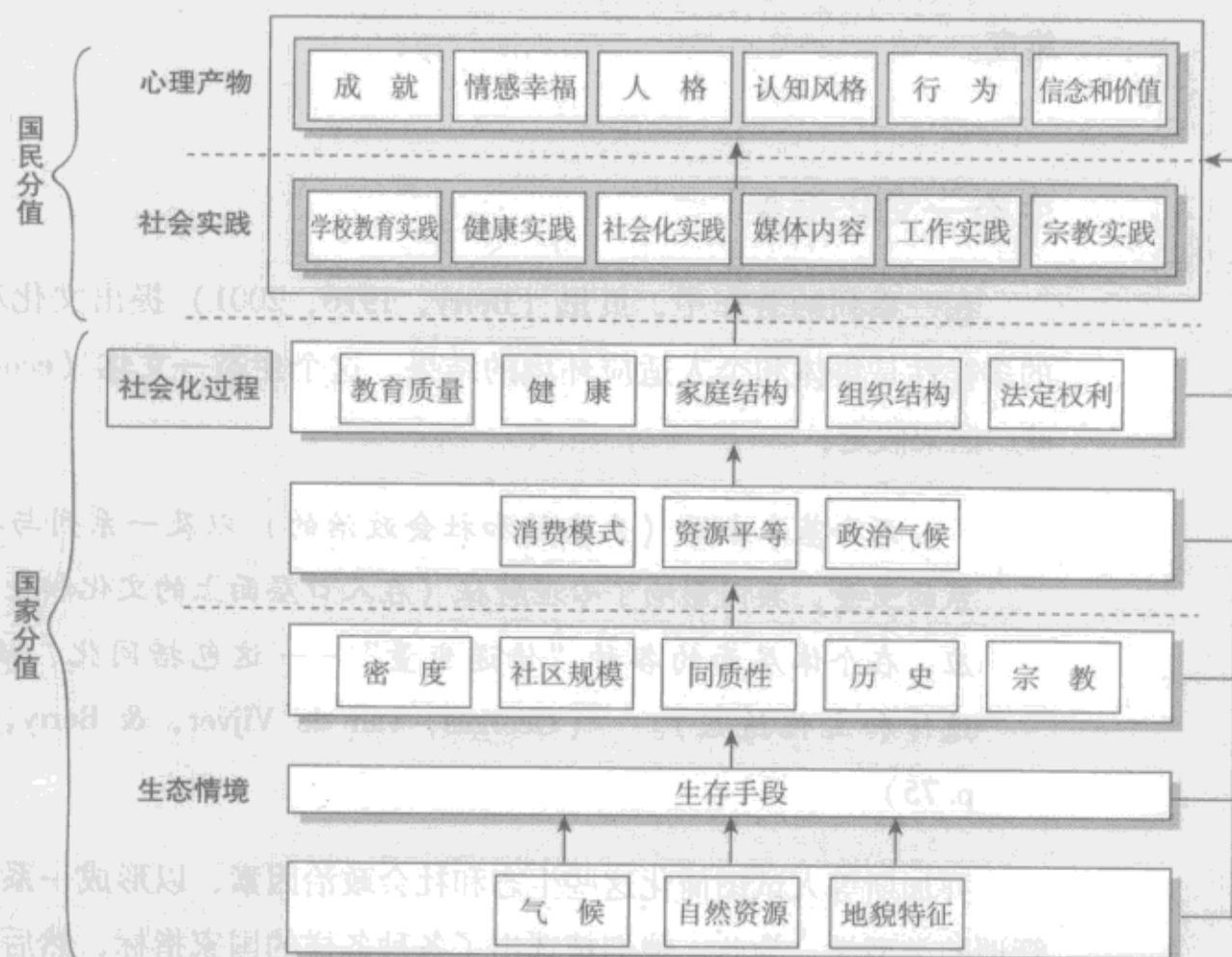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考虑社会科学家理解以及测量社会制度（习俗）和国家背景时所运用的多种方法以及一个国家的成员在国家背景之下承受的社会化压力。

国家的生态—政治—社会—经济背景

如果国家可以被看成其成员社会化的背景，我们应该怎样描述这些国家背景的特性呢？正如史密斯（Smith，2004a）所提出的那样，跨文化心理学这个学科需要“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可以用一些共同的生态和社会元素将国家聚类。聚焦于这些元素，而不是简单通过国别识别出的国家，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按照关键的背景参数为各个国家排序”（p. 11）。对心理学家来说，这些维度对他们具有工具性，这些维度使得他们能够描述和预测社会心理的结果：“国家在这些参数上的相似或差异可以被用在跨文化研究中作为一个预先假设（*priori hypotheses*），说明怎样以及为什么会观察到这些心理变量的相似性”（p. 11）。

专栏 4.3

国家分值和个体分值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 Van Hemert (个人交流)

在这个探索中, 最初跨文化心理学家从其他的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洞见中获得灵感。很多学者建立自己的维度系统, 以使用那些在他们学科内重要的变量把各个国家的位置图示出来。例如, 索耶 (Sawyer, 1967) 在 1955 年从各种各样的来源中提取出 236 个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地理的指标来测量 82 个独立国家的位置。他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因素分析, 抽取了国家差异的三个独立维度——大小、财富和政治。国家大小这个维度最强烈地表现在人口、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和能源的丰富性上。国家财富这个维度反映在人均 GNP、制造业人口的百分比和平均寿命上。国家政治这个维度被定义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索耶抽取的三个因子构成了一个三维

的空间，将国家置于相对的位置。这个类型学可以作为基础，预测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价值、信念、政治态度（例如民族优越感）、诠释自我的方式、自我效能感以及其他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心理构念上可能存在哪些差异。然而，随后的研究者喜欢使用更加外显的理论来定义国家差别的维度。

生态—文化框架

在一系列的著作中，贝里（Berry, 1976, 2001）提出文化和心理的多样性是集体和个人适应环境的结果。这个生态—文化（eco-cultural）框架假定：

两个基本来源（生态的和社会政治的）以及一系列与之相联系的变量，共同影响了心理特征（在人口层面上的文化和生物的适应，在个体层面的各种“传递变量”——这包括同化、社会化、遗传和文化适应）。（Georgas, van de Vijver, & Berry, 2004, p. 75）

乔加斯等人试图简化这些生态和社会政治因素，以形成一系列便于管理的类型学。为此，他们精选出了各种各样的国家指标，然后把这些生态—文化指标分组到不同的类别里，这些类别有生态学（如，最高月降水量）、经济学（如，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占人口的百分比）、教育（如，高等教育的注册比率）、大众传媒（如，每1000人中的电话数量）和人口（如，人口增长率）。在每个类别里的度量标准经过因素分析，得出在每个类别中有一个因子的解。对这5个因子分数进行二级因素分析同样得出一个因子，可以解释在多种多样的生态指标中80%的变异。这样，一个单一因子就能够统一形成一个生态—文化指标。

然而，这一类的因素分析的结果都受制于输入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数据都偏向于测量一个国家的民生和生产基础。看上去在这些指标中存在着单一因子，乔加斯和贝里（Georgas & Berry, 1995）把其正式命名为富裕。这个发现是不是暗示只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能把国家彼此分开呢？如果是的话，这个发现可能支持了经济决定论者所鼓吹的生

产方式决定文化中所有方面的论调（例如，参见 Harris, 1979）。

乔加斯等人（2004）提出，除了财富以外，可能还有更多的造成国家差异的因素，他们用宗教对每个国家进行了分类。他们受到亨廷顿（Huntington, 1996）确定的八大文明（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启发，利用英格尔哈特和贝克（2000）确定的文化区域，区分了六个宗教团体：伊斯兰教、天主教、新教、基督东正教、其他基督教、佛教以及传统宗教。乔加斯等人认为，用宗教类别把国家区分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英格尔哈特和贝克断言，“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或者佛教的历史对各文化地区造成了各不相同的价值观系统，在控制了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后，这些不同的价值观系统仍然存在”（2000, p. 49）。他们预测一个国家的宗教类别将和它的价值观相关，并且这种相关和富裕程度与价值观的相关不同。因此，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除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了解其他方面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直觉得到了实验证明，并且可以引导研究者去寻求更多的方法区分不同国家。

把国家的生态—政治—社会—经济因素与国民结果联系起来

这样的分析框架，尽管复杂而且包罗万象，却仅仅只是描述性的。对跨文化心理学家来说，如此衍生出来的分类学所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它们同不同的国家居民中存在差异的心理现象联系起来。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区分国家的维度在理论上是否能够合理地和心理学家所关注的结果相联系。在早期对这个联系的一个测试中，贝里（Berry, 1976）论证并且表明，促进群体成员独立或者服从品质的生存实践，能够导致独立或者服从的社会化过程，并最终决定知觉功能中或高或低的场独立水平（第6章将对这个论题进一步阐述和扩展）。同样，恩伯等（Ember & Ember, 1994）揭示，近期经历过战争的文化群体，由于这些文化中的年轻男性先前经历过争强斗勇的社会化过程，所以这个群体具有更高的侵犯水平（同样见 Archer & Gartner, 1984）。此外，罗那（Rohner, 1975）发现社会系统越复杂，对父母的要求就越高，从而导致了在养育过程中子女较高水平的父母拒绝。

上面提到的乔加斯等人提出的一个国家的富裕水平和宗教类型对该国国民价值观的作用。他们从现有的广泛的价值观研究中抽取了样本,包括那些提供国家层面的平均值(Hofstede, 1980; Smith 等人, 1996; Schwartz, 1994)和国民分值(citizen scores)(Inglehart, 1997; Diener & Diener, 1995)。区分并厘清富裕和宗教类型之间的分别作用需要进行很复杂的统计分析,但是这使得乔加斯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富裕同自我提升的价值(例如,个人主义……)有正相关。宗教和这些价值观的关系不太显著,而且如果宗教簇群和文化区域之间的关系显著,则通常这些区域和最高程度的富裕相联系。权力距离和富裕呈负相关,和多样的宗教呈正相关。同宗教簇群的身份相关(并且和富裕不相关)的心理变量是等级制度、参与和不确定性规避……数据显示了这样一个观点,宗教和纵向关系相关,这种纵向关系不仅仅在信仰者同上帝之间,也在拥有不平等的权力和资源的人类之间存在。(p. 90)

乔加斯等人(2004)通过对国家数据的横断研究分析而指出,富裕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十分重要。通过过去20年里的时间系列测量,英格尔哈特和奥伊瑟曼(Inglehart & Oyserman, 2004)总结出,“文化改变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p. 74)。对此,我们在第12章有更全面的讨论。“在繁荣阶段,对生存的关注会变小,使得和生存相联系的社会价值观退居次要地位,并且允许人们更加关注同自我表达和个人选择相关的社会价值观”(p. 74)。这个通过时间跨度设计的观察结果确认了乔加斯等人的结果,基本结论支持了霍夫施泰德最初的发现。

从乔加斯(2004)等人的发现中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这个重要的研究使我们的学科超越了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引向以历史传播为国家特征的精神—哲学遗产领域。很长时间以来,社会系统的引入是以这些遗产的教化为基础的,例如在中国,使用公开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地方官员和顾问是在公元前124西汉时创设的(Dawson, 1978)。这些制度建立了一个社会起点,随后的适应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在中国的例子中,政治秩序得以延续,社会财富得以增加,基础教育的提供得到扩

展。现在的中国教育部仍在运行一个国家学术评估系统，仍然保留着严格和精英主义的特点，只选择那些最好的学生，并把他们送去最好的学校深造，最终进入这个国家的公务员和专业领域。由于这些制度结构的存在，作为一位华裔人士并且在一个华裔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新加坡总理成为当今世界上薪水最高的国家领导人，这是否值得惊奇呢？文化遗产通过较早期社会化给当代人留下印记，这些人又给当代的制度打上了早期社会化影响的烙印，文化遗产通过社会化成为当今的现实。在中国的例子中，这个印记存在于当代华人对权力或自我提升价值的鲜明的高度认同，在中国内外都是如此（Bond, 1996b）。

上面讨论的研究采用了一个单一但宽泛的生态—社会背景的维度，并且把它同许多有意义的结果相联系。专栏 4.4 探索了更具体的问题——我们怎样利用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研究来解释冠心病在国家层面上的表现。

专栏 4.4

国籍、价值观和健康

弗里德曼和罗森曼（Friedman & Rosenman, 1975）发现，在美国男性中，A 型人格类型和冠心病、心绞痛或者心肌衰弱梗塞（统称为 CHD）的易感性之间有非常强的关系。在控制了和心脏病有关的其他因素，如吸烟、饮食和运动之后，人格与对身体健康的上述威胁之间仍然存在很强的关联。列文和巴特莱特（Levine & Bartlett, 1984）将这个研究扩展到跨国家的平台，认为如果时间压迫感是 A 型人格的一个要素，那么在生活节奏更快的国家中的人应该有更高的心脏病死亡率。让他们惊奇的是，日本，这个在他们所研究的六个国家中生活节奏最快的国家，表现出最低的心脏病死亡率。

现在人们相信，A 型人格造成 CHD 并发症的关键要素是愤怒，特别是愤怒的表达（Siegman, 1994）。这个个体层面上的发病机理将帮助我们将在国家层面的探索聚焦于那些可以最佳预测 CHD 的影响因素上。特别是，任何一个抑制愤怒表达的文化因素应该与 CHD 的发病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1988 年，特里安迪斯等人（Triandis, Bontempo, Villareal, Asai, & Lucca）整合了集体主义的文献并得出结论说，“当其他的条件（例如，人均 GDP）都相同时，集体主义国家此类疾病的发病性应该比个人主

专栏 4.4 (续)

义国家的低”(p. 328)。陈 (Chan, 1995) 控制了人均 GNP, 用 23 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急性心肌衰弱梗塞、肺循环疾病、脑血管疾病和施瓦茨所提出的国家层面价值领域之间的关系。她发现, 更高水平的掌控性 (mastery) 和更高水平的肺病发病率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

在个人层面上测量集体主义 (或者低独立性, 这是我们在个体层面给予这个概念的名称) 也是可能的。那么, 控制了人均 GDP 后, 测量独立性的国民分值可以预测国家的 CHD 率吗? 彭迈克 (Bond, 1991b) 认为, 社会整合的个体层面价值观维度 (Bond, 1988) 和独立性相类似, 所以那些国民表现出较高水平社会整合的国家, 在控制了国家财富后, 应该表现出较高水平的 CHD。和预测的一样, 社会整合的国民分数预测了 CHD 中的一种——脑血管疾病, 但是与“其他的循环系统疾病”的关系是负相关的。这个矛盾的结果加上陈 (Chan, 1995) 的发现, 揭示了某一特定类型的疾病可能与国民的依赖性有关, 而且我们需要不同的理论构想去解释这些相反的结果。

彭迈克 (Bond, 1991b) 也提出, 另一个不同的国民价值维度——道德对名声——和最典型的心脏病——急性心肌衰弱梗塞——之间存在相关。是担心名声导致了心脏病吗? 如果是的话, 是怎样影响的呢? 对名声的担心是心理依赖性 (个体层面对国家层面的集体主义的反映) 的一个方面吗, 因此当一个人的名声受到质疑时, 愤怒的表达会致这种类型的 CHD 吗 (Felson, 1978)?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控制了国家财富后, 国家层面的集体主义倾向于更高水平的 CHD 发病率, 而不是像特里安迪斯等人 (1988) 所假定的那样, 即更低的 CHD 发病率。

要回答这个及类似的关于国家健康的问题, 需要比这项早期研究抽取更大规模的国家样本, 而且要小心地控制其他可能导致 CHD 的国家层面的患病诱发因素, 比如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另外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健康问题。科恩等人 (Cohen, Doyle, Turner, Alper, & Skoner, 2003) 用实验的方法证明, 擅长交际的人对普通感冒的易感性较低, 和“免疫基线 (特定病毒抗体)、人口统计特征、情感风格、应激荷尔蒙以及健康锻炼”之间没有关系 (p. 389)。由于社交性的国民分数在不同国家中存在差异 (Allik & McCrae, 2004), 我们能预期找到患感冒及其相关后果 (例如工作缺勤) 的国家差异与国家间社交水平差异的关系吗? 这样的研究要求对这些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健康问题进行测量, 但是详尽的研究 (例如 Cohen 等人的) 所涵盖的内容, 可能会促成更多的类似研究。

专栏 4.4 (续)

我们需要为每一个健康类型给出一个独立的理论吗？莱恩和汉普森（Lynn & Hampson, 1975）对国家疾病率和社会病理学的分类揭示，可以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简化：他们对18个发达国家的12种疾病率进行了因素分析，得到两个概括的因素，标签为“神经质”和“外向性”。他们的神经质因素结合了高精神症、低自杀、高咖啡因消费、低酗酒、低犯罪、高卡路里摄入、高CHD和低意外死亡。对这些成分比率其中之一（例如CHD）的国家差异的“文化”解释，也许可以适用于包含在这个因素中的任何其他“健康”问题。同样，需要大大提高国家样本的广泛性，但是疾病种类的确聚成不同的类，因此可能易受到同样的社会性差异的影响。

更复杂的生态—文化模型如今正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且以心理学所感兴趣的指标进行了测试。例如，范德弗列特等（Van de Vliert, Huang, & Levine, 2004）用气温和国家财富去预测国民做志愿工作的动机水平。这些研究者认为，国家财富是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普遍可以获得资源的充足性程度的替代测量：

在高收入、有充足的物质资源的国家中，志愿工作者利己和利他的动机可能是正向相关的，因为自我牺牲是一种“建立一个人的自我认同，确认一个人认为自己会成为怎样的人的理念，以及表达对这个自我认同来说恰当的价值”（Katz & Kahn, 1978, p. 361）的一种方式……相反，在有形资源稀少的国家中，志愿者可能面临一个显著和严肃的问题，在满足自己的利益和做出利他行为或者人道主义关怀之间权衡，因为他们得不到，或很难得到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付出的补偿。（2004, p. 64）

他们的研究还认为炎热的气候有预测作用，能够放大财富对志愿工作的驱动作用：

气候不适宜的国家需要更多的国家财富，来满足一个人的个人需要和帮助他人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气候适宜的地方，几乎不需要什么资源来应对与气候相关的问题。

因此，在较寒冷或者较炎热（以至于造成不适）的高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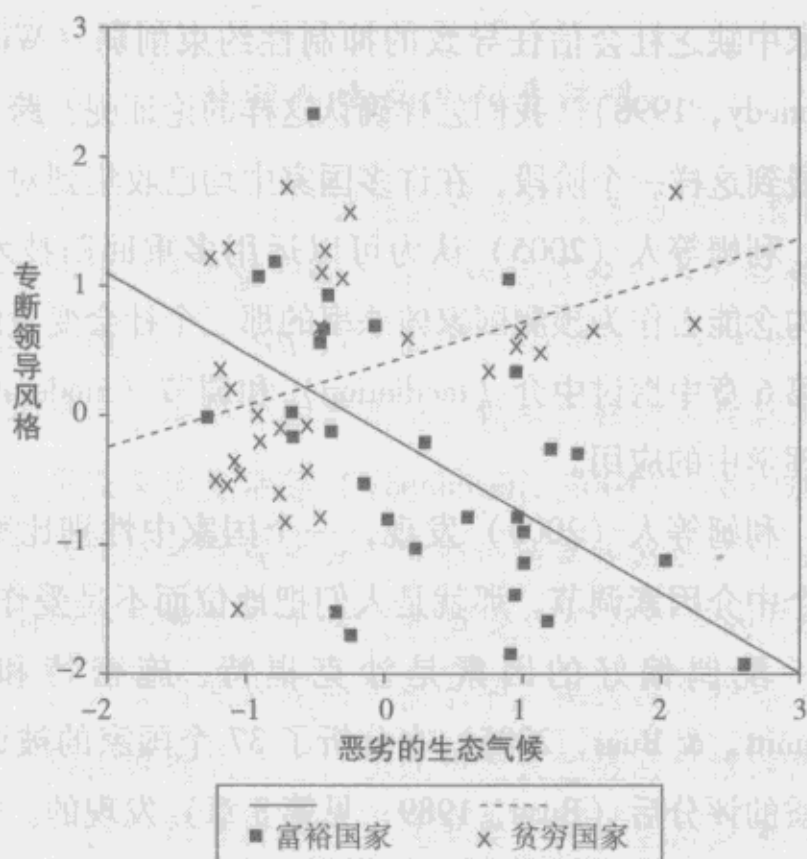
(即, 资源富足) 国家里, 关心自我和关心他人之间呈正向关系, 而在低收入国家里, 关心自我和关心他人之间是负向关系…… (2004, p. 64 - 5)

在这个复杂的研究中, 作为一项心理结果, 在关心自我和关心他人之间保持平衡, 受到财富和气温适宜度这两个基本的国家变量的交互影响。范德弗列特等人 (2004) 认为, 作为国家生态特征的资源基础和气温, 共同作用形成其国民的亲社会动机模式, 这可能是通过在不同的制度下, 价值观的社会化过程来实现的。这些生态条件通过将人类的努力导向不同方向 (或导向自我生存, 或导向帮助他人) 而发生作用。

范德弗列特等人 (2004) 的这一假设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使得我们相信国家维度同其国民的社会—心理结果是相联系的。尽管画出这些关系的路径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需要科学的想像力, 但国家背景的作用不容小觑。有人对范德弗列特等人开发出来的模型提出质疑, 指出国家内部也存在着极大的气温差异, 并且有些国家幅员辽阔, 跨越很宽的纬度范围, 如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范德弗列特 (私人沟通时) 回应说, “和国家之间相比, 在国家内部由于地理位置造成的温度差异是可以忽略的。换句话说, 不管你运用最北还是最南的一个城市的温度, 结果基本上是一样的。”再说, “相对于小国家的数目, 大国家的数目是很少的, 因此它们错误的影响最多只是一定限度之内的。”在进一步的研究中, 范德弗列特及其同事发现, 国家的平均气温和财富之间的交互作用, 同样可以预测国家的薪金水平 (van de Vliert, 2003)、幸福感 (van de Vliert, Huang & Parker, 2004) 和所流行的不同领导风格 (van de Vliert & Smith, 2004; van de Vliert, 出版中)。专栏 4.5 呈现了国家在领导风格上的差异, 说明了以上这些研究的结果。范德弗列特的实证结果提出了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概念构建上同上面的研究一样复杂, 而那个最初的假设如今已经得到更多数据支持。国家的气候差异真的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专栏 4.5

领导风格是恶劣的气候和国家财富共同作用的结果



资料来源：Van de Vliert（出版中）

个案研究：国籍和凶杀

如前文中所描述的，国家层面的研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通过识别行为结果来给出一个心理学上的意义。例如，在范德弗列特等人（2004）的研究中发现，在气温和资源基础不同的国家中，关注自我和关注他人对志愿者工作有不同的影响，研究者要怎样进一步解释这样的发现呢？

利姆等（Lim, Bond, & Bond, 2005）在检验全国性凶杀案例的数据时，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来应对这一挑战。世界卫生组织（2002）报告说每年有160万人死于非自然暴力。其中，32%属于凶杀的受害者。1992至1995年间，利姆等人收集了56个国家不少于3年期间的凶杀率。日本较低，每100 000居民中有1人，哥伦比亚最高，为80人。与先前社会学研究的结果相一致，研究者发现凶杀率可以由三个国家指标

的组合来预测：一个国家的贫困水平，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程度，以及性别比例（每 100 个男性对应的女性数目）。

为了解释这样的结果，社会学家通常提出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比如经济困境引发的压力（Linsky, Bachman, & Strauss, 1995），或者一个国家中缺乏社会信任导致的抑制性约束削弱（Wilkinson, Kawachi, & Kennedy, 1998）。我们怎样确认这样的论证呢？跨文化心理学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许多国家中均已收集到对各社会心理构念的测量。利姆等人（2005）认为可以运用多重回归技术，揭示这些社会心理构念能否作为预测国家凶杀率的那三个社会变量的中介变量。我们将在第 6 章中探讨中介（mediation）和调节（moderate）的概念在跨文化心理学中的应用。

利姆等人（2005）发现，一个国家中性别比率和凶杀率的关系受一个中介因素调节，那就是人们把地位而不是爱作为选择配偶的标准。这一配偶偏好的因素是沙克福特、施密特和巴斯（Shackelford, Schmitt, & Buss, 2005）在分析了 37 个国家的被试对理想配偶的各项品质的评分后（Buss, 1989；见第 8 章）发现的。贫困这个因素的作用效果同样被对配偶地位的偏好而不是爱情偏好所中介。资源公平的作用受到对配偶地位的偏好（而不是爱情）的部分中介。因此，提高配偶社会地位，成为在国家特征和凶杀水平之间的全部三条联系的共同特征。利姆等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系统被积累有价值资源的压力所主导，则在其中社会化的成员会变得更加争强好胜，经年累月，通过大量的日常互动会产生更多的凶杀。这种普遍的、对能够给予地位（而不是给予爱）配偶的更偏好，是这个社会普遍重视权力的一种社会化表现。

国家内和国家间生活满意度的差别

在不同的国家间被试报告的主观幸福感并不相同。专栏 4.6 探索了可能的原因。任何幸福感测量的国民均值都是平均数。在某个国家内，围绕这个平均数分数会有一些差异，因此，在某些国家，国民会表现出相似的快乐程度。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会表现出更大程度上的差异。这

个国家层面的变量称为文化内差异 (intra-cultural variation) (ICV), 经过探索性研究, 它已经成为许多社会心理构念的预测指标 (Au, 1999)。

专栏 4.6

北欧人比亚洲人幸福吗

迪纳等 (Diener & Oishi, 2004) 试图解释为什么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幸福。他们一开始就指出, “幸福” 这个宽泛的词语被许多社会科学家解释为 “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即 “人们对他们生活质量的评价” (p. 1)。需要注意的是, 幸福感可能被解释得更宽泛, 包括良好的居住环境, 有应对生活的能力, 对世界有价值, 以及享受生活等 (Veenhoven, 2004)。诸如迪纳等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 倾向于重视幸福感的主观成分。他们评估幸福感的方法是: 让被试评估至受测时为止他们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的生活 (也就是他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 他们积极和消极情感的水平, 以及自我评定的幸福水平。在这四个指标上的国家分数有很大的重叠。然而, 在不同国家的成员中, 积极和消极情感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有一些差异, 在第7章中会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这里集中讨论生活满意度或者幸福感的跨国国家评估。

方便的是, “世界价值观调查” 测量了总体满意度和在多种不同角色领域 (比如家庭和工作) 中的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的国民分值是从每个国家的成人样本中得出的 (Inglehart & Klingemann, 2000), 因此提供了一个国家的国民在这个基本的社会心理变量上的广泛代表性。研究得到的分数是在下面这个问题上的国家平均数: “考虑了所有问题, 你现在对你的生活总体有多满意?” 采用九点量表, 代表 “不满意” 和 “满意”。

迪纳等总结出了三个影响国民评价生活满意度的因素: 较高的富裕水平 (最强), 政治—社会稳定程度, 个人更关注消极方面的文化倾向。然而, 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许多特征有高度相关, 比如国民寿命、文化水平、人权保障水平、政治自由程度以及妇女的相对地位。这些社会特征是维恩霍芬 (Veenhoven, 1999) 描述的 “良好生活环境” 的一些方面, 而且很难得知这么多因素中究竟是哪一个导致了一个国家国民中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同样的不确定性使得政治—社会稳定性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变得让人迷惑, 因为有很多政治—社会稳定性的共变因素, 比如收入降低、高犯

专栏 4.6 (续)

罪率、贫富差距扩大、早年疾病致死等等都可能与生活满意度有关。更少关注积极面的文化倾向似乎是儒家社会哲学的一个方面，而不属于集体主义，因此，尽管拉美国家偏向于集体主义，但拉丁美洲人更多地关注决定他们生活满意度的积极方面。

因此，北欧人（挪威人、瑞典人和芬兰人）比亚洲人，至少是比儒教影响的东亚人更满意他们的生活。这个结果有可能是因为北欧国家的更高的富裕程度和社会—政治稳定性，再加上他们的国民在评定生活满意度时倾向更多关注生活中的积极方面而不是消极方面。这个问题也许造成了美国不同族群中存在持久的不同幸福水平差异。这些效果在跨越时代甚至国籍的人们中保持稳定性，因为研究发现，尽管被试现在可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富裕和政治更加稳定的环境里，仍然可以通过他们的移民祖先所在国家的人民幸福感来预测不同群体中幸福感的差异（Rice & Steele, 2004）。

文化内差异是和国民均值不同的国家属性，因此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独的国家特征。如同其他国家分值变量一样，它们本身是可以进行因素分析的。在生活满意度的例子中，国家的生活总体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和家庭生活的经济状况满意度的文化内差异全部载荷在同一个因素上，奥（Au, 2000）称其为“满意度差异”。通过计算在这个维度上的因素得分，奥指出荷兰的满意度差异水平最低，而澳大利亚的最高。

然后我们有可能将这些满意度差异上的分数和先前讨论过的一些生态—文化的指数联系起来。例如，我们可以预测，国民满意度差异大的国家，在财富上也会有较高的差异，财富上的差异是通过基尼系数来评估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中收入的分布范围越大，满意度分数的分布范围就会越大。奥确认了在 35 个国家中这个相关很强并且是正向的（ $r = +0.53$ ）。

奥（Au, 2000）没有提供诸如基尼系数这样的生态—文化的测量结果，而是聚焦于从霍夫施泰德（Hofstede, 1980）和施瓦茨（Schwartz, 1994）的研究中得到的国家层面的价值分数上。他报告说满意度差异同施瓦茨的依附性有最强的正相关，和平等有最强的负相关。因此，

在依附性越高的国家中，满意度差异就越大；在越平等的国家中，满意度判别的差异就越小。这个对比是可以解释的。我们可以认为高平等主义的国家通过对资源的更平等的分配来表现它们的平等，而这些资源恰恰和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相关，例如富裕、尊重人权、自由等等。国民具有依附性的国家是那些彼此分离的，群体内关联更紧的，对其他群体的状况更加冷漠的国家。因此，这些群体之间在生活满意度水平上更大的差别部分原因是高的基尼系数，这一点被容忍或忽视。和这个推理相一致，奥和张（Au & Cheung, 2002）指出，在42个国家中，对工作自主性报告存在高群体差异的国家有效预测了对健康和工作满意度方面较低的评价。

整合性的模型

尽管利姆等人（2005）所采取的方法对认识心理过程可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没有包括个体层面的数据，而是使用了其他研究中国家层面的平均分。因此，这样的研究不能直接评估我们所关注的个体的结果。正如霍夫施泰德（Hofstede, 1980）提醒我们的，“生态逻辑不同于个体逻辑”（31页）。为了揭示个体逻辑，需要选择一个个体层面的变量来加以研究，需要有理论来预测导致这个变量结果的国家因素和心理上的过程，然后根据理论，在许多国家的被试中测量这些过程。下面我们就讨论这种方法，首先是理论方面，然后是实证方面。

理论例证

盖尔芬德等（Gelfand, Nishii, Raver, & Lim, 2004）开发了一个“情境制约”的多层模型。这个理论“说明了生态文化和历史因素、社会情境的结构以及心理过程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p. 2）。他们提出这个模型作为跨文化研究文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的补充。加布雷亚（Gabrenya, 1999）首先提出，在跨文化心理学中，由于对价值观

的过度重视以至于忽略了更大的社会结构，这就造成了这个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偏差 (idealist bias)”。盖尔芬德及其同事通过改进他们的模型来回应这个批评，正是这个模型，使得情境结构成为跨文化心理学理论的一个核心焦点。

盖尔芬德和他的同事们指出，总体上来说，心理学里几乎没有针对社会情境性质的理论构想。他们借用米切尔 (Mischel, 1977) 关于强情境对弱情境 (strong versus weak situation) 的理念，首次提出可以根据总体情境的强弱程度对国家进行区分。他们提出强情境通常存在于紧密型而不是松散型的文化中——这是社会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区分，这一点是由佩托 (Pelto, 1968) 首次提出的，他在人类学领域的探索使得他特别留意不同团体对规范的不同服从水平。盖尔芬德等人一开始便指出，“文化根本上是一个跨越不同分析层面的相互关联并且能动的各种作用力的系统” (p. 5, 原文中的强调部分)。在此前提下，盖尔芬德等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识别跨文化的情境结构在宏观层面上的预测指标和微观层面上的相关因素。在最高一层的宏观水平的分析中：

特定生态文化的和历史的因素更加需要社会行为的可预测性和在文化范围内的协调。例如，高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的匮乏、极端气温、遭受外来威胁等因素就需要创造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必须能够在社会环境中促进秩序和协同行动。(Gelfand et al., 2004, p. 6)

这些“末端的”背景因素共同影响情境结构，这些情境结构组成了文化背景，创造了或强或弱的情境优势：

强势情境创造秩序并且协调社会行为，一是通过形成许多明确界定的规范，这些规范使得只有有限的行为模式是可以接受的；二是增强对不适当（越轨的）行为的谴责。与之形成对比，弱势情境几乎没有清晰界定的规范，这样就形成了很大范围的可以接受的行为，并且允许个体在行为选择上极大的自由。(Gelfand et al., 2004, p. 6)

这些文化系统中的个体成员通过社会化发展出某些社会心理特征，

继而使得他们在属于其特定的文化群体的典型情境中能够自如地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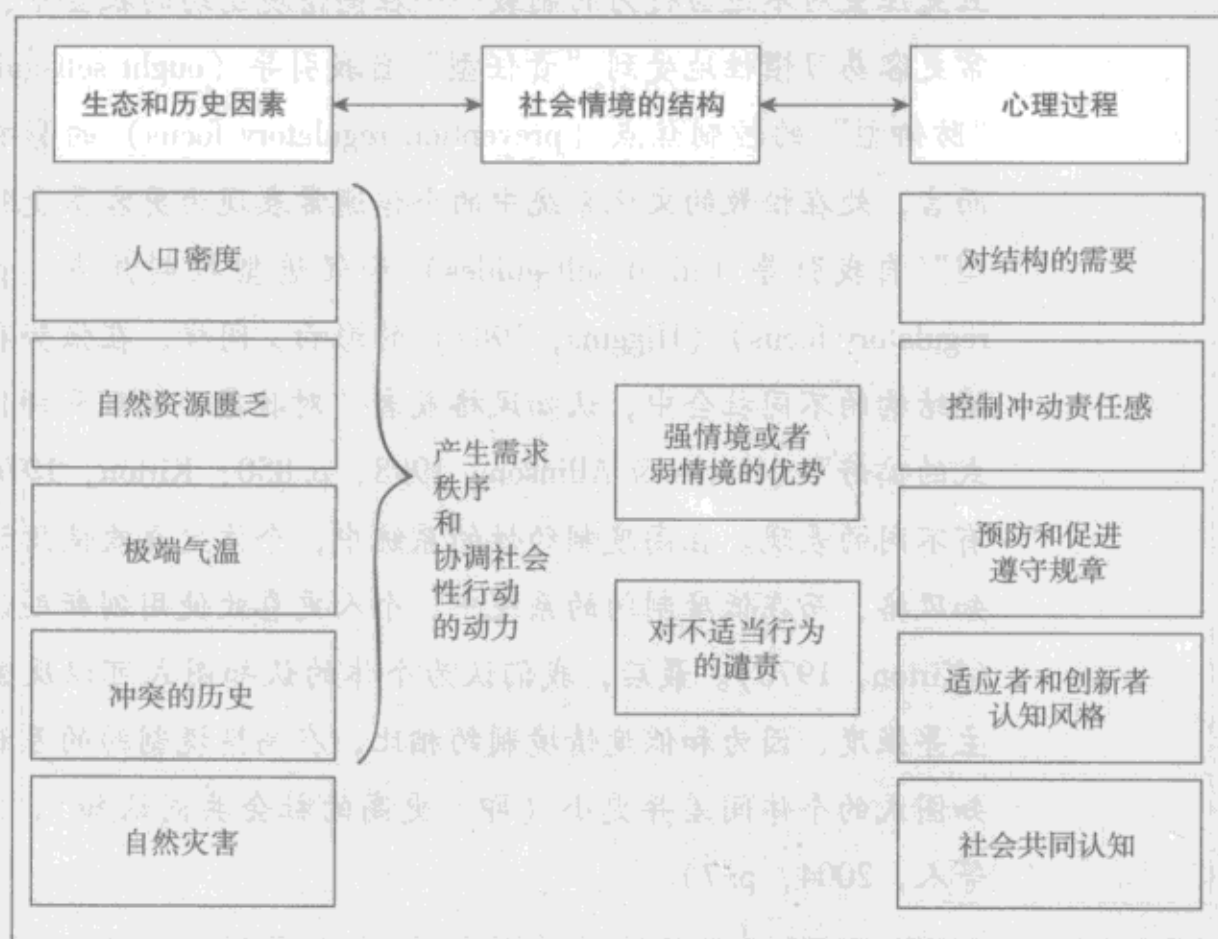
与处在低制约情境中的个体相比，在高制约情境的社会中，通常个体会对结构有更大的需求，更好地控制其冲动，更加尽责，并且更注重对不适当行为的制裁……在高情境制约的社会中，个体通常更容易习惯性地受到“责任型”自我引导（ought self-guides）和“防御型”的控制焦点（prevention regulatory focus）的影响，比较而言，处在松散的文化系统中的个体通常表现为更容易受到“理想型”自我引导（ideal self-guides）和促进型控制焦点（promotion regulatory focus）（Higgins, 1987）的影响。同样，在强势和弱势情境结构的不同社会中，认知风格或者“对收集、处理和评估信息方式的偏好”（Hayes & Allinson, 1998, p. 850; Kirton, 1976）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在高度制约性的系统中，个体更喜欢使用适应型认知风格，而在低度制约的系统中，个人更喜欢使用创新型认知风格（Kirton, 1976）。最后，我们认为个体的认知图式可以反映情境的主导强度，因为和低度情境制约相比，在高情境制约的系统中，认知图式的个体间差异更小（即，更高的社会共同认知）。（Gelfand 等人, 2004, p. 7）

专栏 4.7 中图示了盖尔芬德等人（2004）的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社会情境的结构是在远端水平的生态—历史因素和近端水平的个体层面适应性过程的中介。跨文化心理学需要这一综合性的理论构想，当我们的研究是多层次时，需要我们发展一些模型来反映其中具体的构念以及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Gabrenya, 1999）。请注意，和专栏 4.3 中的模型相对照，这一模型特别指出了生态因素和心理过程因素间双向的因果影响。一方面，历史上生态因素对心理过程已经产生了影响；而另一方面，目前对全球变暖的研究提醒我们，人类活动可以而且的确已经影响到最基本的环境。其后果是，我们需要再一次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专栏 4.7

盖尔芬德等人提出的文化和情境约束的模型



资料来源：Gelfand 等人（2004）。

实证例子：国籍和自尊——生活满意度的一个决定因素

盖尔芬德等人（2004）将文化和心理过程联系起来的复杂理论，指明了通向特定构念和操作化的过程，而这些构念和操作化过程对其理论的科学有效性来说是必需的。实质上，这些理论的提出者提出了文化在社会心理学变量关系上有调节作用，例如觉察到的雇员努力和雇员的业绩评估之间的关系。通过改变某些方面的文化系统强度（比如社会情境的结构或者自我导向的重要性），可以增强或者削弱一些关键变量的作用，在上面的例子中是觉察到的雇员努力。

很少有实证研究证明这个过程。要想通过实验来证明，就需要提供数据的被试来自众多不同的文化群体之中，就现在的情形来看，这样的

文化群体就是国家。至少需要测量两个社会心理学变量在每个文化群体中的关系强度，然后比较不同国家群体之间该联系的特点。然后可以研究该联系强度与该国家层面变量（理论认为这一变量会对两个社会心理学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的关系，以此来解释所得到的结果。使用这个模式的经典研究是迪纳等（Diener & Diener, 1995）在31个国家中对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关系的检验。他们认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社会议程的一个主要部分是提高自我重要性，这个自我是在一个不受集体拘束的自我。在达到这一目标时所取得的成功将表现为一个人的自尊感，这种自尊感又会增加这个人对生活的满意度。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迪纳等（Diener & Diener, 1995）对31个国家中的个体的自尊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进行了测量和计算。不论在哪个国家，这个相关总是正向的，但是强度却不同。这个相关的强度本身与国家层面的个人主义相关——越是个人主义的国家，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就越强。一个国家的富裕水平与它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强相关已经由霍夫施泰德提出并且得到证实，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提高一个国家制度和习俗（这些制度和习俗使个体得以社会化）中的个人主义，使得国家中的个体更重视自己。个人主义使得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自尊受到更加突出的关注，并使得自尊与一个人对生活的满意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国家文化被建构成一个催化剂，它促进某些社会过程，却削弱另外一些。

这是国家文化的一个新作用——它不仅在一个给定的社会心理构念上为其成员定位，并且加强或者削弱此类社会心理构念之间的联系。例如，福等人（Fu, Kennedy, Tata, 2004）发现，对命运控制的信念，就是说，认为结果是由外界的力量（如运气、机会或者因果报应）来决定，与人们使用自信策略之间呈正相关。然而，这个关系的强度在不同的国家中是不同的，在美国的+0.38，在中国是-0.07。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越高，这个关系就越强（Fu, 个人交流）。因此，国家层面上富裕水平的构念似乎能调节个体层面上的命运控制与组织中自信策略的使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多个国家的数据库的建立，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一个理论来回答这一问题：作为重要力量，国家文化在不同的地方是如何对社会因素之间的彼此影响进行调节的。

小 结

国家是有着独特的生态、历史、政治、教育、法律、规章、社会以及经济特征的政治实体。因此，它们组成系统并拥有文化。国家文化对社会化实践的影响及国民心理特征，以及发生在其疆域之内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就成为当今所开展的典型跨文化研究的合适焦点。这些研究可能是国家层面或者个体层面的，但是国家层面的研究不一定暗含着我们对个体层面现象的理解。本章分析了社会科学家把国家作为一种文化单元来研究的不同方法，提出了一个概括的框架来整合这些不同类型的研究，并且举例说明当今这些方法如何接受实验研究的考验。最理想的研究是那些能同时对国家特征和个体过程加以概念化，然后再对它们进行测量的研究。现在，这种类型的研究在跨文化社会心理学领域里正在迅猛发展。

拓展阅读

1. Bond, M. H. , & 68 co-authors. (2004). Culture-level dimensions of social axioms and their correlates across 41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e Psychology*, 35, 548 - 70.
2. Inglehart, R. , & Baker, W. E.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e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 19 - 51.
3. Leung, K. , & Bond, M. H. (2004). Social axioms: A model of social beliefs in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In M. P. Zanna (ed.) ,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4. Suh, E. M. , & Oishi, S. (2002).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cultures. www.wwu.edu/~culture.

思考题

1.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国家是一种文化？

2. 有哪些重要的国家差异特征可以解释一个国家全体公民的心理功能?
3. 国家层面的现象怎样影响那个国家内个体的社会心理功能? 用这一章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你的想法。



文化的形成和再塑： 一个发展的视角

儿童乃成人之父（威廉姆·华兹华斯，《我心雀跃》）。

发展的视角（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跨文化的社会行为呢？我们将在本章中探讨这一问题，并将在文化背景下展示一个关于家庭和自我的发展视角。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发展的视角

社会心理学基本上是非时间范畴的；也就是说，它聚焦于社会影响、社会认知和社会行为，这些都表现在人际、群体间和群体内的互动中。社会对个体的影响，全都发生在“现在”或既定的时间点上，而不是在早期经历中找寻这些现象的前身。因此，举例来说，一个人更可能在发展心理学的教材或在单独的社会发展教材上，而不是在社会心理学的教材上看到“社会发展”这一章节。在跨文化心理学领域内也有同样的现象。尽管文化的视角在发展心理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社会心理学家仍在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者中占了绝大多数，并且迄今为止发展心理学也没有对跨文化心理学产生多大影响。事实上，如凯勒和

格林菲尔德 (Keller & Greenfield, 2000) 所指出的, 文化被整合进发展心理学的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心理学分支。

然而, 随着主流的社会心理学扩大疆域, 将诸如自我、道德判断和攻击行为等纳入其研究范围, 这就对它以当下为主导的研究方向形成挑战, 它已经开始虑及到一些发展性的问题, 虽然这种考虑只是边缘性的 (有关例子见 Bond, 2004)。解释性视野中的这种变化注定要使社会心理学受益。相似地,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对人类发展的关注水平太低, 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因为发展的视角可以使我们洞见生物学和文化、普遍人性以及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动态关系。

因此, 本书中对文化的聚焦召唤着一个发展的视角。这里不会基于主流社会心理学以“人类是普遍的, 不具有文化性”的假设对社会认知和行为进行考察, 而是把人看成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人。这样, 我们所考虑的人类行为的差异会远远大于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通常所面对的差异, 因为全球性的视野需要我们考虑到大量的多样性。因此, 我们不仅要考虑发展的共同性和普遍的方面, 我们还必须要考虑那些不同的、可能是本土特征的方面。从一项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不会自动地推广到全部人类。那么, 就发展的视角而言, 这会产生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 我们可以以人们描述自己的方式作为起点。长期以来, 关于如何能更好地定义自我 (self) 的性质, 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争论不休。我们不会直接进入这场争论, 但我们会聚焦于每个人选择他或她描述自我的方式。在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中, 通常认为自我界定 (self-definition) 或自我诠释 (self-construal) 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它将是本章和第 6 章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一领域中大量的跨文化研究都已经指出, 一个人将自己诠释为与他人相对独立, 还是依赖他人, 对这两者做出区分很重要 (例如, Markus 和 Kitayama, 1991)。研究已经发现,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自我诠释分别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遍性。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 大多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聚焦于具有某种或另一种自我诠释类型的个体, 重视个体在社会认知和行为上存在哪些差异, 所考察的社会认知和行为包括从个人知觉到情绪, 从沟通风格到对资源分配特定模式的偏好。这些研

究基本上是描述性的和不受时间影响的，主要解决“是什么（what）”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考察在一个既定的时间点上，哪一种类型的自我诠释与哪些类型的行为相关联。

如果我们对这些“自我”中的差异是“怎样（how）”来的感到好奇，我们就需要超越描述性分析而进入一个更基础的、因果层面的分析。我们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某一种或另一种类型的自我是怎样逐渐形成的。为了理解不同文化和社会—经济—家族背景中出现的自我何以如此不同，我们需要对基于情境的发展进程以及家庭中子女养育和社会化过程进行研究。与仅仅将自我诠释的不同类型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建立联系（的研究）相比较，这项发展性的思路走得更远。它应对了“怎样（how）”的问题；也就是说，一种特定的自我诠释类型是怎样发展而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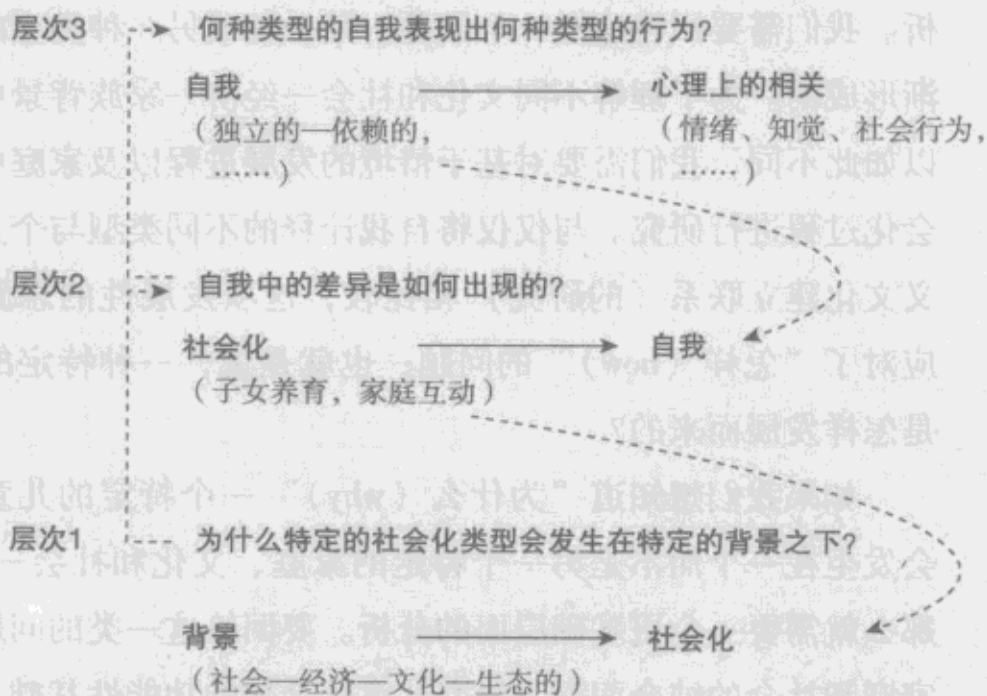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why）”一个特定的儿童社会化的类型会发生在—一个而不是另一个特定的家庭、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之下，那么就需要一个更基础层面的分析。要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家庭和社会的结合面深入研究儿童社会化的功能性基础。换言之，我们需要理解儿童养育模式以及它们相对适应不同环境的潜在原因。通过这项工作，我们能够理解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怎样影响家庭互动模式和儿童社会化，理解家庭互动模式和儿童社会化又是怎样影响儿童养育的。这样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应对“为什么”的问题，可以对我们所观察到的人类模式的多样性加以特征化概括，它还有助于我们搞清楚在这些模式中何时可望发生变化，因为背景中的任何变化都意味着关系链条发生变化。专栏5.1以示意图的方式表达了上述思路。层次1表示生态—文化问题，其中的有些问题我们已经在第4章中讨论过了，我们还将第6章中对层次3加以讨论。

既然我们超越了人类可能的普遍社会行为，对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或总体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发生了兴趣，那么探究这些差异是怎样发生的，对我们来说就变得很重要了。研究这些差异是怎样产生以及为什么会产生，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它们的功能以及适应性价值，由此，对观察到的人类社会行为中的差异，我们的理解亦得以扩展。

专栏 5.1

使用发展的方法时所涉及的概念性问题

探究的层次



人生阶段和文化

我们的思考方式以及行为方式是终生适应的结果,而这种适应在很大程度上被文化影响所塑造。进一步讲,这些适应通过持续的经验在不断变化着并被重新建构着。这就是已经被广为接受的、发展心理学中的毕生发展视角。持续的发展贯穿了从出生以前到老年和死亡的整个生命历程。然而,婴儿期、童年和青春期被认为是毕生历程中特别重要的阶段,因为绝大多数的成长、学习和变化都发生在人类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文化因素在人生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从幼年到成年,文化因素的影响力渐进增长,毕生发展的研究观点使得文化的相关性变得更加重要。

在文化的背景下对童年期进行研究不仅见于心理学,并且在传统上对人类学家 (Whiting & Whiting, 1975; LeVine, 1989)、社会学家

(Elder, 1974)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历史学家来说 (Aries, 1962) 都是一个核心课题。心理学中, 生态学视角 (Bronfenbrenner, 1979; Supter & Harkness, 1986) 将儿童发展和养育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之下, 把儿童镶嵌进最接近的生活环境 (家庭和紧邻的社区), 再把最接近的生活环境镶嵌进远端的社会环境 (社会制度、经济体系、文化模式和习俗) 之中。将儿童置于家庭和社会之中, 以及将儿童发展与父母的价值观和定位相联系起来, 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理解在自我、心灵、行为和价值观的发展中, 社会—文化差异是怎样产生的。

以照看、营养、保护等的生物性需求为基础, 对婴幼儿的解释有很多跨文化的共同性。大部分对婴儿的照看确是基于生物性/进化性的功能, 包括普遍的“本能性养育”, 它涉及了给发出求助信号 (如哭叫、微笑以及“咿咿呀呀”) 的孩子照料和拥抱 (Keller, 1997)。凯勒等人 (Keller, Lohaus, Volker, Cappenberg, & Chasiotis, 1999) 指出, 父母养育婴儿的一些基本成分具有进化基础, 因此显示出了跨文化的共同性。这些成分是最基本的关爱系统 (特别是哺乳)、身体接触系统 (特别是拥抱)、身体运动刺激系统, 以及面对面的互动系统。然而, 凯勒等人也报告说, 后三个系统的普遍性在不同文化的背景存在差异。身体接触和身体刺激在非洲集体主义的传统农耕文化中更典型, 而面对面的互动系统在西方城市背景的中产阶级中更常见。他们进一步宣称, 以亲密身体接触为特色的养育风格有益于儿童与他人发展关联性, 而带有儿童指导性语言 (child-directed language) 的面对面互动则能促使儿童发展出独立感。专栏 5.2 显示了对母亲行为的近距离观察是怎样揭示出微妙但重要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差异。

因此, 从早期母婴互动过程中, 可以发现一些跨文化差异的发展性根源。人类学文献也指出了基于不同生活方式和经济类型, 以及不同风俗和信仰的照看行为的多样性, 这被称之为俗民理论 (ethnotheories) (Harkness, 1992)。不同的自我和全部行为技能是怎样发展而来的, 以及为什么会发展出来? 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 以及当我们在本章后面的内容里详加阐述的时候, 对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这些早期互动模式和照看行为的研究必然会提供线索, 来帮助我们理解上述问题。

专栏 5.2

不同的西方国家以及不同的时代，孩子的抚养方式存在着差异

尽管欧洲社会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但是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在孩子抚养方面还是存在着差异。通过比较德国和希腊的城市中产阶级母亲与她们三个月大的孩子的互动情况，凯勒等人（Keller, Papaligoura, Kuensemüller, 2003）发现两国的母亲都运用了面对面的接触和目标游戏，但较少身体接触和身体刺激。这些都是能够在孩子身上培养出一种独立性的互动性策略。然而，在面对面互动过程中，希腊母亲会通过微笑来表达更多的互动性温情；而德国母亲在回应婴儿发出的信号时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因此，尽管希腊母亲和德国母亲都强调独立性，但希腊母亲也通过温情来建立关联性。按照研究者的看法，希腊母亲的抚养模式有助于发展出一种自主性—关系型自我诠释（Kagitcibasi, 1996a, 后文将予以讨论）。

在一个社会中，（抚养方式）也可能会因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显著的变化。凯勒和拉姆（Keller & Lamm, 2005）检验了两个跨越25年的德国中产阶级母亲的比较样本，他们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她们与孩子面对面的接触和目标游戏显著增加，而身体接触和通过微笑、音调来表达的温情显著减少，前者的增加有助于增加独立作用，而后的减少则表明对关系性的漠视。

上述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只有普遍的、基本的生存需要的婴儿阶段，养育方面也存在着文化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可能就是形成不同发展途径的基础。过了婴儿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社会中对儿童的角色和责任的定义存在着更大的多样性。例如，早期的人类学研究（Mead, 1928）提出，把文字出现前的社会和西方的技术社会加以比较，青春期和性别角色的差异相当大。虽然米德关于萨摩亚人的研究结论的效度后来受到质疑，但在全球性视野下的后续研究表明，不同富裕程度和城乡差异的背景下，儿童和青春期的家庭角色均存在差异。我们可以把儿童劳动作为一个相关案例来进行讨论。

研究发现，在以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为特色的农业社会中，孩子们很早就开始承担诸如家务杂事、照看弟妹、饲养家禽家畜等责任（Munroe, Munroe & Shimmin, 1984）。任务的复杂性和数量随着年龄而增

长，因此到童年中期的时候，大多数的儿童除了睡觉外，时间都被各种类型的劳动占用了。这与生活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特别是在西方社会）的儿童形成鲜明的对比，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儿童的主要任务就是玩耍。例如，怀廷和怀廷（Whiting & Whiting, 1975）在对六种文化中的儿童的经典早期研究表明，在那些3~10岁的儿童中，肯尼亚一个原始民族居住区的儿童有41%的时间用于劳动，而美国城市郊区儿童仅有2%的时间用于劳动。

儿童的劳动对家庭经济是有贡献的，一方面是这些劳动本身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可以使成年人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经济回报更多的工作。按照一位非洲心理学家桑目南（Nsamenang, 1992）的观点，劳动对儿童们学习将来要承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途径。另外一些来自非洲和与其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Dasen, 1988; Harkness, 1992）。在日常的非正式工作背景下，如何向儿童传授，以及儿童如何学习方面也存在着差异。莫雷利等（Morelli, Rogoff, & Angelillo, 2003）比较了刚果、危地马拉和美国的2~3岁的儿童是如何度过他们的童年的。在刚果和危地马拉，儿童们可以频繁地接近大人们的工作，并经常观察他们工作。即使是在这样的年龄，他们之间的游戏有时也会模仿大人们的工作行为。相比之下，美国的儿童很少有机会观察大人们的实际工作，他们更多的游戏时间是和成人在一起，而不是和同龄人在一起。因此，研究指出了父母对儿童学习不同导向。有一些导向显得比较“传统”，另外一些则比较“现代”。时代的变迁带来的抚养方式的改变，也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下面列举出同一些社会中随着生活方式变化而发生的抚养模式的变化（见专栏5.3）。

至于从什么时候开始，儿童劳动不再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学习经验，而成为一种“童工”，甚至变成了“虐待儿童”的问题，人们对此看法不一。特别是从（西方）“人权”的角度，国际机构和儿童权利维护者批评了儿童劳动，认为它干扰了儿童接受学校教育。这个事例表明，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同样的行为可能会被赋予不同的文化涵义，争论由此而来。因此，与不同人生阶段相联系的文化涵义反映了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和价值观。

专栏 5.3

玛雅地区儿童社会化模式的改变

↑ 位于墨西哥恰帕斯的玛雅地区有一个纺织社区，格林菲尔德及其同事报告了此地区的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社区从自给自足的经济体转变成了商品货币经济。这种转变影响了纺织的传授方式和工作方式。在 1969 年和 1970 年，母亲教授女儿学习纺织，是通过关注细节和对模仿的悉心指导。纺织模式的不断重复反映了一个保守和服从的导向。在 1991 年和 1993 年，纺织的教和学都包括了一个更为独立的学徒关系。纺织模式的变化亦反映了这种导向上的变化，代代相传的传统纺织模式转变成了新颖的、含有个人创造力的模式，如下表所示：

	1969——1970		1991——1993
经济	自给经济	→	商品货币经济
纺织学徒关系	悉心指导、关注细节的表述、模仿	→	更为独立的行为
独立纺织	47.98（平均数）34.12（标准差）	→	59.16（平均数）30.64（标准差）

资料来源：Greenfield, Maynard & Childs (2003)；Greenfield & Childs (1977)。

对老年这一人生阶段的理解也存在着差异。在西方的技术社会，老年人被青壮年人的家庭和社区所孤立，失去了社会地位；而在许多传统社会之中，他们仍然是家庭和社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不会失去社会地位。他们还积极参与重要的家庭和社区任务，譬如向年轻人传播价值观念、调解纠纷等等。例如，沃德（Ward, 1987）对新加坡的更年期妇女进行了一项研究。通常人们认为西方社会中妇女中年危机中会经历心理烦躁，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妇女并没有经历中年危机现象。西方世界的妇女地位倾向于随年龄增加而降低，因为青春和美貌是这种社会地位的高价值指标。然而，在传统的集体主义社会里，老年是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时期，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在家庭和社会领域取得了更多的决策权和行动自由。鉴于许多家长制社会里传统的性别角色，年轻妇女通常处于家庭和男性亲属的保护之下，而老年妇女则不受此类约束限制（亦见 Kagitcibasi, 1982c）。伊麦莫格鲁等（Imamoglu, Kuller, Imamoglu, & Kuller, 1993）的一项研究揭示了在经历如何变老

时表现出的文化差异。他们发现与瑞典老人相比，土耳其老人有更频繁的人际交流。然而，土耳其老人对他们的社会关系满意度较低，因为他们希望获得更密切的联系。

因此，从文化上来看毕生发展，可以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度过和理解不同的人生阶段。早期的模式为后来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空间不同、时间不同，意义也不同。有一点似乎具有普遍性，那就是在所有的社会中，人们在定义个体及向他或她分配特定的角色和责任时，都倾向于将年龄作为一个基础。

子女价值和家庭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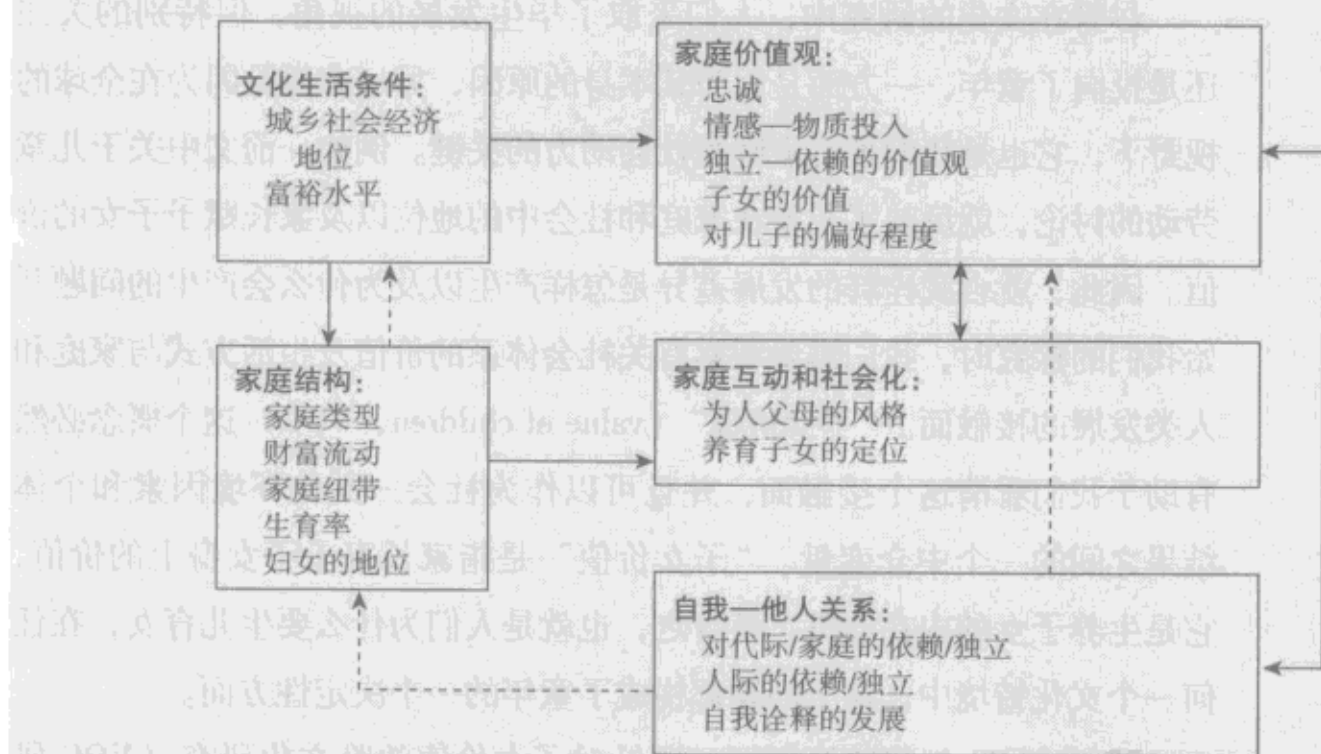
尽管在文化的研究中，人们采取了毕生发展的视角，但特别的关注还是投向了童年，一方面是因为其本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全球的视野下，它也是我们理解家庭和社会动力的关键。例如，前文中关于儿童劳动的讨论，就反映了儿童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家长赋予子女的价值。因此，就自我诠释的发展差异是怎样产生以及为什么会产生的问题开始我们的探究时，我们需要观察有关社会体系的价值及生活方式与家庭和人类发展的接触面。“子女价值”（value of children, VOC）这个概念必然有助于我们看清这个接触面，并且可以作为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和个体结果之间的一个中介变量。“子女价值”是指家长寄予子女身上的价值，它是生养子女的内在动机，换言之，也就是人们为什么要生儿育女，在任何一个文化情境中，这个问题都构成了童年的一个决定性方面。

20世纪70年代曾开展了一项针对子女价值的跨文化研究（VOC研究），该研究调查了来自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土耳其、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的已婚被试样本，以及德国慕尼黑一个女性样本（Fawcett, 1983; Hoffman, 1987; Kagitcibasi, 1982a、b）。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父母赋予他们子女的价值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同样存在。该比较性研究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在发达程度越低的情境下，父母在子女（尤其是儿子）身上所寄予的经济和实用价值越加明显。这种价值随着

社会—经济发展和富裕程度的提高，其重要性有所减少。与之相对照，子女能向父母提供以及父母寄予子女的心理价值，诸如爱、欢乐、陪伴以及自豪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重要性要么保持，要么有所增加。基于 VOC 的研究结果，库查巴莎（Kagitcibasi, 1990, 1996b）提出了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三种不同的家庭关系模式，构成了一个家庭变迁模型（A Model of Family Change）。然而，在我们对三种模式进行考察之前，我们需要先建立一个表现家庭和子女之间关系的概括模型，如专栏 5.4 所示。

专栏 5.4

情境中的家庭—子女关系的概括模型



资料来源：Kagitcibasi (1996b)。

上图是一个具有三项不同内容（下文中将详加阐述）的基本框架。这是一个有关家庭所处背景以及在家庭情境中儿童自我诠释发展的概念化模型。在图示中，文化价值、信念、习俗、城市—乡村生活方式以及贫富差异都很重要。家庭结构主要是受这个情境的影响并对情境也有反作用。情境包括了社会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所研究的几个家庭特点。情

境（文化、生活条件以及家庭结构）又影响着家庭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了家庭价值、家庭互动以及社会化，它们彼此互相影响。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不同因素涉及子女的养育以及在模型中构成家庭系统的价值观和实践。家庭价值、家庭互动和社会化会决定了特定类型的自我诠释和自我—他人关系。

这一基本模型有助于我们将家庭在情境中定位，并有助于我们理解专栏 5.1 中勾画出来的、现象上有着内在联系的层次 1 和层次 2 之间的关系。换言之，现在我们可以对“为什么某一社会化类型会出现在某一类型的背景下”和“自我的差异是怎样显现的”这两个问题在概念上加以解决了。接下来，我们就将检验在不同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下的三种不同家庭模型中，这个概括模型如何得以昭示，以及在每一种模型中上述两个问题是如何得到回答的。

三种家庭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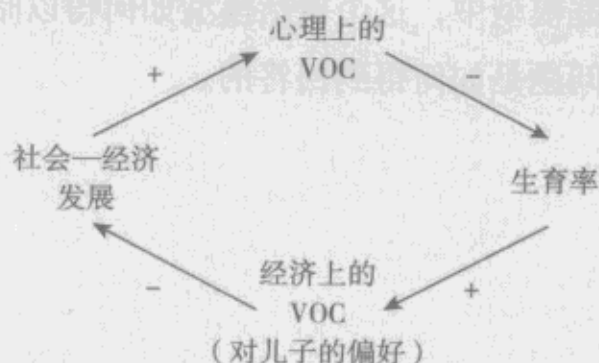
如果儿童对家庭的物质福利具有重要贡献，则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家长会赋予子女经济性/实用性的价值，这是从他们的物质贡献中衍生出的一种价值。在富裕程度较低的社会尤其如此，特别是在城镇或半城镇地区的乡村农业人口或低收入人群中，那里的孩子在家里家外工作的情形是非常普遍的，并对家庭经济颇有贡献。当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还要对他们的父母提供老年生活的保障，因为乡村的老年人通常不具备养老金、保险金和退休金等收入。因此，不管是在子女们年幼时还是已经长大成人，原生家庭（family-of-origin）在生计上均对子女有强烈的依赖性。这就是**依赖型家庭模型**（the family model of interdependence）（Kagitcibasi, 1990, 1996b）。这一模型类似阿内特（Arnett, 1992）归类为“狭窄”的社会化类型，因为它所强调的是顺从和服从。

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之下，生育率也是最高的，因为更多的子女会产生更多的物质贡献，这样意味着有更多的物质利益和老年保障。如果一个人有五六个子女，每一个子女都对他们年老的父母有经济上的贡献，这些累积起来的收入所提供的保障要比仅依靠一个或两个子女大得

多。而且，贫困地区儿童的死亡率也很高，更凸显了多生多养的重要性，只有多生多养，才能保证有足够多的子女长大成人来赡养年迈的父母。因此，印度尼西亚 VOC 研究报告的专论题目是“只生两个还不够”（Darroch、Mayer、Singarimbun, 1981）。专栏 5.5 的示意图呈现了子女价值作为社会经济因素（背景）与生育率行为（结果）之间的一个中介变量。

专栏 5.5

子女价值理论框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生活在更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情境下，孩子们通常去上学，而不是工作。对于家庭来说，他们成了经济负担，而不是财富。既然子女的经济价值可以忽略不计，子女对于父母亲的心理价值就凸显了出来，这一点经常成了他们要不要孩子的惟一原因。通过孩子来满足心理上的需求并不必然导致多生多养，因为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负担很快会超过他们给父母带来的好处。父母亲可以从仅有的一两个孩子身上得到所有的快乐、爱以及自豪感，所以不需要更多。这就是**独立型家庭模型**（the family model of independence）（Kagitcibasi, 1990, 1996b），它可以很少或不依靠子女的物质贡献。阿内特（Arnett, 1992）将这个模型中所发生的进程归类为“宽阔”的社会化，因为它倾向于培养自主性和主动性。

寄予子女身上的价值及其相应的家庭动力学，对子女养育以及自我诠释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在**依赖型家庭模型**中，倾向于对孩子进行

服从性导向的养育，并不会促进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发展。这是因为自主性的儿童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与父母）相分离的独立的成年人，这样的人可能会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家庭的利益。因此，独立性不被当成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可能会被看成是对家庭完整和生计的威胁。代际之间的依赖性是通过家庭生命周期来表现的，一开始是就儿童渴望得到的依赖而言。这种依赖以后就发生了逆转，变成了年迈双亲的依赖，随着生命周期的运转，他们不得不依赖于长大成人的孩子们的赡养。

相比之下，**独立型家庭模型**使成长中的儿童形成了依靠自己和独立的品质，因为物质上的富足和社会保障措施，诸如养老金，使得依赖家庭的必要性减小。再加上客观生活条件支持独立性并渗透到文化价值观之中，这样的价值观又会培养独立性和分离性，并使独立性和分离性正常化，成为人类“健康”发展的一个必需条件。例如，在北美和北欧，后青春期/年轻的成年人要搬出父母的家，自己生活。然而在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地区，年轻人仍旧住在父母亲的家中直到结婚为止。有些人结婚以后还住在父母亲那里。确实，在非西方的文化中，一个人要成长和成熟，并不一定就必须要从家庭中分离出去（Kagitcibasi, 1982c）。

人们普遍认为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生活更加富裕，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就会发生从**依赖型家庭模型**向**独立型家庭模型**的转变。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与其说发生了一个简单的变化，不如说是发生了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与城市化相联系的复杂变化，其中涉及生活方式从传统农业型向城市型的转变（见第1章的专栏1.3）。特别是在人际/家庭关系紧密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之下，关系的联结表现为：情感方面的依赖得到了维持，而由于财富和其他养老保险资源的增加，物质方面的依赖性就削弱了。于是有人提出了第三种模式——**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型**（the Family Model of Psychological Interdependence），打算以此来描述这一变化的特征（Kagitcibasi, 1990, 1996b）。这就产生了一个与传统（农村）完全依赖型家庭和个人主义城市（西方中产阶级）独立型家庭都不一样的社会化结果。

在**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型**里，孩子的养育涉及控制，而不是放任自流，因为养育的目标并不是分离的、个人主义的独立。然而，此模型中孩子的养育，除了控制之外还有自主性的空间与之相结合，这主要有两

个原因。其一，随着物质依赖性的减少——年迈的父母具有可替代的养老资源，孩子成长中的自主性不再被看成是对家庭生计的威胁。其二，成长中孩子的自主性，而不是温驯的服从，有助于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例如，在学校里独立做出决定以及获得一个专业化的工作（see also Kohn et al., 1990）。学校教育的效果在提升自主性方面似乎特别强烈。这一点也反映在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价值削弱、心理价值增强的过程中。子女的实用/经济价值反映了家庭中代际之间的依赖性；另一方面，子女的心理价值反映了心理上（情感上）的依赖性。

2003年在土耳其进行的一项子女价值的研究为这一文化变迁的模型提供了证据（Kagitcibasi & Ataca, 2005），该研究由特罗姆多夫和诺克（Trommsdorff & Nauck, 2003）所主持，是一项横跨15个国家研究的一部分。与1975年在土耳其初次得到的VOC结果相比，研究者发现在经过了为期30年的时间后，经济/实用的VOC显著降低，而心理的VOC显著提高。这种变化反映了目前较高水平的教育、城市化和富裕程度，也就是全球性的社会—经济变化和发展。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2003年城乡的比较进一步揭示出，对经济/实用的VOC的最高认同出现在农村地区，其次是城市低收入群体之中，而那些上流的城市中产阶级群体则只有最低程度的认同。然而，在心理的VOC方面，在不同的群体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进一步说，对儿童服从性的认同与经济/实用性VOC的重视非常接近，教育程度越低/越不富裕的人们越是看重服从性（见专栏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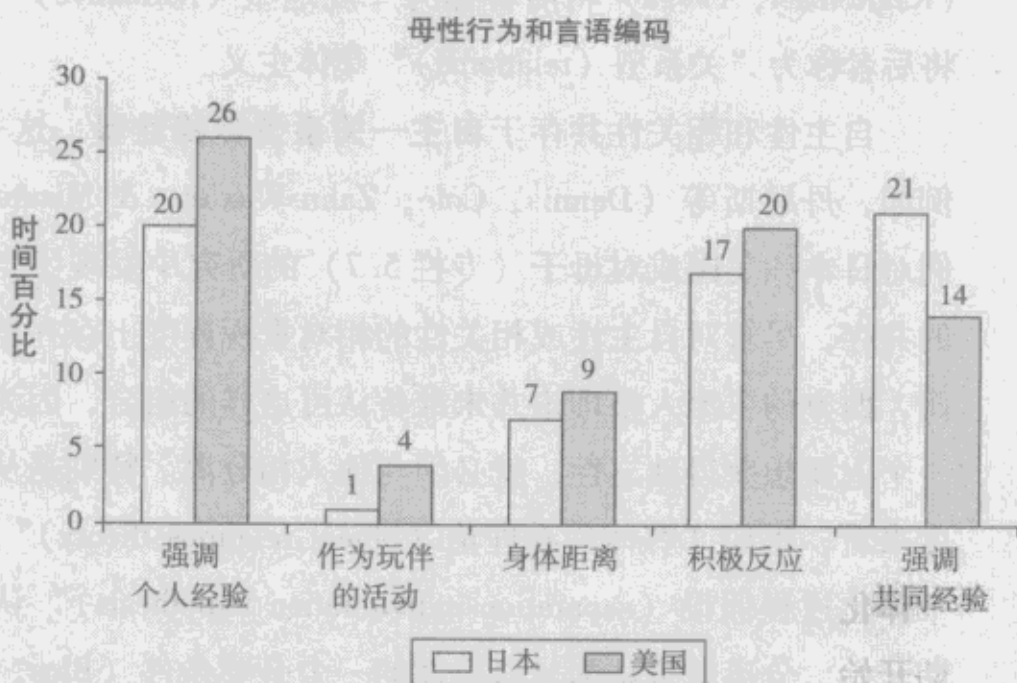
因此，以往的VOC研究及近期的重复性研究，均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经济背景和家庭动力学的交界面，正是这个交界面造成了不同类型自我诠释的发展。这种类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一种特定类型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之中是如何培养出以及为什么会培养出一个特定类型的自我诠释。考虑环境适应与环境 and 个体产出两方面变化的功能性视角成为这一理论性视角的基础。也许会有人提出这些不同的家庭模式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的基础。**依赖型家庭模型**和**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型**似乎都支撑着集体主义文化，它们都产生于集体主义文化并有助于此类文化的发展演变。另一方面，**独立型家庭模型**似乎个人主义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因此，导向这些文化世界观的发展途径是以家庭文化

和家庭动力学为中介的。如专栏 5.6 所示，即使是在发达经济体中，在孩子的养育导向方面也能发现类似的差异。

专栏 5.6

发达工业国家的母子关系

丹尼斯等（Dennis, Cole, Zahn-Waxler, & Mizuta, 2002）观察了旅居美国的日本母子的互动关系以及美国母亲和她们的学龄前孩子的互动。美国的母亲有更多强调个人体验的对话，更多地扮演玩伴的角色，保持更多的身体距离，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并且对孩子的成就有更多的积极反应。相反，日本的母亲有更多强调共同经验的对话，保持更多（母子之间而不是玩伴之间）的社会角色区分。这些发现暗示着美国母子之间强调自主性，日本母子之间强调关联性。但是在自由游戏的情境中，美国母亲表现出更多对关系的关注，而日本母亲表现出更多对自主性的关注。因此，在两种文化中均具有相应的自主性和相关性。



资料来源：Dennis, Cole, Zahn-Waxier, Mizuta (2002).

自主性—关系性自我诠释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看到的，**依赖型家庭模型**中培养出来的个体自

我诠释强调相关性和依赖性。这是因为在以服从为导向的养育过程中，并不鼓励自主性。相反，产生了一种“他控型 (heteronomous)”自我诠释，一个依赖他人、缺乏自主性的人往往以这种自我诠释为特征。与之相对照，一个自主和独立的人往往以**独立型家庭模型**中塑造出来的自我诠释为特征。独立常常被认为是自主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型中塑造出来的自我诠释可以被定义为**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 (Kagitcibasi, 1996a、b; 2005)。它可以看成是独立型自我诠释和依赖型自我诠释整合性的综合体。如上面所提及的，养育孩子的导向若有助于形成这种类型的自我，会涉及自主性，但并非放任不管，还得有家长控制，因为养育的目标并不是要成长中的孩子分离出去。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既有关联性，又有自主性的自我。这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依赖类型。与其说它所依附的价值和规范是一种对等级制度和（个体对群体的）从属关系的认同，不如说是与人际关联性有关。据信前者更多地表现在那些来自集体主义国家、高权力距离文化的人身上 (Hofstede, 1980; Trandis, 1995)。库查巴莎 (Kagitcibasi, 1997a) 将前者称为“规范型 (normative)”集体主义，而将后者称为“关系型 (relational)”集体主义。

自主性和相关性共存于**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丹尼斯等 (Dennis, Cole, Zahn-Waxler, & Mizuta, 2002) 在他们对日本和美国成对母子（专栏 5.7）的研究中发现了自主性和相关性的共存，尽管对自主性或相关性的相对重视程度上存在着文化差异。然而，西方的主流人格理论并未准备认可这样的组合，因为它们常常假定一个人要想获得独立性，就必须与他人相分离。特别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正如“客体关系理论 (object relations theory)”及其“分离—个体化过程假设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hypothesis)”认为，从婴儿早期开始，分离就被认为是自主性的一个必要条件 (Blos, 1979; Mahler, 1972)。它的支持者宣称关联的自我不可能获得充分的自主性。然而，这一主张即使在主流心理学的内部也受到强烈的挑战 (Guisinger & Blatt, 1994)，对于那些人类关系联系紧密的非西方集体主义的“关系性文化”来说，其内涵就更加影响深远了。**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的概念支持了对这一主张的挑战。

对于理解青春期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的争议。结合了精神分析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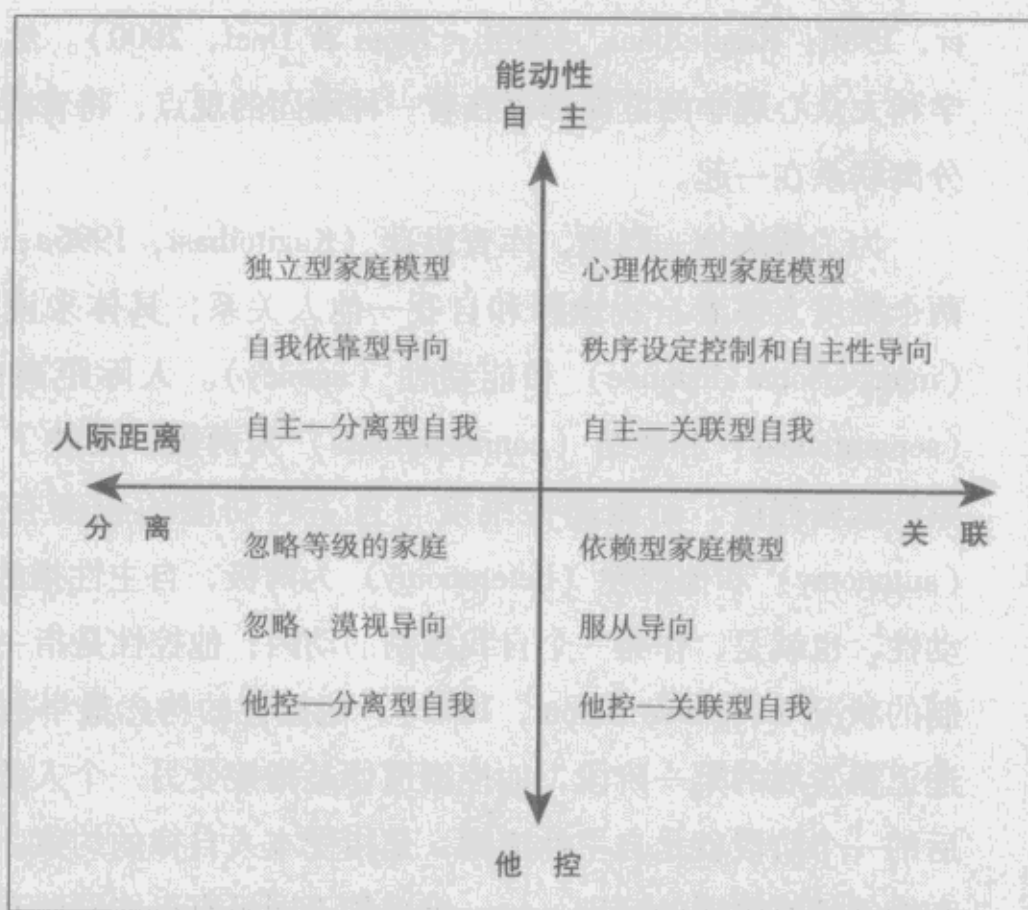
容的个人主义视角将青春期看成第二个分离一个体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与父母的分离被看作是发展自主性的必要条件（Steinberg & Silverberg, 1986）。最近这个观点受到挑战，一个与之对立的视角认为与母亲的亲近关系也有助于青春期自主性的健康发展（Grotevant & Cooper, 1986; Kagitcibasi, 1996b; Ryan & Deci, 2000）。然而，学院心理学和大众心理学两方面都存在着一种顽固的观点，将青春期的个体化与分离联系在一起。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库查巴莎（Kagitcibasi, 1996a; 2005）认为有两个维度支撑着自我诠释和自我—他人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人际距离（interpersonal distance）和能动性（agency）。人际距离的维度以分离（separateness）和联结（connectedness）为两极，反映了自我与他人联系的紧密程度。而能动性维度与自主性功能的程度有关，以自主性（autonomy）和他控性（heteronomy）为两极，自主性指的是意志力的能动性，也就是，作为一个自我控制的动因；他控性是指一种被外力所控制的状况（see also Bloom, 1977）。他控性的构念最早被皮亚杰用于描述道德发展的第一阶段，他控型道德是指接受另一个人的约束，紧随其后的一个阶段就是自主性道德，是指受本人自律的约束。由于人际距离和能动性有鲜明的区别，每一维度的不同极有可能同时存在。因此，自主性和相关性可以是相容的，正如自主性和分离可以相容一样，尽管那些支持自主性的个人主义自我诠释的人只认可后一种组合。

将上述的两个基础性维度、不同的家庭模型和目前检验过的作为这些变量的结果——自我——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概括的整合性模型，如专栏 5.7 所示。这是一个启发式模型，用来帮助我们将专栏 5.1 中所示的不同分析层次的变量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沿着能动性和人际距离这两个基本的基础性维度，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模型与子女养育导向是如何与不同类型的自我诠释相联系的。人际距离和能动性两个维度在本模型中是正交的。这是为了表明它们是截然不同的维度。尽管威金斯和特拉普内尔（Wiggins & Trapnell, 1996）对这两个社会行为之轴的整合暗示着在许多行为领域和测评背景之下它们都是正交的，但是它们也可能只在某些文化背景下存在某种程度的相关，而在其他文化背景中却可能没有相关。

专栏 5.7

能动性、人际距离和情境中的自我诠释类型



资料来源：改编自 Kagitcibasi (2005)。

我们已经讨论了三个象限里所表示的自我诠释的模型。但我们还没有涉及以分离和他控性为特点的第四种类型，以及作为其产物的他控—分离型自我，也没有人提出这种类型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特定地区具有普遍性。在个体层面上，他控性和分离性可能是指向一种父母放任不管或漠不关心的不健康情形 (Maccoby 和 Martin, 1983)。在遗弃型和专断型管教方式的家庭中，人们发现会为孩子塑造出一个分离的且他控型的自我 (Fisek, 1991)。这种模式并不普遍，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家庭病态，它可能是这样一些孩子的特征——他们在学校表现出行为障碍，离开学校后还会出现反社会行为 (Deater-Deckard 和 Dodge, 1997)。

越来越多的跨文化研究支持着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的存在。在美国、俄罗斯、韩国和土耳其都发现，与孩子青春期的健康和幸福联系在

一起的是亲子间紧密的关系和依恋而不是分离（Chirkov, Kim, Ryan, Kaplan, 2003），在德国情况也是如此（Grossman, Grossman, & Zimmerman, 1999）。在美国和韩国还发现，与自主性和分离性之间的关系相比，自主性和关联性之间表现出更为正向的相关（Kim, Butzel, & Ryan, 1998; Ryan & Lynch, 1989）。相似地，乔斯等（Jose, Huntsinger, & Liaw, 2000）对中国台湾人、华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的父母亲进行了比较，发现两组华裔父母既认同关联性又支持自主性。

这些研究表明，在一系列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能动性和人际距离两个维度都是互相分离的，并且支持了**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这一概念的效用。更进一步，周（Chou, 2000）发现了“情绪自主性”（Steinberg & Silverberg, 1986）的两个组成部分与中国青少年忧郁相关，即个体化（分离）和对父母的去理想化；艾丁和奥兹图坦库（Aydin & Oztutuncu, 2001）的研究表明，土耳其青少年的忧郁与分离相联系，但与父母的控制并无联系。因此，特别是在珍视家庭关系的集体主义文化中，青少年与父母的亲近关系似乎为青少年提供了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

然而，上述研究意味着即使在个人主义的美国，**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也是与健康的发展结果联系在一起的，弄清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这种类型的自我诠释将两种基本的人类需求整合到了一起，这两种需求也就是诸多心理学理论所提出的关系性需求和自主性需求。尽管库查巴莎提出的**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是基于集体主义文化的主体世界（也就是非西方的）的城市化了的、发达的背景，但这一概念无疑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本书中所出现的有些概念，最初只认为对跨文化心理学家有用，现在却已经证明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特定背景中有些现象会更加鲜明，通过在该背景下研究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形成一些被主流研究者所忽视了的概念，并以此来丰富我们的主流心理学。

通过类似的途径，**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型**（Kagitcibasi, 1990, 1996b）也应当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上述的一些研究发现已经支持了这一观点。下文中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关于家庭控制的研究将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

家庭控制

对不同家庭模型的检验均表明家庭控制是一个关键变量。家庭控制在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型中根深蒂固，而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型之中产生了自主—关系型自我。相当数量的研究表明在这种家庭模型中共存着父母控制、关联性和自主性导向。例如，斯图尔特等（Stewart, Bond, Deeds, & Chung, 1999）发现，尽管中国香港的富足家庭持有现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但是其家庭依赖性和父母控制都很高。相似地，林等人（Lin & Fu, 1990）比较了中国人、中国移民和欧裔美国人的父母亲，发现同欧裔美籍父母亲相比，中国人在父母控制和鼓励独立性两方面均高于欧裔美国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国人的研究结果，在美国强调分离性和父母放任，特别是社会阶层较高的父母亲更是如此，其研究结果反映了与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一致性（Hoffman & Youngblade, 1998；Solomon, 1993）。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父母控制的含义。人们常常假定严格的父母控制是父母亲敌意的一个信号，换言之，他们对父母控制维度和关爱维度没有加以区分，而仅仅想像父母养育是一个单一维度，以控制（强）为一极，而以关爱为另一极。因此，关爱被看成是与强的父母控制不相容的，后者更被贴上了“权威型父母管教”的标签。这种看法出自于精神分析的观点，精神分析的观点也是“权威型人格理论”的基础（Adorno, Frenkel-Brunswik, Levinson, & Sanford, 1950）。这反映了个人主义的、西方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要求父母管教相对放任，给孩子（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们）提供大量的自由和独立性。在这种背景之下，严格的管教是一种异常的（而不是常态的）父母教养模式，因此被看成是“不正常的”。

最早对这一观点提出挑战的是由库查巴莎（Kagitcibasi, 1970）进行的一项研究，研究比较了土耳其和美国处于后青春期的青少年对受父母管教经历的回忆。尽管发现在父母控制的知觉上存在着差异——土耳其人报告了更强烈的控制，但两个群体之间在察觉到的父母关爱上并无

差异。因此，可以说土耳其的青少年报告了他们经历过的受控制而有温暖的父母管教。这是对父母养育中关爱和控制两个维度相独立的一项实证证明。从那以后，其他研究者，特别是罗那及其合作者（Rohner & Pettengill, 1985；Trommsdorff, 1985）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他们发现韩国和日本的青少年察觉到的父母控制与父母接纳（关爱）相关，但在美国和德国，父母控制与父母拒绝是联系在一起的。特罗姆多夫还报告说，在日本，当青少年感受到很少的父母控制时，他们会有被抛弃的感觉。有趣的是，对韩裔美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他们与欧裔美籍青少年的相似度超过了他们与韩国青少年的相似度。这个表面上自相矛盾的情形又一次指向了一个社会中关于父母控制含义理解上的差异，以及指向了何为“正常”何为“不正常”的社会比较过程。韩裔美籍的儿童和青少年将自己与他们的欧裔美籍朋友进行了对比，发现他们自己的经历是“异常”的，并从而认定他们的控制型父母亲一定是不喜欢他们的。

一般说来，高水平的父母控制会出现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孩子的养育并不是以提升青少年的个人主义独立性为导向。因此大量研究聚焦于在更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集体主义家庭/社会背景之下、服从导向的儿童养育（Barry, Child & Bacon, 1959；Berry, 1979；Bond, 1986；Dekevic, Pels & Model, 2004；Greenfield, Keller, Fuligni & Maynard, 2003；Kagitcibasi, 1982a）。在不富足的情境下尤其如此。如前所述，在这种背景下代际之间的物质依赖性非常强。然而，即使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代际之间的物质依赖性削弱的情形下，子女养育中的父母控制依旧，因为孩子社会化的目标并不是分离，而是心理上的亲近和依赖，这一点我们在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型中已经进行了解释（Kagitcibaci, 1990, 1996b）。

劳和他的同事进一步区分了“主导型控制（dominating control）”和“秩序设定型控制（order-setting control）”（Lau & Cheung, 1987；Lau, Lew, Hau, Cheung, Berndt, 1990）。他们以中国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为研究对象，发现主导型控制与察觉到的父母关爱呈负相关，而“秩序维持”和关心型控制都与父母关爱呈正相关。这与莫斯对功能型和功能紊乱型控制（functional and dysfunctional control）的早期区分是一致的（Moos & Moos, 1981）。在两种概念化中，都存在着较为积极导向

的、关心型控制和颇为消极导向的、极权型控制。因此，父母控制的类型，特别是作为控制基础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进一步来说，在父母养育行为上所赋予的意义常常是由文化来定义的。

上面所提及的乔斯等人的研究（2002）也发现，中国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同时表现出控制和关联性，比欧裔美籍父母表现出更多的控制，但关爱的程度却相同。在非裔美国人的家庭中强的父母控制同样是普遍的，这通常和父母在不安全的环境中保护孩子不受消极影响的压力感和需要相联系（McLoyd, 1990）。体罚是父母控制的一种严厉形式，它在非裔美国人的家庭中比在欧裔美国人的家庭中更为常见，即使在控制了社会经济状况之后也是如此（Day, Peterson & McCracken, 1998; Lansford, Deater-Deckard, Dodge, Bates, & Pettit, 2003）。因此，有些地方的文化接受在孩子养育中使用体罚，觉得这是一种常态。这样，它对非裔美国儿童的意义要比对欧裔美国儿童的意义更为积极。实际上研究也表明，在欧裔美国儿童中，早期的体罚和后来的青春期的行为问题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正向的联系，但在非裔美国儿童中却存在着负向的关联（Lansford 等人, 2003）。同样地，迪特—德克和道奇（Deater-Deckard & Dodge, 1997）的研究表明，父母亲的行为和孩子的行为之间存在的关联，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有所不同，如父母的体罚行为和孩子的攻击性之间的关联取决于在该文化中体罚具有多大的普遍性，以及体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人们所接受。

因此，在不同的族群中，体罚的意义和普遍接受性会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并不赞成严厉的体罚和身体虐待。父母控制和约束的严厉程度也需要加以考虑。有这样一个假定认为，严厉的父母控制和体罚有害并且是父母亲敌意的表现。上述研究表明，在美国（西方）人口中的中产阶级之外，这一绝对的假定不一定有效。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中，关于养育、约束孩子的恰当方式也表现出跨文化的差异。在这项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宣布，父母的关爱和温馨很有可能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反映了为种族延续而对下一代给予保护和照顾的进化过程。另一方面，父母控制似乎与社会习俗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中会有一些差异。这种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期望达到的依赖性—独立性水平，正是基于这一水平，我

们对儿童社会化才受到关注。

移民的背景

我们已经看到了家庭模型、代际依赖、养育孩子的方式以及自我诠释，都会由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显示出差异。例如，当我们的视线从较不富裕的背景转向城市和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背景时，家庭模式会发生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要求，我们已经在我们所检验的子女价值研究中对此给予了阐述。更进一步，当我们对较为集体主义的文化与较为个人主义的文化加以比较时，我们发现了家庭模式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国际移民的情境下特别明显，因为移民大多是来自于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的“主体世界国家（Majority World countries）”，而移入国则主要是具有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欧和北美。

近来，克瓦克（Kwak, 2003）回顾了对移居美国的不同民族移民开展的关于家庭关系的大量调查。与在美国处于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文化相比，她注意到存在于少数民族中的高水平的家庭依附性（关联性），在核心家庭和亲属/民族关系网络之中也都存在。她还发现，总体来说，在移民青少年和父母之间具有良好的青少年—家庭关系，并且就家庭依附性而言，他们有一致的看法，但涉及自主性的问题，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这种貌似不一致的状况可以用**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的观点来加以解释。在美国社会，自主性对于获得成功具有适应性功能。青少年为了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整，要求获得自主性，并且他们也需要与他们移入国的同龄人保持同一性。因此，他们渴望得到的自主性超过了他们父母亲愿意给予他们的。一方面，这些青少年想要得到更多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他们满足于紧密的家庭纽带和关联性，因此**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得到了认同和发展。尽管如此，**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在移民的背景中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举例来说，移民的青少年在追求自主性方面要晚于欧裔美国青少年。因此，移民背景提供了一个较为丰富的接触面和大量刺激，有利于产生家庭中和自我诠释中的改变。

随着越来越多的北欧国家成为移民目的地，欧洲社会成为国际移民

的另一个目标。一个研究团队近来研究了在荷兰的苏里南人、摩洛哥人、土耳其人、索马里人和中国人的少数民族群，也包括荷兰的当地人，研究聚焦于家庭生活和子女养育模式（Dekevic, Pels & Model, 2004）。在不同的移民族群中有一个共同的发现：许多使用强烈（权威型）控制来约束孩子的父母亲同时也对孩子具有温馨的爱和扶助性支持。这同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家庭控制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并且表明父母亲的控制也可以具有不同的含义。在移民的背景下，这种不同的含义可能会在少数民族家庭和移入国社会之间产生一些误解，特别是对那些移入国负责这些家庭的专业人士来说更容易产生误解。这些专业人士接受了主流的心理学观点，认为强的父母管控是一种权威性、极权性敌意的信号，他们因此试图在少数民族家庭中灌输放任性管教的理念。但是，这项研究还有另一个发现：少数民族群体认为荷兰的放任式儿童管教太宽松了，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例如，一个苏里南被试评论荷兰儿童“不懂得尊重别人”、“骑到了妈妈的头上”。移民们很自然地拒绝这种强加式客位养育方法。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不同的文化对父母控制和人类健康发展的界定。此项研究中（荷兰）少数民族的观点与从北美少数民族那里得到的调查结果是相似的。例如，曹（Chao, 1994）提出，心理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所称的“权威型父母养育”，可能是对中国父母在培养孩子的目标（goal of training）方面进行的民族中心主义的解读。相似地，斯图尔特等（Stewart, Bond, Kennard, Ho, & Zaman, 2002）以美国、中国香港和巴基斯坦的青年为被试，进行了一项对父母养育的回顾性研究，结果发现这一培养目标（汉语中的“管”）在亚洲样本中具有普遍性。因此父母对孩子的这一培养目标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看起来在集体主义的“主体世界”中，在具有紧密联结关系的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至少对其他移民群体（例如在美国的波多黎各人家庭）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适用的（Harwood、Handwerker、Schoelmerich & Leyendecker, 2001）。

在强调家庭关系性价值观的地方，对父母和老人某种程度的尊重被看作是一种内在的体面和道德感。这种尊重如果发展到了极端就会表现出其弊端，对尊重父母的强调就会从体面变成了等级制度下对年轻人的

压迫。这里就又提到了**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型**，也许对人类发展来说，它才是一种更健康的模型，因为它允许了自主性和控制的共存，促使**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的形成。依赖型家庭模型提供的容忍度较少，不利于儿童成长中自主性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形成较为他控型的自我诠释。

自我诠释、自主性和发展的道路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检验了相当数量的互相关联的因素，它们都是形成文化、家庭模式以及自我诠释的基础。在关联性的背景之中，自主性发展的动力学同样重要，特别是在集体主义文化和文化接触（如移民）的情境之中。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要进一步探索个体自主性的含义，以及它对个体发展道路的不同程度的贡献。我们将看到个体的自主性对一个人发展道路所做贡献受到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很大影响，超出了西方心理学现在所认识到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青少年来说更是如此。

概括地来看人类的发展道路，个体在他们所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依附性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在青春期，其生存环境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发展中的个体在以不同的生态背景为特色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机构中，同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人打交道（Bronfenbrenner, 1979）。宏观（距离较远的）生态背景中所存在的政治、经济和制度性因素对个体的微观（距离较近的）生态学存在着影响。在有利的环境下，这种发展性的压力可以是一种有助于培养能力的影响；而在不利的环境下，它可能是一种压制性和限制性的影响。因此，发展的道路在跨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情况下表现出多样性，在相似背景下的不同个体身上也同样表现出多样性。

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描绘个体影响与环境影响对个体发展道路的作用。在目前就人类发展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毕生发展观点来看，强调在建设自己生活时个体青少年自身的能动性（见Crockett & Silbereisen, 2000）。这个观点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以个体、家庭/群体为基础的因素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中，个体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个观点被

人们广泛接受，尽管他们认识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能够制约某些个体或群体的机会结构并限制这些个体或群体的发展道路。例如，弗拉纳根（Flanagan, 2000）把青少年看成是“变化的行动者，如同历史的创造者”（p. 195），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前，青少年参与了东欧几十年的民间抗议活动。尽管民间抗议活动有其重要性，特别是那些环境保护团体的活动，但它们并不是苏联解体的原因，更为深远的影响力来自于经济、社会—政治和制度结构。

人类的能动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human agency）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概念，它强调个体的潜能，它是对个体能力的一种认识，它相信个体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能够对自己所创造的生活承担责任。如此，这种观点与个人主义世界观及其从中衍生出来的心理学思考保持一致。例如，社会心理学构念中有“内控型强化”（I-E 控制）（Rotter, 1966），这个观点认为个体应当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负责，而不是让别人、命运和机会等等来承担责任。它也支持了所谓的对应偏差（correspondence bias），即假定他人的行为是由他们的性格倾向所引起的（Ross, 1977）。因此，大量的主流社会心理学和人格理论以及人本主义和积极心理学的观点均支持个体的能动性。

当这种观点发展到了逻辑上的极端，换言之，认为个体要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承担全部责任，便意味着忽视甚至无视环境原因，这可能也是有问题的。认为个体建构他们自己生活的个人主义的观点假定最初大家的机会是平等的，这显然是对社会现实的歪曲。事实上，机会不平等可能是最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即使在富足的社会中也是如此。与之相比，在贫困的情境中，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道路受到了更严重的限制（Kagitcibasi, 2002）。

对于青年人来说，这种观点同样也有一些重要的含义。例如，对美国中心城市少数族群青年进行的一项研究（Flanagan, 2000）发现，青年倾向于从性格上归因，认为个体应当对自己的成败负责。一方面，这会鼓励他们更加努力，否则这些青年在面对困难时就会放弃。而另一方面，考虑到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收入分配的恶化（Takanish, 2000），社会流动性和工作升迁机会的瓶颈（Flanagan, 2000），遇到挫折就会导致不良的心理后果，诸如自责和低自尊等，除非他们同时也相信命运

控制，情况才会有所不同（Leung & Bond, 2004）。

更为公允的观点认识到了宏观层次变量和微观层次变量之间的动力界面；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理解发展的道路，要考虑到环境和个体两方面的特征。这种互动看起来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在支持性的环境中，个体能动性对于发展结果的贡献相对增加；而在限制性的环境中，个体能动性对发展结果的贡献相对减少。相应地，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个体能动性在总体上所起的作用比在那些富足的社会中起的作用要小（Kagitcibasi, 2002）。确实，对25个国家超过19000名被试进行的一项知觉到的自我效能感调查，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Scholz, Gutierrez-Dona, Sud, & Schwarzer, 2002）。除了富足之外，给予孩子和青少年自主性也可以进一步地增加个体能动性对发展结果的贡献。因此在欧美社会中，不但将富足和对个体能动性的认同结合在一起，而且还提供了使个体能动性更有可能发挥作用的条件。更为全球性的视野揭示出在观念上和客观条件两方面均存在的多样性。

上述着眼于环境支持和环境限制的讨论，主要是就所提供的机会而言的。个人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义社会的含义是什么？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人们普遍假设在集体主义的社会里具有紧密联结的社会关系，而个体能动性则较少。通过区别“人际距离”和“能动性”维度以及提出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的概念，我们对上述假设进行了质疑。我们会进一步表明有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支持这些观点。

如果正如我们所提议的，自主性和关联性可以相容，那么只要客观的支持性条件相同，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对个体的发展道路所造成的影响应该也相同。换言之，富裕程度相同，个体自主性对一个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就不应该有显著差异。分离状态和关联状态可以具有同样的能动性。然而，这可能是在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型下的情形，这种模型鼓励自主性；而在培养他控性的依赖型家庭模型之中就另当别论了。

与上述观点相对照的是一些文化性视角，这些文化视角对集体主义的情境中自主性的重要性，甚至其是否存在提出了质疑（Iyengar & Lepper, 1999；Miller, 1997；Oishi, 2000；Rothbaum, Pott, Azuma, Miyake & Weise, 2000）。这个观点的推理思路是，集体主义背景下的个

体宁愿遵从其亲近者的选择或指导，他们达到他人的期望就会体验到满足感。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因为个体的自主性在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之下受了限制，在指引他或她自己的发展道路时，个体自身所起的作用就会相当小。

班都拉（Bandura，2002）近来提出了一个更为公允的观点，其实是他的社会认知理论在文化背景下的翻版，与本章中所提出的视角相一致。他认为能动性根植于个体觉察到的自我效能感（可以是个体层面上的，也可以是群体层面上的），在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中都是如此。因此，他反对那种将自我效能感与个人主义相联系、将自我效能感的缺乏与集体主义相联系的理论构念，并声称人类的能动性可以在包括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所有社会中发挥出来。

我们在本章中所用到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概念非常相似。但能动性还包括了意志，也就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自愿行事。基于前文中的讨论，我们可以认为人际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是自主性的障碍。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都可以存在自主性，它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分离状态或关联状态。然而，在限制自主性的环境中，个体能动性对他或她的发展道路所起的作用会相对较小，不管这种限制是诸如社会—经济落后的客观性限制，还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主导性控制。

小 结

发展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个人、社会和文化之间系统性的关系。这个视角检验了不同类型的自我，以及与它们相伴随的行为总和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以及为什么它们会这样产生。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父母养育和家庭起着重要的关键性作用。子女养育反映着文化价值观，并且因此确保文化的产生和延续；然而，在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如城市化和移民的情境下，它也可能是文化重塑中产生改变的一种作用力。寄予子女身上的价值、家庭模式以及自我概念中存在的差异性反映了全球人类的多样性，我们在研究跨文化的社会行为时要将这种多样性时时铭记在心。

拓展阅读

1. Chen, C. , & Farruggia, S. (2002). Culture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www. ww. edu/ ~ culture](http://www.wwu.edu/~culture)
2. Eyetsemitan, F. (2002). Life sp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Midlife and later years in Western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www. ww. edu/ ~ culture](http://www.wwu.edu/~culture)
3. Kagitcibasi, C. (1996). *Family and human development across cultures: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Hillsdale, NJ: Erlbaum.
4. Kagitcibasi, C. (2002). A model of family change in cultural context. [www. ww. edu/ ~ culture](http://www.wwu.edu/~culture)
5. Keller, H. (2002).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athways to individualism and interrelatedness. [www. ww. edu/ ~ culture](http://www.wwu.edu/~culture)
6. Rohner, R. R. , & Khaleque, A. (2002).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and life span development over the life span. [www. ww. edu/ ~ culture](http://www.wwu.edu/~culture)
7. Seginer, R. (2004). Adolescent future orientation: An integrated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perspective. [www. ww. edu/ ~ culture](http://www.wwu.edu/~culture)
8. Trommsdorff, G. (2002). An eco-cultural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over the life span. [www. ww. edu/ ~ culture](http://www.wwu.edu/~culture)
9. Vandermaas-Peeler, M. (2002). Cultural variations in parental support of children's play. [www. ww. edu/ ~ culture](http://www.wwu.edu/~culture)

思考题

1. 在研究跨文化的社会行为中，发展的视角对我们有哪些帮助？
2. 指出人生的不同阶段中有哪些普遍性以及文化方面的特殊性。
3.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理解家庭动力学和家庭变迁时，子女的价值有何重要性？
4. 三种不同的家庭模型是什么？你认为在你所生活的社会/社区中哪一种类型最普遍？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你能否觉察它们有所不同？
5. 讨论一下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

6. 举例说明家庭控制是怎样进行文化性建构的。
7. 讨论本章中所表达的这样一个观点：在更为有利的环境中，个体的能动性在决定个人发展道路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大。



全面理解人类适应和改变的问题，需要一个完整的因果结构。在这个因果结构中，社会结构的影响通过自我系统的机制发生作用，从而产生行为结果。
(班杜拉，2002，p. 278)

在前两章，我们已经探讨了个体被文化背景以各种方式所塑造。大环境、社会制度、个人的成长以及直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背景共同发生作用，将一个国家的公民塑造成可以识别的不同面貌。由于心理学家们相对地忽视了这些因素，导致了一个潜在假设的盛行，这个假设就是可以在无视我们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来源的情况下，把我们作为自由行为的个体加以研究。在接下来的四章里，我们回到使大多数心理学家感到舒适的分析层面上。我们将聚焦于个体，但我们的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方法：我们假定背景是相关的，我们将考虑所作研究的地点，我们将着重寻求那些关注和测量被试文化取向的研究。之所以强调文化背景，是因为它是本书的核心。

现在有不少这样的研究：研究者比较了从两个或更多个国家中得到的个体样本并报告了测量上的均值差异，之后，这些差异被用以说明一个国家在霍夫施泰德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量表上的得分要高于另一个国家。但是，这种类型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并且没有科学意义。首先，样本中的某些个体之间可能实际上并没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上的差异，仅仅由于某项先前研究表明他们所属的国家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测量中存在差异就简单假定他们不同，这是不明智的。这样做就犯了将国家层面上的结果运用于个体层面的研究的生态谬误，类似于一位实验心理学家在研究中未能验证是否一项实验操纵可以预期的方式得到确切的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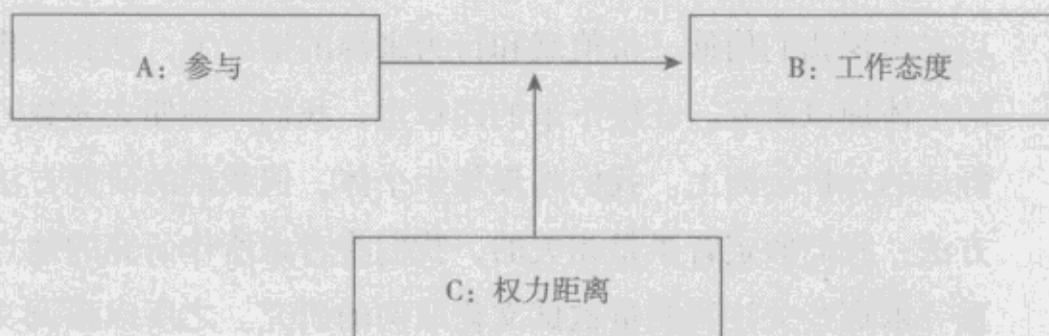
释。其次，如我们已经在第3章和第4章所提到的，不同国家除了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水平上存在差异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形式的差异。研究中所发现的差异也可能是研究者忽视的其他因素造成的。我们需要对不同的文化要素加以“拆包装”，并确定哪些要素最能解释我们研究的现象（Whiting, 1976）。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是测量参与者的文化取向，如独立型或依赖型自我诠释。当一项研究包含一个或更多这类测量时，就有可能确定其对所得结果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有两种方式：调节和中介。这两种作用常常被混淆。专栏6.1解释了跨文化研究中两者之间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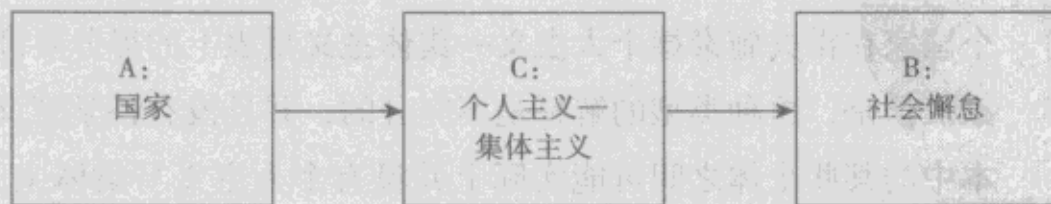
专栏 6.1

调节和中介

如布罗克那等人（Brockner et al., 2001）的研究中那样，当变量C影响了变量A与变量B之间的关系时，就发生了调节作用：



而在厄尔利（Earley, 1993）的研究中，当变量C能够解释变量A和变量B之间的关系时，就发生了中介作用：



我们可以用布罗克那等人（Brockner, Ackerman, Greenberg, 2001）的研究作为调节作用的一个例子。该研究的研究者们对于“发

言权”程度，也就是员工参与决策的程度是否影响员工态度的问题感兴趣。在一系列的研究中，他们获得了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德国、美国和墨西哥的数据，其中包括被试的权力距离。在两项研究中，学生对情景作出反应；在另两项研究中，他们对工作中实际经历过的事情进行等级评价。结果显示，与认同高权力距离的被试相比较，认同低权力距离的被试其组织承诺与决策参与的正相关程度更高。用专业术语来说，一个人在权力距离上的得分调节着工作态度与参与管理之间的关系。

认为国家具有统一的文化，并因此把它们作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各个范畴，这一假设中难题多多。在前文中我们就已经对此做了强调。在社会心理学的结果中，有无数变量能够解释国家之间的差异，而调节作用解释了我们能够拆包装的一部分变量。中介分析企图表明一个选定的理论概念能否部分地，甚或完全地代替国家或文化来作为对一种特定文化差异的解释，在这一点上，它似乎更有用武之地。

第2章提到的厄尔利（Earley，1993）的社会懈怠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厄尔利预测，当个体具有个人主义导向时，社会懈怠现象就会出现。在美国被试的回答中他发现了社会懈怠强有力的证据——那些在团队中工作的人不如单独工作的人努力。在以色列这种效应较弱，而中国的情况则完全相反。运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量表进行测量后，厄尔利表明社会懈怠的程度几乎完全依据研究中被试的个人主义水平，无论其国籍是中国、以色列还是美国。用专业术语来说，厄尔利发现个人主义中介了国别和懈怠之间关系的98%。这种分析将使跨文化心理学有巨大的发展。因为它证明，在解释厄尔利的结果时，中国、以色列和美国在其他方面的差异都不需要考虑。毫无疑问，许多其他的因素也可能影响被试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上表现的差别，但它们不能对这一特定结果提供充分的解释。当然，也可能有其他与我们所选变量有关的因素可以同样有效地解释这些效应。当这些因素被识别，我们就可以测试它们的作用并进行比较，确定哪个更好。

最近的中介研究大多是在单个国家进行的，但我们对于来自多国家取样的研究比较感兴趣。目前这类研究发表得很少，但是我们需要重视那些已发表的研究。它们在跨文化心理学和主流心理学之间架起了桥梁，因为它们证明了各项跨文化差异是能够用主流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

学来共同解释的，而不必凭借像国别这样有问题的概念（Brockner, 2003）。

个体层面的自我表征

要开展像厄尔利和布罗克那等人所做的那些研究，需要有文化取向上的个体层面指标。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报告的那样，我们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有效的测量得分，这些测量都可以应用于该目的。施瓦茨（Schwartz, 1992）的个体层面价值观或其更广的价值观维度也许适合某一项研究课题的特定关注点。同样，衍生于社会公理的五个个体层面维度上的国民均值也可以适应某些研究的关注点（Leung & Bond, 2004）。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的主要推动力还是霍夫施泰德的各国家层面维度所提供的。至此在本章讨论的两项研究中，厄尔利首创了一种测量方法，触及了每个被试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态度，而布罗克那等人也触及了权力距离。霍夫施泰德的分析给我们灵感，而这些研究者们则提供了他们为个体专门设计的测量方法。

在过去的20年中，还产生出许多文化取向的个体层面测量。有几种因素促成了这一繁荣景象。紧随霍夫施泰德研究（1980）的发表，特里安迪斯等人（Triandis, Leung, Villareal, & Clack, 1985）属于第一批在个体层面测量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者。他们使用惠（Hui, 1988）在美国建立的问卷，描述一个人与不同群体关系的各方面（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简称为“INDCOL”量表）。为了减少不同层面测量间的混淆，他们将自己的测量命名为自我中心（idiocentric）（个人主义）和他者中心（allocentric）（集体主义）。不幸的是，这个术语并未被其他人所接受，以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术语被频繁地同时用于指称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概念。

INDCOL量表后来被修订，使它不仅反映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间的文化差异，也反映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间的差异（Singelis, Triandis, Bhawuk, Gelfand, 1995）。单独的量表分别用于研究个体对以下维度的偏好：水平的集体主义（集体主义+低权力距离）、垂直的集体主

义（集体主义 + 高权力距离）、水平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 + 低权力距离）和垂直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 + 高权力距离）。在改进版中，每个项目特指一种情境，并且要求被试在四个反应中做出一个选择，例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幸福”：a）在社区中获得地位，b）与许多友好的人建立关系，c）维护自己的隐私，d）在竞争中获胜（Triandis, Chen & Chan, 1998, p. 280）。这类测量本质上是态度陈述和自我描述行为的混合。大多数的项目指向特定的情境或事件，但随之而来的一个危险便是，它们在某些文化背景下可能比在其他文化背景下更适用。

自我诠释

为了尝试设计出主位而不是强加式客位的测量方法，有几组研究者用开放性问卷“二十项陈述测试”（简称“TST”）要求被试来描述自己。这个问卷是由库恩和迈克帕特兰（Kuhn & McPartland, 1954）首先设计的，被试在该问卷中完成 20 个以“我是……”为开头的句子（Bochner, 1994; Bond & Cheung, 1983; Triandis, McCusker, & Hui, 1990）。内容分析表明，来自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常用特质来描述自己，而集体主义国家的被试则更多地提及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然而，TST 似乎并不一定比其他要求被试描述自己的方法更“主位”。卡曾（Cousins, 1989）研究了一种可能的情况，即集体主义国家的成员可能很难离开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来描述自己。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受到不同环境的强烈影响，那么他只能说他在某一种环境下是怎样的。他发现，当被试对提供了背景的 TST，如“当在家时，我是……”做出反应时，日本被试比美国被试使用更多的特质描述。另一方面，美国人更喜欢对提供了背景的 TST 问卷做出特定的回答，以暗示虽然在那种背景下他们的行为是那样的，但那并不是对他们整体的精确描述。卡纳加瓦等人（Kanagawa, Cross, & Markus, 2001）比较了日本人和美国人分别在四个社会背景中 TST 上的自我描述。日本人在不同情境下的描述的变化幅度要大于美国人的描述。塔法罗帝等（Tafarodi, Lo, & Yamaguchi, 2004）通过向加拿大、日本和中国香港的学生提出一系列有关他们“内在自我”的简单问题，在回答中发现了很大的差异。例

如，当问到他们的内在自我在不同的活动中是否保持一致时，72%的加拿大学生回答是，而只有36%的日本学生和28%的中国香港学生给出了肯定回答。

在定义什么是测量自我诠释有效方式的过程中，关注背景的人和
不关注背景的人之间存在着基本差异。哈伯斯特罗等人（Haberstroh, Oyserman, Kohnen, & Ji, 2002）指出，对于背景的关注不仅影响人们对于自己以及他人行为的描述，还影响他们如何对问卷做出回答。中国学生的回答根据所问问题的次序而有所不同，但德国学生的回答并没有这样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回答表现出更强的情境敏感性，他们受自己对前面问题的回答所影响。此外，吉等人（Ji, Schwarz, & Nisbett, 2000）发现，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能更准确地回忆起以往行为的频率。吉等人总结说，保持社会和谐使得中国人记得过去的事件，因为过去的事件或许能够帮助他们或其他人定义当前事件的意义。他们认为美国人更倾向于将每一事件看成独立的。这一问题使我们想起在第3章中关于怎样定义文化的讨论。仅仅得到可比较的自我行为报告与得到价值观或信念报告相比，也许意味着更大的问题。

一个时兴的研究方法开始关注自我诠释的结构化测量，而不是开放性的TST测量。辛格利斯（Singelis, 1994）和古迪昆斯特（Gudykunst, Matsumoto, Ting-Toomey, 1996）等人都编制了**独立型和依赖型自我诠释**的量表。这些术语来自马库斯等关于日本和美国的对比研究回顾。这篇颇有影响的论文没有讨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但是作者将美国文化描述为是关注于独立于他人的自我，而将日本文化描述为是关注于依赖他人的自我。这种将两种文化传统对比的范例引发了一个趋势，使许多人将美国作为个人主义国家的原型，将日本作为集体主义国家的原型。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见的，数据表明这种特征化并不符合事实。在**国家层面**的特征方面，专栏3.5显示美国在自主性方面低于许多欧洲国家，而日本在依附性方面几乎低于施瓦茨的调查中全部国家的一半。我们将会回到由马库斯等提供的概念化的影响上，但现在的焦点是自我诠释的测量。

由辛格利斯开发出的各项测量已被应用于近来的许多跨文化研究中。辛格利斯的项目有些是对于自己的说明，而有些则接近态度陈述。

专栏 6.2

我怎样看待自己

独立型自我诠释	依赖型自我诠释
<p>应该用我自己的优点评价我。</p> <p>能够照顾自己是我首要的关注。</p> <p>我的个人认同 (identity) 对我很重要。</p> <p>我更喜欢依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别人。</p> <p>我是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个体。</p> <p>如果我的价值观与我所在群体的价值观有冲突, 我遵循自己的价值观。</p> <p>我尽量不依靠别人。</p> <p>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p> <p>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行动, 这对我很重要。</p> <p>我应该依靠自己决定我的未来。</p> <p>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是我自己造成的。</p> <p>我喜欢独特和与众不同。</p> <p>我对单独受表扬和获得奖励感到自在。</p> <p>当团体的决定错误时, 我不会支持它。</p>	<p>在做重要决定之前我会征求别人的意见。</p> <p>与工作有关的事情我会征求同事的意见。</p> <p>为了团体利益我能牺牲自己的利益。</p> <p>即使在困难时期, 我也紧随我所在的团体。</p> <p>我尊重我所属团体的决定。</p> <p>即使不开心, 只要他们需要我, 我仍会留在团体中。</p> <p>我与自己所属的团体保持着和谐。</p> <p>我尊重所属团体中大多数人的意愿。</p> <p>即使我对他们不满, 只要他们需要我, 我仍会留在团体中。</p> <p>我试图遵守工作中的惯例与传统。</p> <p>我对他人的个人情况给予特殊考虑, 以使工作效率更高。</p> <p>在做任何事之前, 最好与别人商议, 听取他们的意见。</p> <p>在做决定之前, 与好朋友商议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很重要。</p> <p>我与其他人的关系远比自己的成就重要。</p>

资料来源: Gudykunst & Lee (2003)

古迪昆斯特等尝试编制一个都是由自我描述项目组成的量表, 但一些态度项目还是保留了下来。专栏 6.2 重现了古迪昆斯特的量表。注意, 就像辛格利斯量表一样, 所有项目都采用了正向措辞, 这提高了文化导致的反应偏差的可能性。

为失控的马减速

科学研究也像人类的其他活动领域一样，易受流行的影响，潮起潮落。在过去的10年中，对于个体层面上所表述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关注迅速增加。10年前，在这本书的先前版本中，史密斯和彭迈克（Smith & Bond, 1998）可以称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概念性框架。使用一个来自赛马的隐喻，现在就像是马厩的门一旦打开，马疾驰而出，以至于我们看不清方向。我们提出了三种能够使我们放慢速度，进行更为谨慎思考的方法。

个体层面测量的使用与滥用

辛格利斯和古迪昆斯特等人所描述的测量已经成为对文化感兴趣的 researchers 最为常用的个体层面的测量，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为人们所熟知的测量，但它们都以探索起源于霍夫施泰德的在国家层面上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间的差别为目的。评价这些发展的重要的第一步是由奥伊斯曼等（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完成的。他们对27个此类量表的全部研究都作了元分析。奥伊斯曼等人调查了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得分是否有差异，美国的各少数民族社区间的得分是否有差异，以及其得分能否预测其他因变量的变化。莱文等（Levine, Bresnahan, & Park, 2003）也作了类似的元分析，但他们只关注测量自我诠释的研究。

奥伊斯曼等人（2002）比较了不同国家的研究中的效应大小，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一些国家的样本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者上的得分比美国高，而另一些国家在两者上的得分均低于美国。埃及人在两种形式的自我诠释上的得分均最低，而秘鲁则在两者上均最高。霍夫施泰德的国家分数在不同水平上的聚合很小。奥伊斯曼等人的论文在《心理学公报》（Psychological Bulletin）上发表，引起了一系列的评论，大多数人要么认为霍夫施泰德关于国家特征的描述已经过时，要么认为在

跨文化研究中运用其他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会更容易出成果。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了本书前几章有关方法学的内容，再研究奥伊斯曼等人的论文，将会发现有两个缺陷，这两个缺陷都将威胁他们所得的结论。莱文（2003）等人的研究对此有所说明。

首先，这些元分析中的测量都没有纠正默许反应偏差中的文化差异。既然在各个国家群体中这些差异是实质性的（Smith, 2004b, 见第2章），那对未经纠正的平均值进行比较就是无效的。施马克等（Schimmack, Oishi, & Diener, 2005）利用来自40个国家的学生调查数据来质疑奥伊斯曼等人在这方面的结论。他们的分数在未经偏差纠正时，与奥伊斯曼等人的分数呈正相关。此外，他们对于偏见的评估与奥伊斯曼等人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方面的效应大小有较强相关。但当施马克等人的分数纠正了偏差后，它们便与霍夫施泰德的研究中国家层面分数相关。所以，在比较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国家层面时，对不同国家之间在默许反应偏差上的差异进行校正是最基本的要求。

这两个元分析的第二个缺陷是它们的效应大小数据基本上是国民分值。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讨论的，在不同层面上分析变量之间联系的方法不一定相同。分析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的数据，得出不同结论不足为奇。让“失控的马”减速的第一步应该是：将个体层面数据的使用限制在个体层面现象的分析中。那一分析层面是奥伊斯曼等人（2002）的研究结果中后一部分的中心点，也是这一章的主要关注点。不幸的是，他们的分析的前面部分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正如彭迈克在对奥伊斯曼等人的研究评语中指出的，我们的研究领域需要前进，需要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众多方面为个体变化发展出跨文化均值测量，然后将这些测量与我们想要加以解释的，在跨文化群体间产生的不同结果相联系。

我们在测量自我诠释的正确方面吗

目前各种测量自我诠释的方法出处很明确，这些方法来源于霍夫施泰德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国家层面的对比，加上辛格利斯等人提出的垂直和水平维度中的权力距离。但是，不同研究者在量表中使用

的项目有很大的不同,这取决于他们如何解释霍夫施泰德概念的意义。奥伊斯曼等人(2002)识别出五个独立项目和八个依赖项目。辛格利斯量表(1994)的报告信度明显低于0.70的可接受水平。来自不同样本和不同国家间群体的量表结构也不同(Levine, Bresnahan, & Park, 2003; Hardin, Leong, & Bhagwat, 2004)。其原因之一可能是这些测量将个人距离(关联—分离)(relatedness-separateness)和能动性(自主—他控)(autonomy-heteronomy)合并在了一起。“独立”被看作是既产生自主又产生分离的变量而加以测量,“依赖”被看作既产生他控(依赖的)又产生相互联系的变量而加以测量。如我们在第5章看到的,对于像**自主—关系型自我**这种不能被这类量表所认可和测量的不同组合,有其存在的有力证据。而这种组合可能尤其对集体主义文化中处在较发达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的个体是有效的。

似乎需要更多的工作来确定个体层面自我诠释的变化维度,并且为这一维度制作量表。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源于最近对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研究,而这些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并不在文化上。塞迪基德和布鲁尔(Sedikides, Brewer, 2001)提出证据将自我诠释分为三部分。他们指出人们可能将自己看作个体自我(individual self)、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和集体自我(collective self)。他们的个体自我概念与**独立型自我诠释**相等价。关系自我涉及按照人际联结或对家人或情侣的依恋来定义自己。从集体意义上定义自我,涉及到将自己看作更大的实体中的一部分,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与该实体中的成员们建立个人联结。在制定依赖性量表时,跨文化研究者们似乎将关系认同和集体认同搞混了。例如,在专栏6.2的项目中,“即使在困难时期,我也紧随团体”是将团体作为一个集体的概念,而“在做决定之前,与好朋友商议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很重要”是更为关系化的。实际上,在**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中它可能是个好项目(Kagitcibasi, 1996a)。

与这一推理相一致,有纪(Yuki, 2003)提出日本的集体主义主要是关系型的而不是集体型的。他指出日本学生对内群体(in-group)的认同和对群体及国家的忠诚都可以由他们对群体中关系的了解来加以预测。作为对照的是,在美国的学生中,认同和忠诚还可以用该群体与其他群体相关联的地位来加以预测。因此,美国的被试利用了集体性和关

系性两方面的标准，而日本的被试则只用了关系性的标准。最近在澳大利亚开发出了一个能够区分个人的、关系性的和集体性的自我诠释量表，并显示了与其他自我诠释测量的汇聚效度（Kashima & Hardie, 2000）。

鹿岛等（Kashima, Kashima, & Chiu, 2005）使我们在理解自我诠释中文化差异上又更进了一步。来自8个国家的学生提供了自我诠释的评分，并对个人、家庭、朋友和社会作为整体所拥有的“能动性（即这些实体发起行动的能力）”的程度做出等级评定。研究者对于不同国家中自我诠释和能动性的国民分值做了比较。所有国家的被试都认为个人比群体有更加固定和不变的特质。但是，来自5个个人主义国家的被试认为个人比群体有更大的能动性，而来自3个东亚国家的被试认为个人与集体拥有同样大的能动性。因此，简单地关注自我诠释依赖性的测量将不能发现被试将能动性分配于他（或她）自己和他（或她）所属群体的比例。正如班杜拉（Bandura, 2002）所承认的，群体效能感可能与自我效能感同样重要。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与依赖型自我诠释相比，其特征在于既相信自我效能，又相信集体效能。

马斯科洛等人（Mascolo, Misra, & Rapisardi, 2004）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提供了印度和美国被试在理解独立的、关系的和集体的自我上相对比的一些初步指标。关系—集体的区分还有待于在其他地区进一步加以测试。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信息来理解自我诠释和对相互关系价值观的测量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布雷斯纳汉等人（Bresnahan, Levine, & Shearman, 2005）指出，辛格利斯自我诠释得分和TST得分在日本、韩国和美国的样本中的相关程度并不高。这也许是因为自我诠释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类似于特质的东西，而TST回答则反映了被试回答时的状态或情景。与此相一致，同样是这组研究者在其早先的研究中发现了自我诠释得分不受实验性启动作用的影响，而TST得分则不然（Levine, Bresnahan, & Park 等, 2003）。

在自我诠释测量中，集体性与关系性认同的交错也许来源于对霍夫施泰德维度的误读。虽然我们讨论的测量大多来源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但他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维度使重视成就与重视关系的国家形成了对比。尽管如此，现今流行的、仅对两类自我诠释之间进行区分的做法

是否足以描述个体文化取向的差异，这一点上仍然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有一套更为稳固的关于价值观的个体层面的测量，它们来自施瓦茨的研究和梁觉及彭迈克对社会公理的测量，我们可能需要更加充分反映这些价值观和公理的自我诠释测量。库克等（Cukur, Guzman, & Carlo, 2004）在来自土耳其、菲律宾和美国的学生中发现了施瓦茨的价值观与辛格利斯等人的垂直和水平的自我诠释测量始终正相关，但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水平。

我们应该在哪里研究自我诠释

对于此领域发展的更大贡献是由马库斯和北山关于独立型和依赖型自我诠释的讨论所触发的大量研究。他们的中心观点是，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独立的或依赖的，这种自我概念对社会认知的所有其他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将自己解释为依赖型（或按照施瓦茨的价值观分析，仁爱的、传统的、顺从的）的人将会审视他们的环境，找到该如何行动的暗示，以搞好与那些他们视为基本参照点的人的关系。马库斯和北山认为，对世界的这种基本定位使得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于那些将自己解释为独立型的人，他们体验不同的情绪并以不同方式被激励。

后面我们将分别评价这些观点。首先，我们需要重申，确定因果关系时要小心。霍夫施泰德将他的书命名为“文化的结果”（1980）（*Culture's Consequences*），这引来一些批评，但在个体层面，我们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我们在第5章讨论了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在那个过程中，他们被引导认为自己是更为独立型或更为依赖型。儿童时期的社会化当然在成年人的社会过程之前，但是成年人的生活要承受很多额外的社会性压力。在一系列研究中，北山等人（Kitayama, Markus, Matsumoto, & Norasakkunkit, 1997）探究了美国和日本社会的背景。他们发现，在美国有大量的情境使个体更可能产生自我感觉良好的感受，而在日本则有更频繁的情境容易导致自我批评。频繁出现的这类情境鼓励美国人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不需要别人的支持，而日本人则更能意识到自己需要适应他人。因此，社会互动频率的不同类型可能会使得人们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诠释自己，其程度就像我们的自我诠释导致我们经历不同类型的体验一样。

本章的以下部分将涉及马库斯和北山 (Markus & Kitayama, 1991) 所识别出的一些问题。在回顾这些研究时, 应当注意到它们几乎将所有的关注点放在北美洲 (通常是美国) 和亚太 (通常是日本) 的对比上, 这一点很重要。关注点如此有限的原因不难找到。原因包括“亚洲虎”各国的财富增长, 重要的个体研究者在亚太和北美间的双向移动, 以及期刊编辑们偏爱那些对比被认为相截然不同的国家的样本并报告有明确而显著差异的论文。从跨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 根据美国和日本在第3章探讨的文化维度上的得分, 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都是相对不同的、不同寻常的国家。在比较它们时, 我们没有穷尽在价值观和自我诠释方面的全球性变化, 我们也没有完全测试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或独立型和依赖型之间的所有区别。尽管如此, 这些研究仍旧提供了动力和挑战, 使得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跨文化研究者能够扩大他们的数据库, 并有助于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怎样自我诠释加以概念化 (Lehman, Chiu, & Schaller,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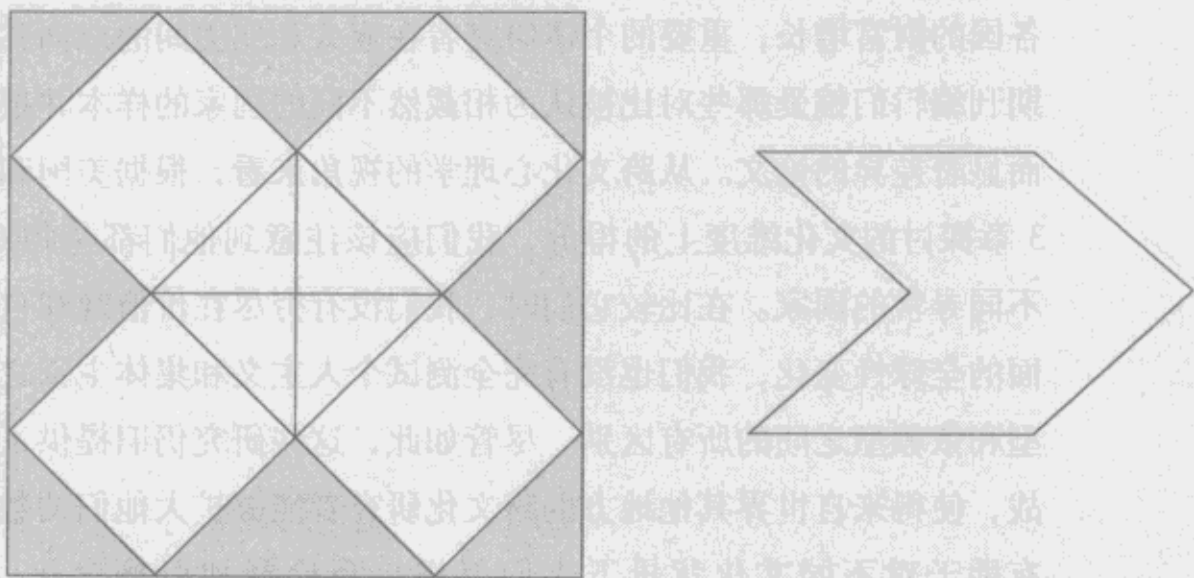
依赖型与认知

马库斯和北山认为, **依赖型自我诠释**是一种独特思维方式的一个方面, 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模式, 它认为世界不仅仅涉及自我, 还涉及个体生态处所的所有其他方面。尼斯贝特等人 (Nisbett, Peng, Choi, & Norenzayan, 2000) 曾总结出一系列的证据, 以显示东亚人倾向整体性的考虑问题, 而北美人则倾向分析性的考虑问题。类似的差异也出现在北美人和非洲人之间 (Nsamenang, 1992), 甚至出现在美国白人和美国黑人之间, 同样也出现在不同性别之间。

这一观点使我们回想起早期跨文化心理学家的很多研究, 如贝里 (Berry, 1976) 的生态文化框架, 这一框架认为在不同环境中生存需要不同的知觉和认知技能。特别是当社会化过程使人进入更多的关系性角色时, 情境依赖和整体思维就更加突出。威特金 (Witkin, 1950) 的知觉区分理论和其中的一项主要测量工具——镶嵌图形测验也可以得出相关证据支持。这个测验要求被试确认一系列的图形, 每一个图形都隐藏

专栏 6.3

镶嵌图形测验



资料来源: Witkin 等 (1977)。

在大的背景中。专栏 6.3 举出了一个例子。来自于依靠个体行动求生存的群体的被试, 如因纽特人, 表现出场独立性 (field independence), 也就是说他们能较容易地将目标图形从干扰背景中选出来。来自于依靠集体行动来求生存的群体被试, 如西非的滕内人, 表现出更大的场依存性 (field dependence), 也就是说他们感到从背景中分离出目标图形比较困难。早期研究表明,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样本在场依存性方面存在着实质性差异 (Witkin & Berry, 1975)。

最近的研究使我们能更全面地对场依存 (即整体思维) 与场独立 (即分析思维) 进行对比。吉等人 (Ji, Peng, & Nisbett, 2000) 发现, 在美国学习的东亚学生比美国学生的场依存性更强, 而库恩 (Kuhnen, Hannover, & Roeder, 2001) 等人发现, 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学生比德国和美国学生的场依存性更强。增田和尼斯贝特 (Masuda & Nisbett, 2001) 向日本和美国学生呈现动画效果的水下情景图片和野生动物照片。日本学生能更好地回忆起图片中动物的背景。如果动物在同样的背景下再次呈现, 日本学生能很好地再认; 但如果在不同的背景下, 他们就表现得不那么好。北山等人 (Kitayama, Duffy, Kawamura, & Lars-

en, 2003) 向日本和美国学生呈现一系列的竖直线段, 每条线段都在一个正方形框架中呈现。在每次实验中, 他们会呈现另一个不同大小的正方形, 任务是在该正方形中画一条与第一次呈现绝对长度相等的线段, 或以同样的比例在该正方形中画一条线段。美国学生擅长画绝对长度相等的线段, 而日本学生在画与新的正方形相关的线条时表现更好。

很显然, 来自更为集体主义背景的亚太地区的人在加工知觉信息时更多地考虑背景信息。进一步的研究聚焦于社会刺激的背景。艾什等人 (Ishii, Reyes, & Kitayama, 2003) 测验日本和美国学生在完成任务时更易被说话者的语言内容还是被其语气所干扰。结果发现, 美国人更易被话语内容所干扰, 而日本人更易被话语中所带有的情绪性语调所干扰。这些研究者认为语调比内容更加具有情境性。这种结果也许是由日语和英语的区别造成的, 所以这些研究者用双语的菲律宾人做了第二次研究。菲律宾人更易于被语调而不是言辞所干扰, 无论是用英语还是用塔加拉语 (Tagalog)。因此, 这一效果似乎应归因于文化而不是语言。

整体思维还包括对复杂性的意识, 比如许多原因相互交织在一起。整体性思维很少对于现在发生的事和紧接着发生的事之间的直接因果联系作出推断。吉等人 (Ji, Nisbett, & Su, 2001) 向中国和美国学生呈现了一系列图形, 并要求他们预测下一次出现的图形与上一个图形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美国学生预测有更大的连贯性, 而中国学生预测的变化性更大。还有研究者 (Choi & Nisbett, 2000) 向韩国和美国学生呈现对一个人行为的描述, 再让被试预测该个体接下来会做什么, 然后告诉他们实际发生了什么。当预测错误时, 韩国人表现出极少的惊讶, 并更有可能用后来的结果解释先前发生的事,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能容忍不确定性。

因为复杂系统中因果逻辑的可适用性有限, 对于社会系统或抽象问题中各元素的依赖性的关注可能导致解决问题时的直觉性偏好, 诺伦扎扬等人 (Norenzayan, Smith, Kim, & Nisbett, 2002) 比较了中国、韩国和美国学生对于形式推理和直觉推理的偏好。问题以能使得两种风格的推理之间发生冲突的方式呈现。面对这类问题, 中国和韩国学生使用直觉推理, 而美国学生更多使用形式推理。但是, 当推理风格之间没有冲突时, 则没有发现存在文化差异。

在理解认知风格中这些差异的本质时，需要明确这些差异不是能力上的差异造成的，这一点很重要。正如诺伦扎扬等人（2002）的研究所指出，整体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最好被当成文化性和社会化的习惯。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用任何一种方式推理，但一段时间后，我们可能会从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中学习更多地依赖一种推理方式而不是另一种。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情境启动我们使用另一种方式，我们可以重新启用另一种方式。作为进一步的例子，崔等人（Choi, Nisbett, & Smith, 1997）的实验表明，当呈现有关动物的一系列前提时，美国人表现出更强的归纳推理，而韩国人在呈现与人有关的前提时表现出更强的归纳推理。崔等人暗示由于韩国人具有更强的依赖性，所以他们更容易使用于人有关的认知范畴。

关于两种认知方式间转换的能力，进一步的说明可以在对应偏差的研究中找到。在讨论这些之前，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已讨论的关于认知风格差异的研究中没有检验过这些差异是否与自我诠释有关。他们只是简单地对北美人和东亚人做一系列的对比。没有理由认为自我诠释比本节讨论的那些认知方面更为基本，事实上，很可能后者更为基本。但是，如果能够表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所使用的各种测量和概念之间彼此存在相关，将有助于我们整合认知文化方面的观点，从而对这些文化效应拆包装。

对 应 偏 差

在许多已发表的研究中，要求美国被试对于一个个体的行为做出解释，此时性格的或情境的解释都是可能的，结果美国被试更多地是将原因归因于个体因素而不是情境因素。换句话说，被试看到了个体行为与其人格、态度或意图之间的一致性。这种倾向常被称为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但我们跟随一些作者的用法，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对应偏差（correspondence bias）。因为我们将会看到，跨文化研究显示了这种现象并没有最初看上去的那么基本。有趣的是，当北美的理论家运用个体认知加工过程来描述对应偏差时，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按照假设它可能出现的社会背景来研究相同的加工过程，并喜欢将其

称为一种内在性模式，强调其社会来源（Beauvois & Dubois, 1988）。

施韦德和波那（Shweder & Bourne, 1982）要求印度和美国成年人描述他们的同伴。他们发现美国被试提出的个人品质中有 72% 是脱离于背景的人格特质，而印度被试提出的品质中只有 50% 属于这一范畴。在一项更详细的研究中，米勒（Miller, 1984）发现，当她呈现一系列情境时，印度学生比美国学生给出更多的情境解释和更少的以特质为基础的解释。考虑到亚洲人在更大程度上将个体与环境紧密相联，那么在这一地区的研究发现对应偏差并不明显也就不奇怪了（Choi, Nisbett & Norenzayan, 1999）。

诺伦扎扬等人（Norenzayan, Choi, & Nisbett, 2002）检验了这一设想：是否对应偏差取决于向被试提供的信息类型。当只向韩国和美国被试提供个体信息时，双方均愿意预测个体将来的行为。作为对照，当同时又提供情境信息时，韩国被试比美国被试利用更多的情境信息。类似地，北山等人（Miyamoto & Kitayama, 2002）发现，当告诉被试个体的行为受情境角色要求的约束时，美国人仍表现出对应偏差，而日本人没有。但是，当告诉被试该个体虽然被角色要求约束，他的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将来的行为，日本和美国被试表现出同样强的对应偏差。因此，在对应方面的文化差异能在各种实验条件下被诱发或排除。

北山等人（2002）还从网上得到了被试在进行判断时推理风格的证据，研究以被试的参照情境而非个人信息来编码。结果发现情境思维的程度对对应偏差是否发生起中介作用。在我们已讨论的有关独立和依赖的知觉的跨文化研究中，这是惟一试图在更为精确的基础上对获得的结果给出一个解释的研究，而不是简单地给出被试的国籍，然后再推测观察到的差异的背后原因。在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确显示了独立型自我诠释是对应偏差的一个有效的预测指标（Newman, 1993）。因此，自我诠释很可能为我们已发现的效应提供最好的解释，但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它可能是，但在我们进行这一观点的拆包装研究之前，它仍是一种让人好奇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将焦点转向由马库斯和北山（1991）所研究的第二个主要问题上。

依赖型与情绪

马库斯和北山（1991）提出，虽然某些类型的情绪具有普遍性，但在那些独立性比较显著的情境下和那些依赖性比较显著的情境下，最频繁体验到的那些情绪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在独立性的情境中，有助于维护个体相对于他人独立性的情绪将更有用，因此也更多地被体验到。例如，我们应期望更多地体验到自豪感。在依赖的情境中，友好的感觉将更有用。他们发现了支持这些观点的初步证据。他们要求学生写日记，在美国学生中，良好的感觉与他们报告自豪的事件有关，而在日本学生中，良好的感觉与报告友好的事件有关。

在评价马库斯和北山的观点时，两个基本问题必须解决。它们都涉及我们对认知的讨论。首先，不同的文化成员所体验的情绪是否存在着绝对的差异？还是说人类情感体验具有普遍性，但在某些情境中比其他情境中更频繁地发生？其次，如果我们确实找到了在情绪报告频率上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是“真实”的吗？抑或解释为情绪表达的文化规范存在差异更好？在认知方面，我们指出以整体或分析方式思维的差异不是绝对的，而是类似于不同强度的文化社会化习惯。对于与情绪有关的证据，我们也能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评价。

情绪的普遍性

有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关注被试识别照片上的面孔所表现的情绪的能力。艾克曼（Ekman, 1972）在巴西、智利、阿根廷、日本和美国的被试中发现，他们对表现下列情绪的面部表情的正确识别率很高：愤怒、愉快、悲伤、厌恶、惊奇和害怕。早期研究使用的刺激都是美国人面孔，以至于该设计是强加式客位法。但是，艾克曼等人（Ekman, Friesen, & O'Sullivan, 1987）使用来自所有国家的面部表情，发现仍然有很高比率的正确识别率。此外，艾克曼等人（Ekman, Sorenson, & Friesen, 1969）曾在更早时发表了一项研究，在该研究中，向来自新几

内亚岛的西伊里安人被试呈现美国人的面部表情，这些人之前与现代社会几乎没有接触。为了平衡他们的研究设计，他们也向美国被试呈现了新几内亚人的面部表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情绪的识别仍有较高比率的正确率。

这类研究的意义备受争议。正确率提高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适合面部表情的名称已经提供给被试了；其次，面部表情是摆出来的而不

专栏 6.4

怎样检验一种情绪是否是本土的

施密特—艾特泽克和帕克（Schmidt-Atzert, Park, 1999）检验了这样的假设：韩语 uulhada 和 dapdaphada 所形容的两种情绪在德语中没有与之对等的表达。为了检验他们的假设，他们询问韩国和德国学生在 10 个场景中体验到的感受。对愉快、幸福、愤怒、爱、恨、孤独和恐惧的场景，两国学生之间没有差别。对于下面呈现的第一个场景，64% 的韩国学生报告他们体验到了 uulhada 情绪，对于第二个场景，62% 的韩国学生体验到了 dapdaphada 情绪，但德国学生对这两个场景的反应差异要大得多。对于第一个，最多的反应是沮丧（36%）和无情绪反应（22%）；对于第二个，最多的反应是无助（38%）和无情绪反应（18%）。要确定是否这些情绪是韩国文化本土的，还需要更广泛的取样。但很明显，德国人对他们在这两种关键场景中的情绪反应如何命名存在较大分歧。

Uulhada 场景

我无理由地感觉不好，也许我知道感觉不好的原因，但我宁愿不知道这个原因。我毫无激情地做该做的工作，不做任何多余的工作，也不打算在这种情绪状态下做任何事。笑是我最不想做的一件事，但没有愉悦的微笑却能打动我。尽管如此，我不哭，因为没有哭的理由。我周围似乎只有雨，一种阴郁的气氛似乎完全控制了我。

Dapdaphada 场景

我在国外生活很长时间了，我必须用外语沟通。我的语言水平在不断提高。尽管如此，在准确表达我的想法时我还是有问题。就在我想“我确定与我谈话的人明白了我想说的”时，我发现仍有误解。经过一些无谓的努力，我发现自己必须接受不能与同伴成功沟通的事实。用我的母语，我可以轻易地表达自己想说的。

是自然的。情绪的词汇标签可能与英语中的不完全匹配。在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不是由静止图片提供的线索。在大多数的语言中，用来区别不同情绪的词远多于6个。拉塞尔（Russell, 1994）总结道，情绪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分类，因其主要情绪间的界线以不同方式划分。一些具有细微差异的情绪可能只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或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文化中。例如，萨摩亚人以指向不同类别的人来区分愤怒（Steele & McGarvey, 1996），而（同在太平洋上）伊法鲁克岛人将 song（翻译为正当的愤怒）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愤怒（Lutz, 1988）。专栏 6.4 考察了据说是韩国本土的两种情绪。

尽管有这些局限，但由艾克曼发起的这些研究结果的确提供了基本情绪具有文化普遍性的证据。为了扩大对这一结论的证明，谢勒等人（Scherer, Banse, & Wallbott, 2001）展示了来自9个国家的学生在听演员口头表达无意义短语时，对愤怒、恐惧、愉快和悲伤的高正确识别率。对情绪识别研究真实性的争论引发了最近在研究方法上的进步。一些研究者试图找出情绪表达强度影响判断的方式。在艾克曼等人（1987）对11个国家的研究中，曾经报告了对最强情绪表达的一致性。但是，这些判断仅仅关注了情绪表达的真实强度。鉴于在表达规则上的文化差异，松本等人（Matsumoto, Consolacion, & Yamada, 2002）指出日本人会比美国人对情绪表达者的内在感受做出更强的推论。于是他们要求被试对每个情绪被实际表达的程度以及情绪表达者的主观体验的强度分别评定等级。低强度面部表情显示出更大的文化差异，日本人将主观体验评价为更加强烈。这个研究也包含了自我诠释的测量，自我诠释几乎在所有日本与美国的反应差异中起中介作用。越强的**依赖型自我诠释**预示着越强的主观体验评定。因此，这是我们所讨论的有关情绪研究中，首个符合我们在本章开始时所说明的跨文化差异解释有效性检验的标准研究。

扩展我们对情绪识别理解的第二个努力是，不仅关注情绪识别的总的正确性，还更多地考虑知觉者与被知觉者之间的互动。埃尔芬拜因和安拜蒂（Elfenbein & Ambady, 2002）对所有之前的研究作了元分析后，报告了一种“内群体优势”（in-group advantage）的存在，即当情绪表达者与知觉者来自同一民族或族群时，其被识别的准确率最高。在进一

步的分析中，他们又检验了内群体优势的另一种解释（Elfenbein & Ambady, 2003）。利用对视觉和听觉情绪识别最大的四项研究，他们得出，情绪知觉者所在国家的霍夫施泰德得分和表达者所在国家的霍夫施泰德得分的差异能够显著的预测识别率。个人主义、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上的差异越大，就预测了识别上更低的准确性。我们应该注意，这是在国家层面而不是个体层面的分析，所以它无法告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解读情绪时是否有相似之处。

有一种可能性是，即使表现出的情绪代表的是基本和普遍的情绪，在它们表达的方式上仍然有一些非言语性的“口音”。马尔什等人（Marsh, Ambady, & Elfenbein, 2003）仔细地修改了一系列由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表达情绪的照片，以便对他们肌肉的收缩加以标准化。用日裔美国人是因为他们外表和日本人相似，但他们是在美国文化中完成其社会化过程的。研究者要求被试猜测每张照片中的人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当照片表现的是中性表情时，准确率在随机水平。但是当呈现一个具体的表情时，准确率就达到了显著水平。所以情绪的面部表情一定包含独特的非言语的伴随特征，使得美国的评判者即使说不出这些线索是什么，他们仍能够觉察。我们可以推测，依赖型的个体能更好地觉察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但这一点还有待直接测验的证实。

将情绪放回到情境中

我们回顾的所有情绪研究中使用的情绪表达都是从通常发生的情境中提取出来的。考虑到马库斯和北山（Markus & Kitayama, 1991）强调过的，对于**依赖型自我诠释**的人来说情境极其重要，因此这类研究可能很难给出情绪与文化间关系的完整面貌，不同的情境要求个体不同的行动，这也许会影响个体表达其所体验到的情绪。即使在主流理论中，情绪体验也不再被简单地视为有或者没有。已经为人们所知的情绪成分理论（componential theory）已经识别出了一系列完整的阶段，包括对内部状态的评定与命名以及在给定的社会背景中如何表达的后继过程。每个阶段都可能存在着文化差异（Mesquita & Frijda, 1992）。

弗里森（Friesen, 1972）很早前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向

日本和美国成年人呈现关于身体截肢的短片。被试或者单独或者当着他人的面看短片。在他们看短片时将他们的面部表情录像然后再对之进行编码。结果发现,美国被试在看短片时表现出厌恶,而在看中性短篇时并不这样。另一方面,日本被试单独看时也表现出厌恶,但当着他人的面时并不这样。弗里森总结道,日本人的表达规则抑制了他们对厌恶的直接表达。但他的研究细节常被错误地加以描述,似乎美国被试在看截肢短片时也改变了表情,只是与日本人的方式不同(Fridlund & Duchaine, 1996)。松本等人(Matsumoto & Kupperbusch, 2001)重复了弗里森的研究,他们只用美国白人妇女作为被试,而且还包括了一个自我诠释的测量。他们发现,在观看不愉快的短片时,依赖型的人表现出更多的微笑和较少的消极情绪,而独立型的人则表现出较少的微笑和较多的消极情绪。由此看来,运用跨文化研究中所衍生出的概念和测量,本来是被描述为跨文化的效应也能在一个美国样本内部得到。多文化的视角能丰富主流研究,并有助于将可能的本土结果加以情境化。

在什么情境中、情绪可以被以何种程度公开地表达,其规则在各国是不同的。阿盖尔等人(Argyle, Henderson, & Bond, 1986)发现,日本和中国香港抑制愤怒和悲伤的规则比意大利和英国要多。曼德尔等人(Mandal, Bryden, & Bulman-Fleming, 1996)发现,对于消极情绪,印度人比加拿大人的反应更消极。情绪表达的适宜场所也随情况而变化。雷德福特和史密斯(Redford & Smith, 2004)指出,希腊和土耳其学生对陌生人比对家人表达更多的愤怒,而英国学生则相反。这种效应被**依赖型自我诠释**所中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与英国人相比,对希腊和土耳其人来说,与家人保持和谐更为重要。

包含了37个国家的“情绪的前因与反应的国际研究”(ISEAR, International Study on Emotional Antecedents and Reactions)(Wallbott & Scherer, 1986)提供了更广泛的数据库,为进一步分析自然情境下的情绪提供了可能。研究要求学生写一周的日记,记录最近发生过的愉快、悲伤、恐惧、愤怒、厌恶、羞耻和愧疚的事件,以及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和在场的人。谢勒(Scherer, 1997)随后按照情绪成分模型(Mesquita & Frijda, 1992)中的“评价”阶段对数据进行了分析。换句话说,他检验了是否存在一致性,即各种情境被评价并分别引起各种情

绪。评价的维度包括新奇、不悦、对目标的阻碍、外部原因、应对情况的能力、不道德和自我一致性。谢勒得出的结论认为，每种情绪都有一套独特的评价条件模式，这种模式对几乎所有国家都适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种情绪在所有的地方发生的数量都一样多，因为引起这些情绪的情境在某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易发生。这一文化普遍性的结论在非洲国家有分歧，尤其是在马拉维和博茨瓦纳。在这些国家的数据中，对不道德、不公平和外部原因的评价对其引起的情绪有更强的作用。

王和彭迈克（Wong & Bond, 2002）试图用 ISEAR 的数据确定情绪的一般元素，不考虑所体验的具体情绪。他们发现各种情绪在新近性、强度和持续性上具有一致性。这使得他们能够分析，在样本所代表国家的国民分值在情绪的这些方面的差异程度。那些国民报告数据中情绪持续时间越长的国家在施瓦茨（1994）智力的自主性上就越低，这也暗示了知觉行为对情绪体验的调节作用。

ISEAR 的数据不包括自我诠释的测量，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在所有文化背景下，情绪性与独立型（而不是依赖型）的联系强度更大，但看起来可能是这样的。许多种情绪表达服务于个体独立性的定义，因此可能在个人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更有效用。文化的其他维度也与情绪表达时发生的事件有关。贝克特和维根霍茨（Becht & Vingerhoets, 2002）调查了来自 30 个国家学生哭泣之后的感觉，大多数人都认为哭泣之后感觉更好。但是，发现有四个因素可以解释人们感觉更好的程度：霍夫施泰德女性气质在国家层面的得分、低羞耻感、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国家以及来自于一个哭泣相对频繁的国家。在这些因素中，霍夫施泰德的女性气质得分是最强的预测因子。哭在芬兰最有效，在瑞士最无效。

依赖型与动机

马库斯和北山（Markus & Kitayama, 1991）提出，一个强调依赖型的文化将会产生一系列影响，决定哪些个体动机最起作用。可以预期，与群体保持和谐将会导致谦逊、导致针对群体而不是自己的成就动机并导致对一致性的最少需求。

自我拔高与谦逊

北山等人(1997)观察了日本人区别于美国人的方面:强调根据他人要求做出调整、更谦逊(modest)的自我表征。莫林等(Morling, Kitayama, & Miyamoto, 2002)扩展了他们的研究,他们要求被试回忆自己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情境和为符合他人要求而调整行为的事件。美国人能回忆起更多的影响他人的事件,且这些事件都是新近发生的,他们报告说影响事件使他们感觉有成效。另一方面,日本人能回忆起更多的为符合他人要求而调整行为的事件,且这些事件也都是新近发生的。适应事件使他们感觉与别人更亲近。

日本人偏好谦逊胜于自我拔高(self-enhancement),不断发现的这一事实挑战了一个广为接受的假设,即某种程度上积极的自我评价是有效社会功能的普遍要求(Heine, Lehman, Markus, & Kitayama, 1999)。最近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广泛的争论:日本人是否“真的”谦逊,是否仅仅因为依赖型要求而导致更加谦逊的自我表征,得到的这些结果是否只是研究方法造成的假象?布朗等(Brown & Kobayashi, 2002)提出,只有在个人主义国家重视的品质上,日本人才对自己的评价低。他们表明:当日本人对他们重视的品质如友好和谦逊进行评价时,对自己的评分与美国人在自己最重视的品质上的得分一样高。塞迪基德斯等人(Sedikides, Gaertner, & Toguchi, 2003)对比了美国学生和在美国学习的日本学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海因(Heine, 2003)对一些研究发现持怀疑态度,这些研究中,以评定被试是否比平均值高的方法测量自我拔高。这类评定得出一些假的效应。因为,即使随机抽取的他人都被评定为高于平均值,那么,如果这种效应只出现在受偏爱的品质评价上就不足为奇了。

海因和他的同事报告称还有一些其他的测量结果证实了日本人的谦逊。日本人的自我与理想自我(ideal self)间的差距比加拿大人的要大(Heine & Lehman, 1999)。这种差距在被评价为最重要的特质上达到最大。在一项实验室研究中,加拿大人不愿相信他们的成绩比平均水平差,而日本人则不愿相信他们的成绩比平均水平好(Heine, Takata, &

Lehman, 2000)。海因等人 (Heine & Renshaw, 2002) 要求美国和日本学校俱乐部的学生评价自己和同伴。日本被试的自我评价比他人对他们的评价低, 而美国被试则相反。这项研究也包含了**独立型和依赖型自我诠释**的测量, 且在日本人和美国人中**独立型自我诠释**对这些效应都有调节作用。

日本被试一致性的谦逊反应现今已经清晰地建立了。那么这种谦逊是“真实的”还是一个自我表征的问题? 村本 (Muramoto, 2003) 要求日本学生反省过去的成功与失败。跟预期的一样, 他们将成功归功于别人而将失败归咎于自己。但是, 当村本要求被试评定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如何评价他们的成功与失败时, 她发现, 被试认为朋友和家人会对成功加以赞许而对失败则不多加谴责。这表明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谦逊主要是一种自我表征。库尔曼 (Kurman, 2003) 从以色列和新加坡的高中生中得出了几种自我拔高的测量, 她还要求被试对谦逊的重要性进行评价。在两个国家中, 对谦逊的高评价均对 (低) 自我拔高有中介作用。

关于谦逊的争论仍在继续。虽然日本和一些其他集体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许, 但他们要么不自我拔高, 要么其程度比其他地区低许多 (Heine, 出版中)。这种自我贬低 (self effacement) 和他们与他人之间更强的依赖型有关。人际关系中的许多其他方面与谦逊的自我表征相互交织在一起, 我们将在第8章中对这些联系加以讨论。

社会导向的成就

早期对成就动机 (motivation to achieve) 的研究都假定成就是能给个人带来名誉的东西。对个体动机的评定是通过让其对一系列图片加以描述, 再对这些内容进行个人成就编码。麦克利兰 (McClelland, 1961) 试图运用这一思路来揭示一些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比其他国家更大。他解释说, 通过鼓励个体成就, 就可以产生一代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开拓道路的企业家。但是, 这种想法现在被看作是建立在强加式客位的概念化上。更倾向于依赖型的人似乎不大可能将成就解释为个人利益和个人认可。的确, 麦克利兰也没有成功地让印度经理们在个人基础上与作为同

事的其他经理相竞争。余安邦 (Yu, 1996) 分别开发出了个体导向成就动机和社会导向成就动机 (individually and socially-oriente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的标准, 并且发现在中国被试中, 它们很大程度上互相独立。社会导向成就动机上得分高的人在确定目标、努力实现目标以及评价目标的实现程度时, 都会注意群体中的其他人。类似的对社会导向成就动机的概念化也出现在印度的一项研究中 (Agarwal & Misra, 1986) 以及对土耳其和比利时青少年的对比研究中 (Phalet & Claeys, 1993)。

与这一分析一致, 雷丁 (Redding, 1990) 研究了中国企业家。他发现, 中国家族企业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内部关联的家庭成员关系网中的协作性联系。切尔齐等人 (Church & Katigbak, 1992) 比较了美国和菲律宾学生的学习动机。美国学生强调得到好成绩和个人成就, 菲律宾学生强调为找到好工作而准备以及得到他人的认可。这种对不同类型的成就动机的区别与班杜拉 (Bandura, 2002) 所承认的——个体效能与群体效能都能够对人类行为产生同样强大的作用——相类似。

社会导向的动机比起个体导向的动机有更深远的影响。一个独立型的人如果失败可能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自我怀疑。余安邦 (Yu, 1996) 注意到中国人常将失败归因于与他人关系不好、命运、运气不好或自己不受社会欢迎等特质上。张雷等人 (Chang, Arkin, & Leong, 1994) 要求美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学生对以下几项因素进行评级: 对优良成绩的关注, 对自己的怀疑, 对自己毅力的怀疑, 对自己社会关系的怀疑。正如预期的那样, 在美国被试中对优良成绩的关注与自我怀疑和独立型自我诠释相联系。但是在中国样本中没有这个效应。而在新加坡被试中, 对成绩的关注与自我的社会关系相联系。所以, 对于个体成就动机的关注似乎更决定了个体如何评价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对于个体自身成功或失败的这种归因, 为之前讨论过的更为普遍的问题——对应偏差和谦逊——提供了例证。

与这一章中的许多内容一样, 我们回顾的成就研究中包含了北美和东亚被试间的对比, 为那些将自己解释为独立的人和那些将自己解释为依赖性的人之间的区分提供了例证。但是, 特别是在第 5 章, 我们发现

有必要区分出第三类的自我诠释——**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Kagitcibasi, 1996a, 2005）。瑞安（Ryan, 1993）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提出，如果家长和老师鼓励青少年们的自主性，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的自主性得到关系性的支持，青少年会发展出强烈的内部动机。在俄罗斯和美国学童中发现了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Chirkov & Ryan, 2001）。尼尔森和谢维特（Nelson & Shavitt, 2002）从一个不同的视角，运用垂直和水平自我诠释的测量方法，比较了丹麦人和美国人对成就价值观的认同。在两个国家，成就价值观均与垂直的个人主义相联系。在我们将这些不同类型的发现结合起来之前，需要采用更全面的自我诠释的各种测量方法，但现有的证据表明，更需要的是广泛的取样和触及不同自我诠释的测量方法。

一 致 性

如果我将自己解释为独立的个体，那么对我来说，将自己看作是统一标准的行动核心就很重要。但是，如果我将自己解释为依赖型的，我的行为将会受到我所重视的人的影响，以对他们做出适当的回应。因此，对我来说，在不同的场合有必要表现得不一致，尤其是在包括不同人物的不同场合。无论我们如何解释自己，生活中的紧急事件可能使我们至少在某些时刻表现得不一致。这就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处理这些不一致？

福等人（Fu, Lee, Cameron, & Xu, 2001）比较了加拿大和中国的学生、老师及家长对一些故事的评价。这些故事中包含了亲社会和反社会的说谎行为。加拿大人对说实话评价更为积极，但中国人只在与反社会行为有关时才这么评价。他们对于一个表现了亲社会行为但否认这么做的人的评价比对承认这么做的人更为积极。此外，接近半数的中国人认为场景中被描述为撒谎的人实际上并没有撒谎。福等人按照中国人自我表征中谦逊的需要来解释这一结果。做了好事而又说出来被认为是自夸。所以，通过参照更高等级的谦逊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的显著性可能与一个人的**依赖型自我诠释**的水平有关），对一个表面上的不一致加以处理，就成为通常的做法。在本章的前一部分，我们也接触了另一些

研究，这些研究暗示了谋略和交际手段在亚太国家更常运用。例如，塔法罗迪等人（Tafarodi et al.，2004）发现，日本和中国香港的被试对一个人的“内在自我”的报告表现出了低得多的一致性，而这两地人们的**依赖型自我诠释**普遍较高。这一特殊的结果说明，在不同场合中使用谋略和交际手段的差异不只是作为权宜之计，而是被试确实感觉他们在不同场合是不同的人。

作为一套持久启动效应的文化

在第2章中，我们讨论了对文化感兴趣的心理学家致力于将他们的研究与心理学研究的主流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几个步骤。他们建立联系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至今，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跨文化研究者在心理学研究的许多领域中不愿意采用实验方法，而实验的方法是许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基石。他们会说，怎么可能对文化进行实验操纵？由于他们的缘故，主流心理学研究者质疑：基于现场调查的研究能否为因果假设提供明确的证据。

独立型与依赖型自我诠释这一个个层面构念的发展鼓励一些研究者提出一种方法来克服目前这个问题。如果自我诠释不仅被认为是完全固定的类似人格的特质，而且在特定时期能够对一个人起特定作用，那么对它们进行实验操纵就有可能。也许我们能在某些时候独立，在另一些时候依赖，这个观点与**独立型**和**依赖型自我诠释**的正交关系是一致的（Sigel et al., 1999）。在第一次实验操纵的尝试中，特拉菲莫等（Trafimow, Triandis, & Goto, 1991）仅仅让在美国的白人学生和中国学生坐两分钟，要么想像和家庭的所有联系，要么想像使他们不同于他人的所有事情，然后他们完成二十项陈述测验。这个实验操纵对每个组的成员如何描述他们自己有重要影响。当被要求想他们的家庭联系时，他们的TST分数表明他们更为依赖型。当要求想他们与别人的区别时，TST分数现出更大的独立性。

如果可以使他人用独立型或依赖型的方式来思考他们自己，那么就有可能测试哪些方面的社会认知与实验引发的这一变化相联系。在过去

的十年中,已经出版了大量使用这种类型的实验启动来检验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相关假设的研究。对于北美双文化背景的被试,关于**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的问题,旗帜和其他图标以及不同语言的其他标志以及材料的呈现都能产生显著的启动效应(Oyserman, Sakamoto, & Lauffer, 1998; Morris, Menon, & Ames, 2001; Ross, Xun, & Wilson, 2002)。这个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认为它提供了一种方法,把文化差异的研究引入实验方法的领域(Hong & Chiu, 2001; Hong, Morris, Chiu, & Benet-Martinez)。

目前为止,大多数使用文化启动的跨文化研究均抽取了双文化个体为样本,因为在他们身上可能更容易出现和提取两种可选择的认知框架。此外,虽然启动引起了显著效应,但是它仍然不能消除先行存在的差异。在特拉菲莫等人的研究中,在所有实验条件下,华裔美国人仍然比白人报告了更多依赖性认知,而白人也仍然更为独立。正如本章在前面所指出的,莱文等人(Levine et al., 2003)发现启动影响TST反应,但是不影响自我诠释反应。最后,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文化启动产生的效应与启动文化相反。比如在中国香港,一个讲英语的中国人实验者产生了更多认可他们文化遗产的反应(Yang & Bond, 1980; Bond & Cheung, 1984; 也见第7章专栏7.4)。

为了增强这类实验研究和我们提出的个体的社会化方式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论证短期生活经验持续地启动我们去关注自身和环境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有些例子已经阐明了这种灵活性。比如说鹿岛等人(Kashima & Kashima, 1998)的研究表明,在集体主义国家中使用的大多数语言允许省略人称代名词‘我’,但是在个人主义国家说的大多数语言则不允许省略。通过使用特定的方式说话,我们也许经常在我们自己和周围的其他人中启动特定的**文化取向**。如果认为启动导致文化差异,这可能将它过于简单化,但是它可能有助于加强和维持它们。启动研究为我们理解文化差异,尤其是与社会认知相关的那些差异提供了另一种途径。

小 结

独立型和依赖型自我诠释间的区别帮助我们检验认知、情绪和动机等固有的基本心理过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如何更好地测量自我诠释，如何在更充足广泛的范围内取样等方面仍然问题不断。已有的证据显示，普遍的过程被以特定方式解释自我的人引向不同的方向。这使得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我们周围人的行为，以不同的方式体验与表达情绪，并寻求与他人建立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

拓展阅读

1. Altarriba, J., Basnight, D. M., & Canary, T. M. (2004). Emotion representation and perception across cultures. www.wvu.edu/~culture
2. Kitayama, S., Markus, H. R., Matsumoto, H., & Norasakkunkit, V. (1997).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process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Self-enhanc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lf-criticism in Jap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 1245 - 67
3.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224 - 53.
4. Nisbett, R. E., Peng, K. P., Choi, I., & Norenzayan, A. (2000).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 291 - 310.
5. Oyserman, D., Coon, H. M., & Ke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 3 - 72.

思考题

1. 你怎样解释自己？用 TST 问卷来描述自己，或者评估你对专栏 6.2

中的项目的同意程度。

2. 自我诠释怎样被测量？你认为怎样能够更好地测量？
3. 如果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也像对北美和亚太那样多的话，还能发现文化差异的哪些方面？
4. 用照片和日记的形式研究情绪领域的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这种方法的优点和缺点各是什么？
5. 确定你自己的文化中哪些方面鼓励谦逊的或自信的自我表征。



你会发现，作为一个普遍规律，一个地方的政治制度、人们的习俗与当地
的自然特征相一致（希波克拉底，《箴言录》）。

前面几章可使我们看到在各种社会心理过程中，动机、信念和自我诠释均与文化差异存在着关联。这其中每一点都代表了人格的一个方面。因此，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不同方面的这些特质存在差异的原因，以及人格差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大千世界中存在的行为多样性。实际上，正是由于可观察到的人类行为如此千差万别，才促使我们开始探求文化差异的解释。

早期的人类学家们远离自己的家乡到其他地方居住时，在当地人身上发现了与他们自己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一些人类学家们在对其他社会的研究中都发现了相当广泛的行为差异，他们对此撰写的报告往往使读者们大吃一惊，比如马利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927）在特伦不朗德岛，劳拉·博安农（Laura Bohannon）（Bowen, 1964）在尼日利亚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75）在巴厘岛的研究。正如在第2章中提到过的，社会科学家中很多人都接受过精神分析的训练，他们喜欢用人格来解释这些观察到的行为差异，从而形成了“文化与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学派。“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生活在相同文化环境中的个体，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化过程……形成相同的人格”（Pooortinga & van Hemert, 2001, p. 1035）。本尼迪克特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过一支中国当代文化考察队，米恩斯腾伯格作为其中的一员，曾经写道：

乍一看来，中国南方人疏导和升华内驱力作用的方式对于我们

而言是陌生的。与西方人相比，他们的前性器期冲动和幻想系统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不断在现实的调节中直接寻求表达的。为了避免俄狄浦斯情结带来的冲突，这种文化中允许人们通过白日梦、理想、幻觉和假活跃性来消除压抑和紧张。彼此之间的依赖是一种由文化决定的、对抗本能需求的防御机制。正是由于这种特点，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的艺术与哲学，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Muensterberger, 1969, p. 329）

在这段分析中，米恩斯腾伯格以他在一个迥异的文化系统中对人们日常生活的近距离观察为基础，并将弗洛伊德的构念和动力学在一个异质文化中进行了创造性的扩展。在文化与人格学派的论述中，典型的早期分析是这样的：

通过社会化活动，一个社会中的基本制度（比如生存组织或家庭组织）会产生某种基本的人格结构，这种结构由所有或大部分成员的共同方面组成。继而，这种人格结构又构成了社会次级结构（包括宗教信仰、神话和艺术表现风格）的基础。（Pooortinga & van Hemert, 2001, p. 103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学家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来自于许多前工业社会的大量人种学资料（Whiting & Child, 1953），并在六种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Whiting & Child, 1975）。这些研究一方面指向子女养育在社会的生态/经济和各文化系统中起到的中心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向儿童人格在形成成年人格以及生成文化产品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在研究中采用了发展的观点，但这是一种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进行解释的相当狭隘的观点。

文化与人格学派对文化的研究中，以三个重要立场为特征：倾向于知觉一种文化中成员在人格上众多的相似之处；假设这一典型的人格系统会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产生普遍而深入的影响；认为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产品是在基本制度性影响下形成的“次级”延伸，这些基本制度性影响通过作为该文化群体特征的基本人格类型发挥作用。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三个观点都可能受到质疑。

为个体和个体所属的文化群体绘制人格地图

正如麦克雷（McCrae, 2000）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与人格学派对人格心理学家们的影响甚微，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用来测量人格的工具缺乏心理测量的性质，这些工具大多数是从精神分析中衍生出来的。这些工具在测量诸如自我意志力、投射出的愤怒等特质时信度比较低。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这些方法的基础，弗洛伊德理论也被社会学习理论和人格特质论所取代。新理论促进了新的人格测量方法，这些新方法大多采用纸笔形式进行，可用于**因素分析**，并从多个侧面得出概念结构。例如，卡特尔的 16PF 和艾森克的 EPN 等复杂的方法，可以用于在多个不同的维度上对个体进行比较。它们的重测信度高，这再次让心理学家们确信，测验触及个体性格中某些具有一致性的东西。这些方法采用书面测验的形式和标准化的反应分类，这些特性使得它们在计分上得到的判断间信度非常高，而且通常是完美的。以罗夏墨迹测验的得分来评价跨文化差异（例如：Abel & Hsu, 1949）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比较不同文化的人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心理学研究最初仅局限在有限的几个国家中进行。一些心理学家，如麦克利兰，却具有更加开阔的、多元文化的视野。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十分感兴趣，曾经尝试将一个社会在经济上具有的优势与其学校中的社会化过程联系起来。具体来说，他对很多不同国家小学课本中出现的有关成就的主题进行评分，根据默里（Murray, 1938）的动机理论，将成就动机教育与一个国家随后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当然，他进行的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分析，并且在那个时候他组织了各种巨大的资源来完成这一项目。

大多数跨文化心理学家并不这么雄心勃勃，而更愿意在个体层面上进行分析。在他们采用的**强加式客位**研究方法中，典型的做法是先施测人格测验——这个测验已经在某一个国家（通常是美国）得到了理论

支持和实证记录——然后再把另一个国家的得分与美国的数据进行比较。例如，彭迈克和托纳特斯基（Bond & Tornatsky, 1973）曾采用罗特（Rotter, 1966）的方法测量了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内控制点对外控制点（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他们采用了当时已有的理论假设（如：Nakane, 1973，将日本描述为一个“纵向的”社会），认为由于日本人在一个纵向的系统中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与对应的美国人群体相比，他们应该更多地将自己描述为更具有外控的特点。

考虑到罗特的测验之前从未在日本使用过，研究者们事先进行了因素分析，以检验在日本人中是否真能找到假设中可归结为控制点的单维结构。彭迈克和托纳特斯基发现，在这个含23个项目的测验中，存在两个，而非单一的因素，这与当时刚在美国得到的结果相同（Collins, 1974）。在美国人和日本人中，这些因素的构成是相似的，因此达到了因素跨文化对等的要求，从而随后能够进行有效的比较。在个人控制（personal control）与系统调节（system modifiability）这两个因素上，日本人都显示出了更强的外控性，证实了最初的假设。

同样是在两种文化间进行比较，库查巴莎（Kagitcibasi, 1970）的理论验证具有更大的雄心。在一个关于美国和土耳其年轻人的比较研究中，库查巴莎采用“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理论进行了跨文化测验。她发现，被认为构成所谓权威人格综合症的某些特征，如尊重权威，在土耳其是一种社会规范，答卷者们在这一特征上的得分都很高。因而在土耳其，这一人格综合症整体的内部一致性比在美国低得多。这一发现，对于这一以精神分析为基础、被认为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格理论提出了挑战。这项研究也是在将文化作为一种决定态度导向因素的前提下，对人格进行的一项早期检验。

跨文化心理学的文献中，充斥着许多这样对两种文化中人格测验中得分的比较。进行这些比较时，有时会事先进行探索性或验证性因素分析，随后对概念结构中经认定的因素进行等价性的评价，而有时则不经过这些步骤。然而，即使进行了这样的等价性评估，这也只是一些初级的研究。建立在某个概念结构上的两种文化间的比较，无论其概念结构多么引人入胜，无一能为社会特征造成平均数差异这一结论提供确定的证据。很早以前，坎贝尔（Campbell, 1970）曾对这种两群体间进行简

单比较的做法提出过警告，他建议在跨文化研究中采用“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的方法，以保证结论有更大的确定性。三角测量不是仅仅使用快速的纸笔测验，而是包括几种不同研究方法。今天，我们建议，要探明产生这些差异的潜在前因，至少需要 20 个左右文化群体，这些群体最好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上都存在着广泛的差异。

此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测量方法所测量的往往是具有等级结构的、更广泛的人格维度中的一个层次。在描述文化差异时，在相对广泛的构念（而不是较狭窄的构念）上进行比较可能会更有意义。举例来说，内部和外部控制点就是一个比较窄的信念系统，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信念维度，在梁觉和彭迈克（Leung & Bond, 2004）对社会公理的广泛研究中被确认为命运掌控（fate control）和犬儒主义（cynicism）（Singelis, Hubbard, Her, & An, 2003）。控制点不仅是一个更具体的概念，从梁觉和彭迈克发现的用于描述信念的更广泛的体系看来，它也是具有多面性的。如果一个研究者去验证一个控制点理论衍生出来的窄的假设，使用控制点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他想检验文化在人格变异上的更广泛的影响，就应在测量人格结构时选择更加宽泛的工具。

人格的组织中是否存在泛文化相似性

由词汇中产生的大五人格

在菲斯克（Fiske, 1949）早期研究的基础上，诺曼（Norman, 1963）在密歇根大学的兄弟会中，让成员们对熟人的人格进行等级评定，从而确定了五个有说服力的维度。是什么使这项研究具有“世界性”？用诺曼自己的话来说，是研究中为了使人格评价能够全面涵盖整个人格差异范围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这项研究以奥尔波特和奥德波特从英语词典中挑选出来的人格描述词为基础，诺曼减少了这些词汇的数量，并把它们归为五个独特的，或说是独立的维度，来描述人格差异。

这五个维度是外向性 (Extraversion)、亲和性 (Good-naturedness)、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will to achieve)、情绪稳定性 (Emotional stability) 和文化 (Culture)。除了在最初得到它们的样本中, 这五个维度在其他不同的样本中也通过了检验, 因此被诺曼称为“大五”。

格斯里和本尼特 (Guthrie & Bennett, 1971)、彭迈克和纳卡扎多等人 (Bond, Nakazato, & Shiraiishi, 1975) 以及彭迈克 (Bond, 1979) 分别在菲律宾、日本和中国香港, 将诺曼用于描述人格的词汇作为一种强加式客位研究方法进行了应用。在这些新的地区, 前四个人格维度能够确定无疑, 而对第五个维度——“文化”的界定往往不充分、不一致。这显然是由于把那些英语中的描述词汇引进到了一个语言差异很大的外国文化中的缘故。这些文化中用于描述人格的很多重要词汇完全可能被遗漏了, 而它们本可以在自己的语言中用来定义“文化”这一个维度, 甚至定义更多的人格维度。

古德伯格的“词汇”假设认为, 在世界上的一些或所有的语言中, 人类行为中最重要的个体差异可以被编码成一些单独的词语 (Goldberg, 1990, p. 1216)。这个有影响的假设在不同国家内激发了相当多对当地语言的研究, 以确定本土的人格结构。从中文 (Yang 和 Lee, 1971)、日文 (Nagashima, Fujiwara, Harano, Saito, & Horii, 1967) 到波兰语 (Szarota, 1996)、塔加拉语 (Church, Kagitbak, & Reyes, 1996), 研究者们分析了词典中的人格词语在各自文化中用于描述自己或他人时发挥的作用, 这些词语通常是形容词。这些分析中总是用到因素分析及其他数据分析技术, 因而在决定因素的个数时存在一些随意性。

迪拉德等人 (De Raad, Perugini, Hrebickova, & Szarota, 1998) 整合了其中的一些研究, 他们得出结论, 认为: “以在美国英语中的研究结果作为参照……美语中大五因素的前四项在其他的语言中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表明了它们的可重复性” (p. 212)。然而, 第五个因素在其他语言中的一致性却没有得到确认。即便是这样, 他们还是主张对大五模型进行修订, 因为对所有语言进行的分析通常都得到了第五个因素。在他们看来, 在不同语言系统中出现的不一致, 一部分原因是在这些分析中大都使用形容词, 并不包括名词和动词。并且与能力有关的词语,

特别是与智力有关的词语，并不总是出现在用于人格等级评定的词汇中。现在，研究者们把第五个因素称为“对经验的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而不再是“文化”；同时，亲和性也被改称为“宜人性”（Agreeableness），情绪稳定性则由它的反义词“神经质”（Neuroticism）取代。

因此，在不同语言中，大五人格结构的差异的确存在。而目前重要的目标是：无论在何处进行研究，大五结构都能够在当地使用的语言中被提取出来。这种应用的普遍性表明，在日常谈话中描述我们自己或其他人时，大五因素的出现和使用有着强大的功能基础。霍根（Hogan, 1982）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描述人格的维度，是由于它们能够帮助人们定义出哪些人能够满足社会融合与协作功能。基于我们的进化性遗传，社会融合与协作是所有的社会系统中都会提出的。他论证道：

获取地位与保持声望是生物学上的要求。……地位……为优先的繁衍和生殖的成功提供机会……声望……有相当大的生存价值……人性的核心包括某些固定的、持续的且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生物学动机……其中的三种构成了人的社会行为的独特风格：（a）……得到社会认可的需要，同时非常厌恶批评与非难……（b）……损害他人的利益以取得成功的需要，亲缘关系……会修正这一需要……（c）……对于其社会环境结构、可预测性和秩序的需要。（pp. 56 - 7）

接下来，霍根总结了将这些基本需要与最早从词汇中产生的大五人格结构各维度联系起来的途径：

调节维度〔神经质〕涉及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在压力下的表现水平与情绪的稳定程度。社交性/雄心维度〔外向性〕与领导力的潜能有关。谨慎维度〔责任性〕与值得信任和可靠性有关。宜人维度〔宜人性〕涉及一个人在群体中受他人喜欢的程度。智力维度〔开放性〕涉及在解决一个群体所面临的技术问题时，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支持。……五因素模型（Five Factor Model, FFM）与荣格的原型类似；它们是人类知觉中的天然分类，用于评

价他人在其家庭、部族或工作团体中的潜在贡献。(pp. 173-4)

不同测验开发者在使用维度名称时有所不同,但似乎都存在一个基本功能上的相似之处,霍根认为这是从无论何时、何地人类生存都要满足的需求中产生的。同样地,大五人格具有跨文化、跨历史的普遍性。霍根的结论与由施瓦茨确认的主要的价值观维度显示出有趣、可靠的聚合,后者我们已经在第3章中讨论过。正如我们在价值观的研究中看到的,价值观的结构可能存在全球的普遍性,但不同个体的社会需求强度以及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不同。一个人在他/她的社会中取得的声誉,取决于其如何处理该社会中的主要需求,以及处理得如何。一个人在当地大五人格中的面貌,像一个结构一样让别人对他进行识别,塑造他的未来成就,也引导着别人对待他的行为。例如,彭迈克和福加斯(Bond & Forgas, 1984)向澳大利亚人和中国香港人呈现了一些对人的描述,这些描述在大五人格中的四个维度上发生变化,是在其各自文化中描述他人特征时使用的。在两个文化群体中,人们都提到更愿意与一个被描述为高外向性和高宜人性的人交往。这两个文化群体,或者所有文化群体中的人都更愿意与待人热情、随和的人互动。然而,在这个人际规则中也存在一些具体文化中才有的动力学特点。在选择更愿意与谁相处时,与澳大利亚人相比,中国香港人更看重他人的宜人性。在评价宜人性方面的这一差异,可能体现了任何个人主义国家和集体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的特征。

专栏 7.1

使用人格的词汇测量方法调查人的优越感

“认为自己比别人强”——所有的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这种想法,因为这样会使人们之间产生敌意,使社会产生不和。因此,尽管一个人的优越感可能在社交功能中是重要的,但却很难直接让人们将自己的优点和别人进行比较来测量它。

像“友好的”、“好争论的”等特质词语,是评价自己或他人的简便人格测量方法。奥斯古德等人(Osgood, May, & Miron, 1975)在跨文化研究中发现,虽然不同

专栏 7.1 (续)

文化对于给定的一个特质标签的喜爱程度各自略有不同，但这些特质词语中都含有评价的成分。特质标签的这一特点，能否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中，评价一个人相对于他/她社交圈中其他人的优越感呢？

研究者可以让被试用一些在当地“大五”中使用的词汇标签对自己进行等级评定。通过计算其各项自评分之和，就可以得出针对自我的评价性。然后，使用相同的词汇标签，让被试对一组熟人进行评价，计算出被试关于这组熟人的评价的平均值。从而计算出被试对自己和对他人评价分数之间的差异，这是测量一个人相对社交圈中其他人的优越感的一种简单、谨慎的方法。

彭迈克等 (Bond, Kwan, & Li, 2000) 依照以上的程序，对项目团队中与同学合作的中国学生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被试对自我喜爱程度的评定 (自我关注) 与对他人喜爱程度的评定 (他人关注) 是独立的。另外，自我关注水平高的被试，在其他团队成员看来是更加外向的、更为自信的和开放的；对他人的关注水平高的被试更受人喜欢，在其他成员看来是更乐于助人的和更自我克制的。一个人的优越感有可能通过他愿意做好事 (即“乐于助人”) 和避免做有害他人的事 (即“自我克制”) 而传达给其他人。这与他/她如何看待自己没有关系。自我关注水平可以预测社交表现中与冒犯他人无关的方面。这些结论与第 6 章中讨论过的关于谦逊和自我拔高的研究有关，这些结论有必要在其他文化，特别是在等级制度不同的文化中进行检验。这样的检验最好使用本土人格维度的词汇测量手段来完成。

人格问卷中的“大五”

人格研究中的词汇传统与问卷传统与科斯塔和麦克雷 (Costa & McCrae, 1992) 对 NEO 人格问卷修订版 (NEO-PI-R) 产生了聚合。在这个得到广泛使用的人格测验的专业手册中，这些作者们声称他们的工具：

是测量人格五个主要的维度或领域，以及定义各个领域的一些重要特质的简明方法。NEO-PI-R 的五个因素量表和 30 个特质量表加在一起能够对成年人的人格进行全面的评价……NEO-PI-R 体现

了几十年来对人格结构的因素分析中提炼出的一个概念模型。这些量表本身是在理性思考与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下开发和修订得到的，这些量表在过去15年中频繁地成为研究的主题，其中既有临床的研究，也有关于正常成人样本的研究。(p. 1)

考虑到这个工具在学科中的广泛使用及其信度和效度，它成为挑战文化与人格学派所存在问题（即其方法不完善和缺乏实证基础）的理想起点。

麦克雷和他的合作者们起先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个早期的个案研究 (McCrae, Costa & Yik, 1996)，随后在菲律宾与法国进行了调查 (McCrae, Costa, Pilar, Roland & Parker, 1998)，他们的人格研究逐渐扩展到36个国家 (Allik & McCrae, 2004)。现在这个覆盖面已经达到42个国家，受调查者通常都是在校大学生，偶尔也有成年人样本 (McCrae, Terracciano 等, 2005)。对 NEO-PI-R 数据在个体层面上进行的因素分析表明，特质的分组模式在所有接受测试的国家中是等价的。此外，每个

专栏 7.2

人格五因素模型中的维度与特质

科斯塔和麦克雷 (Costa & McCrae) 的五因素模型综合了几个广泛维度，每个维度都由一系列更加具体的特质来定义，这些特质又都由一些反映个人特点的项目构成。我们可以预期，文化普遍性在维度的层面上是最强的，而文化特殊性在个人特质，尤其是个人项目上意义更强。构成维度的特质体现出了这个维度的一些含义：

宜人性	尽责性	神经质	外向性	对经验的开放性
信任	能力	焦虑	热情	想像力丰富
直率	秩序	愤怒的敌意	合群	审美
利他	责任心	抑郁	自信	感性
顺从	进取心	自我警觉	活跃	行动
谦逊	自律	冲动	寻求刺激	创意
温和亲切	慎思	脆弱	积极心态	价值观

特质量表中肯定措辞和否定措辞的项目的数量达到平衡,使得研究者们可以克服默许反应偏差,这种偏差可能会歪曲随后的比较结果。遵循我们在前几章中讨论过的方法,艾里克和麦克雷(Allik & McCrae, 2004)接下来得以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因素分析**。分析中得到一个重要发现,在**国家层面上**出现了与**个体层面上**相一致的五个因素。这种平行关系使他们能够推测每个国家的典型人格特征,产生了“人格特质地理学”(geography of personality traits)。对于社会心理学家们而言,这个“心理描述法”(psychography)有可信的实证基础,取代了文化与人格学派中分散的结论。

在这些分数的基础上,艾里克和麦克雷进行了次级分析(2004),他们的结论认为:

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地理位置上相近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的面貌。对欧美文化和亚非文化进行的多维测量中显示出了二者间的鲜明对比。前者在外向性和开放性上较高,在宜人性上较低,次级维度反映了心理调节上的差异(p.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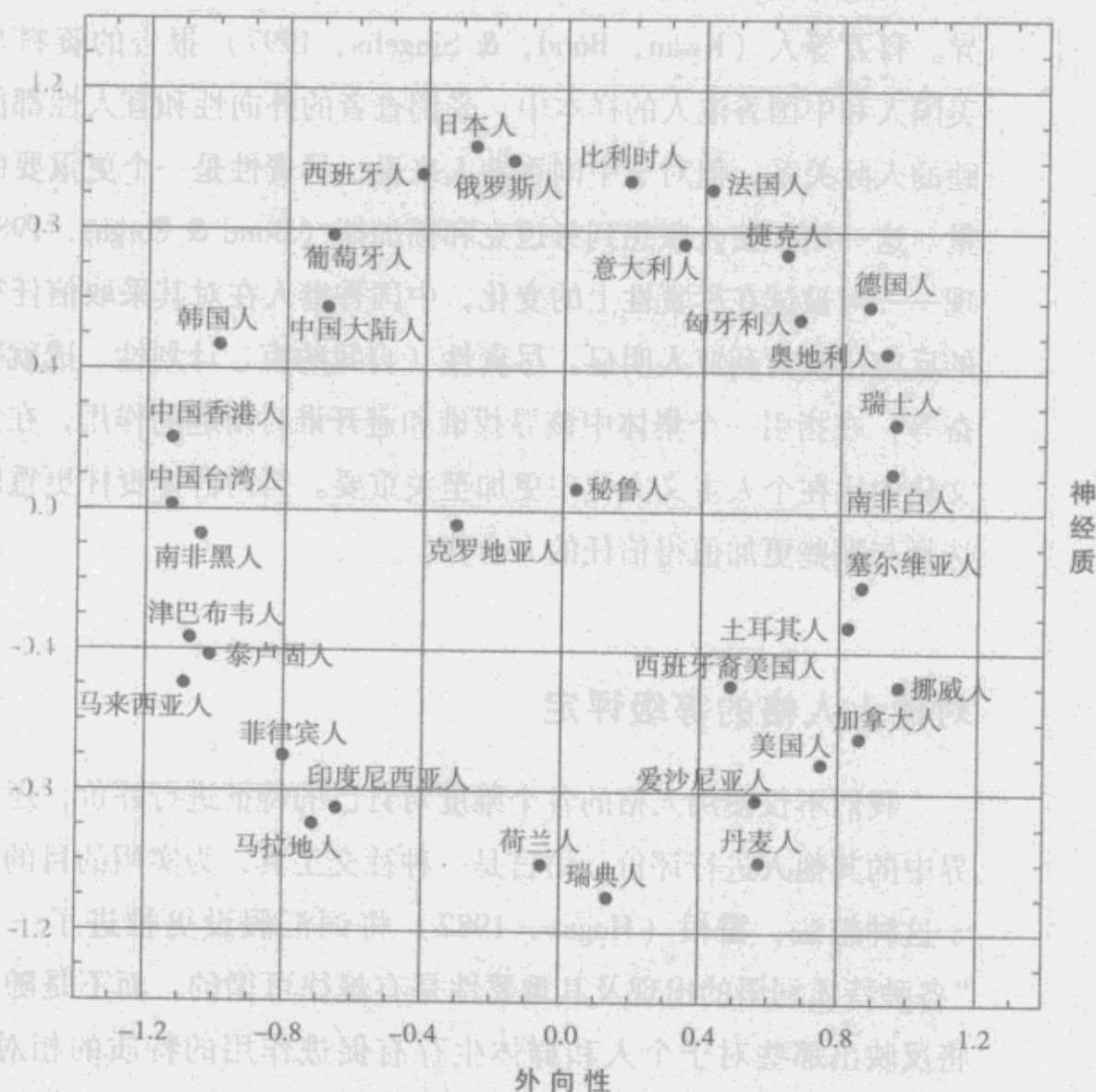
如专栏 7.3 中所列示,这些结论是对典型文化群体的成员的人格面貌进行统计,并在二维图上进行相应定位后得到的。

这种测量同时表示了五个维度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定位。然而,我们用神经质和外向性标明这些维度,因为这两个维度与该模型的相关最高。正如作者指出的:

横轴……与外向性和对经验的开放性正相关,与宜人性负相关。因此,来自欧美文化的人们似乎是外向的、对新经验开放的和对抗性的;而东亚和非洲文化中的人是内向的、传统的和顺从的。欧美文化在权力距离上较低(即他们反对等级制度),在个人主义上较高(即把个人利益置于群体利益之前);欧美文化中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如自我实现等)的趋势($p < 0.10$)。这些国家和地区通常也较富裕,收入分配更公平……,生活质量更高,并且人们对生活更满意。

专栏 7.3

36 个文化群体的多维测量图



资料来源: Allik & McCrae (2004)。

……图中靠近顶部的国家或地区（及其典型成员）神经质得分高，尽责性得分低；（这些文化）不确定性规避的水平也高……他们的人际信任和主观幸福感也低。（pp. 21 - 2）

这种研究文化与人格的方法展示了一种将社会性差异与不同国家或地区内个体的典型特征联系起来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研究的结果并不都与预期一致。例如，在专栏 7.3 中，日本所在的位置表示其是一个不幸福、怀疑、神经质和低责任心的国家。进一步的研究能够提高人格

地图绘制的全面性和抽样代表性，并且“为研究人格特质的起源以及它们在塑造个体行为和集体精神的过程中与文化的互动提供重要线索（p. 25）。

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大五人格如何被用于解释个体行为中的文化差异。科万等人（Kwan, Bond, & Singelis, 1997）报告的资料显示，在美国人和中国香港人的样本中，受调查者的外向性和宜人性都能预测和睦的人际关系，但对于中国香港人来说，尽责性是一个更重要的预测变量。这一结果使人联想到彭迈克和福加斯（Bond & Forgas, 1984）的发现——对被试在尽责性上的变化，中国香港人在对其采取信任行为方面的反应比澳大利亚人明显。尽责性（自我约束、计划性、成就努力和勤奋等）在指引一个集体中该寻找谁和避开谁时所起的作用，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比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更加至关重要。当内群体责任更重时，人们选择与那些更加值得信任的人合作。

对他人人格的等级评定

我们不仅使用人格的各个维度对自己的特征进行评价，还对社交世界中的其他人进行评价。语言是一种社交工具，为实用的目的服务。出于这种想法，霍根（Hogan, 1982）将词汇假设更推进了一步，认为“各种特质词语的出现及其重要性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不是随机的，并将反映出那些对于个人和群体生存有促进作用的特质的相对重要性”（p. 59）。根据这一观点，在人格机能的某个方面，特质词汇的相对频率能够揭示相应的人际功能在不同文化中的相对重要性。

然而，切尔奇对特质的词汇表征所做的研究表明，对于大五人格的每个维度，词汇的相对重要性并没有揭示文化动力。对菲律宾语词进行研究后，切尔奇等人（Church et al., 1996）发现，宜人性方面的特质词语表征是最多的。有人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相对优势反映了在集体主义的菲律宾文化中依赖的压力。但切尔奇还指出，“至少在英国与荷兰进行的研究中，也发现宜人性方面的词语最多……外向性（Extraversion/Surgency）方面的词语数量在这些语言中也都居于第二位，情绪稳定性和智力方面的词语在各种语言中都最少。这表明，词汇对这些

方面的表征的多少，并不那么能说明基础性的文化价值观的功能，而是代表着一些其他更具普遍性因素（个人沟通）的功能，例如霍根所认定的普遍性和功能性。

特质词汇在自然语言中的规模大小，是否对应了它们在社交中的重要性？切尔奇等人（1996）指出：

因此，这些领域的相对大小可能在许多文化中揭示出其在个人知觉、特质归因中的重要作用。例如，令人愉快和令人不快的人际行为中的许多不同的细微差别，显然比描述个人情绪稳定性和智力需要更精细的编码。（p. 21）

威廉姆斯等人（Williams, Satterwhite, & Saiz, 1998）在20个国家中直接测量了大五人格中各个方面的重要性，结果发现：在这些国家中，外向性和宜人性最重要，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最不重要，尽责性则介于它们之间。然而新加坡在这个模式中出现了一些例外，例如，把情绪稳定性评定为最重要的方面。研究者们得到结论认为，“在研究中发现充分的差异性，这为进一步比较不同国家在与心理重要性相关的品质方面的差异提供了保证”（pp. 126 - 7）。他们推测，这些差异与所涉及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侧重点有关。

因此，文化似乎不能影响描述大五人格特质的词语在一种语言中的相对频率，而可能影响着特定的、引导某些社会行为的人格维度的相对权重，正如我们前面在彭迈克和福加斯（Bond & Forgas, 1984）的研究中看到的那样。作为对这一假设仅有的几次检验之一，张等人（Zhang, Kohnstamm, Slotboom, Elphick, & Cheung, 2002）比较了荷兰与中国的父母对其子女的自由描述。研究者们结论认为，“中国学龄儿童的父母在尽责性方面使用了更多的批评性的描述词。这些结果反映了中国人的高成就导向，也显示出了〔特质描述的〕分类系统……对文化差异是敏感的”（p. 165，括号中的强调字体为本书作者所加）。父母对其子女在责任性方面有更多描述，这是由于对这些家庭来说，与生活中的其他顾虑相比，学龄儿童的学业成就是如此的重要。这种对有关责任性词语的强调，反映了中国人对于学龄儿童的自律要求，及在他们今后生活中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对教育的早期关注。这里要说的是，用于描

述人格的语词的突出特点呼应了特定文化情境中关注的问题，这些关注点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文化系统中使用词汇的相对频率发现。

与特质有关的词语可以用来描述他人，也可以用来描述自己。这种可获得性对于围绕着人格来构建一个社会心理学是重要的。当然，我们相信行为者的人格是支撑人际行为的一个因素。然而，从米切尔（Mischel, 1986）的质疑中我们可以知道，当脱离情境来考虑行为者的人格时，结果中的变异只有一小部分能够被解释。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霍根所说，“人格是稳定的，行为却会发生变化；它变化多端，是因为人们面对不同的人时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以保持自己的一致性”（p. 85）；这就是说，互动者的人格也是引起个人行为的关键因素。依据对方的声望、地位或角色等特征来确定自己的行为，这将使得个人的人际行为变得更加有效，虽然这将使他们在面对不同对象时显得不一致。

这些问题一度在社会心理学内引起争论，比如，在所谓的人格与情境主义的辩论中就曾出现争论。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Snyder, 1987）的构念指向个体差异，因而与这里提到的问题有关。与缺少自我监控的人相比，自我监控的人更能依据他人的评价和期望来调整自己。后者似乎更容易受到社会情境变化的影响。除了个体间的差异之外，不同文化间也往往存在差异。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往往与他人更协调，特别是与本群体的人，并且他们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倾向于在行为上展现出更大的差异。与霍根上述的观点相反的是，一些人类学家和文化心理学家认为，不仅表层的行为发生变化，即便是人格本身也在不断地被重新建构，从而在和不同对象发生互动时保持扮演的角色一致（Geertz, 1975; Shweder, & Bourne, 1982）。他们的表述中要求人们不要把人格视为以某种方式行为的倾向，而应该视为一种对情境要求做出反应的倾向。这些情境要求是会发生变化的，在一些文化中这些变化要比其他文化中的大。

通过他人使用特质词语对一个对象进行评价，是测量这些情境作用的强弱程度的一个方法。一个人的社会行为是由其个人动机、互动对象的特征和其他情境因素相结合的函数。评价一个对象的特质不仅是评价者自身人格的投射，而且当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对一个给定的行为对象进行评价时，还会显示出高水平的相似性（见 S. K. Leung & Bond,

2001)。此外,这些对特质的评价组成了大五人格维度,这五个维度在自我评价中也同样出现(Goldberg, 1981)。考虑到这一特质分类在不同国家中的可重复性,大五人格维度都可以使用行为者及其行为对象的人格来预测接下来的社会行为。

麦克雷和他们的合作者(2005)使用 NEO-PI-R 的人格问卷检验了他评人格特质的结构。研究中,他们让 42 个国家的大学生对一个他们熟悉的男性或女性在人格方面进行等级评定。在大多数的国家内对 NEO-PI-R 的 30 个侧面量表进行的因素分析,得到了与作为参照的美国自评结构相同的结果;在其他国家的研究中,仍能清晰地得到常见的五因素结构。因此,将他评人格结构化为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与开放性这些基本的维度,这与用问卷进行自评得到的人格结构是平行的,正如用于描述他人的特质词语的结构与描述自己的词语的结构平行一样。

有了这些他评人格的资料,麦克雷等人也得以比较了不同国家对男性和女性的评价。他们的结论是,女性在所有五个维度上获得的评价都略高,这与艾里克和麦克雷在自评资料中发现的结果一样。对组成各个维度的具体特质进行检验的过程中,他们注意到,“在 E3(自信)、E5(寻求刺激)、O5(观念)、C1(能力)这些方面,男性得到的评价比女性高。女性在很多特质上的评价较高,尤其是在 N1(焦虑)、N6(脆弱)、O3(情感细腻)、A6(温和亲切)这些方面。然而大部分效应的差别都不大,只有一个例子中超过了 0.5 个标准差”(p. 16)。各国中他评的性别差异有一致的倾向,但程度各不相同:“在自我报告的资料中,总的来说亚洲和非洲文化中的性别差异最小,在欧洲和美洲的文化中,这一差异最大”(p. 17)。

为了解释在更传统的国家中性别差异缩小的情况,麦克雷参考了科斯塔等人(Costa, Terracciano, & McCrae, 2001)的研究,得到结论认为:

对角色的特征归因是不同文化产生性别差异的最合理的原因。在具有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文化中,与一种性别相关的典型行为被知觉为是出于角色要求,而不是个人特质的反应,相应地在对一个个体形成印象的过程中被忽视了。这一观点推测,大多数或所有的

文化中有着相同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一假设有待证明。(Williams & Best, 1900, p. 557)

可能存在其他的解释。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的，在更加集体主义的文化中，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都形成了更多的关系自我。这种效应有可能对男性比对女性的作用更强，因此增加了男女性别之间的相似性。然而，重要的一点是，对抽样范围如此广泛的他评数据的使用，使得研究者们不仅能够比较其与自评结果之间的聚合，还能够对人格评价中这一焦点社会心理问题进行研究。举例来说，麦克雷对作为评价者（不是评价对象）的男性和女性进行比较。他们最初的发现是，由于评价者的性别产生的差异很小，极少高于0.10个标准差。当差异出现的时候，女性评价者比男性评价者更宽容，特别是在被评价者是女性的时候。正如研究者们指出的那样：

在评价男性的时候，与男性评价者相比，女性评价者把他们描述为更加正直和没有私心。在评价女性的时候，与男性评价者相比，女性评价者把她们描述为更少焦虑、更少有自我意识和较不易受伤害，更加温暖、更合群、对观念和价值观更加开放以及更有能力。所有这些发现都与女性在总体上比男性更具宜人性的观察结果相一致。这些宜人性高的评价者对他人作出了更宽厚的评价……(p. 18)

这些效应在不同国家中并没有差异。然而，人格与情境在这些结果中起到的作用还是难以分离。女性可能由于更具有宜人的特质而对他人进行更宽厚的评价，但是她们这样做也可能是因为别人对待她们的方式是令人愉快的。无论是哪种情况，如果一个人的人格是影响别人对待他的行为的一个因素，那么不考虑一个人的文化，在准确地预测行为时，评价者的性别就必须作为一个因素被考虑在内。

人格的五因素模型是否完整

以 NEO-PI-R 结构的美国常模作为对照标准，学者们对大五模型的因素结构进行了检验，几乎在参加测试的所有国家中，都找到了人格差

异的大五维度 (Allik & McCrae, 2004)。这五种人格机能无疑是建立泛文化社会行为模型的有用起点, 包括行为者本人和行为对象两者的特征。这五个维度各有其功能基础, 为一个人在重要的社会关注点上的表现提供指导信息。但它们是否完整呢?

在不同于大五诞生地的文化中, 可能存在其他一些额外的功能性方面的关注。通过在这些文化中进行取样, 研究者们或许可以列举出一些项目, 来定义一些补充性的人格维度。为了证明这些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维度, 必须首先开发出本土化的人格问卷 (例如: Cheung, Cheung, Wada & Zhang, 2003, 有关亚洲国家本土测验的开发)。然后本土的问卷应该与引进的大五测量方法一起使用, 共同进行因素分析。如果除了大五之外还存在一个独特的维度, 那么一个主位的本土维度就被分离出来了 (见 Yang & Bond, 1990, 是这种方法最早的例子)。之后的研究可以继续确定这一维度的本土效用, 以及这一本土的维度是否也能在其他文化的人中得到确认。如果是这样的, 这第六个维度就可望成为普遍性的人格差异“第六大”维度。

这是一项要求很高的研究工作,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类研究极为少见。切尔齐和他的合作者在菲律宾, 仇在中国都对此进行了尝试。凯提贝克等人 (Katigbak, Church, Guanzon-Lapena, Carlota, & del Pilar, 2002) 在菲律宾学生们中施测了3个在本土开发的菲律宾人格问卷和 NEO-PI-R 的菲律宾语翻译版。他们的结论是:

(a) 大多数菲律宾的维度被包含在五因素模型 (FFM) 之内, 因此可能不是非常具有文化特定性 (specific); (b) 一些本土的概念未能在五因素模型中得到很好地说明; 西方文化中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概念, 但可能在菲律宾人中这些概念特别突出或者它们组织起来的方式有所不同; (c) 在菲律宾人中, NEO-PI-R 五因素模型的结构得到了很好的重复; (d) 在预测一些与文化相关的标准时, 五因素模型之外加入的菲律宾问卷使预测效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p. 89)

这样一个意在通过与西方标准的五因素模型测量方法进行近距离的比较, 从而发现是否存在本土独特的人格概念的广泛而细致的研究, 仅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结果（仍见 Yang 和 Bond, 1990）。因此，菲律宾问卷并没有在非菲律宾的文化群体中进行翻译和检验。

然而，在中国，张妙清等人（Cheung, Leung, & Zhang, 2001）在三个独立的研究中（Cheung, Leung, Fan, Song, Zhang & Zhang, 1996），让被调查者完成 NEO-PI-R 和中国人人格测量表（CPAI），为一个本土人格维度的存在提供了明显证据。他们把这个额外的维度，称为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edness）维度：

这个因素最初被称为中国传统因素，它由特地为 CPAI 开发的几个本土人格量表组成，包括人情（关系导向）、和谐性和面子。另外，灵活性在这一因素上呈负向负荷。这些人格量表的特征反映了：对工具性关系的强烈导向；对个人占据适当位置、从事适当活动的强调；对内部、外部及人际冲突的回避；以及对规范和传统的坚持。（p. 425）

在这个维度中存在着强烈的等级和集体主义逻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坚持传统”的强调。任何有关个体对情境中标准化要求做出回应的社会行为理论，都将从判断行为者的倾向这一点上获得收益。知道了何为适当规范的知识后，心理学家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预测个人行为的可行方案。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个人际关系因素在非中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中是否也能被分离出来。张妙清等人（Cheung, Cheung, Leung, Ward, & Leong, 2003）在新加坡人和美国白人（Caucasian-Americans）中使用了 NEO-FFI（测量大五的简略方法）和 CPAI 的英译版，此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证据。他们的结果与先前在中国人中得到的一致，进行联合因素分析后出现了第六个独立的人格维度，被确认为人际关系的维度。正如研究者们提出的那样，“西方工具中人际关系的缺位可能‘指出了（西方的人格理论中的）一个盲点’，明确地说，在西方人格理论中，对依赖的关注相对较少”（p. 450）。另外，这样的一个维度对社会心理学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社会情境本身就被大多数当代的社会行为理论家所忽视。事实上，极少有理论聚焦于社会行为而非认知过程的。如果我们希望解释行为，则在人际影响、标准化环境作用方面对

人格进行测量将是最有用的。张妙清等人提出了未来的方向,“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通过考查不同文化情境中外显行为间的相关性,来验证人际关系维度”。(p. 450)

专栏 7.4

说两种语言的人有两种人格吗

在不同文化中评定人格结构时,任何人格问卷都需要翻译成施测地所使用的语言。通常要由精通这两种语言的人将问卷翻译为目标语言,再由目标语言回译为原来的语言,比较其中的差异,从而保证翻译过程中的准确性。为了对翻译准确性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还可以使用这些问卷的原始版本和翻译版本在不同的双语者中进行测验(例如:McCrae, Yik, Trapnell, Bond & Paulhus, 1998)。在对两种语言的群体进行比较时,可以用双语者在特质或维度上分数的差异,来调整两个群体的得分。

解决这些差异的另一种方法,是把双语者在两种语言中的差别看成他们的双重人格——在每种语言中各表现一种人格。这一逻辑最早被艾尔文(Ervin, 1964)运用。她在说法语和英语的双语者中进行了主题统觉测验(TAT,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并提到“这些(关于两种语言内容差异的)发现意味着我们的被试有两种人格吗?回答似乎是肯定的,至少在人格包含言语行为的意义上是肯定的……”(p. 506)。最初促使将人格转换作为语言产物进行研究的是沃夫(Whorf, 1956)的语言相对假说(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他认为,不同的语言会提供不同的世界观,因此语言的变化将造成人格的变化。最近,研究者们按照他们所谓“文化构建假说”(culture framing hypothesis)建立了“人格转换”(personality shift)的框架(Hong, Morris, Chiu & Benet-Martinez, 2000)。他们的论据是,双语者是双文化者,即他们已经内化了两种文化,也内化了与两种文化体系相一致的人格。人格问卷采用的语言,提示了在该文化中适宜的人格,因此双语者的人格会有明显的变化,在使用第二语言时,会更像以此为母语的人的典型人格。例如,拉米雷斯-艾思帕沙等人(Ramirez-Esparza, Gosling, Pennebaker, & Benet-Martinez, 2004)比较了说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双语者在大五问卷中的反应(Benet-Martinez & John, 1998)。在使用第二语言英语进行反应时,这些双语者“比使用西班牙语时更加外向、宜人和有责任心,这些差异与在两种文化中发现的人格差异一致(尽管不如在两种文化中发现的显著)”(p. 19)。

专栏 7.4 (续)

这种把第二语言当作第一语言使用时,在反应上更靠近该语言文化群体的变化,被称为“跨文化调适”(cross cultural accommodation, Bond 和 Yang, 1982),这在很多研究中都有发现(例如: Harzing & Maznevski, 2002)。然而,有时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民族肯定”(ethnic affirmation),也就是双语者没有靠近他们第二语言的文化,而是作出比其自身文化中的典型成员更强烈的反应(Yang & Bond, 1980; Bond & Cheung, 1984)。特定的语言变化能够在两个方向上引起人格的变化。但双语者的人格怎么会有这么大变化呢?似乎更明智的做法是将双语者在第二语言问卷中的反应视为他们无意识的、面向使用这一语言的典型群体的自我呈现。双语者对于第二语言的文化越熟悉,调适性变化越可能在他们身上出现。然而,如果出现文化冲突,他们将通过过度反应来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这种行为的强度,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第一语言想要表达的认同感的强度。

人格的跨文化差异与文化内差异

在讨论 36 个国家中大五维度上的平均分时,艾里克和麦克雷(2004)提醒我们,“这些平均分数当然不能表现出每个个体的特征,但它们的确提供了关于典型人格特征的一种认识,这使跨文化互动更加容易”(p. 25)。在面对这些经过正确计算得到的国民均值时,我们必须谨记它们来自个体反应,这些反应本身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群体中显示出相当大的差异。

正如普尔廷加和范赫梅特(Poortinga & van Hemert, 2001)所指出的,来自很多国家的人在一个给定的人格测验中的分数构成了一个个人分数矩阵,其变异可以表达为国家间的差异和镶嵌于国家内的个人之间的差异。国家间的差异是指在人格的某个方面上,我们所说的国民均值或国家均值之间的差异;个人间的差异是指在人格的那个方面上,国家内部分数差异的平均值。将国家间的差异表达为分数矩阵总差异的一定比例,得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

在包含了艾森克人格问卷四个量表分数的数据组中(这一数据组包含了来自 38 个国家的 153 项研究),得到了(对于这一比例

的)估计:在精神质上为.14,在外向性上为.17,神经质上为.16,在说谎量表上为.25……对施瓦茨的价值观量表中的10种类型进行了相似的计算(Schwartz, 1992),基于来自38个国家的学生和教师的样本,(这个比例)在刺激寻求上为0.06,在顺从上为0.21。(p. 1045)

这些结果是令人惊讶的,也是重要的,因为跨文化心理学家倾向于牺牲个人差异来强调文化上的差异。他们可能忘记了用来说明差异的平均分数本身就是从个人分数的分布中得来的。文化差异仅仅是揭示泛文化数据矩阵中全部差异的一个途径。对于人格与价值观,文化内的差异实质上要比文化间的差异更大。这个发现清楚地暗示着:采用具有跨文化有效性的测量方法在个体层面上进行跨文化研究,通常将比在国家层面上比较平均分数更富有成效。在第6章中,我们回顾了以这种方式对文化“拆包装”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中使用了对自我诠释和价值观的测量。对大五的研究,使采用人格分数进行与之相似的研究成为可能。

将跨文化差异的大小与个体差异的大小进行对比,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相对而言,哪些(个)变量的跨文化差异更大?举例来说,在普尔廷加和范赫梅特(Poortinga & van Hemert, 2001)的研究结果中,为什么在顺从方面的总差异中,跨国差异占的比例比在刺激寻求方面的相应数据高这么多?这些国家中,是什么使顺从这种价值对于社会变化更具响应性?尤其是,社会规范和传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附加在刺激寻求上的价值是否来自于更平均分配于世界不同文化间、属于一个总体的气质性特征?附加在顺从上的价值是否产生于各种社会关系的等级化,而此等级化程度在世界各文化间的分布存在很大差异?人格中的哪些特征更能抵御社会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又是为什么?更一般地说,对人格与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现在应当如何加以概念化?专栏7.5中提供了两种相对照的观点。

专栏 7.5

人格与文化价值观

人格与价值观在国家水平上的得分，使对二者间相互关系的检验变得相当容易。霍夫施泰德的全部四个维度都与大五人格中一个或更多维度上的分数显著相关：

大五维度	权力距离	不确定性规避	个人主义 (对集体主义)	男性气质 (对女性气质)
外向性	-.57		.64	
尽责性	.52			
对经验的开放性	-.39			.40
神经质		.58		.57
宜人性		-.55		-.36

注：这些相关的方向指的是括号外的变量

霍夫施泰德和麦克雷 (Hofstede & McCrae, 2004) 就如何更好地解释这些相关进行了辩论。麦克雷认为人格中有很强大的基因成分，因此他认为，一个国家中某种基因特征的优势，将适应当地主要人格类型的文化发展。经过几个世纪，那些在人格上与此不太适合的人也更可能移居国外。霍夫施泰德承认人格可能存在一些遗传基础，但他还指出，在大国中人格类型的差异以及民族起源的差异表明，必须要寻找产生文化差异的其他原因。比如我们可以预期，在某个特定文化情境中长大的人，社会化的过程将使他们的人格以在文化上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

资料来源：Hofstede & McCrae (2004)。

未来的方向

过去的十年中，在建立有效的方法进行跨文化的人格比较方面取得的进展，为我们打开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我们接下来要探究一些这样的进展。

作为一种关系导向的人格

菲斯克 (Fiske, 1991) 在对一个西非的民族志学田野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关系模型”理论 (relational models theory)。“这个理论认为, 人们用四种基本模型来解释、建立和评价与他人的关系。这些模型被理解为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认知结构, 人们按照各自本土文化中提供的执行准则和参数, 通过这些结构来调整他们的人际生活” (Caralis 和 Haslam, 2004, p. 398)。这四种模型是:

共同分享 (communal sharing, CS) 的关系基于一种双方是平等、无差别并且共享一个身份的理解, 这种关系常见于情侣、家人和运动团队中。平等匹配 (Equality matching, EM) 的关系多见于朋友之间, 这种关系以一种平等主义的平衡感为基础: 人们记住恩惠和义务, 通过同样的方法回报对方、在劳动中平等分工和互相轮换以达到一种平衡。权威等级 (Authority ranking, AR) 关系常见于等级化组织中以及父母与孩子之间, 以地位不对称为基础, 一个人指挥并掌握主导权, 其他人跟随和服从。市场定价 (Market pricing, MP) 关系遵循比例性股权的原则,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投入的时间、金钱和努力寻求合适的并且是工作群体中普遍的回报率。(Caralis & Haslam, 2004, p. 398)

研究者们已经说明, 在美国, 这四种关系倾向于与大五维度上的不同人格相联系。然而, 有人可能认为人格恰好包含在一个人的人际关系风格之中, 并认为人际关系导向的社会心理学应当对这些关系导向进行评价, 并以此作为一个研究起点。将这一工作引入跨文化领域是合乎逻辑的, 因为在我们已经检验过的国家类型中, 使用的维度似乎能在这些关系风格上找到相似的定位。例如, 人们在人际动机和行为中对权威等级的偏好, 可能更频繁地出现在施瓦茨 (1994) 的等级维度和彭迈克等人 (2004) 的社会性犬儒主义维度上得分较高的国家中。使用哈斯拉姆和菲斯克各种形式的关系问卷以及哈斯拉姆等人的关系特征量表 (Relationship Profile Scale) 进行的跨文化比较将在跨文化的社会心理学中呈现和鼓励一种更加“社会的”方法。

运用内隐人格测量

近来,研究者们一直在扩展内隐人格测量(implicit measures of personality)所能评定的概念范围。例如他们用主题统觉测验(TAT)评价亲密动机,用与自我正、负效价的联想评价内隐自尊(implicit self-esteem)(Greenwald & Farnham, 2000)。在预测一些重要的结果时,典型的做法是使用有关价值观、信念和自我诠释的外显方法,而内隐方法的加入,能够提高外显方法的预测能力。举例来说,麦考利等人(McAuley, Bond, & Ng, 2004)发现,通过对合群动机进行内隐的TAT测验,对中国香港在职成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效果比只对特质、价值观和努力进行测量时要高。霍弗和查西奥提(Hofer & Chasiotis, 2003)结合内隐和外显(explicit)的方法测量成就和亲密动机和合群动机,以提高它们对赞比亚成年男性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效果。

考虑到内隐人格测量的额外价值,跨文化心理学家们要把这一方法结合到他们的测验工具包中的动机很清楚。这种主动性的另外一个激励来自科恩,他曾经提醒过我们,很多行为中的文化差异可能是由自动化的过程驱动的。他作出这个判断的过程是:

因为首先它们既不是这样被过度学习的,(也从未被外显地传授过),它们可能完全避开了意识过程。我们口头的报告和判断,无疑依赖于意识水平的过程,因此它们可能从未与体现在我们前意识中的文化规则取得联系。(p. 126)

因此,对于跨文化社会心理学家来说,回归到内隐测量,可能对于触及这些指导行为的无意识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内隐测验的使用对实验者提出很高的要求,因为要对被试的答卷进行记分并达到足够的评分者内部一致性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通常需要经过相当长的训练,正如精神分析传统中的研究者们最初开发这套测验时的情形一样。当内隐方法在跨文化的领域中应用时,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强加式客位的测验材料和任务要求在研究中对被试的分数在相关构念的层面上进行解析,而这些材料和人物对于一个新地区中的被试来说,通常是不熟悉的,甚至是胁迫性的。霍弗和查西奥提

(Hofer & Chasiotis, 2003) 在赞比亚的成年男性中使用了主题统觉测验 (TAT) 卡片, 他们发现每张卡片引起的线索强度 (即意象的数量) 有所不同, 这与预期的一致, 但是他们发现, 与德国人样本相比, 每张卡片的线索强度也是变化的。显然, TAT 卡片中描绘的“相同”情境对于三个基本动机有着不同的激发能力, 恰如文化可以决定特定情境的不同意义一样。

直接进行的跨文化比较要求 TAT 卡片具有相同的“线索强度”。考虑到传统 TAT 测验材料的这一不足, 霍弗和查西奥提 (Hofer & Chasiotis, 2004) 一直试图使图片的线索强度相等, 从而为 TAT 测验和他们最近使用的操作性动机测验 (Friedlmeier, Hofer, Chasiotis, Campos & Nsamenang, 2004) 提供“无偏见”的图片。如果他们能解决这一问题, 他们就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将来就可以把这些内隐测验与外显测验结合起来使用, 提高我们测量人格的水平。

建立“如果—就”的社会行为模型

人格差异驱动行为这一逻辑, 可能不像我们在本章开始时说得那么简单。从米切尔的那篇经典的文章开始, 这个学科就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不仅只包括行为者人格信息, 而是能够预测更多可观察的行为模型。与我们前面的讨论一致,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就是将对情境的测量加入到预测模型中。霍根认为, 情境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其他人, 这些人或是行为者互动的对象, 或是行为者想像中的参照群体。这些他人的特征, 可以由他们被知觉到的人格特征 (Bond & Forgas, 1984)、在互动中他们被期望运用的人际规范 (Ohbuchi 等, 2004) 或者围绕行为表现本身的社会规范 (Heise & Calhan, 1995) 来加以描述。

以我们在这本书中要探讨的主题而言, 关键的情境变量是文化情境。一个高外向性的人, 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 其行为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一致? 我们已经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个体的自主性。因此, 外向性的行为需要在一个特定文化的具体限制中表现出来。角色理论提供的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出文化对个性表达的塑造方式: 加入行为者对互动情境的评价 (Forgas & Bond, 1985), 或作为互动特点的角色关系 (McAuley, Bond & Kashima, 2002), 或行为者对所

处环境的信念 (Leung & Bond, 2004), 就可以更完整地对行为进行解释。这些可能在预测社会行为中作为补充的内容, 在不同的国家群体中显现出不同, 因而它们可能是解释不同文化的社会过程时的重要补充。先不用说, 情境中有哪些因素是重要的, 我们的预测模型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公式: 人格预测行为。相反, 这方面的研究要从索达和米切尔 (Shoda & Mischel, 1996) 用于解释行为的“如果—就 (if-then)”模型开始。其中, “如果”包括行为者的人格特征以及他或她所面对的情境。

作为第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当一个相对内向的儿童进入不同国家的学校时会发生什么事。陈和他的同事们比较了中国、巴西、意大利和加拿大的 2000 名 9 到 12 岁儿童的上学经历 (Chen, He, De Oliveira 等人, 2004; Chen, Zapulla, Lo Coco 等人, 2004)。与其他的儿童比起来, 他们对于“害羞—敏感”儿童的经历尤其感兴趣。抽样国家既包括强的集体主义国家, 也包括强的个人主义国家。儿童们要报告对自己能力和孤独感的知觉, 同时社会行为的信息是通过指定同伴和老师的评估来测量的。研究发现“害羞—敏感”与自我报告的孤独感正相关, 与自我报告的社会能力负相关。这种效应在加拿大最显著, 巴西和意大利次之, 在中国则完全没有发现这种效应。在中国, 感到孤独的是那些有攻击性的孩子, 而不是害羞的那些孩子。消除了默认反应偏差之后, 各国中总体的孤独感水平并没有差异。因此, 在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中, 儿童在学校中同样可能感到孤独, 但在更加个人主义的国家中, 害羞与敏感并不是造成他们在学校中的劣势的原因。

弗里森 (Friesen, 1972) 在日本人和美国人中进行的关于公共情境和私人情境中情绪表现的研究, 也显示出了不同国家在对情境变化做出反应时可能存在的差异。当这个情境的变化与人格的变化相结合时,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在各个文化中发现的人格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来揭示出文化动力学的差异。在跨文化研究的文献中, 能够提供直接证据的研究非常少。在第 6 章中, 我们讨论了松本 (Matsumoto, 2002) 等在情绪表达的情境效应方面的发现。近来, 奥诗等人 (Oishi, Diener, Napa, Scollon, & BiwasDiener, 2004) 调查了日本、美国和印度学生处在五个不同的日常环境中时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表现。他们得到的各项有趣发现

说明了文化对情境效应的作用。比如,与个人主义国家的学生相比,集体主义国家的学生和他人一起相处时比他们独处时表现出更多积极感情。这个研究依靠的是对情绪的报告,而不是人格测量,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了对文化效应“拆包装”并不是单靠运用人格,而是要运用人格—情境的相互作用。

小 结

心理学家们试图通过对不同文化中个体的典型人格评价,来解释这些文化中典型行为的差异。由于早期测量人格的工具不可靠、缺乏经验,使得在这方面进行的早期尝试令人沮丧。过去30年中心理测量的发展,使心理学家们得以在很多不同国家中使用大量人格问卷的翻译版本。由于这些问卷的结构已经在不同的国家中被证明是等价的,人格心理学家们现在可以比较不同文化群体中人们特征的差异,也就是他们的国民均值。

这项工作的结果与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中进行的词汇研究,共同表明人格可以通过五个维度进行描述——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以及对经验的开放性。这些个人差异特征似乎是泛文化的人际与社会的机能,因此,特定国家中个体的典型人格特征,代表了个国家对其特定生态历史挑战所做出的应对。现在可根据不同国家中典型成员在大五人格维度上的位置来对他们加以比较。

对中国人人格进行的本土研究说明,大五人格不能完全代表人格差异。第六个维度称为“人际关系”,并且在其他非中国的群体中也发现了这一相同的维度,因此人际关系成为五个基本维度的重要补充。这个维度可能在更加集体主义的文化中尤其合适。对人格进行内隐测量的方法也得到了改进,并在不同文化中得到使用。已有研究表明,这种方法的加入,能够提高外显方法的预测能力,如在预测生活满意感时。人格研究方法中的这些改进,不断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中相关信息的补充,有助于对个体的社会行为进行更准确的预测。

拓展阅读

1. Cheung, F. M. , & Cheung, S. F. (2004). Measuring personality and values across cultures: Imported versus indigenous measures. [www. wvu. edu/ ~ culture](http://www.wvu.edu/~culture)
2. Church, A. T. (2001). Personality measurement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p. 69, p. 979 – 1006.
3. Church, A. T. , & Katigbak, M. S. (2002) Studying personality traits across cultures: Philippine examples. [www. wvu. edu/ ~ culture](http://www.wvu.edu/~culture)
4. Hofstede, G. , & McCrae, R. R. (2004). Personality and culture revisited: Linking traits and dimensions of cultur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p. 38, p. 52 – 88.
5. Hogan, R. , & Roberts, B. W. (2000). A socioanalytic perspective on person/environment interaction. In W. B. Walsh, K. H. Craik, & R. H. Price (Eds.), *New directions in personenvironment psychology* (pp. 1 – 24).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6. McCrae, R. R. (2002).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www. wvu. edu/ ~ culture](http://www.wvu.edu/~culture)
7. Triandis, H. C. , & Suh, E. M. (2002). Cultural influences on personalit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p. 53, p. 133 – 160.

思考题

1. 在不同国家中，人们观察到了哪几类人格差异？
2. 在不同国家中观察到的人格差异，在证明国家因素对国民人格的影响上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3. 如果人格差异大多发生在个体层面上，如何科学地描述国家的“人格”？
4. 如何解释“欧洲和北美国家的性别差异比世界其他地区大”这一发现？

8

与他人沟通和建立关系

“当我使用一个词时”，大胖蛋用相当轻蔑的语气说道：“它只表示着我想让它所要表示的意思——不多也不少。”“问题是，”爱丽斯说道：“你是否能让一个词有那么多不同的意思。”（《爱丽斯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刘易斯·卡罗尔）

在前面数章，我们已经确定了几种能够描绘文化差异中个体特征的方法。我们有好几种有效的测量方法，有人称之为“心理软件”（the psychological software），可以测量价值观、信念、自我诠释、人格和情绪体验。现在，我们把重点从内在心理转到人们如何与他人建立关系的问题上。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强调几个文化取向方面的早期研究，因为这可以使我们在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际关系的各项变异“拆包装”时，再次认识到涉及个体差异的理论的重要性。

沟通的类型

言语沟通

我们预期人们的文化取向会反映在与他人的沟通方式中，包括言语沟通和非言语沟通。在特定文化背景中成长的人将会经历社会化过程，其内容包括对别人谈话中的各方面的关注，哪些是值得说的，什么时候说，以及怎么说等。也许完成这一系列复杂过程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是整合不同语言系统中习语的使用。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鹿岛等人发现在

个人主义国家中，人们更强烈地要求使用人称代词“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通过语言对生活经验做出分类方式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众所周知，因纽特人有很多描述雪的词，显然他们要比其他人更多体验到雪的细微差别。人类学家对亲属称谓词（kinship term）的分类非常感兴趣，这些词反映了亲属关系的重要性级别。例如，土耳其有三个叔叔称谓词和三个阿姨称谓词，分别表示不同的关系，表明这一关系是通过父系一方的或是母系一方的，或是通过婚姻关系而形成的。同样，一些语言要比另一些语言有更多的表示尊重和等级的词汇。如日本有三个不同水平的礼节，并且要求女性和男性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说话。

目前还没有研究能够证明语言的这些特点与文化维度上的国家分数（如：权力距离）之间是否有任何系统性的关系。有意思的是，芒罗等人（Munroe, Munroe, & Winters, 1996）发现世界上热带国家的语言与寒带国家的语言是不同的。热带国家的语言有很多交替的元音和辅音（如马拉维、马来西亚和巴拿马），而寒带国家的辅音则要多得多（如英语单词 awkward、screech 和 stretch）。热带国家语言由于其规则性而更容易解码，芒罗等人认为这是为了使更长距离的户外沟通能够更容易地进行而不断演化形成的。而寒带国家的语言则更像是在室内或有遮蔽的地方使用。然而，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语言的使用地区，已经与该语言最初发源地之间没有太大关系了。

语言在说话的不同部分的相对比例也不同。塞明等人（Semin, Gorts, Nandram, & Semin-Goossens, 2002）预测，在以关系和依赖性为主的文化中，情绪是一种关系的标记，并且会更经常地表达为具体的动词。相反地，在情绪服务于自我认同的文化中，情绪更多地作为抽象的名词和形容词来使用。就像预测的一样，他们发现在印度语和土耳其语中，动词出现的频率更高；在荷兰语中，名词和形容词出现的频率更高。由于在认知上动词比形容词和名词更容易提取，不同语言可能启动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效应的存在，关于语言对认知的作用，有漫长的争论历史，如专栏 8.1 所示。

专栏 8.1

语言影响认知吗

1956年，莱恩伯格和罗伯茨报告了语言和认知之间的联系。他们比较了只会讲美国土著语言祖尼语（Zuni）的被试和哈佛本科生对颜色的记忆。在祖尼语中黄色和橙色是一个词，在展示一系列颜色之后，祖尼人不能回忆起哪个颜色是黄色，哪个颜色是橙色。在对同样也缺失一些颜色词汇的热带国家文化群体进行的各种研究中，人们发现了相似的效应。这些研究常被引用为沃夫假设（Whorfian hypothesis）的证据，该假设认为语言制约着我们的思维方式。

热带地区持续高强度的紫外线辐射（UV-B）会导致对绿色和蓝色感觉的缺失，近来这一点已得到验证。林赛和布朗（Lindsey & Brown, 2002）发现，与这种效应相似，英语本土被试在透过模拟此等效果的镜片看颜色时，也会有相似的不能命名的颜色。这说明在一些文化群体中，缺乏颜色名称是不能命名或记忆某些颜色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然而，感觉缺失不能解释所有关于语言效应的研究。土耳其语中有两个关于蓝色的词，蓝色（mavi）和深蓝（lacivert）。研究发现，说土耳其语的被试比说英语的被试能更好地分辨蓝色的深浅。并且，研究表明，通过训练能够提高说英语的人分辨蓝色深浅的能力（Oezgen & davies, 2004）。这个发现说明在土耳其语中一个额外的颜色词的存在，的确在长时间内促进了更高的颜色灵敏度。

资料来源：Au（2004）；Oezgen 和 davies（2004）。

尽管一个人通常只说一种特定的语言，但人们还是需要选择如何表达自己。金（Kim, 1994）提出一个她称之为谈话约束（conversational constraints）的理论，个体希望通过这些方法限制自己所说的话的效果。她提出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会约束自己不要伤害听者的感受，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另一方面，在个人主义文化国家中，个体约束自己使自己表达更清晰。最初的支持证据来自对韩国人和美国人样本的研究。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金等人（Kim, Hunter, & Miyahara, 1996）增加了对自我诠释的测量，并扩大了具体约束的范围。实验要求来自韩国、日本、夏威夷和美国大陆的对一系列想像情境中五种约束的重要性做出评价。对美国被试来说，关于情境任务结果的约束更重要，

并且该效应受被试的独立型自我诠释水平所中介。对亚太地区的被试来说,能够产生关系和睦的约束被评定为更高,而该效应则被被试的依赖型自我诠释的水平所中介。

服务场景涉及不同种类的沟通,如让技术人员修复出问题的电脑,在旅馆订一个晚上的房间,在咖啡馆点咖啡等,都是一些强调依赖型谈话的场景。人们要依靠服务提供者来获得想要的服务。人们想要尽可能快地得到想要的全面服务,并且不冒犯服务提供者,从而能保持关系以备将来之用。陈等人(Chan, Bond, Spencer-Oatey, & Roja-Laurilla, 2004)研究了寻求服务的菲律宾人和中国香港人,研究他们在保持和促进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上存在哪些差异。研究者使用了五种不同服务的场景。他们发现在五种场景中存在很大的差异,当服务提供者拥有提供服务的自由决定权时,服务需要者更关注关系促进。在五种服务场景中,菲律宾人只有在一种服务的情境下比中国香港人更关注促进关系,即电脑维修。在菲律宾,提供修电脑服务的状况使得菲律宾人比中国香港人更依赖于服务提供者。然而,不管何种国籍,施瓦茨自我超越维度的认可均起中介作用。那些更看重人际和谐与和睦的被试更希望通过保全面子、非冲突沟通方式来培养和促进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

金和彭迈克等人的模型都是在个人追求对其行为的约束,以达到其关系目标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然而,他们所关注的形成谈话结果的程序,同样也可以根据文化规范来考虑。尽管对规范层面的文化差异进行的系统研究不多,但存在许多关于集体主义文化偏好和谐的定性描述。如,来自西班牙文化的人据说认可 *simpatia* (Triandis, Lisansky, Marin, & Betancourt, 1984),希腊人崇尚 *philotimo* (Vassiliour & Vassiliour, 1973),它强调内群体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人喜欢 *Rukun* (Oerter, Oerter, Agostiani 等人 1996),而 *kapwa* 是菲律宾人的一个关键概念(Enriquez, 1993)。当让被试回答他们在沟通交流时对操作性规范的知觉时,研究是很容易开展的,并且规范性印象与被试的沟通内容和沟通风格相关。

霍尔早在1966年就已经对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各自所偏好的沟通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霍尔比较了高情境与低情境,通过该对比,他揭示出在个体主义文化中,沟通被当作相对独立的事件,不会涉

及到特定的人际环境背景。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则相反，沟通与其所发生的人际关系相联系，包括双方过去的交往、共同的理解基础以及当时的情境。这种对比影响到沟通表达的方式。例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关系已经建立，而且保持关系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沟通就会不那么明确和直接，因为在情境中包含了不需要用语言来说明的含义。没有必要说出那些关系中一直不变的方面。相反，在低情境文化沟通中，我们期望更多的直接性和更少的含糊性。

霍尔特格雷夫（Holtgraves, 1997）提出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来测量谈话的间接性。两个单独的量表分别测量个体是否间接地说话以及是否揣摩他人谈话中的间接含义。韩国人在两个量表上的得分都高于美国人。使用霍尔特格雷夫的测量方法，桑切斯—伯格等人（Sanchez-Burks, Lee, & Choi, 2003）的研究表明，学习商科的韩国和中国学生要比美国学生更多地考虑间接含义，并且此效应被**依赖型自我诠释**所中介。在夏威夷学生身上也存在相似的中介作用（Hara 和 Kim, 2004）。

古迪昆斯特等人（Gudykunst, Matsumoto, Ting-Toomey, Nishida, Kim, & Heyman, 1996）在霍尔提出的概念基础上发展出一个范围更广的、对高情境和低情境沟通风格的系列测量方法，并且把这些测量方法与自我诠释联系在一起。在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夏威夷和澳大利亚的学生中，**独立型自我诠释**是与运用戏剧化的、感受取向的、准确的、开放的沟通联系在一起的，也与解读间接信息的能力联系在一起。**依赖型自我诠释**预测了更高的敏感性和对沉默的负面态度。如同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那样，高情境和低情境国家之间的比较比金提出的约束模型的应用范围更广泛，因为它不仅关注沟通信息的接收，同时也关注沟通信息的发送。此外，在高情境和低情境对比的基础上，北山等人（Kitayama & Ishii, 2002）比较了日本和美国听众对带有情绪的讲演段落所给予的关注。他们使用一个情绪声调与用词不一致的任务，发现相对于内容而言，日本人更关注语音中的情感，而美国人则更关注所用词汇的内容。

我们需要对在前文段落中已讨论过的研究结果进行谨慎的评价，这对于贯穿全书的一些问题都很重要。如果集体主义文化是高情境文化，那么这些文化中的人们会根据沟通的对象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沟通方式。

当然，在低情境文化中，沟通方式也会随着沟通对象的不同而变化。一个人和自己同伴说话的方式会不同于和一个教师、一个银行经理、一个陌生人说话的方式。然而，在高情境文化中，这样的差异会更大。在这里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分很重要。一般来说，相较于个人主义而言，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在与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互动时，其行为和沟通之间有着更大的差异。我们已经看到**依赖型自我诠释**与不同情境下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不同方式相关。因而，沟通风格的差异在所有情境中都成立的结论面临着挑战。我们也许会发现，在高情境文化中，有些场合的沟通是直接的，而有些场合的沟通是间接的。与已知的内群体成员间的沟通和与外群体成员的沟通之间的差异已经成为特别重要的一个命题。

在第6章，我们已报告过，雷德福特和史密斯提出，在对不同目标表达愤怒时的差异被自我诠释所中介。扩展这一分析，我们有可能将个体差异变量不仅作为沟通过程的**中介变量**，而且作为其**调节变量**来进行研究。因而，举例而言，与较少依赖的个体相比，更为依赖的个体其沟通活动在不同社会情境中表现出更大的差异。尽管所有的人在相同社会情境中均有社会表现的差异，但某些个体会表现出更大程度上的差异。考虑到每一个文化群体都有其独具特色的沟通风格，与另一个文化群体相比，这些个体在特定文化群体中也许更为典型。在跨文化情境中开始运用人格作为效果的**调节变量**，这一做法已经被广泛用来帮助人们解决人一情境的争论（Fleeson, 2004）。这种研究要求非常高，因为它要求在一系列的情境中观察每个参加者，但这种额外的工作会带来额外的科学收获。

古迪昆斯特（Gudykunst, Gao, & Schmidt, 1992）等人比较了中国香港、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学生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沟通。在对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的评定进行对比时，在更集体主义的日本和中国香港学生被试群体中，发现评估存在数项显著差异。这些被试报告有更多对相互的质疑、更多相似的感觉、更多共享的网络、更多感觉到他们即使不通过内群体清晰的沟通也能够了解彼此的感受。而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生在内群体沟通和外群体沟通上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如上所述，这些外群体和内群体沟通结果的差异也许可以通过被试的**依赖型自**

我诠释水平来预测，在每种文化群体中，这一自我诠释的不同强度会中介所观察到的文化差异。

沟通风格的文化差异还有许多方面需要研究。自我报告这种测量方法的效度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他们的互动对象不明确的情况下。对真实会话的样本进行研究可以给予我们更丰富的理解。尼尔森等（Nelson, al Batal, & el Bakary, 2002）分析了埃及人和美国人如何拒绝三种人（地位比他们高、和他们一样、比他们低的人）所提出的请求。结果发现，埃及人表达得最直接。但是在对待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时给予更大的尊重这一点上，两个国家的人没有显示出差异。在一项早期的类似研究中，尼尔森等（Nelson, al Batal, & el Bakary, 1993）关注恭维的给予。结果也发现埃及人和美国人一样直接。埃及人的恭维更为精致，常常使用隐喻。

埃及人喜欢直接的沟通风格这一发现是很重要的。它说明了在把一些集体主义文化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得到的结论推广至所有集体主义国家是有风险的。也许东亚被试中发现的间接沟通形式可更多归因于东亚人的世故、谦虚、保全面子等，而非集体主义。也许还有其他保持集体主义内群体完整性的沟通方式。

非言语沟通

人们会说，过多地关注沟通的语言，这一做法本身就是有文化偏见。至少在高情境文化中，我们讨论过的证据表明，如果拓宽我们关注的方面，包括沟通过程中的各种非言语方面的因素，我们也许会了解更多。这些非言语方面的因素包括面部表情、手势、接近和接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很少利用跨文化理论，它们只提供给我们一些简单的描述性对比。这一领域的研究困难可能来自于我们在第3章所讨论的定义问题。典型的非言语沟通研究主要通过行为观察来进行。然而，如同我们在第3章所注意到的，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可能有不同含义，因此，尽管人们已经做了一些努力（Andersen, Hecht, Hoobler, & Smallwood, 2002），但仍然很难把这些行为与文化的概念整合在一起，这些文化的概念源于发生在我们周遭事件的含义。例如，在较长时间里盯着别人看

的人，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会被判断为表达友善，但在另一些地方却会被认为不够尊重、甚至敌意。李（Li，2004）分析了加拿大和中国学生角色扮演医生—病人对话的录像记录。加拿大同一性别组相互对视是中国同一性别组的两倍以上。我们该怎样理解这个巨大的差异？

接 近

在非言语沟通中，关注接近（proximity）偏好的数据是最多的。华生（Watson，1970）让科罗拉多大学来自31个国家的学生在感觉舒服的距离坐下来并相互交谈。结果发现，阿拉伯和南亚学生坐得最近，其次是拉丁美洲和南欧人，再次是东亚人，最后是北欧人（包括北美人和澳大利亚人）。尽管这个研究有一定缺点，如样本规模小、在搭档自陈他们相互喜欢的程度上存在差异、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抽样国家的范围太广泛并且完全是有倾向性的。萨斯曼和罗森菲尔德（Sussman & Rosenfeld，1982）发现，事先不认识的委内瑞拉谈判者坐得要比美国谈判者近，而后者又比日本谈判者坐得近。这些研究有意思的一点是，不同国家被试呈现出的方式与**依赖型**和**独立型自我诠释**所揭示的不同。尽管东亚国家的人有强烈的**依赖型自我诠释**，但他们倾向于保持一定的物理距离。霍兰等人（Holland，Roeder，van Baaren，Brandt，& Hannover，2004）揭示了一种可能性，至少在欧洲人中，德国学生在坐着交谈时其**独立型自我诠释**能够预测更大的实际空间距离。通过启动独立性，在荷兰学生中也发现了类似的距离效应。

萨斯曼和罗森菲尔德的研究与尼尔森对埃及人的研究结果一样，性别作用与国家之间的差异同样大。类似地，我们可以预期不同文化中不同的性别配对之间的差异，但目前我们对于国家之间在“接近距离”上存在差异所提供的解释，并不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理解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

空间定位

除了简单的距离，人们与其他人的相对位置在不同地区传递着不同的含义。马里奥特（Marriot，1993）提供了日本商业公司关注空间定位（spatial positioning）的证据。通过在日本观察会议的情况，她注意到所

坐的位置代表着每个与会者的相对资历。与此相反，澳大利亚经理在决定坐在哪里时不考虑其地位。这样，他们就无法解读环境线索，这些线索本来可以使得他们与正在会谈的各位日本经理更有效地建立关系。日本人也常常在判断澳大利亚人的资历时困惑不已。

触 摸

霍尔（Hall, 1966）除了区分高情境和低情境文化外，还根据接触的不同，对触摸文化和非触摸文化进行了对照研究。接近使得触摸（touch）和保持目光接触都更容易，而且华生（Watson, 1970）还发现那些坐得近的人更频繁地相互触摸。舒特（Shuter, 1976）在拉丁美洲人中观察到了亲密的接近和频繁的触摸。雷姆兰德等（Remland, Jones, & Brinkman, 1995）秘密地在欧洲六国拍摄人们在公共场合与他人站着谈话的录像。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比法国人、荷兰人、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触碰更多。但是，研究中只关注总体触摸数量未必有用，因为不同类型的触摸可能有不同的含义。为了说明这一含义的不同，迪比亚斯和冈诺（Dibiase & Gunnoe, 2004）观察了波士顿、布拉格和罗马夜总会里的情侣，区分出手接触和非手触摸。从总体上说，男性更多的是手触摸，女性更多的是非手触摸。在意大利和捷克，触摸比在美国更为频繁，捷克人的手触摸更多，而意大利人的非手触摸更多。然而，捷克男性和意大利女性的手触摸频率更高，这一点表明不同种类触摸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不过，总体触摸的数量，尤其是同一性别人的触摸数量也许能说明库查巴莎（Kagitcibasi, 1996a）的关系性—分离性维度。

姿 势

有人已经把西欧 40 多个地区使用 20 个不同手势的频率记录在案（Morris, Collet, March, & O' Shaughnessy, 1979）。有些姿势的使用比其他姿态更广泛。然而很多姿势（gestures）的含义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差异，如“V”标志和“A-OK”手势，以及点头和摇头。我们没有理论去解释这些含义是如何演化的。有一些国家的姿势要比另一些国家更丰富。格雷厄姆和阿盖尔（Graham & Argyle, 1975）发现，意大利人的姿势比其他地方人的姿势更能促进沟通的有效性。姿势的低频率使用

常和更高的正式性联系在一起，因而手势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使用的频率较少。另一方面，鞠躬更大程度上限定于等级文化中，尽管没有在所有这样的文化中发现这一点，因为地位之间的信息可以通过许多其他的方式得到彰显，包括接近、凝视和空间定位。

面部表情

在第6章我们讨论过对情绪表情普遍性识别的证据。然而，我们也许还要从面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s）中做更多的推论。松本等（Masumoto & Kudoh, 1993）让美国人和日本人看微笑和中性的脸部照片。对所有被试来说，微笑的面孔都传递了社交性，但美国人还认为微笑的面孔更聪明。在一个相似的研究中，奥尔布莱特等人（Albright, Malloy, & Qi, 1997）比较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对面部表情的判断。两者都认为微笑的面孔更有社交性，但中国人还认为其缺乏自我控制和冷静。这样，在对微笑的反应及其对微笑含义的理解方面，证明了既有普遍性又存在着文化差异性。

沉 默

人们经常说日本人大量地运用沉默（silence），例如用它代表不同意，而不必直接反驳。长谷川等人（Hasegawa & Gudykunst, 1998）比较了日本人和美国人对沉默的态度。他们提出沉默可以被看作是高情境沟通中的一个极端例子，在日本的应用频率应该比在美国更高。他们的研究还包括了和好朋友以及和陌生人沟通之间的区分。他们区分出了两个维度：策略性地使用沉默和负面地看待沉默。跟预期的一样，日本人报告了更频繁地陷入沉默，他们对沉默的反应随着和朋友还是和陌生人沟通而变化。日本人对与陌生人在一起的沉默更不自在，而美国人不论是与朋友还是与陌生人都没有区别。美国人要比日本人更多地报告策略性地运用沉默，这与刻板印象中日本人会策略地运用沉默相矛盾。这种刻板印象可能由于美国人观察日本人的情境时，把自己的文化逻辑投射在日本人身上所致。然而，长谷川认为他们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因为低情境文化的美国人在沉默时会有更多的自我意识，而日本人较少自我意识，因而日本人将视沉默为自然而非策略性的。

贾尔斯等人 (Giles, Coupland, & Wiemannn, 1992) 发现, 美国人和中国人对待沉默的态度上有同样的情况, 尽管他们发现芬兰人对待沉默甚至要比中国人更自在。在很多社会中都有的一些俗语, 如土耳其语中就有: “说话是银, 沉默是金”, 反映了对三思而后行、谨言慎行以及对言多必失等传统价值观的支持。说话在所有社会生活中都是一个如此基本的要素, 以致于人们会猜想是什么文化动力造成不同文化群体间对沉默的不同理解。

情绪表露

非言语表达常与各种情绪的体验联系在一起, 而每一种情绪都有可观察的行为作为其典型特色。王和彭迈克 (Wong & Bond, 2005) 在沃尔玻特等 (Walbott & Scherer, 1996) 创建的 ISEAR 数据中, 检验了 30 个国家中人们表达快乐和愤怒经验的特点。情绪反应由言语、非言语和动作反应来测量。在所有国家中, 他们发现快乐比愤怒能引起更多的言语反应、更多的非言语反应以及更多朝向另一方的移动。对快乐和愤怒而言, 感觉到的情绪强度和对情绪表达加以控制的愿望都影响了情绪反应的类型和程度。尽管 30 个国家的情绪强度、对情绪控制的愿望和对情绪反应之间的联系强度是一致的, 但根据表达类型的不同, 在控制愤怒的愿望和愤怒表达上仍有差异。这样, 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说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富于表现力; 情绪的表达取决于情绪的强度和利用特定渠道对某种情绪表达加以控制的社会化过程。

沟通中的成功与失败

前面的部分我们回顾了言语沟通和非言语沟通, 发现相关的文献缺乏一致性, 因为大多数研究不是建立在理论累进发展的基础之上。另一个研究沟通的途径是建立和测试关于沟通成功与失败的理论。关注领导和谈判等过程的具体的理论将在第 9 章予以讨论。这里我们讨论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方法, 这一方法探索与面子、礼貌和难堪有关的现象。沟通过程的当事人对达到沟通目的这一点上有共同的兴趣。如古蒂 (Goody, 1978) 所写:

有效互动的基本制约在所有文化和语言中都是重要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人想要达到目标，必须确保与其谈话对象合作。而想要达成合作，他必须避免与他的听众对抗。(p. 6)

礼 貌

达成和维持合作的第一步是在沟通时的举止能够被另一方判断为适当和礼貌 (politeness) 的。霍尔特格雷夫等人 (Holtgrave & Yang, 1990, 1992) 比较了韩国和美国学生在涉及地位差异和关系亲近度时习惯用语中表达要求的方式是否有礼貌 (如, “去, 拿信去”, “您介不介意去取信?”)。美国学生表现出“用更礼貌方式说话”的较高偏好, 并且更喜欢这样说。霍尔特格雷夫等认为美国学生与韩国学生相比, 认为他们与提出要求的对象距离更远。更远的距离要求更多的礼貌。地位和亲近程度的效应在每个样本群体中相对而言比较相似。但是如同我们所预期的那样, 当选择用何种程度的礼貌时, 韩国学生要比美国学生更多地考虑情境的变化。安拜蒂等人 (Ambady, Koo, Lee, & Rosenthal, 1996) 同样对韩国人和美国人样本的互动录像进行编码。通过比较同样的声音和录像编码, 他们发现, 根据特定情境所要求的礼貌程度, 在非言语和语言行为中会有差异。与在本章前文回顾的研究相一致, 韩国人的礼貌策略还是更多地被情境中的关系所影响, 而美国人更多受到对方所用语言是否礼貌的影响。

当然, 不是所有的沟通者都希望表现得彬彬有礼。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 对什么是侮辱的判断可能存在差异。我们也许可以预期, 在个人主义国家, 侮辱直接指向被冒犯者个人; 而在集体主义国家中, 侮辱可能还会聚焦于被冒犯者所属的群体。厄斯库和塞明 (Uskul & Semin, 2004) 比较了荷兰语和土耳其语中的侮辱语。尽管两国语言中大多数侮辱语都是指向个人, 但是在土耳其语中有更多的“关系”侮辱语, 而土耳其语被人们认为有更多的集体主义文化情境。土耳其侮辱语更多指向与被侮辱者有亲近关系的人, 尤其是那个人的母亲 (如, 各种指向该母亲的想像的性行为), 更多的时候是关系性的 (如她是没有教养的或不可靠的)。荷兰侮辱语更多指向疾病或指向与外群体的成员关系 (如你人老, 长得丑, 属于一个少数民族)。而且, 当被问及如果某人侮辱

了你的母亲，你觉得被冒犯的程度时，土耳其人的反应会更强烈。

面 子

礼貌策略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失败，其所属群体可能会丢面子（face）。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如果是我个人的策略失败，只有我自己会冒丢面子的风险，除非我能够采取一些防御性的面子功夫（defensive facework）来减轻问题。戈夫曼（Goffman, 1959）第一个分析了西方情境中的面子功夫，他区分了一系列能够减轻或挽回丢面子的行动。在集体主义情境中，情形变得复杂。廷一图米（Ting-Toomey, 1988）提出了一个考虑到集体主义情境的面子谈判理论（a theory of face negotiation）。她的理论强调，如果我的身份是由我的团队来定义的，而非由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来定义的，那么我丢面子也会引起你丢面子，因而你和我就有避免丢面子的共同利益。集体主义群体对和谐的偏好使得人们更加注意预见或预防在两个人之间或在一个群体内丢面子。因此，对情境和间接沟通风格的关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预防性面子功夫的形式。

集体主义文化中所使用的语言反映了对面子的关注。比如，中国有脸和面子两个词。脸指个人或道德的正直，而面子指一个人在与他人关系中所表现出的社会脸面（Ho, 1976）。面子相当于韩语中的 *chemyon* 和日语中的 *mentsu*（Choi & Lee, 2001）。在廷一图米和她同事的研究中，他们检验了跨文化中的面子谈判理论，这些概念所指包括自我面子和他人面子，并提出了第三个概念“共同面子”。他们用一个新的英语词汇以充分表达这些概念，充分说明任何一种语言不能完全抓住另一种文化的各个方面。既然这样，英语——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语言，就不能包含集体主义关系关注的复杂性，除非为这些复杂性创造合适的词汇和这些词汇之间的联系。

奥策尔等人（Oetzel, Ting-Toomey, & Masumoto, 2001）比较了中国、德国、日本和美国人在人际冲突时采用的自我诠释、面子关注和面子功夫策略。如同所预期的那样，他们发现，在所有文化中独立型自我诠释与自我面子关注（self-face concern）相联系，而依赖型自我诠释与他人面子、共同面子关注（other-and mutual-face concerns）相联系。奥

策尔和廷一图米 (Oetzel & Ting-Toomey, 2003)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对自我面子的关注, 以一种被称为“专横面子”的形式, 对国家差异起完全中介的作用。换一句话说, 对自我面子的威胁可以通过将责备转移给另一方而加以转移。相反地, 对他人面子的关注以被称为“回避或融合的面子”形式对国家差异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换一句话说, 对他人面子的威胁可以通过忽略其冲突或寻求共同解决的方式来转移, 而且他人关注水平高的个体更喜欢用和事佬的面子功夫策略。

尴尬

当面子功夫失败时, 某种程度的尴尬 (embarrassment) 就产生了。辛格利斯等人 (Singelis, Bond, Sharkey, & Lai, 1999) 在中国香港、夏威夷和美国大陆学生中施测了一个尴尬量表。在所有的样本中区分出两个因素: 自我尴尬 (self-embarrassability) 和共感尴尬 (empathetic embarrassment), 后者指个体为他人未能达到社会期许而感到的羞愧。这种区分与廷一图米的自我面子、他人面子相类似, 提供了更进一步的例证, 这说明源自集体主义研究中的概念也可以应用于个人主义文化, 并对个人主义文化也是有用的。如所预期的一样, 美国白人在尴尬量表上的得分低于亚洲—美国人和中国香港人。辛格利斯等人的研究还测量了独立性和依赖性, 表明低独立性和高依赖性分别对自我尴尬和共感尴尬上的群体差异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我们还需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面子和尴尬, 因为在任何一种文化中, 它们植根于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嘲笑和羞耻是一些社会化的策略, 长久时间之后, 就形成对他人的窘迫感和对面子的关注。看来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更倾向于运用羞耻的策略, 在这种文化中其他人的评价更加重要, 而责备 (慢慢灌输一种有罪感)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更加突出。例如, 康罗伊等人 (Conroy, Hess, Azuma, & Kashiwagi, 1980) 比较了美国母亲和日本母亲针对孩子行为不当时所说的话。日本母亲强调不当行为会引起的感觉以及对他人的结果, 用诸如此类的话: “如果你表现不好就会惹恼他们。”而美国母亲常指出孩子违反了本应内化的规则和权威, 用诸如此类的话: “你应当更明白这一点。”前者强调依赖和对他人的关注, 而后者强调独立和责任。

与他人建立关系

假以时日，在这一章我们已经考虑过的这些沟通程序，将建立不同类型的丰富社会关系。而这些会形成亲近和分离维度等概念，用我们在第5章已讨论过的名词来说就是人际距离维度。内群体和外群体关系的区分会使得与他人关系的差异清楚明白地显现出来。在关注那些各种显著的内群体关系细节之前，我们先思考一下与陌生人建立关系的文化差异。

陌生人

早先的研究证实了旅行者的主观印象：世界一些地方的人们比另一地方的人更愿意帮助陌生人。例如，费尔德曼（Feldman, 1968）报告：对于要求帮助的请求，在雅典要比巴黎和伦敦有更高的反应。然而，要了解这样的差异，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匹配地点和求助程序，并包含更多的国家样本。莱文等人（Levine, Norenzayan, & Philbrick, 2001）完成了这样一项研究。在23个国家的大城市中进行三项独立的助人测试。在第一个任务中，一个训练过的试验者经过一个行人时偶然掉下一支钢笔；在第二个任务中，当行人接近时，一个看上去显然腿部受伤的试验者掉下一叠杂志，并挣扎着要拣起它们；在第三个任务中，试验者装扮成一个盲人，在人行横道处等待，当信号灯变绿时看谁会来帮助他。

在31个国家中，三个场景中的助人比例呈现中等程度的正相关，产生了一个完整的帮助指数表。助人性在巴西是93%，在哥斯达黎加是91%，在马来西亚和纽约都是41%。在国家层面上对这些巨大差异进行解释时，莱文等人发现没有证据证明差异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相联系。然而，慢的步行速度和不富裕这两个指标能中等程度地预测助人性（Levine, Norenzayan, 1999）。莱文等人还预测西班牙文化中的同情（*simpatía*）认可会带来更高的助人性。在他们样本中的五个西班牙语国家确实助人性更高，但该研究没有包含对 *simpatía* 的任何测量。在其他

跨国研究中也并没有对这种人际倾向的可靠测量，所以无法肯定莱文等人对涉及此种助人行为的心理过程的猜想是否正确。在解释这些结果时也需要谨慎，因为实验中的试验者尽管是一个当地人，但在每个国家样本中由不同的人来担当。虽然如此，该研究关注一个重要的社会行为，强调在解释文化差异时需要更丰富的理论。

在这里，有几个概念也许可以作为潜在的机制，如内群体/外群体的区别，传统的好客规范，对什么是道德行为的不同理解等。例如，米勒等人（Miller, Bersoff, & Harwood, 1990）在比较印度被试和美国被试对道德的推理时，他们发现印度人的道德观特别集中在仁慈和社会责任上，而美国人的道德更多的是用公正和自由（个人选择）来定义的。这些差异对助人行为的发生有明显的作用。

莱文等人的研究本身是对帮助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的一个文化视角的例子，还有很多对陌生人不帮助行为的研究。在第11章我们会讨论到关于偏见和内群体关系的研究。

理解人际亲近度的途径

目前在跨文化研究中的主导概念来自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一现状要求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特别当我们想要了解集体主义成员的行为时尤其如此。但是，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之间的界限应当如何划分？这种划分在不同文化之间有区别吗？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在家人（家庭成员）、熟人（家庭之外的亲戚，邻居、朋友、同学和同事）、生人（陌生人）之间是有区分的（Goodwin & Tang, 1996）。在日本，shin-yu 关系（伴随终生的友谊）据报告与德国人婚姻关系有相似之处（Salamon, 1977）。巴西人区分朋友（dolegas）和亲近朋友（amigos）。专栏8.2给出了日本独有的另一种关系类型：“甘え”。

很早以前，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先驱勒温已就美国人和德国人关于友谊的不同含义做出了评论（Lewin, 1936）。他发现德国人的友谊开始得较美国人慢，但更深、更长久。当前的发现是：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人朋友数量更少，但更为亲近（Verkuyten & Masson, 1996; Wheeler, Reis & Bond, 1989），这一发现似乎指向了相同的方向，尽管今天德国人要

专栏 8.2

“甘之”：一种日本本土的关系类型？

日本人常与另一个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建立关系，在日语中叫做“甘之”。在第一次尝试把这个现象介绍给更多的读者时，多伊（Doi, 1973）把这个词翻译成“溺爱的依靠”。典型的“甘之”情形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年少者向更为年长的人提出要求，这种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视为无理要求，在做出这种要求时常假设要求会被接受，而事实确实是如此。

山口（Yamaguchi, 2004）已对“甘之”做了一系列的研究。最初在日本人中的调查显示有很高比例的被试承认他们在家庭中、工作中和朋友中确实存在“甘之”类型的关系。尽管“甘之”关系大多数源于童年，“甘之”情形在成人中也有同样频率的报告。山口试图定义“甘之”关系的基本组成成分，他让被试评估存在不恰当要求或行为的系列场景中是否存在“甘之”情形。87%的人报告当参与者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要求将被满足时，“甘之”存在，没有这样的假设存在时，则只有很少人报告存在“甘之”。然而，这样的场景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双方是如何来就假设进行沟通的。

山口认为“甘之”在日本提供了一个向上影响的有效工具，并且也许适用于其他集体主义文化，因为集体主义中的本质就是依恋。假定自己的要求会被满足的想法确定了依恋的力量。为了测试他的解释，他向成人被试提供了在陌生情境中孩子行为的描述。这种方法广泛应用于研究婴儿对照料者的依恋。在这一程序中，照料者离开孩子，让其和一个陌生人短暂地待在一起，对孩子与照料者分离和照料者返回时的行为予以观察。跨文化研究已表明婴儿反应的实质性差异（Harwood, Miller & Lzarry, 1995）。山口发现，分离时的反应表现为“安全依恋”特征的婴儿，会被其被试预测为表现出更多的“甘之”行为。与此相反，在西方国家孩子呈现出“甘之”行为会被认定为典型的不安全型（Rothbaum, Weisz, Pott 等, 2000）。

尽管最初设想“甘之”是日本独有的，但是在其他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中也许也会存在与“甘之”相应的概念。例如，在土耳其语和波斯语中就有相似含义的词。

比20世纪30年代更为个人主义（Keller, Lamm, 2005）。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尤其是在美国，喜社交、有很多朋友是件好事。与陌生人主

动接触是件易事，也是友好的一部分，如在大学校园里和路人打招呼。这样，自我的表层更开放或更易穿透，但内层的穿透性更小。另一方面，在集体主义情境中，外层似乎更不易穿透，但一旦被接受为“朋友”，人们倾向于向她或他敞开心扉（Kagitcibasi, 1996b）。这样，在不同文化情境中，关系形成的节拍和节奏就会不同。

与这种关系类型的分类相对照，一些研究者近来运用强加式客位测量，假设各种关系可以在亲近度（closeness）的维度上加以排列。桑田等人（Fijneman, Willemsen, & Poortinga, 1996）等人让希腊、土耳其、中国香港、荷兰和美国学生对五种关系进行排序：家庭成员、好友、邻居、熟人和陌生人。在所有的样本中发现了非常接近的排序序列：与父母关系是最亲近的。亲近排序与被试愿意支持每一个人的程度以及被试预期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少支持有强烈的相关。

桑田（1996）等人认为这些结果否定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理论，因为尽管他们的样本范围中既有个人主义又有集体主义的国家，但是在样本之间没有发现差异。然而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在亲近度和支持度之间的相关性一方面可能首先建立在包含各种家庭成员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则可能更多地建立在邻居和陌生人二者之间的对比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并没有断言家庭不重要，也没有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向与自己亲近的人所投入的情感和物质要比向自己疏离的人投入的要多（Kagitcibasi, 1999）。我们必须更细致地看待亲近度是什么。

阿伦等人（Aron, Aron, & Smollan, 1992）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概念化和操作化的例子。他们在加拿大开发出了一个“在自我中包含他人”（IOS, Inclusion of Others in the Self）的量表。他们要求被试通过挑选七对不同的圆圈，来描绘他们与不同的他人的亲近度，这些成对圆圈的差异表现在从相互重叠到相互分离，分离的程度逐渐增加。乌尔曼等（Uleman, Rhee, Bardoliwalla, Semin, & Toyama, 2000）比较了美国、日本、荷兰、土耳其学生使用 IOS 量表对家庭成员、亲戚和朋友的关系进行的评定。用一系列不同的亲近标准让被试对亲近度重复评分，这些标准包括相似性、和睦和名声。在所有文化中，家庭和朋友被认为比亲戚更亲近，然而，亲近度的基础在不同国家之间是不同的。对荷兰和美国白人来说，亲近度与支持度之间的相关最大，而与和他人的相似性及

他人的名声之间的相关最小。对土耳其和亚裔美国人来说,亲近度明显地与名声及和睦联系在一起,而对于日本人,和睦单独与亲近度高相关,而相似性与亲近度弱相关。这样,尽管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结果可能是相似的,但造成结果的基本原理可能变化,而且如此表现的方式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逻辑是一致的。

李(Li, 2002)比较了中国学生和加拿大学生的IOS反应。中国学生报告与其家庭有更多的亲近度。用一个不同的测量,克莱斯(Claes, 1998)发现意大利和比利时的青少年报告对其家庭的亲近度比加拿大青少年更高。厄斯库等人(Uskul, Hymie, & Lalonde, 2004)比较了加拿大和土耳其学生对家庭成员、浪漫伴侣、朋友和熟人在IOS上的得分。第一次是对实际的亲近度进行评分,第二次是对所期望的亲近度进行评分。土耳其被试在实际亲近度和理想亲近度上得分都较高。两个样本都把浪漫伴侣放在家庭前面,其次是朋友,再次是熟人。这个研究还测量了自我诠释,结果发现,依赖型部分地中介了国家层面上的实际亲密度和期望亲密度的效果。

IOS的研究有助于明确不同文化情境中哪些关系对被试是重要的,以及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文化的结果。然而,更具体的测量形式能帮助我们认定这些差异。维库伊腾和梅森(Verkuyten & Masson, 1996)调查了生活在荷兰的不同种族中同一性别的人之间的友谊,同时还测量了**独立型自我诠释**和**依赖型自我诠释**。结果发现摩洛哥人和土耳其人比荷兰人和南欧人有更高的依赖性。依赖性个体有一个最好的、更亲近的朋友,但其他朋友的数量会更少。依赖性还预测在与第三方打交道时,介绍一个人最好的朋友时有更多的规则。这些发现让我们回忆起日本人对友谊的描述 shin-yu, 以及中国香港人和美国人对友谊所进行的比较(Wheeler, Reis & Dond, 1989), 还有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勒温在德国人和美国人友谊之间进行的对比。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友谊看起来更强烈、更集中,也更具排他性。

通过科万等人(Kwan, Bond, & Singelis, 1997)对生活满意感研究的思考,我们能看到这种友谊有多么重要。这些研究者开发出了一个报告个体关系和睦水平的测量工具。如同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被试的自尊能够解释生活满意度的某些变化。此外,在预测生活满意度的额外差

别时，**依赖型自我**诠释能够中介关系和睦。而且，相对于自尊，由关系和睦所解释的生活满意度在中国香港样本中要比美国样本中更高。相似地，家庭凝聚力在日本要比在美国更能预测情绪困扰，甚至对自尊进行了控制之后也是如此（Abe, 2004）。

家庭关系

在跨文化研究中，很多人际关系的类型都涉及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有一些研究完全是心理学的，如研究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和依恋（attachment）（这些将在下一节讲到），而有一些是建立在人类学对家庭数十年的研究基础上的。在第5章，我们展示了一个家庭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普遍模型（专栏5.4的摘要），其中把家庭互动也作为其组成部分之一。家庭互动有人际方面的，有代际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在以**依赖、独立和心理依赖**的模型为基础的家庭中系统地变化。这些差异是不同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的产物，而这些环境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Kagitcibasi, 1990, 1999b）。

相似地，乔加斯等人（Georgas, Berry, van de Vijver, Kagitcibasi, & Poortinga, 2006）近来运用贝里（Berry, 1976, 1979）的生态—文化框架，研究了27个国家的家庭关系。在这些国家中，库查巴莎对心理和物质家庭依赖的区分得到了支持。结果发现财富对心理依赖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而对于物质家庭依赖的预测则不是这样。除财富外，宗教也可以解释在家庭价值观、角色和关系上的一些差异。这种类型的生态—文化研究对研究跨文化家庭关系的相似和差异之处都是有价值的。

亲密关系

关市等人（Seki, Mastumoto, & Imahori, 2002）让日本学生和美国学生对其与母亲、父亲、爱人和同性最好朋友关系的亲密程度评分，并评估各种与亲密相关的行动和感受的频率。日本人的亲密与欣赏、放松和“联结”等感受更强烈地联系在一起，而美国人的亲密更多地和身

体上的接触联系在一起。但在不同的关系类型中存在着差异。日本人倾向于对同性、shin-yu、最好的朋友直接沟通，对其他人用间接沟通，而美国人倾向于对爱人直接沟通，对父母、同性好友间接沟通。

专栏 8.3

找一个伴侣

英 国	印 度
<p>职业男性</p> <p>棕色头发，蓝眼睛，28岁，5英尺9英寸，寻找24~34岁的女性，希望得到友谊及更多。</p> <p>聪明的、小巧的</p> <p>喜欢玩乐的女性，27岁，寻找真诚的男性，为了友谊，或更多。</p> <p>优雅的操作工</p> <p>同性恋男子，41岁，14英石（约合89公斤），优雅，喜欢俱乐部、酒吧和电影院。寻找男性，为了玩乐和友谊。</p> <p>爱 笑</p> <p>热情的、诙谐的、独立的女性寻找有意思的、25~35岁之间的小伙子，分享欢笑与爱情。</p> <p>不要甜蜜，让我们以轻松为起点</p> <p>有吸引力的男性，60多岁，但看上去只有50多岁，专业人士，瘦削的，5英尺6英寸，有非常好的幽默感，喜欢滑雪、音乐、美食和娱乐。想要在滑雪道内外与关心人的、苗条的、小巧的、有吸引力的女性相遇，开始爱的漫长旅途。</p>	<p>父 亲</p> <p>ISRQ执行官为儿子寻找姻缘，其子26岁，5英尺11英寸，工学学士、理学硕士，在美国工作，12月将回印度一游。寻找其印度北部的婆罗门女孩。</p> <p>住在 Pune 市</p> <p>Keralite，信仰基督教的父母，Marthomite教派，为其有工作的儿子 M. Corn 寻找姻缘，一级注册会计师，英俊，爱整洁，敬畏上帝，经济基础良好，寻找来自父母从事专业工作、身高5.2英尺的基督教女孩。</p> <p>占星术 (Horoscope)</p> <p>要求履历信息，在职男士寻求目前在孟买做实习牙医的 Palakkad Lyer 女孩。</p> <p>内科医生</p> <p>1.86米，29岁，医学博士，就职于德里医院，无种姓要求，职业女性优先。</p>

资料来源：《英国独立报》（伦敦），2004年6月6日；《印度时报》（孟买），《星期天婚恋》，2001年12月16日。

关市等人把亲密的概念运用在个体更广泛的关系中，这一节其余的部分关注的重点则更多为与性相关的亲密关系。在这个领域的主要研究从进化论的观点展开。因而研究者尤其对那些明确对物种进化有贡献的男性—女性关系的普遍观点有兴趣。在讨论这些研究时，我们重点关注那些普遍观点以及那些用文化变量解释结果的跨文化理论。专栏 8.3 提供了一个例证，在当今英国和印度，寻找伴侣时那些吸引人的品质之间存在的鲜明对照。

性别差异

巴斯 (Buss, 1989) 在 37 个国家调查了 9 500 多名学生，调查他们在选择异性伴侣的偏好方面存在哪些性别差异。在所有的样本中，男性都更偏好年轻、健康、漂亮的伴侣，而女性偏好有雄心、勤奋、有高收入潜力的伴侣。在对同一批数据进一步分析后，巴斯等人 (Buss, Shackelford, & Leblanc, 2000) 发现，那些期望自己的 (年轻) 伴侣和自己年龄差异越大的男性，期望有更多的数量的孩子。如同他们所预期的，在女性中没有发现这样的效应。巴斯等人 (Buss, Shackelford, & Kirkpatrick, 1999) 运用韩国、日本和美国的样本，发现男性更在乎性方面的不忠诚，而女性更在乎情感方面的不忠诚。施密特 (Schmitt) 和 120 名合作者 (2003) 在一个对 62 个国家进行的调查中 (下文将详述) 发现，男性比女性报告了更高的性伴侣多样化的愿望。研究还发现，男性更多地报告曾经引诱另一关系中的伴侣或曾经从目前的关系中被诱惑 (Schmitt, 2004)。这些研究的结果可以作为以下解释的例证：男性的行为可以解释为生物的本能，他们想成为尽可能多的孩子的父亲，而女性的行为可解释为她们的首要本能是通过抚养其已经生养的孩子、并与将会供养这些孩子的男性保持关系，以确保其基因能够保存。

尽管上述调查中的每一项都发现了预期中的性别作用，大量的样本也表明，虽然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但这些研究只能解释很少程度的差异效应。在巴斯 (Buss, 1989) 的调查中，性别差异累计只有 2.4% 的方差贡献率。相反，对同一批数据进行的深入分析，在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结果，其平均方差为 14% (Buss 和 49 个合作者, 1990)。最大的差异在于对一个人的伴侣是应该贞洁或有性经验的偏好上，其累

计方差达到 37%。巴斯等人用多维度量表按追求配偶特征的相似性程度把国家分成不同的簇。主要的差异出现在那些被描述为传统的国家和现代的国家之间，但他们的数据没有包含对样本文化取向的测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文化解释的方差要比性别更大，该研究却被广泛地引用，用于证明进化性和生物性在伴侣偏好方面的决定性。

巴斯的数据近来又被重新检验。沙克福德等人（Shackelford, Schmitt, & Buss, 2005）对潜在伴侣的 18 种特征进行了因素分析，区分出四个个人层面的因素。它们被命名为爱情对地位、依赖/稳定对漂亮的容貌和健康、教育和智商对家和孩子的渴望，以及社交性对相同的宗教。陈（Chan, 2004）检验了这些因素的分数的国家层面的假设。她发现，一般来说，与不富裕国家的人相比，来自较富裕国家的人对其伴侣的爱、可依赖性、教育和社交性有更强烈的偏好。这些相关的程度从强烈到中等，它暗示着在形成建立婚姻关系的过程中，经济发展起着强有力的背景作用。该结果让我们想起乔加斯（Georgas, 2006）等人发现的跨文化情境中富裕在影响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性别是重要的，但同样地，文化也是重要的，尤其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及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那些支持进化论的研究者可以运用这一理论来检验他们的假设。然而，进化理论中的一些抽象品质是否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相似的含义，我们在评估这一点时，仍然需要小心。专栏 8.4 用有关外貌吸引的讨论来阐明这一个观点。考虑到在伴侣选择上更强烈的文化作用，我们需要拥有比现在更坚固的理论。接下来我们会探索更多的研究，它们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走得更远。

专栏 8.4

外貌吸引

同样的特征在不同文化中会具有同样的吸引力（attractive）吗？进化论者强调，拥有年轻的特征会让个体有吸引力，尤其是女性。例如，麦克阿瑟和贝里（McArthur & Berry, 1987）发现，长着娃娃脸（baby-faced）的女性，即有着大大的眼睛、丰满的嘴唇、光滑的皮肤、小巧的鼻子、圆圆的脸的女性在美国和韩国都被判断为更有吸

专栏 8.4 (续)

引力。然而,维勒和金(Wheeler & Kim, 1997)发现,在美国被判断为更有吸引力外貌的人,在韩国被判断为更敏感。如此看来,吸引力在不同情境中可能有不同含义。也有可能在一个特定文化群体中被判断为具有平均水平的人在另一个文化中则会被判断为最有吸引力。琼斯和希尔(Jones & Hill, 1993)在巴西、巴拉圭和美国发现:年轻和“普通(averageness)”显著影响了两种性别的吸引力,但娃娃脸的特征对女性吸引力的知觉是重要的。

苗条体形现在在西方国家被评估为最有吸引力,尽管看来在历史上并非如此。而且,有证据表明,并不是在所有当代文化中苗条体形都被看作最有吸引力。霍德斯等人(Hodes, Jones, & Davis, 1996)发现,英国的母亲认为苗条的女孩更有吸引力,但在英国的来自南亚、地中海国家、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母亲并不这样认为。科根等人(Cogan, Bhalla, Safadedeh, & Rothblum, 1996)发现,在加纳,身材高大者,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被评定为更具吸引力,但在美国却不是这样。弗海姆等人(Furnham, Moutafi, & Baguma, 2002)发现,英国和希腊的学生,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偏好苗条的女性身材,但在乌干达,人们就喜欢较胖的身材。这些结果暗示:更大范围内的取样会对来自于进化理论的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年轻的外貌总是把女性吸引力最大化。

依恋与文化

在第5章,我们讨论了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演化出的不同家庭结构。家庭结构与亲密关系有着双重的联系,一是家庭围绕着性的亲密关系而建立,同时也改变着父母之间亲密关系的程度;二是家庭也让其后代朝向某种特定风格的依恋类型社会化,而这会为其对成年伴侣的偏好涂上色彩。因此家庭模型就成为预测人际依恋的基础。建立在**依赖型模型**基础上的家庭更有可能倾向于其后代拥有这样的依恋:把家庭的需求看作一个整体。婚姻也由家庭代表从后代角度出发来安排,而不是个体的主动求偶。建立在**独立型模型**基础上的家庭鼓励其后代的自主性和依靠自己,这种自主性会延伸到伴侣的选择上。浪漫型的依恋将会是常态,建立在**心理依赖型模型**上的家庭将会喜欢既考虑个人偏好又考虑家

庭偏好的伴侣选择。

与这些研究一致，人们常说浪漫的爱是个人主义国家的特征，而伙伴的爱在集体主义国家中更多（Dion & Dion, 1995; Hatfield & Rapson, 1996）。莱文等人（Levine, Sato, Hashimoto, & Verma, 1995）对这个假设做了一个初步的验证。他们问 11 个国家的学生：“如果一个男性（女性）有你所追求的全部品质，只是你不爱他（她），你会与他（她）结婚吗？”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泰国的学生有一定比例回答说他们会结婚的。在 11 个国家中同意结婚的比例与霍夫施泰德的集体主义分数相关度为 +0.56，但这样简单地在浪漫之爱与个人主义之间画等号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对爱没有任何更具体的定义，被试也许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爱”。确实，在另一项研究中给被试提供一系列爱的定义，结果发现 8 个国家所偏好的“爱的类型”有显著差异（Neto, Mullet, Deschamps, Barros 等, 2000）。在莱文等人的研究中，在一些据说是集体主义的样本中，如中国香港和巴西，也只有非常少的被试说愿意没有爱而结婚，就像在个人主义国家样本中所得数据一样。国家的富裕对不愿意没有爱而结婚是更好的预测因素，这些国家的样本相关度在 +0.70。这个结果与陈（Chan, 2004）的发现是一致的。

之前提到的 62 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组成了当今国际性特征描述项目（International Sexuality Description Project）（Schmitt 等, 2003, 2004）的一部分。被试人数接近 18000，大部分是学生。研究者问被试一系列简单的问题，目的是了解其对亲近关系的人有何种风格的依恋，他们评定对自己和对他人积极看法的程度。这些项目是强加式客位法的，是从早期美国的研究中提取的（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对这类问题的反应加以综合就产生了四种类型的依恋：安全型（对自我和他人都是积极的看法），轻视型（对自我积极看法，但对他人消极看法），专注型（对自我消极看法，对他人积极看法），害怕型（对自己和他人都是消极的看法）。有证据表明这些测量有跨文化的效度，施密特（Schmitt, 2004）等人接着报告，大多数国家更认可安全型依恋。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一种普遍的依恋类型，施密特注意到来自 9 个亚洲国家的被试，从印度到日本，对他人看法的报告都比自我看法更积极。这个结果与我们先前讨论的在许多东亚国家的自我贬低倾向是一致的，也许这

更好地反映了自我与他人建立关系的不同风格。彭迈克 (Bond, 2000) 等人发现在人格评定中高评价他人的倾向与**依赖型自我诠释**相关, 而且与既助人又克制的社会声誉相关。这些结果将施密特等人的依恋结果与集体主义相关的概括型理论主体联系在一起, 并且暗示着此等自我贬低具有可观察的社会后果。

在对数据进行的一次单独分析时, 施密特等人 (Schmitt et al., 2003) 比较了男性和女性对他们依恋风格测量的反应。基于以前的研究, 他们预期男性要比女性有更多的轻视型, 这一点未完全验证。他们发现, 性别差异较小, 并且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样本中只有较富裕国家的男性较女性存在更多轻视型。这个大规模调查的结果发现, 依恋风格的性别效应上存在普遍性的一些证据, 但也有一些关于这个效应的文化调节作用的证据。但是, 所用的测量并没有提供足够丰富的特征以用来发现库查巴莎 (Kagitcibasi, 1996) 预期的家庭关系分布图。而且, 由于大多数样本是学生, 生活在完全属于依赖型家庭的被试没有取得足够的代表性, 因为他们更少可能进入大学。

罗森鲍姆等人 (Rothbaum, Pott, & Azuma, 2000) 令人信服地提出, 如果西方依恋模型被用作日本关系的理论构造, 我们就不会对日本的依恋风格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这个假设可以适用于更广泛的领域。用主位法的研究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 让我们了解在更广泛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获得什么。例如, 罗森鲍姆等人 (Rothbaum & Tsang, 1998) 分析了中国和美国流行情歌的内容。美国歌曲更多关注当前爱恋对象的积极品质, 而中国歌曲更多涉及悲伤、未来和爱恋存在的环境。浪漫也许是普遍的, 但浪漫的表达方式也许会存在差别, 这依赖于不同文化更广泛的人际关系背景。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跨文化理论能够足够地联系起来之前, 我们需要更好的测量工具。

我们还需要记住浪漫关系并不总是和睦的。阿彻 (Archer) (发表在即) 比较了 12 个国家伴侣之间的身体侵犯的比例。他发现在西方国家, 女性对男性的身体侵犯和男性对女性的身体侵犯频率一样多, 尤其是在学生样本中。但是, 在印度、约旦、尼日利亚、韩国, 尤其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男性对女性的身体侵犯占优势。男性侵犯占优势与性别平等指数显著负相关。这些结果与进化理论不一致, 而这些进化理论指导

着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这些结果暗示着性别角色随着社会权力变化而演化。

小 结

我们与他人沟通的方式受到以下方面的限制：我们如何思考自己，自我诠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我们对社会情境的考虑程度。成功的沟通取决于对礼貌的共同解释，取决于怎样处理对面子的威胁和怎样处理短暂或长久的特定关系。在非言语行为方面存在着文化差异，但对这些变化与价值观、信念或自我诠释之间的相关，我们还没有清晰的解释。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的沟通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要比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差别更大。在集体主义文化中，友谊更集中、更强烈、更持久，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亲密更多地与浪漫之爱联系在一起。性别关系的某些方面是普遍的，但在偏好的性别关系上存在着文化差异。依恋过程在国家间的差别表明，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理论有关的研究前景广阔，但需要更多的文化反应测量方法，还需要把工作拓展到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体制以及它们的人口中去。

拓展阅读

1. R. Goodwin(1999),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cross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2. R. V. Levine(2004). Measuring helping behavior across culture. www.wvu.edu/~culture.
3. Schmitt, D. P., & 110 co-authors(2004). Patterns and universals of adult romantic attachment across 62 cultural regions: Are models of self and of other pancultural construc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5, 367 - 402.
4. Singelis, T. M., Bond, M. H., Sharkey, W. F., & Lai, S. Y. (1999). Unpackaging culture's influence on self-esteem and embarrassabilit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p. 30, p. 315 - 41.

思考题

1. 你怎样表现自己非言语行为的特色？你对于亲近、触摸、目光接触和沉默有什么偏好？这一点如何使你的文化与众不同？
2. 请讨论在多大程度上，研究者已令人信服地表明沟通中的文化差异不同于沟通中的性别差异。
3. 你会怎样以保留面子的方式，与一个来自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进行沟通？
4. 在你的文化中，什么情境下是可以撒谎的？
5. 依恋的概念怎样才能正确适用于所有文化？



管理过程基本上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多少……这种状况会保持下去。管理在时代上的差异确实要比在地域上，甚至在国家间的差异要小（吉尔特·霍夫施泰德，2004，p. 30）。

日本和美国的管理有 95% 是相同的，但在所有重要的方面都是不同的（藤泽武夫，本田公司共同创始人）。

上述引语说明了同样的观察能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取决于所要强调的重点是什么。社会心理学和组织心理学是相似的还是相去甚远，人们可能会做出类似的评论。在前面的章节中讨论的几乎所有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进程其实也发生在组织中。反过来说，本章将要讨论的大部分过程在家庭和人际关系中也会发生。跨文化心理学家在研究组织行为方面表现得尤其活跃，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许多更为普遍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领域得到应用。虽然区分社会心理学和组织心理学之间的分歧是一件很便利的事，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都是那些对组织有效运行而言最核心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讨论的大部分概念来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但我们在本章也会考虑等级和权力距离在理解组织行为方面的独特作用。

工作动机

霍夫施泰德（Hofstede，1980）在他的经典研究中确定了国家文化的四个维度，其中有两个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男性气质—女

性气质)是基于员工对其工作情境中哪些方面最为重要而做出的评定。因此,我们有长期证据表明工作动机会随着国家而变化。当然,霍夫施泰德的测量方法是强加式客位,在评价近来研究时,我们需要考虑测量方法是否最大程度地考虑到不同动机在不同文化间的种类和含义上的差别(诸如在个人成就和社会取向成就之间的区别)(Yu, 1996)。

工作意义国际研究团队(The Meaning of Work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1987)对8个工业化国家的雇员进行了抽样调查。当要求雇员将100分的总分配到工作、家庭、爱好、信仰和其他兴趣时,与其他国家的相比,日本人在工作上给予了更多的分数。更多日本人表示,即使自己中了彩票,仍然会继续工作。施瓦茨(Schwartz, 1999)认为,根据国家层面上的掌控(mastery)和等级(hierarchy)分数,可以预测不同国家的工作中心度分数。他的预测得到了证实,但国家的样本太小。然而,了解了工作对于某些国家的人们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为重要这一事实,对于理解何为组织行为的普遍方面及何为组织行为的独特方面来说,仅仅是前进了一小步,我们需要考察雇员工作经历中更为具体的那些方面。

工作满意度

近来有一些研究利用了一些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这些数据库来自于很多国家的代表性调查。通过使用分层分析的技术,可以对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与工作满意度相关的具体因素做出测量。黄和范德弗列特(Huang & van de Vliert, 2004)分析了来自39个国家,且服务于同一家跨国公司的接近130 000个员工的问卷。在个人主义国家,白领雇员比蓝领雇员感到更满意,尤其当他们的工作能够提供具有挑战性的机会和运用他们技术和能力的机会时更加明显;然而,在集体主义国家里,工作满意度并不随工作种类而变化。此外,在那些运用个人技能机会更少的地方,蓝领员工感到更满意。这些结果是在控制了国家财富在统计学上的差异后得出的。该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由霍夫施泰德(Hofstede, 1980)分类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国家中,工作动机存在着差异。然而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在集体主义国家中更显著的激励因

素，如第6章中已经介绍过的社会取向的成就，是否可以用来解释来自集体主义国家的人们工作满意度上的差异。

在一个类似的研究中，样本是来自42个国家的58 000名员工，惠等人（Hui, Au, & Fock, 2004）发现个体层面上更大的工作自主性和国家层面上更低的权力距离能预测工作满意度。而且，如果我们假设工作自主性能提供从事更具挑战性工作的机会，国家层面的权力距离会调节工作自主性的效果，这一发现和黄和范德弗列特的结论相似。惠等人利用霍夫施泰德的权力距离的分数而不是集体主义的分数，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任何一个归因于集体主义维度国家层面的结果也可以归因于权力距离维度，因为霍夫施泰德这两个系列的分数有着强烈的相关。因此我们要根据作者的理论取向和其论据的可信度来决定哪一个是相关的文化因素。

工作自主性和挑战性工作的机会均是内在工作动机的实例。该领域的研究者经常将内在激励因素的效果和更为外在因素（如工资）的效果进行对比。斯威尼和麦克法林（Sweeney & McFarlin, 2004）检验了与其他人工资的比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工资的满意度。代表性的样本来自12个国家，其中包括10个欧洲国家。结果显示在富裕和欠富裕的国家中，工资都是满意度的一个很强的预测指标。和这一效应相符的是：在所有的国家中，与“我国其他人（工资）”的比较能预测工资满意度上的显著性差异。在另一个大范围的研究中，黄和范德弗列特（Huang & Van de Vliert, 2003）对比了内在工作动机和外在工作动机。他们发现，国家层面的个人主义和低权力距离能调节工作的内在方面（如使用技能的机会）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正相关强度。相反，在所有的国家中，对外在工作特性（如工资）的正向评定和更高的工作满意度相联系。

既然工资可能是一个相对普遍的外在激励因素，就可以通过个体层面的测量，分析不同文化取向的工资以什么方式达到其激励效果。博迪和布劳（Bordia & Blau, 2003）对印度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满意度、独立型和依赖型进行了施测。就样本的总体而言，对生活开销的知觉能够预测工资的满意度。然而，对于那些依赖型的雇员，其家庭成员的工资水平也是满意度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这种情况在那些独立型的雇员身

上并不存在。

包含内在激励因素测量的研究使得对比工资和其他潜在激励因素的效果成为可能。例如，费（Fey，2005）比较了瑞典和俄罗斯管理者的工作动机。对于俄罗斯人，工资和奖金的级别是重要的预测变量；但对于瑞典人，重要的预测指标是：被公正地对待、感兴趣的工作和好的工作环境。他推测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可能是俄罗斯的工资水平较低，但我们还需要来自更多国家的数据对这个结论做进一步的验证。

尽管工作满意度已经得到广泛研究，但其结果并不像期望的那么有效。因为了解某人对工作满意或不满意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会在多大程度上为组织绩效做出贡献。其他一些概念，如心理契约、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填补了这项空白。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些概念。

心理契约

在员工和雇主之间通常会有某种形式的明示合同，而心理契约（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则是雇员对一些事情的含蓄的理解，（这些事情是）雇主有权利要求雇员做的事和雇员有责任做出的贡献。鲁索和沙尔克（Rousseau & Schalk，2000）列出了心理契约可能会随文化而发生变化的几种方式。例如，对于程序公正的不同理解可能意味着承诺在某些文化情境下比其他文化情境下更有约束力，在某些地区，其牢固性可能会因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内群体或外群体成员关系而有所不同。

通过研究违反心理契约的情形，我们能够对工作动机有更深入的理解。基库尔等人（Kickul, Lester, & Belgio, 2004）比较了中国香港和美国的管理者在一系列具体工作中对其雇主违背契约程度的判断。他们发现，美国的管理者对违背契约内在的方面（如创造的自由和得到真诚的交流）有更为负面的反应，而中国香港的管理者对违背契约的外在方面（如培训机会、卫生保健福利）有更为负面的反应。基库尔等人也发现契约的违背能预测更低的组织承诺、更高的离职意向和更低的绩效。尽管此研究中的样本匹配得并不好，但其结果与早期的研究结果相一致，那就是在个人主义国家中，内在动机是满意度的一个更强的预测指标。罗和阿里（Lo & Aryee, 2003）也在中国香港研究了违背契约的

情形。他们发现，在违背契约和消极效果（如离职意向）之间的关联中，员工是否信赖他们的雇主起了部分的中介作用。在其他国家中，我们缺乏证据证明违背契约是否会导致信任丧失。我们期望在这一过程中雇员对违约做出的归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组织承诺

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中可能经常包含了工作满意度的成分，但其中心要素是雇员留在组织中和为组织目标奋斗的意愿。由梅耶和艾伦（Meyer & Allen, 1997）设计的测量方法发现有三种以某种方式内在相关的成分：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规范承诺（normative commitment）和持续承诺（continuance commitment）。这三个概念分别是指由于组织所提供的满意度、由于对组织的义务以及由于缺乏可替代物而参与到组织中来。三种参与之间的差异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即可以调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附属于其组织的可能特点。依据我们之前的讨论，我们期望在集体主义和高权力距离的国家中，规范承诺是一个很强的预测指标，因为在这些情境下，行为更多地被认为是由角色和规范来控制。另一方面，在个人主义和低权力距离的国家，情感承诺应该是一个很强的预测指标。因为在这些情境下，个人的感觉更能左右他们继续做某份工作还是离职。验证这些想法的第一步是确定梅耶和艾伦的强加式客位的测量方法是否在其他文化情境中有效。

高等人（Ko, Price, & Mueller, 1977）报告了在韩国使用这些未经修改的测量方法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然而李等人（Lee, Meyer, & Rhee, 2001）认为这三个概念具有跨国界的适用性。他们开发出经过修订和验证的版本，在韩国，规范承诺与不离职意向之间的相关，比通常在美国发现的相关要强烈。萨默尔等人（Sommer, Bae, & Luthans, 1996）也在韩国取样，在那些更关注员工的组织中，他们发现承诺的总体测量分数更高。费舍尔等人（Fischer & Mansell, 2004）对其他研究者报告的承诺水平做了元分析，他们采用的研究来自49个国家。一些研究使用的量表区分了承诺的种类，而其他研究使用的是单一概念的测量。在欠富裕和经济增长比较缓慢的国家，研究者发现承诺水平更高。

通过一个含有必要信息的小样本，费舍尔等发现，在更集体主义的国家中，低承诺和离职意愿之间的相关更强烈。但这些数据并不足以让我们确定，在集体主义国家中，规范承诺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更强的作用。

一个有前途的替代方法是直接测量文化对不同承诺的影响。在一项此类研究中，瓦斯蒂（Wasti, 2003a）在土耳其探索了员工在独立型/依赖型个体层面的测量和三种类型的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在独立型上得分高的人群中，对工作本身感到满意是三种承诺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晋升机会也会作用于情感承诺。与之相对照，在依赖型上得分高的人群中，对上司的满意度是三种承诺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晋升机会和对工作自身的满意也作用于规范承诺。而且，在依赖型上分数更高的人，离职意向与家庭成员是否赞同之间的联系更强（Wasti, 2003b）。

瓦斯蒂的结果至少证实了一点：对于那些处于高权力距离情境中相对属依赖型的土耳其人，与工作自身的内在方面相比，和上司的关系是一个更有力的激励因素。姚和王（Yao & Wang, 2004）考察了承诺的文化性决定因素。在一个由中国雇员组成的样本中，情感承诺能预测工作满意度，依赖性对其有正向调节作用。相反，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均与先前更少的跳槽有关，而依赖性对其有正向调节作用。土耳其人和中国人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造成的。离职的意愿可能并不等同于实际跳槽的频率。但是，我们应该对这一天真的假设保持警惕，即在其社会化的组织过程中，所有的集体主义国家彼此都是同等的。今后的研究需要扩展上述这几个研究者的分析种类，应该将其纳入更具文化差异的国家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更个人主义国家的被试。

安多尔塞克和斯蒂伯（Andolsek & Stebe, 2004）调查了那些更具代表性国家的被试的情感承诺和持续承诺。取样来自德国、英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日本和美国。但是他们的调查并不包括任何文化取向上的测量，只是对每个国家进行单独的个体层面的分析。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的变量之后，结果发现，对所有样本，高工作满意度、与上司及同事的良好关系和报告的工作努力程度能够预测承诺。然而，研究者还

发现了差异。例如,在英国和美国,独立工作的机会是承诺的一个显著预测指标;而与绩效相关的报酬在日本能预测高承诺,但在匈牙利却预测了低承诺。在一个对荷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工人的研究中,罗伊等人(Roe, Zinovieva, Dienes, & ten Horn, 2003)发现,在荷兰,内在因素对满意度和承诺更有预测作用;但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外在因素更重要,这可能是因为后两个国家中的工资水平较低。对于这些不同国家间差异的解释还需要补充以理论为基础的预测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描述提升到理解。

组织公民

美国的研究者们提出了“组织公民”(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这一概念,即个体通过自身的行为使组织获益,而这种行为超越了依据心理契约应当做的事。在此情形下,认为组织公民是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概念也不妥。我们首先要确认在不同的国家心理契约的定义范围是否相同。集体主义文化动力以及高权力距离的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是家长式领导类型,在此背景之下,组织员工对良好举止的预期是否与个人主义的美国员工对良好行为的预期相同呢?拉姆等人(Lam, Hui, & Law, 1999)询问了一些主管及他们的下属:在一系列行为中,哪些行为是下属应当表现出的行为?被试取样来自4个国家和地区,所有的被试都服务于同一公司且从事相同的工作。拉姆等人发现,在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下属应当表现出的行为范围比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更为广泛。很明显,如果在亚太地区得出了更广的工作范围,那在这些地区组织公民行为的范围就会缩小。一个人不可能因为他做了自己的份内之事而得到额外的荣誉。

在不同国家中,组织公民性很可能不仅仅在程度上不同,而且在组织公民所贡献的性质上也会不一样,二者都取决于当地流行的价值观和信念。樊景立等人(Farh, Earley, & Lin, 1997)在中国台湾做了一个在当地有效的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其测量包括了源自美国的三种组织行为(公民美德、利他主义和尽责性)的测量和两种主位的测量(人际和谐和保护公司资源)。他们发现,与强加式客位的美国量表相比,组织承诺和知觉到的公正是更好的预测指标。最近,樊景立等人

(Farh, Zhong, & Organ, 2004) 在中国公司收集了由雇员提供的 726 例针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描述。对其内容加以分析和归纳, 产生了 10 种组织公民行为, 其中只有 5 种与美国的发现相类似。因此, 尽管这是基于两个国家的样本, 但仍旧可以看出, 组织公民的元素既有文化普遍性的成分也有文化特殊性的成分, 如专栏 9.1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 专栏中有中国特殊性的组织公民行为, 对于西方组织并不是闻所未闻的。之所以认为它们具有文化特殊性, 是针对这些事情所发生的相对频数和被试认为这些行为是否超越了心理契约范围而形成的看法。

从最初工作中心性的抽象层面, 到那些被某种动机所驱使而使组织受益的具体行为, 我们对工作动机的探索已取得了进展。当然, 员工并不总是被鼓励使其组织受益。穆尼尼 (Munene, 1995) 讨论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来自尼日利亚的被当地人熟知的 “not-on-seat (尸位素餐)” 的行为, 这个词语是用来描述某些管理者行为: 他准时上班, 在办公室挂好上衣, 然后离开好几个小时, 在这段时间内, 他没有在工作。然而穆尼尼的研究结果显示, 上级对这种准时上下班的管理者的尽责性的评分很高。

专栏 9.1

不同文化下的组织公民类型

中国特有	中国和美国都有	美国特有
自我培训 (提高自己技能的主动性)	公民美德 (参与集体活动)	礼貌
参与社会福利 (参与公司的休闲活动)	利他主义 (帮助同事)	运动员精神 (忍受不利的环境)
保护和节约资源	尽责性 (采取主动)	支持参与 (鼓励他人表达自己的意见)
保持工作场所整洁	忠诚 (提升公司形象)	
人际和谐	表达意见	

资料来源: Farh, Zhong, and Organ (2004)。

正如前面章节我们所提到的，只要一讨论具体的行为，意义的多样性就会很明显。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这些概念确实有价值，但是基于它们的研究应确保测量工具的本土有效性。一旦达到这个要求，我们将会得到一幅更为完整的、各种本土有效测量相互关联的图画。例如惠等人（Hui, Lee, & Rousseau, 2004）在中国的一个国有企业考察了与组织和上司的良好关系是否能够预测情感承诺和组织公民的水平。结果发现，组织支持仅仅与情感承诺相关，但是与上司的良好关系能预测情感承诺和组织公民水平。瓦斯蒂在土耳其的研究也是一样，和上司的关系被认为是关键的。惠等人也发现被试是否有传统取向对这种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在飞速变化的中国的组织生活情境中，他们发现更传统的员工，不管与上司的关系如何都具有组织公民行为；而不那么传统的员工，仅仅当他们的关系很好时，才是如此。后面我们会讨论组织变量间的关系随着逐渐增长的现代化程度而发生变化的其他实例。

不仅仅考察高满意度和承诺度很重要，考察满意度和承诺度低时会发生什么同样重要。鲁斯布尔特等人（Rusbult, Farrell, Rogers, & Mainous, 1998）确定了4种可能的反应，分别命名为离开（Exit）、表达意见（Voice）、忠诚（Loyalty）和忽略（Neglect）。托马斯和奥（Thomas & Au, 2002）预测：在那些更注重情绪表达的个人主义国家，员工更倾向于抱怨和要求纠正（表达意见）；然而在集体主义国家中，他们更可能选择回避，即其他选项所表达的意思（离开、忠诚、忽略）。考虑到是否可行的问题，离开是用离职意向而不是实际的离职来测量的。样本取自新西兰和中国香港，托马斯和奥使用辛格利斯等人的垂直和水平的自我诠释测量来检验他们的假设。正如所料，与独立型相关的、水平个人主义的测量能预测更大的意见表达，而且它正向调节了工作不满意度和辞职后有好工作选择的效应。与依赖型自我诠释相联系的，垂直的集体主义预测了更大的忽略和低忠诚度，与预测相反的是，它也正向调节了辞职后有好工作选择的效应。在一个相似的研究中发现，在新西兰人中，其低满意度与高离职、忽略以及低忠诚有关，这比在印度尼西亚人中的影响要明显（Thomas & Pakerit, 2003）。因此，在个人主义国家中，自我诠释可能会影响人们在离开和表达意见之间的选择；而在集体主义国家中，组织规范可能更有影响力。艾布拉姆斯等人

(Abrams, Ando, & Hinkle, 1998) 发现, 在日本, 雇员对辞去工作的知觉是离职意愿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 但在中国香港不是, 这也支持了上述研究者的观点。

在讨论动机驱动行为的一些效果中, 我们已经简单地接触了组织行为学中其他几个相关的方面, 例如知觉到的公正、团队工作和领导力, 下面我们将对组织生活中的这些方面逐一进行介绍。

公正理论

到目前为止, 本章关注的仅仅是个体雇员的动机、承诺和随后的行为。孤立地关注个体的价值是有限的, 因为他们表达动机的方式更依赖于其知觉到的组织情境。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人们如何判断所在组织和当下环境中那些人对待自己的公平程度。许多年前, 多伊奇 (Deutsch, 1975) 提出了分配公正 (distributive justice) (即报酬在员工之间的分配方式) 的三种不同基础, 并提出每一种分配方式都可能在某个具体的组织中居于主导地位。他预测, 那些首要目标是经济利润的组织会有对公平的偏好, 也就是说, 报酬的分配是按照每一个个体对组织的贡献来进行的; 在那些以和谐关系的发展和维持为首要任务的组织中, 他预测会对平均分配报酬有偏好; 最后, 在那些以个人福利为主要任务的组织中, 他预测资源的分配是根据需要来进行的。

员工可能也关注决定报酬分配的方式。这被称为程序公正 (procedural justice) (Lind, Tyler, & Huo, 1997)。第三个被提出的概念是互动公正 (interactional justice), 即决策被传递到员工的方式, 这一概念也出现在一些跨文化研究中。对于公正的三个概念, 甚至在北美的文献中, 它们的交叠程度也还不清楚 (Colquitt, Conlon, Wesson, Porter, & Ng, 2001)。

报酬分配

报酬分配 (reward allocation) 的跨文化研究非常多, 相比于其他研

究领域来说，其跨越的国家范围更大。然而，因为所进行的各种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所以结果并不那么容易解释。梁觉（Leung, 1997）认为，区分两种研究非常重要：第一种研究是参与者在自己与其他人之间分配薪酬；第二种研究中，参与者是在其他两个或更多人间选择怎样对报酬进行分配。因为第二种研究更接近于日常的组织经验，我们首先考虑这种类型的研究。

分配公正

费舍尔和史密斯（Fischer & Smith, 2003）对有关分配公正的 25 项跨文化研究做了元分析，其中 21 项研究涉及美国被试和另一国家被试的对比。总之，这些研究的被试来自 14 个国家。费舍尔和史密斯发现，来自高权力距离国家的被试，对于公平（而非平均）存在明显的强烈偏好；尽管其他早期研究者使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来解释他们的结果，但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通过来自大范围的研究，元分析能对影响个别研究结果的因素给予更准确的解释。费舍尔和史密斯考察了这一类型研究的几个因素。首先，他们发现那些研究结果中存在一个显著的分别：一些研究是要求学生分配假想的报酬，另一些少量的研究在实际的公司职员中取样。通过聚焦于对企业雇员的两项研究，我们可能得到最为有效的理解，研究者发现，中国管理者比美国员工更偏爱分配公正（Cheng, 1995）。俄罗斯的管理者也偏爱公正，但他们的报酬分配比美国人更平均（Giacobbe-Miller, Miller, & Victorov, 1998）。

俄罗斯被认为是在权力距离上得分高的国家，因此，他们以平均为基础的分配方式并不支持总体的元分析结果。这显示出可能有更深的未被控制的变量影响了目前已经得出的结果。首先，需要注意到陈的研究（Chen, 1995）是 25 项研究中惟一对个人的文化取向进行了测量的研究。所调查的这个特殊样本中的被试可能在他们的国家中有着与霍夫施泰德的分数不一致的价值观。其次，这些研究均未测量接受分配的人在何种程度上被知觉为分配者的内群体成员。正如我们在讨论情绪表达时所注意到的那样，在行为举止的方式上，**依赖型自我诠释**的人对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展现的行为，比那些**独立型自我诠释**的人会表现出大

得多的区别。结果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可能取决于被试怎样解释他与分配结果接受者的亲密程度。

最近更多的研究试图克服这些问题。何等人 (He, Chen, & Zhang, 2004) 调查了中国公司的雇员对报酬分配的偏好。使用辛格利斯等人的水平和垂直的自我诠释的测量, 他们发现那些赞成垂直集体主义的人更偏爱有差异的报酬分配, 即根据工作绩效进行分配。而那些采用水平集体主义的人更偏爱平均的分配方式。因此, 这是首次在报酬分配和自我诠释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研究。但此研究还不清楚接受分配的人的内群体或外群体身份。费舍尔 (Fischer, 2004a) 要求德国和英国的员工描述和评价组织中的报酬分配方式。由于评价是以被试在组织中的近事事件作为整体为参考的, 因此, 其关注的是外群体成员而非直接

同事。结果显示: 在英国, 基于公正、平等和需要的分配均被频繁采用; 而在德国, 基于资历的分配更频繁。在一个更深入的分析中, 费舍尔和史密斯 (Fischer & Smith, 2004) 发现, 在这两个国家中, 被试在基于能力的价值测量的自我拔高 (self enhancement) 分数能预测其对基于能力的有利评价和基于资历的不利评价。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弄清楚被试的特征与分配目标 (分配所指向的对象) 之间的交互作用, 然后才有可能全面地理解分配公正。

深入了解报酬分配过程的研究者, 也开始关注被试文化定位的测量。林德等人 (Lind, Tyler, & Huo, 1997) 提出: 只有当程序被认为公平、无偏见和非欺骗性的, 决策者被认为是仁慈和值得信赖的, 以及决策接受者得到了尊严和尊重时, 在分配和其他事情上的决策才会被知觉为公平的。假设这些效应有普遍性, 他们认为高权力距离国家的成员更易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因此会更少关注程序的这些方面。与这推理相一致的是, 他们发现了在人们描述所经历的双值冲突 (dyadic conflicts) 中, 美国被试比日本被试会更多考虑他们在内群体的位置。这一推理方式在拉姆等人 (Lam, Schaubroeck, & Aryee, 2002) 的研究中得到了支持。他们在中国香港和美国研究了员工对工作场所决策的反应。在对公正程序的知觉比对结果更加重视方面, 美国员工比中国香

同事
用
尔和
施瓦
公正
分配
后才
程序
量
是充
的接
为是
更容
一推
confl
这种
究中
反应

港员工要明显。权力距离在个体层面上的测量能调节这些效应。对于那些低权力距离的人们，知觉到的公正是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低旷工率的一个重要预测指标。

在第6章，我们已经讨论了调节作用的一个例子：布罗克那（Brockner, 2001）等人的相关研究。在被试取样于中国、墨西哥、中国香港、德国和美国的一系列研究中，他们发现权力距离上更低的个体层面的分数能预测员工对表达意见更积极的反应。最后，樊景立等人（Farh, Earley, & Lin, 1997）表明，在中国台湾，对于那些具有更少传统价值观和更多现代价值观的人，知觉到的公正（此研究中包括程序公正和分配公正）能预测组织公民的增长。因此，在这4项研究中，有3项包括个体层面上的测量，这3项研究都支持了这样的观点：个体层面的高权力距离（在这里等同于传统价值观）和较少关注公平相联系。

由布罗克那和他的同事所做的一系列深入的研究（Brockner, Chen, Mannix, Leung, & Skarlicki, 2000）所得到的结果乍一看和这些结果相矛盾。其样本取自中国、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台湾地区。布罗克那等人发现，对于学生被试，在结果的有利性的评定上，**依赖型自我诠释**会增强而不是减弱程序公正的作用。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注意到，在对公正的研究中，使用学生被试与使用管理人员被试（Fischer & Smith, 2003）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一点可能会以某种方式解释这种明显的矛盾。在布罗克那等人（2000）的研究和上述其他研究之间的另一个不同是，任务的性质是要求被试评估其结果公平与否。布罗克那等人的研究涉及组织外的一些人的情境，例如买主与卖主间的谈判和招聘新员工。因此，这些研究关注了处于组织外情境中人们对事件结果公平与否的评价，然而，我们已经考虑过的其他研究都集中在关于内群体事件的公平上。这再一次显示：内群体和外群体间的不同可能是产生这种结果的一个关键决定性因素。为了验证这种观点，我们需要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效应之间进行直接的对比研究。在本章的后半部分，当我们讨论冲突与协商时，会讨论此类研究中的一些例子。

互动公正

在组织生活中，那些信奉平等社会关系的人更关注组织生活中的程

序公正。类似地，对互动公正（决策是怎么被传递的）的关注可能会随着现代化而增加。樊景立等人（Farh, Earley, & Lin, 1997）在中国台湾做过的研究中包含互动公正的测量。结果显示：对那些崇尚现代价值观的人，在组织公民性上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对那些不崇尚现代价值观的人影响则不显著。在一项对合资酒店工作的中国管理者的研究中，梁觉等人（Leung, Smith, Wang, & Sun, 1996）发现，对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知觉能预测工作满意度，而对互动公正的知觉则不能。然而，三年之后，分配公正不再是个显著的预测指标，但互动公正却变得具有预测性（Leung, Wang, & Smith, 2001）。研究者对这些变化做出了解释：在早些时候，被试更喜欢与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中国管理者进行比较并得出满意的结果；三年后，随着阅历的增加，被试认为可以与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外派管理者做比较。换言之，他们所选择的用来比较自己是否获得公正对待的群体，即参照群体，已经发生了改变（Kelly, 1952）。

我们关于报酬分配的大多数讨论都是关注对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人进行的报酬分配。一旦在自己和其他人之间考虑报酬和资源的分配，那按照冲突和谈判的视角来加以考虑就更为合适，我们下面将对此加以验证。

冲突与谈判

在考虑冲突的研究时，确定谁是冲突的对象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即使是在个人主义国家中，那些彼此比较熟悉的人和彼此陌生的人在解决冲突时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这些差异在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的情境之中更为突出，这一点对于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的概念是具有核心意义的。冲突研究领域非常有意思，因为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学者们创造出各自的冲突和谈判模型，但这些模型有时候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北美的研究者们主要按照一系列双重关注模型（dual-concern model）而形成冲突的概念。谈判风格被看作是一个人究竟关注自身收益还是关注另一方收益的产物（如 Pruitt & Carnevale, 1993）。如果对自己的关注超过了对对方的关注，可以预测会持苛刻的竞争性的姿态；如果

对别人的关注程度较高，那就可能产生更迎合或更服从对方的姿态。如果关注自己和他人的程度都高，可以预测会有一种更通融的或是问题解决型的方法；最后，关注自己和别人的程度都低则会导致对冲突情境的回避。

举一个与之相对的东亚模型的例子，我们考虑梁觉（Leung, 1997）的方法。梁觉明确了与冲突相关的两个核心概念——减少敌意（animosity reduction）和避免分裂（disintegration avoidance）。他假设依据冲突对象是内群体成员还是外群体成员，两种情境下动机的强度会存在差异。当对方是内群体成员时，因为团队于每个成员身份来说具有核心意义，人们主要关心的是避免分裂。因此，会出现各种策略性的回避和顾全面子的行为。当对方在外群体中时，对他人的关注更低，但敌意的风险却高得多。梁觉因此预测，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会有更大的妥协和合作的行为。

这两个模型的争论点在于他们对回避的概念化。西方模型认为当双方或多方互不关心时，就会发生回避。在东亚模型中，当关注己方和他方的程度最高时，回避是最高的。没有任何研究直接支持某种假设而反对另一假设。然而，已有的研究已经验证了每个模型能解释其在相应国家范围内的所得结果。

双重关注模型的验证

一系列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批指标。在该系列研究中，商业人士参加了一个为时1小时的买卖交易模拟实验，该项模拟可以对交易者能否成功地达到最优化结果加以客观的评估。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显示，那些集体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被试，例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交易者，更经常地采用问题解决型策略。然而，欧洲和北美的交易者却更富竞争性（Graham, Mintu, & Rodgers, 1994）。然而，这些研究也得出这样的效果：谈判风格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最终结果（Graham & Mintu, Wimsat, 1997）。尽管美国的商业人士倾向于更少使用问题解决策略，但是当他们采用这种策略时，只要对方也能投桃报李，就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另一方面，在西班牙被试身上，问题解决的策略导致了不

那么积极的结果。在日本，因为卖方对买方都很尊重，所以不管采取何种策略，在讨价还价中，买方总是比卖方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范奥登霍文等人（van Oudenhoven, Mechelse, & de Dreu, 1998）的研究提供了比简单的东西方对比更多的结果。他们要求来自5个欧洲国家的管理者描述与上司和同事冲突的情形。荷兰、英国和丹麦的管理者比西班牙和比利时的管理者报告了更多的问题解决行为。荷兰的管理者会更多地考虑另一方的观点。因此，即使在欧洲这样更具有文化同质性的地区，在冲突管理方面也有强烈的行为差异。

莫里斯等人（Morris, Williams, & leung, 1998）通过直接测试谈判风格是否能被谈判个体的文化取向所决定，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样本取自印度、中国香港、菲律宾和美国的商学院学生。他们使用施瓦茨的价值测量，确认了成就价值观部分被竞争性讨价还价方面的国别差异所中介，而保守的价值观完全被回避行为方面的国别差异所中介。因为保守的价值观代表了对现状的保护而不是对他人的关注，因此，这项研究并没有直接验证双重关注模型的跨文化效度。然而，它确实显示，在这些国家中，回避能被非双重关注模型所确定的某些变量所预测。莫里斯等人的研究并没有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谈判上的不同。因此，我们还不不大确定所发现的效应是否同样适用于这两种情境。

皮尔逊和斯蒂芬（Pearson & Stephan, 1998）对巴西和美国学生如何与陌生人和朋友谈判进行了比较。如预料的一样，巴西人在**依赖型自我诠释**上的测量分数要比美国人高，也偏爱非竞争性的冲突处理方式。而且，他们在内群体和外群体情境中的差异比美国人更大。在一个对墨西哥人和美国人进行比较的深入研究中，加布里利迪斯等（Gabrielidis, Stephan, Ybarra, Pearson, & Villareal, 1997）得到了相似的结果，但是他们也报告了自我诠释测量和谈判风格测量之间的相关。与双重关注模型相反的是，他们发现在这两个国家中，**依赖型自我诠释**和回避偏好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

这两个关于内群体和外群体谈判的对比研究和早期的关于报酬分配（在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研究相一致。许多研究显示，学生喜欢在内群体分配中以平均为基础，但是在外群体分配中偏爱以公平为基础。对这些偏爱的解释可能有一部分与被试是某特定群体成员有关。梁觉等人

(Leung & Park, 1986) 验证了这项假设：当群体的目标是和谐时，人们更喜欢平均；当群体目标是完成任务时，人们更喜欢公平。这个假设在韩国和美国学生中均得到了支持，但在这一例子中韩国人对平等有更大的偏好。在集体主义国家中，尽管完成一项任务个人会得到更大回报，但对内群体和谐的偏好也很强。在一项情景研究中，梁觉等人 (Leung & Bond, 1984) 发现，中国香港学生在朋友之间平均分配报酬，但是对陌生人，他们更喜欢基于公平的分配方式。美国的学生并没有这样的区别分配。在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进行的一项相似研究中，惠等人 (Hui, Triandis, & Yee, 1991) 发现，在内群体和外群体间报酬分配的差异部分地被集体主义的个体层面的测量（其反映了依赖型自我诠释）所中介。

梁觉模型的验证

梁觉模型与双重关注模型的不同点在于其说明了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谈判者为什么表现出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因此，对这一模型的验证不仅仅要求公平和平均之间的选择，还需要对减少敌意和回避分裂的偏好进行测量。梁觉 (Leung, 1987) 得到了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学生对各种冲突解决方式（例如谈判、调解、裁决）的喜好程度评定。在这两个样本中，他发现那些被评定为最能减少敌意的方式是学生所偏爱的。盖尔和卡门特 (Gire & Carment, 1993) 在加拿大和尼日利亚的学生中做了一项相似的研究。在此研究中，两组都偏爱谈判。然而，加拿大的学生把谈判评价为更有可能减少敌意，而尼日利亚的学生则感觉到在发出威胁的时候也会减少敌意。在更全面地理解尼日利亚被试如何构念其谈判的进程上，这个来自尼日利亚的与众不同的结果（本书中来自非洲被试的少数研究中的一个）可能会很有价值。

彭迈克等人 (Bond, Leung, & Schwartz, 1992) 使用了一个相似的研究设计，取样来自中国香港和以色列的学生。以色列学生比中国香港学生更可能发出威胁。在这项研究中，以色列学生对敌意减少只有较低程度的关注，这能够部分地预测对威胁的偏好。然而，以色列学生更偏爱仲裁。这种偏爱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以色列人有较强烈的信念认为仲裁

能在更大程度上减少敌意。因此,在预测谈判策略的选择上,必须同时考虑减少敌意的偏好和使用给定谈判策略后是否能在更大程度上减少敌意。跨文化差异的产生是因为价值观和信念体系这些因素中的每一种在国家之间均会发生变化。这些研究并没有提供对梁觉的模型的全面验证,但是他们再次说明了在文化之间特定的行为会通过多样的方式产生差异,但也可能被共同的解释性概念联系起来。在此研究中,他们认识到减少敌意方面的有用性和减少敌意本身的价值。包含区别性回避测量的研究尚未有人报告。

有一些证据同时支持这两个模型,但这些证据都没有被广泛地加以验证。再后来的一些研究试图描述不同文化对冲突的理解,研究的方式是通过额外的细节来捕捉绝大多数冲突情境中的复杂性。盖尔芬德等人(Gelfand, Nishii, & Holcombe, 2001)分析了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对冲突事件的描述。来自这两个国家的被试都根据妥协与胜利来评估冲突。然而,美国学生也按照对其偏爱的个人身份的威胁来对情境加以解释,而日本学生是根据对他人的关系责任来看待情境的。欧布基等人(Ohbuchi, Fukushima, & Tedeschi, 1999)获得了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对冲突经历的评定。美国人认为声明是达到公正的一种方式,日本人则把回避当作维持和谐的一种方式。对契约本质的理解也会随国家不同而发生变化。莱文森等人(Levinson, Peng, & Wang, 2004)对中美被试进行了对比,美国被试强调对工具的关注,中国被试强调对关系的关注。由被试对一些情境做出评价,在这些情境中商贩并没有按照各种不同的报价来卖东西。美国人更多地按照法律责任来解释情境,而中国人对那些不法小贩的评估,则是按照道德和人格的判断来表达的。

用学生作被试的研究结果与用管理者作被试的研究有些不同。廷斯利(Tinsley, 2001)在一个内文化模拟情境中,对成对的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管理者之间的谈判进行了考察。她预测美国人会寻找方法来整合自己和对手的偏好,换言之,他们会满足双方谈判者而不只是使自己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日本人被预测为强调权力,德国人被预测为强调规则。她的预测得到了验证,并且发现研究结果分别被个体层面上的个人主义、等级和直率所完全中介。她根据其期望——德国人可能会不满偏离规则的行为,预测德国人的直率和关注规则两者间存在关联。在一项

类似的对中国香港地区 and 美国的商院学生做的文化内谈判的研究中，廷斯利和布雷特（Tinsley & Brett, 2001）再一次发现美国人更多地达成整合双方偏好的结果。如果一个谈判中不同元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妥协和交换，他们能更频繁地达成协议，而不是分开解决单独的问题。而中国香港的学生则更频繁的是将问题转呈给上司或留下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中国香港学生更为支持集体主义也更为尊重权威，但在这项研究中，这些测量未能预测结果。范德弗列特等人（Van de Vliert, Ohbuchi, van Rossum, Hayashi, & van der Vegt）（待出版）得到了日本员工对于如何更好处理与上司争议的评定。有所主张（即争辩）和迎合上司意志结合起来能预测效果。以前有研究表明，荷兰员工能够把争辩和自己与上司的愿望结合起来达到效果最大化。范德弗列特等人将这两项研究的结果进行了对比。

我们希望前述章节中所讨论的人际关系的其他方面在冲突环境中也是有效的。例如，布鲁和凯恩斯（Brew & Cairns, 2004）比较了英国裔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学生对于涉及到有失自己面子和他人面子的冲突情境的反应。威胁面子比被试的国籍解释的方差更多。当自己的面子受到威胁时，两组被试都喜爱直接的交流。在他人的面子受到威胁时，中国的学生反应更强烈，主要是表现为使用更谨慎的交流风格。

跨国谈判

所有在内文化谈判中有效的因素在文化间谈判中也可能是有效的，这导致了结果更加不可预测。应用一种复杂的模拟谈判进行研究之后，布雷特等人（Brett & Okumura, 1998）证实了日本人与美国人的谈判，与日本人与日本人之间或者美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谈判相比，更少有成功结果。基于同一研究，阿代尔等人（Adair, Okumura, & Brett, 2001）表明，日本人在内文化的谈判中，使用比美国人更多的间接信息交换和直接影响手段。但谈判在跨文化间时，日本人会变更他们的策略，转向美国人熟悉的直接信息交换和较少直接影响的风格，而美国的谈判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风格。尽管没有取得实际的依赖型测量分数，这些结果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依赖型的谈判者更愿意使其行为适应环境的改变。情境性因素对于他们的行为结果应当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亦见第6

章)。为何一方会朝向另一方移动以及移动程度如何?尤其是当他们的迎合行为并没有得到反馈时会怎样?在将来的研究中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会变得很重要。

文化和道德规范

绝大多数关于谈判的跨文化研究是在一个相对有序的世界中进行的,组织成员们在这个有序的世界中利用合法的程序相互影响对方,其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做出预测。逐渐增长的贸易国际化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对一些利益问题,例如提供或接受贿赂、偷窃公司财物、雇主和员工相互勾结骗取退税等是否正当的判断上,可能存在着文化差异。卡伦等人(Cullen, Parboteeah, & Hoegl, 2004)利用全球价值观调查数据库的数据,比较了28个国家3450名管理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伦理上可疑的行为(例如偷税和在当权的时候收受贿赂)。对7种可疑行为的因素分析显示了单一因素:被试在接受和拒绝各种可疑行为的水平上,都显得很一致。卡伦等人使用分层分析来决定什么因素能预测可疑行为的接受程度。在个体层面上,较小的年龄和拒绝宗教是最强的预测指标;在国家层面上,低教育水平和高工业化是最强的预测指标。工业化的测量反映了居住在城市里并未受雇于农业的人口的比例。霍夫施泰德(Hofstede, 2001)也对1998年的“腐败知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在国家层面上的分数做了相关分析。该指数发布在一个网站上,并且每年都会更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04)。在那些富裕程度低和权力距离得分高的国家,知觉到的腐败也是最大的。

特里安迪斯等人(Triandis, Carnevale, & Gelfand, 2001)使用模拟合同谈判的方法来检验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上与贿赂和撒谎意愿有关的假设。参与者是来自8个国家的学生,结果发现,来自更为集体主义国家的被试更愿意行贿和撒谎。然而,在个体层面上,那些更具有独立型自我诠释的人喜欢不道德的行为。我们不能确定模拟的结果是否能反映真实的管理情况,但是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更深入的例子——研究的结果在不同层面上是不同的,但在每个分析层面上却似乎都是有道理

的。至少从短期来看，集体主义情境下的个人主义者更有可能行骗。

范尼姆威根等人 (Van Nimwegen, Soeters, & van Luijk, 2004) 说明了跨国公司在这一领域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他们要求荷兰银行 AB-NAMRO 来自 17 个国家的雇员说明如何对 17 个道德两难困境做出反应。专栏 9.2 是其中的 3 道题目，研究者对答案的赋值是根据组织认为“正确”的标准做出的。然而，研究者承认了在不同的情境下存在的差异（例如在权力距离上）可能会影响具体的反应。毫不意外的是，荷兰雇员的回答更多与银行试图鼓励的那些答案相符。专栏中的 3 个两难困境题，研究者认为是合适的回答分别是：a、a 和 b。

专栏 9.2

银行业中的两难困境

1. 你的家庭拥有一家公司的股权。有一天在上班时，你从办理这家公司业务的同事那里了解到，由于糟糕的财务状况，该公司的股价会下跌，你会怎么办？
 - (a) 什么也不做。
 - (b) 建议你的家庭对该公司加以分析。
 - (c) 建议你的家庭售出（股份）。
 - (d) 询问上司该怎么做。
2. 因为关系很好，某客户送你一款漂亮贵重的手表作为礼物。你会怎么办？
 - (a) 把它送还。
 - (b) 接受它并在下班之后带回家。
 - (c) 询问上司该怎么做。
 - (d) 也送客户一份精美的礼品。
3. 你在内勤办公，要报销一个同事某天宴请客户的费用。你记得那天你看到这个同事是和他的家人在饭店里吃饭，你会怎么办？
 - (a) 什么也不做，然后给他报销。
 - (b) 不给他报销，但首先会和他谈话。
 - (c) 询问上司该怎么做。
 - (d) 告诉同事的上司所发生的事情。

资料来源：Van Nimwegen et al. (2004)。

在团队中工作

在工作中，我们常常需要与他人建立合作关系，然而合作的工作并不一定能排除前面部分所讨论的冲突和谈判的某些成分。史密斯等人（Smith, Peterson, Leung, & Dugan, 1998）发现，在23个国家中，商业组织中的冲突更频繁地发生于部门之间而不是部门之内。一定程度上，团队在合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会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在某些特定类型的组织，如小的家族企业中，团队和组织更可能是同义词并且存在时间更长。尽管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家族企业，但家族企业的形式在东南亚的华人和在许多地方的印度人中尤其典型。雷丁（Redding, 1990）曾经描述了互助的家族联结以何种方式导致了华人企业家独特的经济成就。

在更大的组织中，其管理者的主要职责就是建立团队中的合作。稍后我们将对领导的研究做简短讨论。然而，一个工作团队中所产生的文化不仅仅是领导力的产物，它也是主流文化价值和组织发展的产物。在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探讨了厄尔利（Earley, 1993）关于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的开拓性研究。**依赖型自我诠释**的团队成员在和别人合作时，实际上工作更加努力。对于团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提高绩效而不会危及凝聚力。我们应当谨慎，不要想当然地认为由依赖型成员组成的团队总是能最好地达到这一目的。曼和拉姆（Man & Lam, 2003）调查了中国香港地区 and 美国的471个工作团队，他们都服务于同一家跨国银行。那些面临更复杂的任务，并在整个组织中更具自主性的团队更有凝聚力且有更好的业绩。正如他们所预计的一样，他们发现一项个人主义态度的测量可以正向调节这种效果。他们认为自主性和任务的复杂性需要更多地区分个体角色，个人主义者比集体主义者在这一类型的情境中能更好地做出有个人特点的必要贡献。

柯克曼和夏皮罗（Kirkman & Shapiro, 2001）检验了跨文化影响在81个自我管理型团队中的效果。这些团队来自比利时、芬兰、菲律宾和美国。他们认为，自我管理团队使用的集体工作程序将适合于那些集

体主义价值观的人们，但是正式领导的缺乏将会威胁到那些赞成高权力距离的人们。因为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在国家层面上有强烈的关联，这看起来是一对有挑战性的假设。然而，正如我们继续强调的那样，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变量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彼此相联系。柯克曼和夏皮罗使用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的个体层面上的测量，然后总计到团队层面上。在这一水平上，运用由更资深的管理层提供的团队效率的独立评定，结果表明文化的两个预测指标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两个假设都得到了显著的支持。

在对不同团队成员贡献的利用程度上，各团队也可能存在差异。厄尔利（Earley, 1999）检验了英国、法国、泰国和美国参加培训项目的管理者的地位对一个团队决策任务的贡献效果。在个体层面上权力距离的总计测量分数更高的那些团队里，按照年龄来定义的资深员工有更大的影响力。不考虑国籍，由更具等级取向的成员组成的团队更服从他们的团队领导。

反 馈 程 序

不管作用于个人和团队的具体动力是什么，为了使个人和团队更有效率，个体和他们的团队需要在个人绩效和集体绩效上的反馈。想要让反馈不危害到凝聚力，它就需要以与主流价值观一致的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厄尔利等人（Earley, Gibson, & Chen, 1999）利用一个模拟管理情境研究中国、美国和捷克的管理者对反馈的反应差异。研究者提供了表明工作绩效在平均水平之上或之下的反馈，此等反馈要么是给个体的，要么是给团体的。在个人主义价值观测量上得分高的人群中，不管其国别，个体的正面反馈在个人效能感上产生了最强烈的效果。然而，那些信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人，从个人和团队的正面反馈上，都表现出增强的效能感。

在一个相似的研究中，范德弗列特等人（Van de Vliert, Shi, Sanders, Wang, & Huang, 2004）比较了荷兰学生和中国学生对各类反馈的反应。依赖型自我诠释能预测对整个团体工作进行反馈的反应，尤其是当反馈传达给作为一个整体的团队时更是如此，反馈是消极还是积极这

一点就可以解释更大的变异。那些得到积极反馈（在本研究中是表扬和鼓励）的人，报告了更多的积极情绪和较少的破坏性意图。与本书中所报告的许多发现一样，我们应当谨慎，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在少数几个地区密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一定会被证明适用于其他地区。高斯登（Gausden, 2003）研究了受雇于 BBC 全球服务的阿尔巴尼亚员工的反馈过程。她发现反馈经常以强制性和消极的方式表达，并且被试认为单独的积极反馈不起作用。

莫里森等人（Morrison, Chen, & Salgado, 2004）比较了来自美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学生在先前工作中从他们的上级处寻求反馈的程度。正如所料，美国员工比中国香港地区的员工寻求更多的反馈。寻求反馈的差异被权力距离和独立型在个体层面上的测量所正向中介。莫里森等人并没有调查中国香港地区的员工在工作中是如何获得必要指导的，但是我们可以预料，这可能是通过同侪和更多间接的交流形式，例如与已经确立的标准进行比较而获得。廷斯利和韦尔登（Tinsley & Weldon, 2003）提供了与此对应的解释。他们询问中国和美国的管理者：如果一位同事受到好评，但实际这项工作是由你完成的，你将如何反应？美国人说，他们会通过直接对质该同事的方式给予反馈，而中国人则表示，他们将与其他人倾诉，试图使这个行为不良的人员感到羞愧或给其一个道德上的教训。

多元文化团队

现在每天都发生着这样的事：工作团队是由来自不同的，常常是许多不同的国家的成员所组成。这些团队的成员也可能面对面地交流，但他们经常是作为虚拟团队，通过电子邮件来一起工作。这种团队所面临的问题既包括不同文化对于什么是团队有效工作的期望上的判断不同，也包括面对面接触的缺乏（Earley & Gibson, 2002）。

对多元文化学生工作团队的研究有这样的优势：更容易收集纵向的数据。几个研究者已经提出假设：同质性的团队会面临更少的问题；在短期内会被证明更有效率。然而，他们也认为，如果能够建立一种提供不同技能和观点的团队文化，异质团队会有更大的潜力。华生等人

(Watson, Kumar, & Michaelsen, 1993) 发现, 美国的一个文化异质的学生团队, 经过 17 周的学习后——在此期间由教练提供了在团队动力和发展上的咨询——其在问题识别和多种解决方案的产生上要优于同质团队。这样的结果也由华生等 (Watson, Johnson, & Zgourides, 2002) 在美国得到了重复验证, 但没有被托马斯 (Thomas, 1999) 在新西兰超过 10 周的研究所验证。这些不同的结果可能是由于涉及的任务不一样、时间较少、教练干预的数量差异等所造成的。一个进一步的可能是, 我们需要更清楚的理论来说明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文化的多样性达到它的效果。范德齐等人 (Van der Zee, Atsam, & Brodbeck, 2004) 对英国 43 个文化多样性学生团队的人格变量和团队多样性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了超过 10 周的研究。分层分析显示, 更多样性的团队关系和个人的灵活性之间的交互作用能预测最后的成绩。团队的多样性和个体情绪的稳定性也会交互作用, 来预测对个人幸福感的评定。

厄尔利和莫萨科夫斯基 (Earley & Mosakowski, 2000) 的工作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方法。他们认为同质和异质间的简单对比非常有限。如果一个跨文化团队需要发展出一种对自身有效的团队文化, 成员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比成员来自两个国家的团队更容易达成目标。这两种团队都被认为是异质的, 但来自两个国家的团队有可能发生两极分化, 而这种两极分化发生在来自多个国家的团队中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厄尔利和莫萨科夫斯基在英国使用由四人组成的商校团队 (团队成员来自许多国家) 证实了他们的预测。多元文化团队的有效性需要一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而他们的结果表明, 由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小帮派造成了团队的分裂, 而这种分裂会削弱适应性和灵活性。

我们讨论过的多元文化学生团队的研究都没有正式的领导者, 在较为长久的团队中, 此种未加组织的情境其实不太可能发生, 因此考虑领导者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团队所面对的多元文化的问题就非常重要。对于工作场所团队的研究很少见。埃隆 (Elron, 1997) 在跨国公司中调查了 22 个高级管理者团队, 更具文化多样性的团队成员对他们的绩效具有较低的满意度, 但其团队却比更同质的团队表现出更高的效率。

领导者和领导力

组织行为学中，领导力（leadership）早已经是一个主要的研究热点。该领域跨文化研究者们已经成功地将更多国家的被试纳入了研究范围。许多关于领导力的研究，无论跨国的还是在单个国家内开展的研究，都把研究目标锁定在经正式委任的领导者身上。然而，如果领导力仅仅以实施影响来加以定义，那就应该首先考虑那些有关实际影响过程的研究，不论行使影响的人是那些被正式任命的还是其他人。

影响过程

罗尔斯顿等人（Ralston, Vollmer, & Srinivasan, 2003）要求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的管理者评估影响上司的6种方法的有效性。在标准化测量消除了默许反应偏差之后，他们发现美国和荷兰的管理者更偏爱“软”策略，例如理性的劝说和提出额外工作的意愿等。墨西哥和中国香港的管理者更愿意采用“硬”策略，例如通过保留信息和使用信息来控制他人。德国和印度的管理者介于这两种模式之间。由尤克尔等人（Yukl, Fu, & McDonald, 2003）做的一系列情境研究也考虑了向上影响的风格。他们发现美国和瑞士的管理者喜欢以理性的并且鼓舞人心的号召来说服他人，而用口头反对来抵制他人。中国的管理者却认为非正式的方法和避免对抗会更有效，而中国香港地区的管理者介于这些状况之间。

肯尼迪等人（Kennedy, Fu, & Yukl, 2003）扩展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包括了向上的、横向的和向下的影响。他们要求来自12个国家的管理者在这些情境中鉴别每一个场景下16种影响风格中的哪些是有效的。在所有样本中，理性劝说、磋商和合作都被评定为有效，送礼物、社交、非正式手法和压力被普遍认为是相对无效的。把这些影响风格聚类后发现，在低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的国家里，包含磋商和合作的这一簇的有效性在国家层面上的平均分数非常高。

福等人 (Fu, Kennedy, Tata, & Yukl, 2004) 对相同的回答做了分层分析, 该分析还包括另外由梁觉和彭迈克 (Leung & Bond, 2004) 所测量的个人的社会公理 (信念) 数据。16 种影响风格分别被命名为“有说服力的”、“武断的”和“以关系为基础的”3 个因素。在个体层面上, 那些认可梁觉和彭迈克的信念测量中“天道酬勤 (reward for application)”的人, 把有说服力的策略评估为更有效。那些认可社会犬儒主义 (social cynicism)、命运控制 (fate control) 和虔信宗教 (religiosity) 的人, 把自信的和基于关系的策略评价为更有效。在国家层面上, 使用来自于豪斯等人 (House et al., 2004) 的 62 个国家调查 (将会简单加以描述) 所得到的国家层面上的分数, 他们发现几种显著的调节作用。例如, 对自信和基于关系策略有效性的信念, 与那些不确定性规避低的国家的命运控制有着更强烈的联系。这一系列研究的优点在于要求被试在具体而不是一般化的情境中, 对具体的几类人的有效影响做出等级评定, 而不是泛泛的评价。如果这些情境具有代表性, 这类研究结果就更具有跨文化的效度。通过在许多国家的测量, 研究者能够检验在个体层面上, 信念和被知觉为有效的影响方式之间的关联是泛文化的, 还是被国家的特征所调节。

情境化的领导力

一系列进一步的研究开始关注领导者们和与之互动的整体人际网络之间的关系。史密斯等人 (Smith, Peterson, & Schwartz, 2002) 调查了 43 个国家 7000 名管理者在处理 8 种频繁发生的工作事件 (如指定一名新的下属) 时, 依靠 8 种不同指导资源中的哪一种。在大多数国家, 发现最频繁的指导资源是个体的经历和培训、上级、正式规则及程序。然而, 对各种指导资源的依赖程度会随着国家而变化。研究者建构了垂直资源的依赖指数, 对上级和正式规则与程序的依赖赋予正值, 而对依赖自己和自己的下属赋予负值。在国家层面上, 这个指数与霍夫施泰德的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的分数, 以及施瓦茨的等级分数有着强烈的相关。分层分析显示, 对于不同的国家, 霍夫施泰德分数显著地调节了依赖不同资源的评估对工作程序导致的变化。在更具男性气质、低权力距

离的国家，对经验的依赖被评估为更有效。在更集体主义国家中，对同侪的依赖被评估为更有效（Smith, Peterson 等人，2005）。因此，日常工作中管理者处理关键情况的方式与众所周知的文化差异有关是可以理解的。

GLOBE 项目

尤克尔团队和史密斯—皮特森团队做的研究分别强调了领导力与其所发生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他们的研究有点处于对领导力主流研究传统之外，这一研究传统仍然强调有效领导者的独特品质。在跨国研究中，近来对主流传统的主要贡献是 GLOBE 项目（The GLOBE Project）。它是由罗伯特·豪斯指导的，研究涉及到来自 62 个国家的接近 200 名合作者（House 等，2004）。在过去 10 年间，GLOBE（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Effectiveness，全球领导力和组织行为有效性）的研究者们调查了来自各国电信、金融服务、食品供应行业的超过 17000 名管理者。他们要求被试从一张特质清单中选择他们认为有效的领导者特征。在进一步的评定中，他们还按照 9 个维度来描述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组织，这包括他们所见到的（换言之，对当前实践的测量）和他们所希望的（换言之，对价值观的测量）。这 9 个维度都来自霍夫施泰德和其他人的早期研究概念。

邓哈托格等人（Den Hartog, House, Hanges, Dorfman, & Ruiz-Qintanilla, 1999）报告了 GLOBE 研究中有效领导者特质的初步结果。他们发现了世界范围的重要共识：人们喜欢那些可信赖的、精力充沛的、鼓舞人心的，并且有才华的领导者；而排斥那些不合作、自我为中心和易发怒的领导者。所有特质首先按照 21 个种类概括，然后区分为 6 种领导力风格。为了更加清晰地概括他们的复杂结果，研究者在其样本中又形成了 10 个国家簇，这些簇是根据价值观彼此相对近似来加以区分。在所有簇中，被标明为有个人魅力的和团队取向的领导风格得到了积极强烈的认可，而那些自我保护和独断型的领导是最不受欢迎的。然而，对 6 种风格中另外 4 种的认可则随着簇的不同而变化。这项研究最重要的结果是：这些簇中的主流价值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在每一

簇国家中被认为是有效的领导风格及其之间的差异。研究者在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上都发现很大的不同。专栏 9.3 概括了每种领导风格在组织层面和国家层面上的结果。尽管专栏中的所有效应在统计上都有显著性,但大多数并不强烈。在累加水平上,必定会显示出更大的不同。我们希望将来能在单独的国家、行业和组织层面上找到更强的效应。

专栏 9.3

在国家和组织层面上期望的领导风格的预测指标

领导风格	这种风格被认为更有效的国家簇	能预测这种风格的价值观
魅力型 (charismatic)	盎格鲁的 日耳曼的 北欧的 南亚 拉丁语系的欧洲 拉丁美洲	高绩效导向 (O) 高内群体的集体主义 (N, O) 高男女平等主义 (N)
团队取向型 (Team-oriented)	在簇之间无差异	高不确定性规避 (N, O) 高内群体集体主义 (O)
参与型 (Participative)	日耳曼的 盎格鲁的 北欧的	低不确定性规避 (N, O) 高绩效导向 (O) 高男女平等主义 (N, O)
仁慈型 (Humane)	南亚 盎格鲁的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信奉儒家的东亚	高仁慈导向 (O) 高不确定性规避 (N, O)
独断型 (Autonomous)	在簇之间无差异	高绩效导向 (O) 低制度性集体主义 (N, O)
自我保护型 (Self-protective)	中东 信奉儒家的东亚 南亚 东欧 拉丁美洲	高权力距离 (N, O) 高不确定性规避 (N, O)

N = 国家层面上; O = 组织层面上。

资料来源: House et al. (2004)。

斯普雷泽等人 (Spreitzer, Perttula, & Xin, 2005) 提供了我们所希望的来自更多特定目标样本的研究结果。斯普雷泽等人在中国台湾和美国的两个组织中, 检验了传统价值观对变革型领导有效性的影响。变革型领导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Bass, 1997) 在概念上和 GLOBE 研究者所标明的魅力型风格 (charismatic style) 相似, 一些证据表明这种观点在许多情境下都是有效的 (Bass, 1997)。斯普雷泽等表明, 传统中国人价值的测量负向调节了变革型领导对绩效的影响, 换言之, 变革型领导对那些更传统的员工的影响更小。

总之, 领导力的研究者们都认为: 在有效领导力的要素中, 有一些是具有普遍性的, 而其他的要素则更适合于特定的文化。但对于普遍要素和特殊要素何者更为重要, 还没有定论。GLOBE 项目最初根据魅力型或以价值为基础的领导力模型 (这些模型近来被美国很多的领导力研究者所拥护) 来建构概念, 希望能得到一些普遍的结果。最初所使用的非结构化的特质清单允许出现一些很具文化特殊性的结果。然而, 特质清单本身就是强加式客位的研究方法, 我们知道来自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在思考问题时较多地考虑到具体情境。高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背景下的领导力可能更多地与职责而非特质或是风格有关。在低权力距离国家, 领导者实际可能会更加努力以产生影响力, 因为他周围的人对规范性职责的响应较少, 而对于领导者采用的影响风格的响应较多。在高权力距离的国家, 探究领导力特殊性的研究要从情境而不是从特质开始。我们前面已经注意到一些很特殊的影响力的例子, 例如日本人的“甘之” (amae, 见第 8 章) 和中国人的 guanxi (关系) (见专栏 9.4)。

专栏 9.4

“关系”: 帮助还是阻碍?

中国社会非常关注“关系”的重要性。“关系”就是以某种方式在两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使之相互承担责任的联结。这种联结可能是基于亲戚、共同的祖宗、邻居、同学、同乡、同姓或同事关系。这种联结是基于角色的联系而非人格的联系。处于“关系”中的人在长时期内要记得彼此的恩惠并给予回报。一般来说, 任何一方都寻求给予对方的恩惠比他们从对方接受到的恩惠更多, 因此, 享受这种积极恩惠的“储蓄余

专栏 9.4 (续)

额”，以待在将来的事务中加以利用。

樊景立等人 (Farh, Tsui, Xin, & Cheng, 1998) 在中国台湾调查了 560 对上级和下级，其中有 100 对承认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在那些基于亲戚或是从前的邻居的“关系”的人群中，研究者发现对上级的信任明显高，但在基于其他“关系”的人群中则没有。樊景立等人接下来在中国调查了一个由 32 个管理者组成的更小的样本，他们报告了总共达 212 个横向的业务联系。其中 37 种“关系”被标明是基于以前的同班同学、亲戚、同一个血统而建立的。“关系”之间的信任程度上再一次高于样本中的余者。

郑佰坝等人 (Chen, Chen, & Xin, 2004) 使用了情境研究的方法来调查对“关系”的反应。要求中国的商科学生在其上司把一份工作给了某个和上司有“关系”的人时，评估其对上司的信赖程度。当“关系”是基于亲戚或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发现了信任程度的巨大降低。当“关系”是基于从前的同学和亲密朋友时，发现了较小的和不显著的信任程度减少。郑佰坝等人认为产生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由于被试的推理：其上司对朋友或是同学的实际能力很了解。因此，在中国当代新兴的经济活动中，在建立有效的业务关系时，“关系”的某种形式会比其他形式更具适应性。

跨文化心理学家对“关系”感兴趣是因为三个原因。首先，它们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方面还是在其他文化中也有类似的现象呢？其次，这种现象对当前中国飞速的社会变迁的反应是如何呢？最后，对那些外派的商务人员，他们有多大可能处理好“关系”？因为他们的价值体系可能会导致他们把“关系”的某些方面认为是裙带关系 (nepotism)。

家长制作风

一项针对 10 个国家家长制作风的研究 (Aycan, Kanungo, Mendonca 等 2000) 提供了一个更具普遍性，但确实肇始于非西方文化的研究方法。家长制作风 (paternalism) 被定义为一种等级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上级给下级提供指导、培养、保护和关心，而下级则回报以忠诚和恭敬。在消除默许反应偏差后，艾肯等人发现家长制分数在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和中国最高，而在以色列和德国是最低的。多元回归分

析显示在7个国家中，家长制作风的认可和一种拔高了的对他人的责任感有关；在5个国家中，它都能预测雇员的参与愿望。因此，不同的家长制作风的结果因文化而异，这意味在某些国家，家长制作风被处理等级关系的其他方式所替代，在这种文化系统中，家长制作风有消极的内涵。

与这一评估相符的是，由艾肯等人同时采用的低权力距离在个体层面上的测量对责任感或参与愿望没有影响，但它确实能显著预测下属的积极性。这个结果和前面讨论的结果一致：低个体层面的权力距离会提升对公正的知觉（Lam, Schaubroeck & Aryee, 2002）和对“表达意见”给予更多的积极反应（Brockner, Ackerman, Greenberg 等, 2001）。由艾肯等人得到的结果表明，那些衍生于霍夫施泰德原始维度概念和测量方法的一些概念，可能忽略了领导力的某些方面。

作为文化的组织

前面我们已经分别讨论了能体现出组织行为特点的各种典型现象，这样做就等于忽视了这些现象间的关联性。领导力可以被看成是谈判中的一种，谈判会导致公正和不公正的情感。这些过程的任何一个都既是工作动机的原因又是工作动机的结果。这些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是把组织（类似国家）看成是社会系统。就如同国家具有文化一样，组织也有文化。同一个国家内的各组织的各种文化可能会反映一种共同的国家文化，但是使国家具有不同文化的环境性事件，也经常会使不同的组织形成不同的文化。

霍夫施泰德等人（Hofstede, Neuyen, Ohayv, & Sanders, 1990）提出国家文化的主要差异在于它们所拥有的不同价值观体系，但是组织文化的差异更多体现在共同的行为上。因此，相同国家中不同组织的成员可能会共享价值观，并在组织工作和实践中发展出了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价值观。霍夫施泰德等人研究了20个公共和私营组织，其中10个在丹麦，10个在荷兰，他们用7个维度代表组织实践的特点。由于首先扣除了国家层面上的分值差异，可以不用考虑其所在的国家，而使用

这7个实践维度描述每个组织的文化。这些维度包括：过程取向还是结果取向，以员工为中心还是以工作为中心，开放的系统还是封闭的系统等。研究发现，组织文化的类型和组织的一些结构性指标（例如组织的规模、所有权的类型、劳动力成本占预算的百分比和女性员工的比例）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

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强调的，即使所收集的数据来自个体，在不同层面上对总体数据进行分析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构，任一结构仅仅适用于它自身的分析层面。在本章我们报告的几个有关团队的研究中，研究者在验证他们的假设之前，都考虑到把数据总计到团队层面上。霍夫施泰德等人（Hofstede, Bond, & Luk, 1993）采用他们在1990年收集的数据，在个体层面上进行因素分析，他们的做法也强调了这一点。正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这一分析得出了一个不同的因素结构。与上面讨论的各组织层面实践的维度所不同的是，研究者发现6个维度，它们是指个体员工所知觉到的组织特征，即：专业主义、与管理层的距离、对同事的信任、秩序、敌意和整合。不考虑被试所属的组织类型或国家，女性比男性知觉到了更多的信任、更守秩序和更少的敌意。那些在组织阶层中处于更低层的人比那些处于更高层的人知觉到与管理者更远的距离和更少的整合。

跨文化研究对理解组织文化也有所贡献。狄克森等人（Dickson, 在出版）使用GLOBE项目的部分数据来验证他们的一个假设：机械式文化（mechanistic culture）的组织 and 有机式文化（organic culture）的组织所偏好的领导风格会存在差异。机械式文化和有机式文化的区别起源于伯恩斯和斯塔克（Burns & Stalker, 1961），指的是文化被结构化和程序化的程度，也即其灵活和不断变化的程度。为了验证这一假说，研究者在国家层面上进行了标准化以消除各种文化影响，并探索不同组织类型中的程序。结果发现，在机械式组织文化中，专制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风格被认为更有效；在有机式组织文化中，变革型和考虑周全型的领导风格被认为更有效。

国家的文化也可能会影响其中的组织文化类型。范德弗列特等人（Van der Vegt, van de Vliert, & Huang, 出版中）研究了权力距离的国家层面分值是否会调节雇员多样性对创新氛围的作用。他们调查了248

个服务于同一跨国公司的当地员工的“地点（location）”，结果发现，在每一地点，现有部门的多样性和被试在组织内任期的多样性是显著的预测指标。在低权力距离的国家，在这些因素上的多样性和创新氛围有关；而在高权力距离的国家中，这样的关系刚好相反，多样性和低创新氛围有关。

大型组织的管理层现在经常使用可观的资源试图形成组织文化。确实，IBM 公司当初不情愿发表霍夫施泰德（Hofstede, 1980）的研究，原因之一就是其结果突出了在创建一种全球的组织文化的时候，IBM 并没有成功实现它的目标。组织不同于国家的区别在于，组织对其员工进行的控制比国家对本国人民的控制更为精确。这使得他们能够招聘那些他们期望能够创造和维持必要的组织文化的人群。与之相反的是，当前的经济压力要求组织在全球开展业务并雇佣多国劳动力，而多国劳动力的价值观、忠诚度和语言技巧可能和组织需要相脱离。

在合资企业里，建立统一的企业文化可能非常困难。在两个或是更多的组织（每一方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情况下，识别和有效解决突发性文化冲突问题时，我们需要一些实质的资源。这种挑战会产生一些个人或组织的问题，对此我们将在第 10 章予以讨论。

小 结

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和国民财富是员工的工作动机和相应的工作满意度的重要预测指标。在集体主义国家里，心理契约更强调与上司的关系、规范承诺和工作的外在方面。组织公民的成分会因当地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在高权力距离国家里，更赞成符合公平原则的分配公正；但在低权力距离国家里，对程序公正的知觉有更强的效果。东方和西方的有效谈判模型都抓住了此过程的要素，但都不完全，谈判对象的内群体和外群体的身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有效团队工作的预测指标也是具有文化特殊性的。领导者的有效影响在有些方面是具有文化普遍性的，但我们还需要更多和更有效的领导力情境化模型。

有很多关于文化取向个体层面测量的研究，这就可以更容易地解释

文化差异的心理原因。权力距离的个人和国家层面上的测量,是对文化差异更为有效的预测指标,而在其他心理学领域中都没有发现这么明显的效果。尽管本章所讨论的许多研究在样本间都发现了差异,但很少有研究能给出这些差异的大小。因此,我们还是不能评估本章开篇时所引用的霍夫施泰德的观点究竟是对还是错。文化确实重要,但在组织领域内它有多重要呢?

拓展阅读

1. Earley, P. C. , & Gibson, C. B. (2002). *Multinational work teams: A new perspective*. Mahwah, NJ: Erlbaum.
2. House, R. J. , Hanges, P. J. , Javidan, M. , Dorfman, p. W. , Gupta, V. & GLOBE associates(2004). *Leadership,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n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3. Leung, K. (1997). Negotiation and reward allocation across cultures. In p. C. Earley & M. Erez (Eds.) , *New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pp. 640 – 75). San Francisco, CA: New Lexington.
4. Pearson, V. M. S. , & Stephan, W. G. (1998). Preferences for styles of negotiation: A comparison of Brazil and the 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 p. 22 , p. 67 – 83.
5. Rousseau, D. M. , & Schalk, R. (2000).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in employment: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思考题

1. 你会怎样描述你所承担过的工作的满意和不满意的方面? 你对你的雇主有什么期望?
2. 在你们国家, 你认为在工作团队中分配报酬是以什么为依据? 试将100分分配到绩效、平等、需要和资历这四个方面, 看看你认为哪个更为优先。

3. 当准备和来自另一种文化的人员进行业务谈判时, 需要考虑什么事项?
4. 跨国组织需要建立全球的组织文化吗? 为什么? 如果他们想付诸实践需要克服哪些问题?
5. 关注组织行为的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 哪个更有用? 这两个视角是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组织行为的?
6. 在你所熟悉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中, GLOBE 项目研究者所确认的哪种领导风格应当被证明是最有效的?
7. 用哪些方法可以使范尼姆威根等人对道德的研究(专栏 9.2 所解释的)更为有效?



我现在所学习的单词并非像我的母语一样有确凿无疑的意思。（伊娃·霍夫曼，《在翻译中迷失》，1989，p. 106）

前面章节中所回顾的大多数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描述和解释发生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各种心理现象之间的差异。在这本书余下的章节中，我们将更直接地关注不同文化情境中人们的社会化和日益频繁的互动过程。学者们能够在我们所区分出的不同的分析层次上进行跨文化互动研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考虑的是当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时会发生什么，而这也是我们本章关注的焦点。然而，当两个人开始互动后，互动的结果并不仅仅是由这两个人决定的，同时也受到这两个人所属群体的影响。群体间关系的跨文化研究将在第 11 章中予以阐述。最后，近几十年来发生的无数跨文化互动对目前正在发生的全球性变化产生了影响，我们将在第 12 章中对此予以阐述。

专栏 10.1 讲述了一个跨文化沟通不成功的虚构故事。请通读这个故事，注意导致误解的原因。最显著的一个原因就是语言教师罗伯特森女士在对话时没有使用那些简单的、明确的、通俗的英文单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是选择了许多复杂的成语，其中甚至包括了一些只有苏格兰当地

人才能理解的单词。但是，陈先生和罗伯特森女士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分别完成的社会化过程也在许多方面阻碍了沟通的进行。罗伯特森女士所在文化背景的特点是个人主义和低权力距离，相反，陈先生成长于集体主义和高权力距离的文化背景下。根据前面一些章节所了解的内容，你自己能界定出其中存在多少文化差异呢？专栏 10.2 罗列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分析。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已阐释过导致沟通失败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在这里我们主要强调的是一些语言运用方面的问题。

专栏 10.1

学习一种语言和学习一种文化

陈奇洛是香港大学的一名华人新生，他选修了简·罗伯特森女士的商务英语课程。罗伯特森女士不久前才从苏格兰来到香港，她是一名离异的英国老师。陈先生没有通过他的期末考试，因此，她让他中午 12 点到她的办公室，讨论一下他不良的学业表现。因为罗伯特森在 12:30 时与系主任乔治·戴维斯有一个午餐约定。

陈和他的一个朋友在 12:20 时到达罗伯特森的办公室，敲了一下办公室的门，不等对方有任何回应，他就和他的朋友一起进了办公室。罗伯特森惊讶地看着他们。陈和他的朋友走向罗伯特森的坐椅，然后就站在她的旁边。

陈微笑着问罗伯特森：“老师您吃过午饭了吗？”

罗伯特森指着离自己书桌约两米远的椅子，严厉地回答：“陈，请你坐在那儿。”“我想你已经迟到了 20 分钟了”，她抱怨道，“我认为我们最好是单独谈话”。她指着陈的朋友继续说道：“你可以在门外等。”

“啊？”陈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罗伯特森又慢慢地将她的话重复了一遍，陈的朋友离开了办公室。

“我们都认为您很好，老师”。罗伯特森的脸拉了下来。“我们想邀请您参加明天的班级聚会。您会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的，是吧？”

罗伯特森非常震惊地看着陈：“我不能那样做，我之前已经把时间都安排好了。”她反驳道。眉头皱了起来。

“你不喜欢书吗，老师？”陈微笑着询问，很专注地看着罗伯特森。

“陈，你必须明白我们现在有正经事要讨论。你还没有解释你为什么迟到。”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老师，等待着。“陈，你为什么迟到？”

陈笑了起来，随后不笑了。“呃，因为地铁延误了，”陈撒了谎，眼睛向下看，“并且校车非常拥挤，所以我只能一路步行来你的办公室”，他解释道，这倒是事实。

专栏 10.1 (续)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有点油腔滑调，陈？”

“哦？”

“陈先生，说‘哦’是不礼貌的，你应该说‘您能重复一下吗？’”

“对不起，老师。”陈咕哝着，眼睛向下看。

“没关系”她继续说，“你考试的分数并不理想。你怎么会考得这么糟？”陈打了两个喷嚏。

“你感冒了？”罗伯特森问道。

“没有，老师，是因为你身上有气味。”陈的回答是指她身上的香水味。

罗伯特森睁大了眼睛。

看到了她的不自在，陈转移话题，开始回答她先前提出的问题并解释道：“考试很难。但是我已经很努力了，在考试之前我已经反复阅读书——书——书本四——四——四遍了。”陈结结巴巴地说，“我们都觉得你的考试非常的难，而且……”陈继续着，开始提及他的同学，“而且……”

“拿别人做挡箭牌并不好，你应当看清自己的问题。”罗伯特森打断了陈，“如果努力就能通过考试。”

“但是通过您的帮助，我的英语已经进步很多了。您的教学非常棒。看在我已经取得了进步的份上也该让我通过这门课程。”

“我并不关心这些，陈。现在的问题是你的英语能力。而且你经常缺勤，这对你的英语没有好处。”

“在这学期我妈妈住院了。我不得不……（陈停顿了一段时间以寻找合适的词汇）……每天都得去探望她。”

“你首要的任务是学习，陈。你可以在晚上去探望你的妈妈。”

“但是谁来照顾我的妹妹？”陈反驳道。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是吗？”罗伯特森叹气道。

“是的。”陈答道，更加使她的老师感到困惑。

“陈，我现在必须要走了，因为我之前已经和别人约好了。”

“您就看在我可悲的份儿上让我通过考试吧，老师！我真的很需要能通过你的课程。”

“什么？同情地让你通过？我从来没听说过！无论如何，我现在得走了。如果你想要参加复试的话，给我电话我们再约个时间。”

罗伯特森走过去为陈打开了门，陈低垂着眼睛走出了办公室的门，找到他的朋友。

“下次别再迟到了，陈。如果你连这点都做不到，你什么也做不了的。”

专栏 10.2

一次失败的会面——罗伯特森女士和陈先生

罗伯特森女士	陈先生
<p>注重守时。</p> <p>话题单一性——她想一次只谈论一个问题。</p> <p>注重她的个人空间。</p> <p>一直关着门，并且希望其他人只有得到她的许可之后才进入。</p> <p>认为陈考试失败是他个人的失败。</p> <p>陈明显表现出不接受她在谈话中的控制性，使她感觉受到冒犯，她坚持只使用陈的姓来称呼对方表明她的地位。</p> <p>认为陈在迎合他自己。</p> <p>认为考试测试的是学业和能力。</p> <p>认为她的专业角色赞成一个绝对的质量标准，本例中是书面英语的质量。</p> <p>对说谎持批评态度。</p> <p>通过只讨论一个话题来控制互动，但是没有取得她想达到的成果。</p> <p>提了一个否定性问题，这个问题在英语中需要一个否定的回答来表示肯定。</p> <p>对非有意的语言错误感到生气。</p>	<p>视和谐的人际关系比准时更重要。</p> <p>多话题性——认为通过考试、找工作、照顾家人是互相联系的。</p> <p>喜欢靠近，这样会感觉舒服些。</p> <p>并不理解这种尊重的需要。</p> <p>认为将他的朋友排斥在会面之外是没有理由的，并且希望在和老师交谈时能够得到她的支持。</p> <p>通过称呼“老师”来表示对罗伯特森的服从。</p> <p>通过报告全班同学对她教学的积极评价来给予罗伯特森地位，并且把她的时间说成是“宝贵的”。</p> <p>认为努力的证据和能力的证据一样重要。</p> <p>认为让他的老师运用她的自由决定权是合适的，提及他的家庭问题、给予老师表扬和提及他的职业需要。</p> <p>使用谎言和间接表达来恢复和谐。</p> <p>发现他所偏好的处理情况的方式都是无效的。</p> <p>通过回答“是”来作为对一个否定问题的肯定，这是广东话的特点。</p> <p>提及罗伯特森因为她身上的香水而“有气味的”，在广东文化中几乎不用香水。</p>

语言问题

我们先想像一下两个陌生人初次相遇的场景：他们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无论这两个人来自于相同的文化抑或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这些问题都会发生。例如第一印象的形成，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发生，它是一种应对情景不确定性的反应。这些第一印象会受到双方的外貌、对对方所属群体的了解以及会面时环境的影响。然而，当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相遇时，经常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应该使用哪种语言？双方可能共有一种语言、两种以上的语言，当然也有可能发生没有一种语言是双方都会的情况。我们依次来考虑这些情景。

单一语言选择

当双方只有一种共享语言的时候，如何谈话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一旦双方开始互动，沟通调适（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的过程就必定会发生。也就是说，互动的双方需要将自己的话语模式（词汇、发音、说话方式）与对方的话语模式联合起来（Giles, Coupland, & Coupland, 1991）。非常典型的一种情况就是，所选择的语言对于一方来说是母语，对于另外一方来说则是他的第二语言，这种情况对双方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对于母语的一方来说，虽然因为是说本国语言而加强了自己认同感，但是必须用与之前说话方式不同的方法去和对方沟通。母语方需要用简单的语句、避免使用成语、语速放慢以及更多停顿的说话方式。加斯和瓦罗尼斯（Gass & Varonis, 1985）将这些效应定义为“外国人交谈”（foreigner talk）。一些研究认为，相比与将该语言作为母语的人，在与第二语言的人交谈时，说母语的一方会更多地用上述的方式加以调适（Pierson & Bond, 1982）。

但是，这种有效的调适并不经常发生，因为在情景中可能存在一些因素导致说母语的一方拒绝调适，例如，当认为自己所属的群体是与对方的群体相冲突的时候。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之前“调适不足”

(underaccommodating) 的情况之外,说母语的一方也可能会“过度调节”(overaccommodate)。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没有必要地或过度地使用“外国人交谈”,就像和老人交谈时使用“婴儿语”(babytalk)一样(Williams, Garrett & Tennant, 2004)。

有人对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和当地的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对话进行了研究,对话分为模拟的和真实的两种,研究发现那些在对话中作出调适的澳大利亚人更受中国学生的喜爱(Jones, Barker, Gallois & Callan, 1994)。这一系列的研究也说明了母语方进行调适的途径(Gallois, Giles, Jones, Cargile & Ota, 1995)。在和中国学生进行交流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女学生会说得比较慢,并且经常停顿;而澳大利亚的男学生则会提出更多的问题来确定对方是否明白了他所表达的意思;澳大利亚的学生都会将谈话转向对方更熟悉的话题上。谁会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使用什么样的策略,是将来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对于说第二语言的一方来说,情况有所不同。用非母语的语言会话或写作可能会使得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思考。根据互动所处的情境,一个人对其语言的认同感会更弱或者更强。哈尔金和马兹奈夫斯基(Harzing & Maznevski, 2002)提出,在7个不同的国家中,当被试用英语来回答调查问卷和用他们自己的母语来回答调查问卷的时候,他们所报告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当他们用英语作答时,他们所报告的价值观更接近那些将英语作为母语的被试所报告的价值观。这种现象称为跨语言调适(cross-linguistic accommodation)。

对于那些说第二语言的人,即使他们说得很流利,但还是能够通过词汇、发音或者是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将他们和以该语言为母语的人区分开来。例如,阿尔·伊萨(Al Issa, 2003)让美国学生和约旦学生用英语来拒绝他人的要求。结果发现,即使是用英语进行交流,约旦的学生还是使用了阿拉伯人的说话方式,包括更多地参照与他人的关系、更加强调互相帮助、更多地寻求理解,以及更加强调消除消极的情绪。在中国学生和澳大利亚人之间调适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进行调适的中国人会得到澳大利亚人更积极的评价。相对于个体特征(如注视和手势)的标记来说,这一点对于涉及一个人的群体成员性的标记(例如语言的使用、发音、噪音等)来说更为正确(Hornsey & Gallois,

1998)。

因为交谈的许多不同特征,说母语的人常常会在能力评估上低估说第二语言的一方,即使在给定的任务上,他们的能力实际上是与说母语的人的能力相当的(Hui & Cheng, 1987)。这种错误知觉会带来许多消极的后果,这就要求使用母语的一方运用一些认知策略来消除或减小错误感知。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因为,虽然英语并不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是它在国际交流上却是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这也就是说,在当今的跨国接触中,那些使用母语的人多数是那些说英语的人。因此,说母语的一方通常来自于经济实力或政治实力更强大的国家,从而在对话中会加入对相对权力的考虑,在相对权力方面所做的考虑也许会随着个体所处的文化等级性或权力距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多语言选择

当交谈双方共享的语言超过一种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系列相关问题。该选择哪种语言进行交谈受到“民族语言活力”(ethnolinguistic vitality)的指引。民族语言活力是指在特定团体中说该语言的人数、在当地相关机构中的威信和使用。对民族语言活力可以客观地测量出来,但是在许多环境下,对语言活力的主观知觉对于预测人们的行为更加重要。在加拿大,知觉到的语言活力能够正向地预测对一种语言的偏好,而负向地预测学习第二种语言的意愿(Harwood, Giles & Bourhis, 1994)。诺埃斯等(Noels, Clément, & Gaudet, 2004)做了一项研究,让在法国的加拿大学生想像他们正在和某个特定种族语言群体的人交谈,发现在这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调节:与说英语的人交流时,他们的英语认同感上升而法语认同感降低。诺埃斯等也让这些被试评估一下他们在英语方面的信心、英语和法语相比的言语活力、以及他们对在加拿大的英语和法语团体的认同感有多深。结果发现,英语自信心低的人,对法语团体的认同感就会高。在那些英语自信心高的人中,在私下场合法语认同感增加,而在公共场合英语的认同感增加,而语言的活力也是与这两种不同场合的情况相联系的。在私人场合母语居最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模式。因此,母语的民族语言活力是防止英语和其他

广泛使用的语言占主导地位的一个保护性因素。

谈话双方共有两种语言时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编码转换 (code-switching)。编码转换是指在用第一种语言交谈的过程中, 穿插加入一些第二种语言的简单单词或短句。朔伊 (Scheu, 2002) 对西班牙一所学校中一组会说双语的学生进行研究。研究中学生用德语和西班牙语进行对话, 但是在表示强调时经常用到编码转换, 例如诅咒的时候。另外, 编码转换帮助个人在与他人对话时确定同一性。劳森和萨奇夫 (Lawson & Sachdev, 2000) 运用日记和街头现场观察的方法, 对突尼斯人在法语和阿拉伯语之间的编码转换进行取样。他们发现编码转换常出现在组内成员较为非正式的谈话中, 而当突尼斯人和他们的老师或非阿拉伯人交流时, 编码转换出现得比较少。

编码转换对于移民家庭来说也非常有价值。恩格和何 (Ng & He, 2004) 对新西兰的中国家庭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 祖父辈的人倾向于将对话从英文转向中文, 儿童则倾向于将中文转换成英文。中间的父母一代的人常常是在一句话之内进行转换。他们的编码转换有助于祖父辈理解英语和儿童理解中文, 因此中间一代的人可以看作是语言的中介人。

无共同使用的语言

沟通的双方没有会说的共同语言,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第三方翻译者对于沟通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 使用第三方翻译者也有许多困难。翻译者如何代表交谈的双方? 他仅仅是对所说内容进行字面上的翻译, 还是应该运用自己对双方文化的理解来翻译出他认为在双方所说内容背后所隐藏着的含义? 翻译者与会谈中的一方拥有同样的国籍, 这样就使得会谈的另一方要面对两个对手,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两个对手可以以私人的方式来彼此交流, 从而改变了交谈中的权力平衡, 激起被排除在外的一方的怀疑。

专栏 10.3

翻译的困难

商业公司在将广告和宣传语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必须解决遇到的难题。在这方面，他们并不总能获得成功：

- 派克钢笔公司在拉丁美洲推广其产品的时候，最初是用“bola”来表示他们的圆珠笔。在一些地区，bola 可以传递所想表达的含义。但是在其中的一个国家，bola 指的是一个革命；在另外一个国家它表示淫秽；在第三个国家它表示是谎言。
- 一个错误的翻译例子：一家美国的衬衫制造厂在墨西哥的广告语是这样的“在我穿这件衬衫之前，我感到舒服”，而在美国的广告语却是“当我穿了这件衬衫时我感到舒服”。
- 在一些阿拉伯国家，面霜的广告是不成功的。广告展示了一位女士使用面霜前后的照片。虽然广告上的文字翻译对了，但是却把“以前”的照片放在了左边，将“以后”的照片放在了右边。因为阿拉伯人的阅读习惯是从右到左的，那么这个广告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会理解成这个面霜使用后使人的脸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 一家法国服装店的广告语“我们为站街者（指卖淫人员）（street walking）提供服装”。
- 一个日本花园的广告语“日本花园是日本人的精神家园（精神病院）”。

资料来源：Ricks（1993）。

在外交领域，协议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协议中一个或更多关键词能被同等内涵地翻译为两种或以上的语言。在比较私人的场合，翻译者的困难不仅在于说了什么，而且在于沟通过程那些无法用言语翻译出来的交流过程。在医学和心理治疗领域中，如果一名治疗师或其他从业者所面对的当事人是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那么该治疗师就无法依靠对非言语信息的正确理解来进行诊断，而这些非言语信息却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例如，李—瑞派克（Li-Ripac，1980）发现，相对于华裔美国医师诊断华裔美国当事人，美国白人医师在诊断华裔美国当事人时

会对抑郁“过度诊断”。而这种错误诊断可能是由于对非言语线索的误解所造成的，例如在交谈中缺乏凝视（Li, 2004）。眼神交流的不同水平也会因为医师和病人双方面偏好而被阻止或误解（Hillier, Huq, Loshak, Marks & Rahman, 1994）。翻译者有时也会发现他们会被所面临问题的情感强度所影响而卷入到问题之中，并且可能会代替了治疗师的中心作用。非专业的翻译者也可能是当事人的其他家属成员，通常会那些较年轻的家属，这也阻碍了公开地谈论问题（Rea, 2004）。除了翻译的问题，治疗师独立的或依赖的视角以及当事人所重视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可能会非常不一样，这就对治疗过程提出了挑战（Pedersen, Draguns, Lonner & Trimble, 1996）。

专栏 10.4

咨询中的文化问题

在西方国家，大家都认为咨询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然而，在一个非常传统、非常集体主义的文化团体中，私人咨询并不是最好的干预形式，尤其是当咨询是由外国人通过翻译进行的时候。卡维尔（Cavill, 2000）描述了如何培训来自难民营的当地群体的领导者，使他们能够以文化上合适的方法来引导同一性别、同一部族的人集体会面，应对他们共同的创伤经历。

相似地，德怀瑞（Dwairy, 1998）提出在巴勒斯坦裔阿拉伯人中如何解决咨询中的问题。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感是与其家庭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如果让家庭成员也参与进来，那么干预就会更有效。另外，针对他们的治疗必须与西方的家庭治疗方式相区别，对阿拉伯家庭关系的等级性质给予尊重，知道真实的感情是如何隐藏在积极、外交性的表面之下（mosayara）。不那么直接的治疗干预方式包括运用图画和隐喻等。

资料来源：Cavill（2000）；Dwairy（1998）。

理解跨文化互动

在讨论翻译者所面临的困境时，我们已经在触及一个更重要的普遍性问题了。一个人是如何“解读”，也就是说如何准确地理解来自与自己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的语言和动作的？相反地，来自于与自己不同文化背景的另一方又会如何来解读自己的语言和行为呢？语言流利性对于有效的互动来说是一个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所说的话在对方所处的文化背景下如何被解释。在专栏 10.1 中，当陈先生询问罗伯特森女士是否已经吃过午饭了，他的英语是正确的，但是他错误判断了在那个时刻做出这个询问的恰当性。当一个荷兰客人用流利的葡萄牙语询问巴西的主人自己应当何时到他家吃晚饭时，虽然这位荷兰客人这样做是为了确定一下到达的时间，但是却违反了巴西人款待客人的规范。当一个中国的教授对来拜访的爱尔兰教授说自己的妻子没有上大学是因为她比较笨（中国教授的妻子当时也在场），虽然这样说符合中国人谦虚的传统，但是却没有考虑到欧洲的传统观念，他们认为当家庭成员在场时，是不应公开地对其作出批评的（Wei & Yue, 1996）。他们都犯了社会语用学上的错误。

我们有证据说明人们对不同情境中同样的行为会有不同的理解。皮塔姆等人（Pittam, Gallois, Iwawaki, & Kroonenberg, 1995）做了一项研究，他们让澳大利亚学生和日本学生对一系列非言语行为与八种不同情感之间的联系程度进行评估，这些行为和情感都是表现在澳大利亚人和日本人身上的。结果发现存在文化普遍性效应，例如，日本学生和澳大利亚学生都认为微笑与爱、尊重、得意和安慰相联系，与生气、害怕、悲痛无关。另外他们还发现了民族中心主义的效应。例如无论被观察者的国籍是什么，日本学生将语速快与生气、害怕相联系，将语速慢与爱、尊重相联系；相反地，澳大利亚学生并没有将语速和情感互相联系起来。最后，他们还发现，有一些例子能证明被试意识到跨文化差异的存在。日本学生认为，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来回走是和生气、害怕相联系的，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却不存在这种情况；澳大利亚人认为，对

于日本人来说,慢语速是和爱联系起来的,但是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却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在该研究中取样的学生与不同国籍的人交流的经验还很少,所以对跨文化的意识可能偏低;如果是在跨文化经历很多的人群中进行研究,这样的跨文化差异可能会更为显而易见。

阿尔伯特和哈(Albert & Ha, 2004)做了另外一项研究。他们让在美国的10~15岁的英国学生和拉丁美洲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对来自12个学校的场景进行解释,这些场景包括拉丁美洲学生一系列的触摸行为以及一名英国老师沉默和躲避触摸的行为。虽然这次实验的被试每天都在进行着跨文化接触,但是实验结果仍旧显示,他们对场景的解释依旧存在着跨文化的差异。英国人倾向于用个人素质来解释行为,而拉丁美洲人解释行为时会更多地参照环境。例如,英国人认为英国老师的沉默是心怀鬼胎,但是拉丁美洲人却认为这表示她想惩罚一名顽皮的男孩。老师要求学生坐回座位而不要围在她身边,这一点在英国人看来,会认为是一种对个人空间的需要,而拉丁美洲人则会认为这是行使权利。专栏10.5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说明了在教室发生的事情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能够理解行为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那么调整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不被来自其他文化的人所误解就非常重要了。而一个人对这一点的理解程度受到个人的经验和成熟度的影响。劳和桥本(Rao & Hashimoto, 1996)调查了202名在加拿大工作的日本管理者。他们通过比较这些日本管理者影响加拿大管理者或是影响在加拿大的其他日本管理者时的不同表现,来评估文化间适应。结果发现,当与加拿大人一起工作时,日本人说话更加果断,更多地依靠理性,做出更多的威胁并更多地诉诸上级;当他们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他们之间的沟通会比较间接,就如同他们在日本本国和他人沟通一样。托马斯和拉夫林(Thomas & Ravlin, 1995)让美国管理者观看一盘录像带,录像带的内容是一名日本管理者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得行为更接近美国人的沟通方式;或者是一名日本管理者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调整。调查发现,那些做出文化调适的日本管理者被评价为更值得信任和效率更高。

专栏 10.5

教室中的文化

洛杉矶有一个幼儿园，里面大多数的孩子都是拉丁美洲人，而老师也是拉丁美洲人。老师将班级的红色蜡笔、蓝色蜡笔和绿色蜡笔分别用盒子装了起来，以便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它们。一位来参观的白人督导对这名老师说，这种安排是不合适的。她认为将蜡笔一起收集起来进行归类，学生就不会认为这些蜡笔是他们个人的财物，也不会学着去好好地使用它们。如果把蜡笔分发给每个人，孩子们就会学会看管自己的蜡笔盒，将自己蜡笔弄断的人就不会来指责别人了。

老师贯彻了上级所给予的建议，将这些蜡笔装在盒子中，分发给每个学生。但是这却与拉丁美洲孩子每天在家中接受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抵触。在每天放学时，他们并不关心他们的蜡笔是否都放在了自己的盒子中。一段时间后，老师发现，每天放学后，她必须重新将这些蜡笔放回每个孩子的蜡笔盒中。这个改革失败了。

像这样的故事为一系列“桥梁文化”（bridging cultures）工作坊提供了基础，在这些工作坊中，老师和研究者一起创造并且验证各种处理教室文化问题的方法是否有效。

资料来源：Greenfield, Trumbull & Rothstein-Fisch (2003)。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都说明了日本管理者调整自己的行为。我们在第6章中讨论过，那些来自于集体主义国家的人更倾向于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情境。李（Li, 2004）关于眼神交流的研究是另外一个例子（在第8章中已讨论过）。加拿大人比中国人更频繁地进行眼神交流。然而在加拿大—中国的混合配对中，中国人对加拿大人的眼神交流次数上升了。这种调节可以看作是“自我监控”（self monitoring）的一个例子，它是人格的维度之一，存在着个体差异（见第7章）。来自个人主义国家的个体在不同文化情境中互动时对自己行为做出调整的程度和频率需要进一步研究。一项早期的研究表明，在香港的美国管理者并没有这样做（Black & Porter, 1991）。

刻板印象还是框架

在决定如何与一个来自于其他文化的陌生人进行互动时，我们面临一个选择策略的问题。一方面，可以以一种“文化盲（culture-blind）”的观点来接近这个人，换句话说假定世界各地的人相互交流时所采用的方法有许多共通之处。根据这个观点，一个人可能会按照平时的方式和另一个人交流，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已经发生一些错误沟通为止。这与那些运用强加式客位研究方法的研究者是相类似的，这些研究者只有当他们发现无法达到预期目标时，他们才会修改自己的方法。在另一方面，也可能以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研究中提供的指导方式去接近一个陌生人。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根据由跨文化研究者提供的国家层面的特征来建构一组期望（例如，Bond, 1991a）。相关的期望包括知道陌生人所处的国家文化的个人主义、等级制度和在陌生人的国家里人际互动的典型情景。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些最初的刻板印象，并且会发现我们的刻板印象与某个特定的个人也许并不完全吻合。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利用这种方法时所发生的误解比文化盲的方法较少。

刻板印象经常被定义为一种对他人的偏见和消极的观点。然而，我们这里所关注的群体或国家普遍性是建立在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未经验证的偏见之上的。相对准确的刻板印象有许多来源，而非仅仅阅读这本书，这些来源可以包括直接的经验、和其他旅行者交谈、来自媒体的信息以及培训项目等。稍后我们会对培训项目进行讨论。刻板印象包括一个“事实核心”（kernel of truth）（Allport, 1954），只要将刻板印象看作是和他人互动的一个临时的基础，那么它们对沟通的有效性就是有帮助的。例如，李和迪纳斯（Lee & Duenas, 1995）对墨西哥商人和美国商人之间的会谈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双方都对另一方的时间取向有刻板印象。墨西哥人说美国人是“机器”，意指他们偏好线性、有秩序的、“同一时间只做一件事情”的风尚。而美国人则认为墨西哥人是“香蕉人”，意指他们以很放松的方式同时从事数项工作，没有严格的时间规定。这些刻板印象能提供一个基础，使双方能就人际风格的差异需要进行调适和协商，从而高效率地一起合作。

跨文化技能

知觉到差异以后,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来成功处理跨国互动?对于这一过程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一些研究者试着将关于个体跨文化技能的早期研究加以系统化,然后将各种可能的组成部分贴上了诸如“文化智力”(culture intelligence)的标签(Earley, 2002; Thomas & Iskson, 2004)。关于在某一特定文化范围内一个人所学习的与他人相处的技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泛化到其他文化疆域中,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我有和拉丁美洲人互动的技能,那么我是否能在和南亚地区的人或者东欧地区的人互动时更加熟练呢?当今的一些研究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证据。

范德齐和范奥登霍芬(Van der Zee & van Oudenhoven, 2001)创造了一种测量方法,称为多元文化人格问卷(MPQ),该问卷包括了自我报告的文化共感、开放性、情感稳定性、社会主动性和灵活性五个分量表。通过自评和他评,发现之前有国际经历的荷兰学生的MPQ分数比那些之前没有离开过荷兰的荷兰学生的MPQ分数高。MPQ分数同样也能预测在中国台湾的外派者其个人的、职业的和社会的调整(van Oudenhoven, Mol & van der Zee, 2003)。然而,由于MPQ只触及和本国人相处时的特征,如果它被认为是测量跨文化技能的一种有效的方法,那么它必须比那些传统的人格测量问卷更有效地对跨文化经历进行预测。范奥登霍芬和范德齐(Van Oudenhoven & van der Zee, 2002)对一所荷兰商业学校的外国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MPQ对外国学生调节能力的预测好于对自我效能感的预测。相似地,松本等人(Matsumoto, LeRoux, Bernhard, & Gray, 2004)编制了一个测量跨文化调节潜能的量表。在日本学生去美国之前,让他们填写量表,结果显示,即使是在除去由大五人格问卷解释的差异之后,量表分数能够很好地预测他们在东道国时对调节能力的自我评定、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的程度和生活满意感的高低。

所以我们认为,对跨文化技能的初步测量是可能的,但是这个结论迄今为止都是建立在自我报告技能和自我报告调节能力的基础上得到的。在得出稳定的结论之前,必须要建立关于调节的独立标准。至今还

没有对这些经过了泛化的跨文化技能测量与学习特定国家的知识两者之间做对比研究。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证据了解跨文化智力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如果存在差异）单一文化环境中有效活动所需的社会智力。

跨文化培训

大多数到访其他文化地区的人都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准备培训。然而，提高跨文化互动成功率的一条途径就是提供这样的培训，尤其对那些会在国外停留较长时间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培训的方法可分为提供基础信息，加深对其他国家的理解，提供更有效互动方法的实践。提供信息本身对成功的跨文化互动没有很明显的积极作用，因为信息很难与个人所遇到的特定环境相匹配，并且很容易被遗忘。然而，信息提供如果和其他形式的培训相结合，则会变得非常有效。

加深对其他国家理解的培训试图提高受训者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关注一个人的行为会被当地人如何理解。该培训可以通过使用模拟情景来实现，例如“BaFa BaFa”（Shirts, 1995）。受训者被随机分配到两种模拟文化中的一种文化中，要求每一组的受训者按照培训者所提供的一系列规则进行活动。两种文化中的成员互相见面时会产生一系列的误解，而这些误解稍后就会被用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都会用自己在母文化中所持的观点去解释他人的行为。然而，没有什么证据显示这种培训是有效果的，也没有证据表明模拟情景会对一个人的跨文化有效性有持久的影响（Ward, Bochner & Furnham, 2001）。

技能导向的培训更接近于有效的培训干预的要求。本章强调了语言在跨文化互动中的关键性，毫无疑问，跨文化培训最有效的培训形式就是学习当地的语言，但是语言的学习需要很长的时间。培训也需要提供相关技能学习的机会，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培训可以建立在出发前与当地人会面的基础上。另外，也可以提供给受训者关于一个或多个关键性事件的描述，而这些事件是之前其他人去相同的地方时所发生的。通过小组讨论，他们能够知道哪些地方出了问题，以及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处理这些事件。

关键事件的收集也被用来建立人们所知道的文化同化工具（culture

assimilators)。文化同化工具包括对关键事件的一系列简短的描述，每一个事件又包含了四种甚至更多的不同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是正确的，其他的解释都是错误的。专栏 10.6 给出了这样的例子。通过学习这些文化同化工具，受训者能够提高他们正确行事的能力，尤其当同化关注的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并且建立在关于该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时。

专栏 10.6

文化同化

噢，非常合适！

玛莎·安德森担任助教的英语班进展得非常好，越南学生、柬埔寨学生、中美洲学生彼此都很融洽并且能够相互适应，男生女生经常互相帮助。由于几乎没有接触过其他文化，所以玛莎对他们的轻松互动感到非常惊奇，并且常常就她在教室中观察到的一些不同的行为向辅导员求教。学生们彼此都非常礼貌，即使是在他们不能够理解对方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和玛莎或是其他辅导员交谈时，他们也特别有礼貌，经常用一些非常正式、礼貌的称呼。

玛莎想要和学生们发展关系并且使得他们感觉到轻松自如。一次她单独约见了维恩。她想让他称呼自己的名字，于是说：“我的名字叫玛莎，请叫我玛莎！”。维恩回答说他的确知道她的名字，但是“用您的头衔称呼您不好吗？”玛莎说这个称呼太正式，他们可以成为好朋友，所以坚持让他称呼自己玛莎。维恩微笑并且点头，但是在下个星期他就没有再出现在英语课堂上了。

怎样解释这种情况呢？

1. 维恩认为玛莎对自己太过侵略性并且太接近自己，因为女性一般不会这样和男性交谈。
2. 玛莎不应该单独挑选出一个人。维恩不喜欢被单独挑出来。
3. 英语班对于维恩来说太复杂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4. 玛莎违反了在南亚国家存在的复杂的层级系统。

请在看专栏 10.7 之前做出你的选择。

对于跨文化培训有效性的评估已经有了适中却积极的结果。德实庞德和维斯维瓦让 (Deshpande & Viswesvaran, 1992) 通过元分析得出, 对管理者的跨文化培训是有效的。但是, 许多研究的成功指标是在培训结束后立即完成的, 而不是在受训者开始任务或者在任务完成之后。加依和普恩 (Gannon & Poon, 1997) 比较了信息提供和看录像结合、只看录像和 BaFa BaFa 训练三种培训方式, 发现这三种方式在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上没有差异, 但是参与 BaFa BaFa 更加快乐一些。厄尔利 (Earley, 1987) 比较了 80 位到韩国工作的美国管理者所参加的培训项目, 培训为期三天, 内容不同。作为项目的一部分, 受训者或是接受关于韩国的书面信息然后小组讨论, 或是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参观亚裔美国人社区然后小组讨论, 或者两者都接受。这些受训者在韩国的管理者所做的绩效评估, 说明这两种培训方式都比不培训更有效。但是, 那些接受了两种培训方式的人的工作绩效最好。

得出跨文化沟通是否有效的结论的困难在于, 培训结果是在不同的研究中用许多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估的, 而每一种培训方法可能是和不同类型的跨文化接触相适应的。因此, 我们最有把握的是, 如果培训设计是与受训者需要相适应的, 那么有一些证据能证明培训是有效的。我们需要明确哪种形式的培训在哪个跨文化标准上显示出了积极的效果。

专栏 10.7

文化同化答案的解释

1. 在许多东南亚国家, 女性的角色应当以某些方式受到制约, 例如接近男性。但是, 这个班级是在美国, 而且也有从其他国家来的学生和教师在一起互动。事实是英语班是混合性的, 学生似乎能够和睦相处, 这说明了这的确不是维恩不来课堂的原因。
2. 来自亚洲社会的人的确不喜欢被单独地挑出来。但是在这个例子中, 这是次要的。玛莎是在和维恩单独谈话, 因此即使没有其他人在场, 也没有强调的必要。
3. 很难得出这个结论, 因为所有的状态都说明了这个班级的情况良好。

专栏 10.7 (续)

4. 这是一个最佳答案。南亚人有着一个关于地位层级非常复杂的系统。玛莎试着降低她的角色或地位便违反了这个系统。但是，她的尝试并不是维恩不想回来的所有原因。如果她只是提出建议，然后让维恩自己决定，那么维恩可能会感觉更舒服。她的坚持迫使维恩进入了一种情境，而在这种情境中，他必须放弃之前所拥有的全部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资料来源：Brislin, Cushner, Cherrie & Yong (1986)。

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

诸如“调节”、“适应”、“文化适应”和“有效性”等术语经常运用于对文化间接触结果的分析中。我们将会在这一章余下的部分以及下一章中看到，在考虑如何有效运用这些术语时，我们需要小心从事，就如同学习关于应激、紧张和调节等在心理学中最为宽泛的概念时的情况一样。沃德（Ward, 2001）将人们与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在一起时所做出的反应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情感反应，其范围包括高兴、迷惑、焦虑到抑郁等，沃德等人将这些反应定义为“**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第二种是文化学习过程，包括学习（或未能学习）其他文化群体的人是如何活动的，应当如何处理这种文化等，沃德等人将这些过程定义为“**社会文化适应**（socio-cultural adaptation）”。第三种，如果延长跨文化接触的时间，那么一个人将会把自己看作当地群体的一部分或者是将自己与当地群体分离开，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沃德等人将这些更加认知性的过程作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来加以讨论。在这章中，我们只关注这些适应中的前两种，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关注的是那些会停留相对较短时间的个体。

接触的类型

那些在与自己文化群体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停留一段时间，但不久以

后还是要回到自己所属文化群体的人被称为旅居者 (sojourners)。旅居者与移民是不同的。我们现在就依次讨论三种最常见的旅居者。

游 客

旅游是现今世界上跨文化接触的一个最大来源。在 2003 年, 全球共有 6.94 亿人次的跨国旅游者 (世界旅游组织, 2004)。旅游停留的时间很短, 并且经常是和同一国家的同伴一起出游的。因此, 旅游者与旅游地当地的居民直接接触的机会经常受到参观安排和参观程序的限制。并且, 接触也经常被当地酒店业的代表所代替, 他们的任务就是导游、解说和接待。

旅游对旅游者所产生的影响随着旅游者旅行动机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不同。那些去海边度假、滑雪度假、色情观光的游客对旅游地的当地居民最不感兴趣。而名胜地观光、参观电影拍摄景地、背包游和经济游都很有可能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意识和知觉 (Ward 等人, 2001)。除去这个差异, 所有类型的旅游都有一些共同的元素, 即离开自己所住的地方, 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可能会遇到不熟悉的细菌、不熟悉的食物、不熟悉的住处和不熟悉的同伴。因此, 旅行者会不同程度地经历“文化休克” (Pearce, 1981)。

更加重要的是, 调查显示当代旅游业对东道国的人口有着实质的影响, 尤其是旅游者占当地人口的比率很高的地区。最直接的一个效应就是经济的重构, 越来越高比率的当地人进入到旅游者服务的行业中, 进而导致获利较少的职业和技能的散失。这些变化导致一系列的应激和不确定性, 挑战了先前存在的文化价值观。贝诺 (Berno, 1999) 就旅游对太平洋库克群岛不同岛屿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 在那些较少被观光的岛屿上, 游客被看作是客人。在游客和当地居民人数之比为 3.6 比 1 的拉罗汤加岛上, 传统的语言和习惯已经丢失了, 并且有证据显示当地的居民采用了游客所展示的行为。当地的经济得益于旅游业; 东道国居民中的有些产业部门也从中得利, 并且他们很欢迎这些改变。对当地居民进行的态度调查 (Reisinger & Turner, 2002; Jurowski & Gursoy, 2004) 发现, 在那些对经济利益感到满意的人和那些对环境和

文化效应感到不满的人之间存在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随着地区和主要旅游目的地距离间的不同而不同。

厄利(Urry, 1990)对他提出的“旅游者凝视(tourist gaze)”做出了界定,是指旅游者希望强调他们通过观看和拍摄旅游地景观的方法来说明去过不同的地方旅游,而这些地方对他们来说是新异的和不同的。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游客太多,导致有文化特色的仪式、事件和工艺消失了,因此需要重建它们以满足游客。尽管传统技能的复兴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是将仪式调整得适合游客观看、将文化工艺品修饰得更加畅销,这些恰恰扭曲了所营销的文化过程。就像莫斯卡多和皮尔斯(Moscardo & Pearce, 1999)所说的,“民俗旅游正在陷于消耗其自身所依赖基础的危险中”(p. 147)。

因此,东道国对旅游的文化冲击的感受要比旅游者对文化冲击的感受强得多。在一些情况下,旅游的压力推动了东道国对其成员进行文化培训。例如,博克纳和库伦(Bochner & Coulon, 1997)开展了文化同化培训项目,以帮助澳大利亚的导游更有效地接待日本游客。那些拥有特定文化技能的东道国成员成为非常有价值的人力资源,因为他们能够迎合来自相关文化群体的游客。

留学生

据估计,现今至少有超过一百万的留学生,有些时候他们被称作国际学生。因为和旅行者相比,留学生会离开自己的国家更长的时间,所以对留学生的研究更关注于在他们留学期间所发展起来的人际关系类型,并且关注这些关系如何影响他们的适应能力。将留学生与本国人的关系、与东道国的人的关系和与其他国家人的关系区分开来是非常必要的。许多研究结果在这方面都有一致的报告,即使这些研究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完成的,例如美国、澳大利亚、以色列、英国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Ward 等人, 2001)。大多数留学生报告说在他们留学期间最好的朋友是和他们一个国家的人。和东道国人的关系主要是工具性的,也就是说能够满足学术上的要求和获得语言上的帮助。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的关系主要是提供社会支持。对心理适应的测量能通过旅居者与东道

国国民和与同国留学生之间较好的关系来加以预测。

解释这些结果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建立关系就能产生满意感，还是那些彼此更满意的人更能够建立支持关系？是否存在着第三个成分，诸如一个乐观或社会智力的人格变量，能够推动这两项结果呢？在留学生出国之前进行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弄清这些困惑。这些研究揭示出人格对于出国之后的调节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预测指标。英和莱斯（Ying & Liese, 1991）发现，出国前的抑郁水平能够负向预测中国台湾学生在美国的调适情况。沃德等（Ward, Leong, & Low, 2004）发现在澳大利亚留学生和新加坡留学生中，低神经质和高外向性是**与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相联系的**。

然而，仅仅依靠人格因素并不能充分地预测适应。我们也必须考虑留学生前往的地方的文化类型。奥格瑞和古迪昆斯特（Oguri & Gudykunst, 2002）认为留学生的**自我诠释**和当地文化偏好之间的匹配能够预测他们在美国的调适。**独立型自我诠释能够预测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能够通过运用更直接的沟通和对沉默更好的接受来加以预测。**这种方式符合美国当地的规范。沃德等（Ward, Leong, & Low, 2004）用另一个不同的方法对“文化匹配”假设进行验证。他们将留学生的大五人格与留学生留学所在地的大五人格常模进行比较，发现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拥有与新加坡人相似人格的澳大利亚人，或是拥有和澳大利亚人相似人格的新加坡人，他们在**心理适应**上会更容易。这两项研究截然相反的结果可能是由于留学生留学所在地的差异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由于所验证的“匹配”的类型不同而造成的。

的确，环境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使得留学生的经历也非常不同。那些非常重要的变量包括：留学生的年龄、旅居的时间、母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的相似程度、和东道国成员进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可能性，以及所知觉到的自己被东道国成员接受/拒绝的程度。例如，如果留学生认为自己的国家在东道国人的眼中不是一个积极的形象，那么该留学生可能就会体验到“丧失地位”。在一项早期研究中，库查巴莎（Kagitcibasi, 1978）在两组土耳其高中生中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测量。这些土耳其学生有在美国学习一年的经验，并且他们在美国时是与美国家庭生活在一起的。在这项研究中，库查巴莎在这些学生出国前和回国后

对他们的态度、自我概念和世界观进行了测量。与在土耳其度过相同时间的控制组学生比较,由于这些留学生是与接受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的,因此这些学生显示出了积极的成长和调适、更好的内控、更高的自信、较少的独断以及更开阔的思想。即使是在他们回国后的一年或两年后,这些留学生在回国后也表现出了积极的再调适。

这项研究发现了一个最理想的留学生经历。有一些证据显示,留学生在他们回国后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会体验“再进入”(re-entry)问题。沃德等人(Ward, Berno, & Main, 2002)发现,在那些从澳大利亚返回的新加坡留学生中,在澳大利亚的心理调适能预测返回新加坡后的心理适应,在澳大利亚的社会文化调适不能预测返回新加坡后的社会文化适应。这项发现很有意义,因为心理适应受到个人特质很大的影响,但是社会文化适应会遇到更大的环境挑战。

旅居工作者

在近二十年来,商业旅行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之前的关注焦点是那些承担某项外派任务长达五年时间的外派管理者,通常他们都是在跨国企业的子公司中任职。尽管仍有外派,但电子邮件的出现和旅行工具的改善意味着商业旅行的时间会短很多。就像我们在第9章中所提到的,许多工作可能是由跨国团队来完成的,他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来交流,只有偶尔通过面对面的会谈。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其他类型组织的职员,例如援助机构和外交服务,这些人更加符合传统外派者的角色。

组织外派者需要面对一些和留学生一样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额外的、不同的挑战。因为相对留学生来说,外派者的年龄更大一些,所以他们经常是和配偶、孩子一起去到国外。成功调适通常是与一起去到国外的人一起融合的调适,而不是外派者单独一个人的调适。早期的研究显示,从其岗位上提前回国的外派者比例较大,这被证明是不正确的(Harzing, 1995)。然而,提前回国与配偶不满意感有关是正确的(Thomas, 2002)。尽管配偶可能会支持外派者,但也有可能配偶无法在当地社区找到另外的有意义角色。的确,配偶可能会发现新文化中

的一系列不同和不受欢迎的角色要求。在美国工作的日本管理者中，工作一家庭关系影响着调适的两个方面：工作压力影响配偶的调适、较差的配偶调适能预测早点回国的意图（Takeuchi, Yun & Tesluk, 2002）。外派者需要面对的第二个困难是，无论是在当地进行评估还是在自己国家内进行评估，他们都必须做出令人满意的工作绩效。由于本国的成功标准和当地的成功标准经常互相矛盾，这就使得员工工作绩效很难同时使得两地都满意。例如，当地人希望外派者的行为能够符合当地的规则，但总公司通常会使用全球化的绩效标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经常评估来解决，评估包括来自于当地和总公司的反馈（Gregersen, Hite & Black, 1996）。

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差别使得对组织外派者的研究同样富有成果。在一个对在尼泊尔援助工作者的研究中发现，外派者对同一国家的人的认同能够预测心理适应，对尼泊尔当地人的认同能够预测社会文化适应（Ward & Rana-Deuba, 1999）。人格特征能预测差的心理适应，如外控型、对尼泊尔人的低认同以及高孤独感等（Ward & Rana-Deuba, 2000）。但是，和留学生一样，高社会文化适应能够提高外派期间的有效性，但是对外派者回国后的有效性没有什么帮助。萨斯曼（Sussman, 2002）发现，从日本回来的美国教师中，那些对日本人认同感最强的人是那些返回美国时体验到最大精神痛苦的人。

我们所回顾的对不同类型的旅居者进行的研究说明，那些跨越文化边界的人都会面对不同程度的角色冲突。一些人能够找到更好地处理这一紧张的方法，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无法避免。问题发生不仅仅是因为旅居者的个人特质，也因为他们所认同的特定群体。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更详细地探索这些过程。

小 结

语言是对跨文化互动结果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尽管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常常不赞同这种观点。语言流畅性决定权力关系，并且影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喜欢程度。语言可以用来定义一个人在和他人相处时的认同

感。没有共通的语言会严重影响跨文化互动的成功。但是,使用共通的语言也并不能确保一个人理解对方的目标和观点。跨文化技能需要意识到其他人的观点可能会与自己的不同,需要调节自己的行为以加强彼此理解的能力。跨文化技能究竟是情境一般性的还是情境特殊性的,至今仍没有定论。跨文化技能究竟是社会智力的一个成分还是一种独立的能力,至今也没有定论。通过旅游,跨文化接触正在不断增加,而旅游已经成为了文化变化的一个主要成分。和旅行者相比,旅居者在国外停留的时间更长,并且和当地人互动得更多。在评估旅居者的经历方面,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之间的差别是主要的研究对象。

拓展阅读

1. Brislin, R. (2004). Encouraging depth rather than surface processing about cultural differences through critical incidents and role plays. [www. wvu. edu/ ~ culture](http://www.wvu.edu/~culture)
2. Bochner, S. (2004). Culture shock due to contact with unfamiliar cultures. [www. wvu. edu/ ~ culture](http://www.wvu.edu/~culture)
3. Reisinger, Y. , & Turner, L. W. (2002). *Cross-cultural behaviour in tourism: Concepts and analysis*. Oxford, UK: Elsevier.
4. Scollon, R. , & Scollon, S. W. (2001).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Malden, MA: Blackwell.
5. Thomas, D. C. (2002). *Essentials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ousand Oaks, CA: Sage.
6. Ward, C. , BOchner, S. , & Furnham, A. (2001) *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shock*. (2nd ed.) Hove, UK: Routledge.

思考题

1. 如果你会两种语言,你用其中一种语言表达和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时有何不同感觉?什么事情是你用两种语言都能很好地表达出的?为什么?

2. 如果你只懂一种语言，当你和那些使用其第二语言的人进行交流时，你会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调整会对你和第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跨文化技能是否有广泛的适用性，还是仅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能起到有效作用？为什么？
4. 如果你是一名旅居者，什么因素会帮助或影响你的适应？



你们这 50 个群体，说着 50 种不同的语言，都拥有自己的历史，各怀仇恨和敌意。但过不了多久，兄弟们，你们都会受上帝的驱使……德国人、法国人、以色列人、英国人、犹太人、俄国人，你们都会进入熔炉！上帝正在创造美国人！[以色列·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大熔炉》，1909，第 33 页。]

当赞格威尔大约一个世纪前写的剧本展现在 21 世纪的我们面前时，剧中人物所说的铿锵有力的话就描绘出一幅画面，说明移民将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场翻天覆地剧变中的文化。在本章中，我们将检验世界是否真的成为文化的“熔炉”（cultural melting plot），或是群体之间的某些持久关系限制了这一转变。我们首先看更基础的方面：不同群体的成员如何知觉另一群体的成员。然后再考虑这些过程在那些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的人身上是如何发生的。

社会认同过程

在第 6 章里我们讨论了不同社会背景下个体解释自己的方式，特别关注了**独立型自我诠释**与**依赖型自我诠释**的区别。尽管这一区别对跨文化心理学家来说很有价值，但不能据此认为只有那些依赖型自我诠释的人才关心他人的反应。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坚持认为，社会比较的过程才是每个人定义他是谁的核心。塔杰夫（Tajfel，1981）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式，后来又被重新组织成了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Turner 等人，1987）。

按照这一理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能通过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来定义我们自己。社会认同是通过把我们自己知觉为对我们有吸引力的某个社会团体的成员而实现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根据年龄、性别、家庭、种族、国籍、职业、朋友圈、宗教等级等等来取得一系列的社会认同。同样，在知觉我与他人的差异的基础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定义我们自己的个人认同。我们在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选择前提是：这个选择能为我们自己提供更多的积极自我形象。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想要对自己持积极的观点时，就可能致使他对其他人或他所属的群体之外的群体持消极的观点。

自我分类理论的学者知道，我们对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选择是相对灵活多变的，在每一天内我们就可能以许多不同的身份来知觉自己，这取决于当时激发我们不同身份的不同的个体和社会环境。从自我分类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把**独立型自我诠释**和**依赖型自我诠释**理解成固定不变的特质或素质，而是理解成在更多的时间里按照个人认同或社会认同来考虑自身的一种平均趋势。

如果自我分类理论能提供给我们一种有用的基础来思考族群间和国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需要先考虑到，该理论的形成和测验基本是在欧洲的条件设置下的，有什么证据能表明该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样适用？在第6章，我们讨论了东亚人是否也具有在西方调查对象中典型的自我拔高的需要，并且我们提到了有纪（Yuki，2003）的研究，这一研究表明他的日本调查对象对群体内关系的关注高于对群体之间的比较。在另一个相关的研究中，德弗里斯（De Vries，2003）发现在斐济这个以种族区分的国家中，尽管认同群内人的斐济人同时也显现出更多的内部偏见，但他们并不贬低外族人。对外族的反应是通过对盛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距离的知觉来预测的。

为了确定这些限制对自我分类理论的影响，我们需要直接对其效应作跨文化的比较。这样的研究并不多见，陈等人（Chen，Brockner，& Katz，1998）比较了随机分组的中美学生的行为。研究者想办法让团队成员相信，如果自己的团队表现得更好或更坏，相应之下，自己个人的表现也更好或更坏。在差的团体表现条件下，美国调查对象的反应是对其组内评价低于其他试验条件，中国学生团队对组外评价低于其他实验

条件。换句话说,美国调查对象通过将自己与群体分离来保持他们的个人认同,而中国人通过贬低组外人来保持本组内的归属感。这些结果被认为是受**依赖型自我诠释**调节的。就好像在被告知表现不好的人里,依赖性高的调查对象相比独立性高的调查对象更喜爱组内人而非组外人。第二项类似的研究中,也向被试反馈了其他组的表现,当其他组表现好而本组表现不好时,那些更倾向**依赖型自我诠释**的人则保持更高程度的组内偏爱(Chen, Brockner, & chen, 2002)。

德莱加等人(Derlega, Cukur, Kuang, & Forsyth, 2002)对社会认同理论所派生出的假设也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他们询问了美国学生和一组异质的非美国学生来评价他们可能用于处理人际、群体间和国际冲突的不同方法。**依赖型自我诠释**预示在人际冲突中对他人观点的接受度更高,但在组间冲突时更多使用威胁。那些具有高度依赖性的人也因为与外组的冲突而报告出更多负面信息。德莱加等人提出,这一模式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那些高度依赖性的人更加强烈地认同组内人。总的来说,这三项研究使我们相信,社会认同理论与其衍生的自我分类理论的确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得到了支持,并且自我诠释的测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得到的结果。

自我分类理论学者也提出,一个人越是与一个给定群体中的原型成员相似,这个人越有可能采纳一个给定的社会认同。因此个人就会利用不同团体成员的典型形象对自己的团体认同做出判断。这里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广大群体认同的**族群特性**、“**种族**”(race)和国籍。这里种族加引号是因为人类种族区分的存在缺乏生物学上的证据(Segall, 1999)。遗传标记所显示的特征,例如在不同人口中的血型和HLA抗原,揭示出的是一种逐步的转变,而不是能足以区分出不同种族的清晰的差异。自我们共同起源于非洲之后,不断的人口混合已经确保了所有人来自一个共同的基因血统。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相当大的程度是非洲人加亚洲人加欧洲人。在人类上千基因中,社会惯例已经创造出了一些通过肤色和面部特征来定义的“**种族**”群体。然而,这样的种族划分是社会构念的而非基于生物学。尽管“**种族**”一词更易接受,族群特性的概念为描述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了更好的途径,因为它可以更好地反映他们的文化构造基础。族群特性和国籍都是社会构念,它们反映了人们

社会化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本章的关键问题是帮助我们理解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认为某些概念是真实的，导致我们认同一些观念，而又排斥另一些观念。

国籍刻板印象

在前几章里，我们讨论了不同国家群体在价值观、信仰和人格方面的差异。这些发现能够给我们提供相对精确的、从经验中得来的刻板印象。如何将它与不同国家一般大众中流行的世俗的刻板印象相比较？在讨论以下研究的时候，我们需要牢记研究者所发现的世俗刻板印象不够精确，它们经常来自诸如大众媒体这样的间接信息源，而非直接经验。我们并非认可它们，只是研究它们是什么，它们如何形成又如何影响那些认可它们的人。

异质刻板印象

皮博迪（Peabody, 1985）让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学生对来自6个国家的人的不同特质的典型性分别予以评价。他发现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特别是对异质刻板印象的评价，也就是说对其他国家的、非本国人的评价。被试都同意美国人自信，英国人自律，德国人工作勤奋。回顾目前可得到的出版文献，皮博迪总结说他取样的学生的异质刻板印象与经验研究的结果高度一致。斯蒂芬等人（Stephan, Stephan, & Abalakina, 1996）在6个国家的学生中发现共识：日本人工作勤奋而传统，俄国人坚强而被动，美国人好胜、现实、情绪化。在后来的一项调查中，迈克安德鲁等人（McAndrew, Akande, & Bridgestock）调查了对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美国和尼日利亚人的异质刻板印象，调查是在这5个国家以及南部非洲的另外5个国家的学生间进行的。评估者对9个测量异质刻板印象中的8个特质达成了显著的一致，他们惟一没有达成一致的一个维度是目标国家的人是慷慨还是自私。正如我们所见，这一“道德”维度经常作为区分组间差异的

一个重要的基础，特别是偏向评估者自己的群体。

我们所调查的人不可能都去过他们要评价的国家或者见过很多来自那些国家的人。所以问题来了，这些国家的代表性是怎样被产生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它来自媒体，但这并没有回答那些被媒体渲染出的形象的来源是什么。林森和哈根多姆（Linssen & Hagendoorn, 1994）测试了一系列备选的假设来解释学生所展现出的西欧人的异质刻板印象。通过对这些特质所做的因素分析，他们确定了4个用来知觉外国人的维度，即效率、支配性、共感和情绪。这些维度与客观的国家特点相关。可以理解的是，知觉到的效率可以通过国家富有程度来预测，支配性通过国家政治力量来预测。共感可以通过国家大小来预测，情绪通过国家地理纬度更靠南来预测，但后面这两种预测就不是那么直接了。

情绪和国家地理纬度偏南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单一的国家内发现这种情况，这很可能与气温有关，并且在南半球应当相反。在第4章，我们讨论了气候和在更温暖气候下出现的各种文化类型之间的可能联系。这使人们相信来自气候温暖国家的人总体上与那些来自较为寒冷国家的人存在着差异。佩内贝克等人（Pennebaker, Rimé, & Blankenship, 1996）从26个国家的学生中取样，检验了人们认为同一国家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感情更丰富这一观点。21个北半球国家的被试支持这一观点，但5个南半球国家被试的结论则不存在任何方向上的差异。这一效应离赤道越远越显著，在欧洲比北美显著。佩内贝克等人也让被试在同样的量表上评价自己，发现一个显著但微弱的倾向：南方人认为自己比北方人感情更丰富。因此，在这种特别的刻板印象中有一些真实的成分。

回到国家刻板印象的主题，库迪等人（Cuddy, Fiske, & Kwan, 2003）从欧洲国家的学生中取样，让他们评价本国人和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测量一个刻板印象结构模型的跨文化效度，这个模型与性别刻板印象相关（Glick & Fiske, 2001）。模型建立在这样的想法上：可以在两个基本维度（任何特定目标群体被知觉到的能力和热情度）上对刻板印象加以分类。不同程度的能力和热情度相组合定义了三种可能的偏见形式，叫做家长式作风（paternalism）、轻蔑（contempt）和妒忌（envy），以及一种正面的刻板印象，叫做钦佩（admiration）。专栏11.1描述了这项欧洲研究的结果。其结果与库迪等人的假

专栏 11.1

在两个纬度共有的欧洲异质刻板印象的定位

	低能力	高能力
高热情	(家长式作风) 西班牙 • 意大利 • 葡萄牙 • 希腊 • 爱尔兰 比利时 • 瑞典 丹麦 • 荷兰 芬兰 • 卢森堡 • 奥地利	(钦佩) • 法国 • 英国 • 德国
低热情	(轻蔑)	(妒忌)

资料来源: Glick & Fiske (2001); Cuddy 等人 (2003)。

设相一致, 该假设认为对每一个国家地位的测量将预测能力, 而对本国缺乏竞争力的知觉将与热情评价相关。在能力方面, 这些结论与林森和哈根多姆 (Linssen & Hagendoorn, 1994) 的研究结论相同, 但在对热情的结论上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尽管在国家的异质刻板印象上取得广泛的共识, 也存在特殊因素, 这些因素影响特定国家的国民彼此刻画对方的方式。范奥登霍芬等人 (Van Oudenhoven, Askervis-Leherpeux, & Hannonver, 2001) 用社会认同理论预测, 学生对他国的印象反映了在多大程度上该国威胁他对自己国家的认同。他们认为小国的身份会因大国的存在受到威胁, 尤其当他们所讲的语言相似时, 然而大国的身份不会因小国的存在受到威胁。他们利用比利时是一个相对它的邻国德国、法国较小的国家这一事实来说明这个理论。更进一步说, 在比利时, 佛兰德社区的第一语言是荷兰语, 在瓦龙社区第一语言是法语。正如预期, 佛兰德人对德国人的印象

与德国人对佛兰德人的印象比较起来,会表现出更多自大和更少的同情心。瓦龙人对法国人的看法和法国人对瓦龙人看法之间的对比更为强烈——这一发现支持了预期结果,因为他们说同一种语言。

尽管对国家刻板印象的研究最多,而且已经取得了大量实质证据,同时对形成这些刻板印象的因素也做了很多研究,但专栏 11.2 中的内容提醒我们不要错误地认为刻板印象是一成不变的。

专栏 11.2

刻板印象如何多变?

尽管国家的异质刻板印象在持久的历史、政治、地理特征下是可以预测的,它们仍然受到媒体报道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哈斯拉姆等 (Haslam, Turnet, & Oakes, 1992) 测量了在第一次海湾危机时澳大利亚学生对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当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开始军事冲突六周后,研究者又重复了他们的测量。重复的测量显示澳大利亚学生对美国人中的勤奋、正直和科学头脑等特质的评价显著下降,而对自大、好争辩和热爱传统等特质的评价显著增加。

然而,哈斯拉姆等人的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刻板印象可以很容易被改变,通过简单的实验设计调节就可以改变。自我分类理论认为我们表达出来的态度会因我们在某一特定时间点归类自己的方式而不同。哈斯拉姆等人仅通过在实验指导语中提及其他国家名字,例如伊拉克,就能引起澳大利亚人对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产生同样大的相似变化。

这项研究是对刻板印象跨时间稳定性的早先工作的放大。例如,50 年来一系列以美国学生为对象的研究表明,虽然世界性事件影响了部分刻板印象,但有关种族和国家群体的刻板印象存在稳定性 (Gilbert, 1951; Karlins, Coffman & Walters, 1969; Katz & Braly, 1933; Singleton & Kerber, 1980)。自我分类理论家认为,我们一生获得了许多对其他群体的不同刻板印象,这些印象取决于特定时间的社会背景。尽管有些人也许持有长期的偏见,但还有一些人在某些时候聚焦于另一群体的积极特征上,某些时候聚焦于消极特征上,这取决于存在或不存在威胁、取决于不同的听众等。通过实验方法,哈斯拉姆等人扩大了我们对于刻板印象形成过程的理解。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础,使得经常与国际冲突相伴的消极国家刻板印象有了改变的希望,不幸的是,刻板印象经常被基于传统的、带偏见的媒体报道歪曲和扩大。

自我刻板印象

了解特定国家的异质刻板印象是有价值的。这些信息有助个人做出移民决定和了解相应国家的外交。然而,对大多数个体来说,其他国家的刻板印象能够给个体提供一个与自己国家的刻板印象的对比。至少在一个人从自己的国籍出发想到自己的时候,社会认同理论声称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国民,我们会寻求把我们的国家和国民界定得更为积极。然而,皮博迪(Peabody, 1985)在他的样本中发现,自我刻板印象并没有比异质刻板印象更为积极。迈克安德鲁(McAndrew, 2001)的研究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尼日利亚自我刻板印象比异质刻板印象更积极,美国自我刻板印象比美国异质刻板印象要消极得多。这些分歧也许因为答卷者是学生,学生并不必然是其国家的典型代表。与那些把所在国家知觉为一个整体的人们相比,很多国家的学生认可那些更激进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度很有可能没那么强烈。

与这一推理相一致,史密斯等人(Smith, Giannini, & Helkama, 2005)发现,9个欧洲国家学生样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有实质的不同,德国被试的得分最低。然而,在所有样本中个体对其国家的认同与更为积极的自我刻板印象相关。特别对**依赖型自我诠释者**更是如此。斯蒂芬等人(Stephan, Stephan, & Abalakina, 1996)也测试了社会认同理论在这方面的预测性。在他们的测量中,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被试都认为积极特质在本国更为典型,而消极特质要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不典型。

主要政治事件也影响自我刻板印象和异质刻板印象的分歧。皮博迪(Peabody, 1985)收集的数据和斯蒂芬等人(Stephan, 1996)较晚些的研究指出,尽管冷战结束了,欧洲答卷者继续保持对俄罗斯人的消极异质刻板印象,把他们视为严肃的、顽固的、工作努力的和固执的。与此对比的是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慷慨、轻率、坦诚、不切实际(Peabody & Shmelyov, 1996)。我们目前缺乏这样的被试的系统资料:这些被试与俄罗斯人有日常接触,并且这些接触能显示出他们自我觉知到的情绪性(emotionality)和自发性(spontaneity)。

很难否认大多数国家认同中都有一些消极的方面。社会认同理论预测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会寻找其他的基础来比较自己所属的群体和其他群体。波普和林森(Poppe & Linssen, 1999)报告了这样的例子。他们在中欧和东欧的6个国家的在校学生中取样,发现来自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学生在一系列积极品质,或研究者认为更高的能力方面,得分更高。然而,学生们的自我刻板印象强调了另外一套特质,这些特质能代表他们国家的优越道德品质。当被评价国家又小又不够强大时,这个结果最为强烈。波普(Poppe, 2001)通过进一步收集数据,确定了这些变量之间的部分因果关系。当评价者所在国家的经济状况下降时,他们对来自更成功国家的人的道德评价甚至更低。

关注本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培养一个人对其国家的积极认同。刘豁夫等人(Liu, Lawrence, Ward, & Abraham, 2003)要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学生列举本国历史上的十大重要事件。由两国华裔、印度裔、马来西亚裔答卷者所列出的事件十分相似,主要集中在独立和国家地位等成就上。刘豁夫等人认为这种共有的“支配权”的观点更能提高一个人的国家认同而不是民族认同。然而在中国台湾,尽管有共同的历史观,但这一历史却被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加以评价,取决于答卷者的家庭在历史上哪一个时点上移居到中国台湾,其结果是人们要么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要么以一个中国台湾人的身份来加以认同并表述历史(Huang, Lin, Chang, 2004)。

其他的历史环境也产生各种不同的历史观。例如,刘豁夫等人(Liu, Wilson, McClure, & Higgins, 1999)发现 pakeha(白种人)和新西兰毛利人在列举他们国家历史上重要事件和评价它们的意义时有很大差异。他们认为毛利授权(Maori empowerment)正在产生一种竞争性的而非支配性的新西兰历史观。很多欧洲居民现在觉得在认同自己国家和认同自己是欧洲人之间没有冲突,也许这种情况可以作为超越过去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方式。相反,认同自己是英国人和认同自己是欧洲人之间是负相关的(Cinnirella, 1997; Smith et al., 2005)。以前,格根(Gergen, 1973)认为社会心理学应当被视为社会历史的一种,记录我们当前如何彼此相关联,而不用考虑现在的发现在将来是否会保持不变。对国家和超国家的认同研究揭示了历史在心理学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解读国家历史的方式限制了我们的当代身份选择。

种族刻板印象

种族刻板印象的研究和国家刻板印象的研究有着实质上的不同。这方面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异质的刻板印象上，甚至大量关注负面态度，这些负面态度被更典型地描述为偏见。而且不同国家中的族群社区很少有一样的，因此通常在单个国家内研究这种刻板印象，而单个国家提供的具体信息很少以至于无法达到超越国界的程度。

早期由阿多诺等人（Adorno, 1950）进行的一项美国权威人格研究遭到了后人的许多批评，但它鼓励了后续研究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对一个种族社区有偏见刻板印象的人也经常对其他少数族群社区有偏见。因此我们目前主要测量的是：右翼权威主义（Altemyer, 1988）、微妙却显而易见的偏见（Pettigrew & meertens, 1995）和种族容忍度（Berry & Kalin, 1995）。

对偏见的普遍测量的确有它们的有用之处，但是它们也要冒险把注意力转移开：我们都保持除自己以外的族群形象。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情境因素也起作用，特别是在关系到偏见行为时尤其如此。例如，一项早期种族偏见的研究显示，在工作环境中，美国南部城镇中的大多数白种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交往，因为工作环境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做，但是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却不交往，因为在那里，种族隔离还是一种社会规范（Minard, 1952）。的确，佩蒂格鲁指出了微妙偏见与明显偏见之间的区别（Pettigrew, 1998），这种区别结合了人格和情境视角。在像荷兰这样的社会，受更多教育的中产阶级表达明显的偏见会显得不那么“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环境压力导致偏见以一种更为微妙和间接的方式指向少数民族。

通过对普遍偏见的测量，我们可以把注意指向偏见特别严重的人，而远离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内容。在思考特定族群被以什么方式知觉时，我们再次依靠格里克和菲斯克（Glick & Fiske, 2001）的偏见类型模型。专栏 11.3 说明了美国不同族群的刻板印象定位（Fiske, Cuddy,

Glick & Xu, 2002)。贝里和卡林 (Berry & Kalin, 1995) 在加拿大进行的一项调查指出, 全体国民对不同族群的偏好有共有的评估, 最偏爱的是欧洲民族。在他们的样本中, 更能宽容的和不那么宽容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是: 不宽容的人对他们喜欢和拒斥的族群所做出的评价有更明显的区别。

专栏 11.3

在两个维度上的美国种族刻板印象定位

	低能力	高能力
高热情	(家长式作风)	(钦佩)
	移民工人 •	黑人专业人士 •
	拉美裔美国人 •	亚洲人 •
	• 贫穷白人	• 犹太人
	• 贫穷黑人	• 阿拉伯人
低热情	(轻蔑)	(妒忌)

资料来源: Fiske, Cuddy, Glick, & Xu (2002)。

研究偏见的另一个方法是研究偏见性判断的形成过程。媒体通过重复描述族群特性和社会问题之间的联系, 就形成关于族群的印象。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面对面的关系中。维库伊腾 (Verkuyten, 2001) 在荷兰成人中实施了焦点小组访谈, 让他们讨论他们多文化的社区。经过研究, 他们识别出了构成少数族群关键判断的四项策略: 将行为描述为不正常、将行为认定为超越了道德标准、将极端行为事例作为典型, 以及断言某种行为背离某个少数族群的文化规范。其他研究者致力于通过测验一些与偏见有关的更为具体的信念来解释偏见。我们逐个检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几个研究思路。

整合威胁理论

斯蒂芬和斯蒂芬 (Stephan & Stephan, 1996) 提出一个假设, 认为对族群的偏见部分或全部与四种不同的威胁相联系, 这四种威胁是现实性威胁、象征性威胁、群体间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现实性威胁可以包括工作机会的竞争和对个人健康或环境污染的威胁。象征威胁是感觉到对个人文化群体价值观和规范的威胁。群体间焦虑可能是与过去有冲突或者先前接触比较少有关。消极刻板印象可以导致对困难和不悦接触的预期。斯蒂芬等人 (Stephan, Ybarra, & Martine, 1998) 让西班牙的学生评价他们对摩洛哥移民的消极情绪水平, 而让以色列学生评价他们对埃塞俄比亚和俄罗斯移民的消极情绪。他们也各自评价他们所经历的四种类别的威胁。对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人来说, 最显著的预测指标是群体间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对俄罗斯人来说, 最显著的预测指标是群体间焦虑和象征性威胁。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 斯蒂芬等人 (Stephan, Diaz-Loving, & Duran, 2000) 发现, 群体间焦虑能够最好地预测美国学生对墨西哥学生的态度, 而群体间焦虑和消极刻板印象共同预测墨西哥学生对美国学生的态度。群体间焦虑是消极情绪最为一致的预测指标, 但我们要更仔细地研究这一焦虑的原因。

现实冲突理论

艾赛思等 (Esses, Dovidio, Jaclspm, & Armstrong, 2001) 在北美开展了一项聚焦于斯蒂芬四种威胁的研究。移民占据更多工作机会必然意味着非移民的工作机会比原先要少, 这种“零一和” (zero-sum) 信念被反复用来预测不愿接纳移民的现象。更进一步说, 当向答卷者给出认可或拒绝零和信念的信息时, 他们回答中不愿接受移民的程度会随着信息不同而不同。因此, 偏见态度的表达可以像刻板印象那样用实验来操纵。

杰克逊等人 (Jackson, Brown, Brown, & Marks, 2001) 也比较了偏见和知觉到的威胁对移民态度的影响。他们从一项在欧盟每个国家所做的年度公众意见调查 Eurobarometer 中获取数据。杰克逊等人比较了导致答卷者声称移民应当回到他原来国家的不同预测因子。在取样的

15 个国家中发现有 14 个国家感知到威胁中“侵占”(encroachment)是一个显著的预测因子。侵占在斯蒂芬的象征威胁类别中这样定义——对我们的价值观和正常生活方式的威胁。相反,种族主义仅在 11 个国家是显著预测因子。对移民应当设一些限制以及认为移民没有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只在 9 个国家中有预测性。这些预测因子明显解释了每个国家的不同,真实地反映了欧洲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移民率,从爱尔兰的 11% 到法国的 45%。这项研究也表明,特定信念的表达方式与单纯的偏见测量相比,能够解释更多的效应。

社会主导取向

西达纽斯和普雷托(Sidanius & Pratto, 1999)建立了一个关于同一个国家内不同群体互相关联方式的理论。他们认为,地位较高的群体会认可一套态度和信念,以此证明他们的特权地位是正当的,例如“正义世界”假设,这种信念认为社会上地位较低的人之所以地位低,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失败。这个观点为劣势者的地位原因做出“内部”归因,并且忽略了社会的不公正。那些认可这种“社会主导取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SDO)的人会认同他们的群体,并且对其他群体很少产生兴趣。地位较低群体的成员也可能认同 SDO 信念,但如果他们认可这种信念,他们就会更少认同自己的群体,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寻求转移到地位较高的群体中去。SDO 理论最初在美国建立,在性别和族群特性两方面也获得了支持其效度的证据。SDO 假说随后在加拿大、以色列和中国台湾被检验(Levin & Sidanius, 1999; Pratto, Liu, Levin, and Sidanius et al., 2000)。在每个国家和地区,研究者对当地的男性至上主义、种族偏见、保守主义和支持霸权等相关因素进行了测量,SDO 测量与这些测量结果都正相关,在几乎所有例子中,高地位的人对内群体的认同都很一致。特例是,SDO 在中国台湾并不能预测与配偶相关的种族偏见,但是在以色列,的确能预测与以犹太人为配偶的相关种族偏见,而以阿拉伯为配偶时则没有这个作用。因此,有证据表明 SDO 理论具有普遍有效性,但当地环境的确限制了它的范围。

后来,SDO 被用来对黎巴嫩群体关于 2001 年纽约世贸大厦受袭的观点进行分类。认同阿拉伯身份与认可 SDO 观念两者间存在负相关,

与认为“9·11”事件是正义的之间存在正相关 (Lewin, Henry, Pratto, & Sidanius, 2003)。在研究者看来,支持袭击更为准确地被解读成对美国主导的拒绝,而非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Sidanius, Henry, Pratto, & Lewin, 2004)。SDO 有时被认为是基于人格的偏见的一项测量。然而,艾赛思等人 (Esses, Dovidio, Jackson, & Armstrong, 2001) 发现,美国人中 SDO 与关于职位竞争的零和信念显著相关,但在对黑人和亚裔移民的偏见态度上相关微弱。另外,SDO 和对移民的消极态度间的关系是通过实验操作“零和”工作竞争来中介的。因而,SDO 最好被认为是一套关于群体间关系的信念而非基于人格的偏见指标。SDO 理论对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移民通常被分配到最低的社会地位。SDO 似乎与施瓦茨理论中个体层面的保守维度和梁觉等的社会犬儒主义的测量相似。

个人主义群体对集体主义群体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一个社会内群体互相关联的讨论与跨文化心理学家所使用的概念很少有联系。然而,能够并且应该有明确的方法来找到这样的联系 (Smith & Long, 出版中)。如果社会认同的根据在于群体成员资格,我们可以预期在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中群体间关系存在不同的表现方式。在个体层面上,我们预期**依赖型自我诠释**可以预测更高程度的内群体偏差 (in-group bias)。例如,在新加坡的中国学生和马来学生中,只有在**依赖型自我诠释**上得分高的人显示出内群体偏差 (Lee & Ward, 1998)。

在思考更为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群体间关系的本质时,我们必须回到集体主义模棱两可的定义上来。集体主义主要是关系性的吗?集体主义群体的成员是通常全神贯注于自己群体而对自己群体之外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吗?或者说,集体主义仅是一个成员分类的问题,集体主义的成员始终意识到他们与其他群体的关系变化?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回答。甚至有一些研究社会认同理论的西方研究者提出,在将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比较时,在一些条件下比另一些条件下其差别

会更突出。辛克尔和布朗 (Hinkle & Brown, 1990) 提出不同群体文化依据两个正交维度而变化。首先, 群体可以是集体主义或者个人主义取向, 这取决于他们的活动是整合的还是相互依赖的。其次, 群体可以是相关的也可以是分散的。换句话说, 一些群体存在的原因可能涉及与其他群体的比较, 如运动队; 或可能与其他群体无关, 如一个家庭。这种群体的类型学与在第5章中我们讨论过的库查巴莎 (Kagitcibasi, 1996b) 的自我诠释类型学非常接近。

辛克尔和布朗预测, 对个体内群体的偏见只会在集体主义和关系型的群体中找到。在英国这个个人主义国家的群体 (Brown, Hinkle, Ely 等人, 1992) 和巴西这个集体主义国家的群体间, 使用个体层面的依赖和关系型取向的测量, 找到了支持这一预测的证据 (Torres, 1996)。我们需要进一步检验这一模型, 但在不同文化中对其进行检验可能存在困难, 只是因为不同类群体在比较它们自己和其他群体时的程度在不同文化间存在差异。这个问题在托雷斯的研究中已经很明显了。巴西学校儿童对自己社会阶层的从属更具关系性, 这一点远甚于英国学校儿童。

荣誉文化

在一些集体主义文化中, 针对其他群体的关系型取向尤其突出。如果某群体中一个成员的尊严和名誉被冒犯, 作为该群体合格的成员, 有责任对冒犯本群体成员的个人或群体做出适当的惩罚。据说在欧洲地中海部分地区、中东、拉丁美洲和南亚均存在这种荣誉文化 (Honour Culture)。在这种文化中, 荣誉的概念有着独特的内涵。为了对照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中对荣誉的理解, 莫斯奎拉等人 (Mosquera, Manstead, & Fischer, 2000, 2002) 在荷兰和西班牙从学童和成人那里得到了有关荣誉及荣誉丧失与提升的相关情境的描述。在荷兰, 对荣誉的理解与自我成就和自主性相联系。相反, 在西班牙, 荣誉感与一个人的家庭和对他人的依赖有联系。在西班牙, 荣誉被视作更重要的概念并且与骄傲、羞耻和愤怒的情绪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西班牙语中 *pundonor* 的概念及希腊文 *philotimo* 这样的相关概念是指一种个人的尊严和荣誉, 通过完成对自己内群体成员的义务来保持。这些义务包括对受宠爱的人

忠诚和慷慨好客，但也包括在面对威胁和侮辱群体的荣誉时给予坚定的防卫。正如我们在第8章提及的，在对比各种侮辱时，我们发现了这种不同的有趣观点。在荷兰，大多数咒骂针对个人，但在土耳其，还往往牵扯到对方的家庭，强调将个人荣誉与其直属的家庭荣誉牵扯在一起(Uskul & Semin, 2004)。

据说传统的荣誉文化发端于牧民文化(Peristiany, 1965)。放牧兽群的分散本质使盗窃牛、羊和骆驼的事件相对容易发生，而传统法律的执行相对困难，于是出现了非正式的、对侵犯自己所在群体的人进行制裁的方法。这种文化的中心价值观是男子勇猛和保护妇女。破坏这种荣誉会引起复仇，包括当侵害严重时的荣誉杀人，例如在性方面失贞和逃离包办婚姻。这样的惩罚很正常并且也会得到每个内群体成员的支持。

尽管荣誉杀人比以前少了许多，当代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存在着持续的、特色鲜明的各种荣誉文化(Nisbett & Cohen, 1996)。科恩和尼斯贝特(Cohen & Nisbett, 1997)将假装参加过荣誉杀人的人的求职信寄给一些公司，在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公司，获得的回应比北部和东部的公司更积极。他们也将有关荣誉感杀人者的信息寄给报社，南部和西部报刊登出的故事更有同情心。科恩和尼斯贝特指出，这样的结果不能单纯归结为总体上更偏爱暴力——所发现的差异是与荣誉相关的情节所独具的。传统甚至能影响法律。就在不久之前，在土耳其刑事法典中，挽回一个人自己或其家庭的荣誉被认为是荣誉杀人问题的改良模式。

范德罗和科恩(Vandello & Cohen, 2003)让巴西和美国学生评价女性配偶的不贞对男性名誉的损害。他们也评估了使用暴力在多大程度上能挽回名誉以及女性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配偶的暴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著地符合来自巴西和美国南部被试的荣誉文化，而较不符合美国北部的被试。当范德罗和科恩在实验中上演一名不知情的被试目睹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明显的暴力，他们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男人和女人事实上都是实验合作者。与那些来自南部美国的被试相比，来自美国北部的被试对这一暴力表达出较少宽容，当该女士谴责这一暴力行径而不是为此事件责怪自己时，北美的被试对受害者留下了更好的印象。

并非所有的集体主义文化都是荣誉文化。例如，在东亚文化中还没有确定荣誉文化的元素。如果事实上有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文化，我们

应当更全面地了解它们如何产生，并在分析不同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之间移民的问题时，更全面地思考这差异。

宗教和群体间关系

在当今世界，确实有一部分群体间的暴力冲突，对这些群体而言，宗教归属是一个主要的认同来源。通常这些冲突的领导者是一个拥护犹太—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群体或国家，而另一个领导者是拥护伊斯兰教的相对集体主义的群体或国家。分析这些冲突需要提供更为详尽的处理，但维护荣誉常常是引发此类危机的诸多原因之一。在应对这些冲突时，跨文化心理学家可以提供某些类型的信息，以便我们更完整地理解这些冲突的动力学特征。亨廷顿（Huntington, 1996）把这些冲突描述成一种文明的碰撞，而宗教信仰是这一碰撞的中心要素。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的，在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分布的确形成对比。然而，这种分布没有仔细标出宗教归属的分布。进一步说，一项取样于11个国家的个体层面上的研究显示出自评宗教虔诚和施瓦茨笃信一教的信徒（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价值观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Huisman, 1994）。那些自评更虔诚的人最认可传统、顺从、善行。

当然，也可能这些最积极参与群体间冲突的人和一般人口不同。卡恩和史密斯（Khan & Smith, 2003）比较了巴基斯坦两个群体成员的个体层面施瓦茨价值观。两个群体都是信仰一个宗教，但其中一个群体更积极地参与有政治动机的恐怖活动。恐怖主义群体的成员在享乐主义、刺激和权力价值观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另一群体，而另一群体在善行、普适主义和服从价值观上得分更高。恐怖主义群体成员在独立型自我诠释的得分更高。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从宗教冲突的角度分析当代文明碰撞过于简单化了，它们更应当被视为由社会支配权、不平等、现实威胁和荣誉所驱动的群体间冲突。

蒙蒂尔和沙（Montiel & Shah, 2004）研究了我们在观察冲突的视角是如何受相关群体信仰的歪曲的。他们在菲律宾学生（在菲律宾信基督教者占大多数，而信伊斯兰教者为少数）和马来西亚学生（在马来西亚穆斯林占大多数，而基督徒为少数）中取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被

试需要对一起被描述成恐怖袭击或者“自由斗士”的自杀性爆炸做出反应，这个爆炸炸毁了大楼并炸死许多人。正如他们预测的那样，蒙蒂尔和沙发现，在评价投弹者的品质时没有国籍和宗教效应。然而，两个国家占少数的群体相比多数群体对“自由斗士”标签的反应更积极，而对“恐怖袭击”标签的反应没那么积极。

这就证明，作为少数群体成员的经历而非宗教归属是这一条件下的关键原因变量。移民通常属于一个少数群体，我们接下来考虑他们的经验。

移 民

人们因为种种原因从一种文化背景搬到另一种文化背景，这些原因从强制性地被迫逃离战争和迫害到自由选择以获得一份新工作或离亲属更近些。我们在第1章提到，当今移民最大的特点是从农业地区到城市的移动。鲁巴克等人（Ruback, Pandey, & Begum, 2004）调查了新德里、达卡和伊斯兰堡贫民区的移民。搬到城市的最大原因是为了找工作，但也有很多回答者将他们的搬迁归结为命运。归因于命运与缺乏个人控制感有关，而与宗教和贫穷程度无关。

从郊区到城市环境的移民可以体验到很多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的人的困难。然而，大多数移民研究关注的都是国际移民。在当今世界，在一些较大城市可以找到拥有广泛文化背景的人们。除了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公开寻找特定种类的移民外，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人口流动。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在巴西，孟加拉国人在日本，越南人在芬兰，塞内加尔人在意大利，土耳其人在德国，克罗地亚人在瑞典，苏里南人在荷兰，菲律宾人在中国香港，北非的阿拉伯人在法国。我们发现不说波兰语的哈萨克裔波兰人和不说德语的俄裔德国人分别再次移民回到德国和波兰。真是五花八门！

为了更好地理解涉及这些文化变迁的过程，我们需要能够抓住相关核心的概念模型，我们在本章中已经触及到了两个这样的模型，也就是赞格威尔的熔炉理论和以社会认同理论为核心的社会心理形成模型。前

者展示出一个无情的文化融合，而后者强调东道国人民并非总是欢迎移民。目前的绝大多数研究是按照文化适应的过程来说明的。

评估文化适应

在知道文化适应实践的重要性后，我们并不惊讶它成为近年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我们首先关注如何定义文化适应。

概念性的问题

虽然人们对这一主题早有兴趣，由三位人类学家拉德菲尔德、林顿和赫斯科维茨（Redfield, Linton, & Herskovits, 1936）首先提出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定义仍旧被人们广泛地接受。

文化适应包括这样一些现象：来自不同文化的群体经过第一次握手，某一方或双方群体原先文化模式的改变…在这样的定义下，文化适应与文化改变（文化改变仅仅是单方面的）以及同化（这有时是文化适应的一个阶段）是有区别的。（pp. 149 - 152）

这个定义的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它关注文化而非个人，它把文化适应看作一方或双方体验到文化改变的过程。因此，为了利用它，我们需要牢记在前几章讨论过的分析层面的问题。到达一个特定国家的大量移民，有可能改变该国文化模式，也有可能改变不了。例如，近几十年来，移民的一个主要影响是改变了许多国家的餐馆所提供的菜系。这一变化接着又会改变人们在自己家里对食物的选择。然而，文化适应的研究重点一直是移民而非东道成员。文化层面的过程很少告诉我们个体移民的经历或者那些以不同程度接触移民的东道国人民的经历。

为了关注这些经验，我们需要将心理或者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过程概念化。在第10章，我们已经讨论过沃德等人（2001）的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的区别，这些概念给予我们有价值的提示，测量文化适应同时需要注意个人经验和个人与其他文化群体接触的经验。

研究者对**文化适应**所采用的最简单的概念化方式是将其等同于同化 (assimilation)。比如, 量表被设计成为测量一个特定移入群体成员说英语的程度, 吃典型美国食品的程度, 看英语电视台等等。这一类型的一个例子是广泛使用的斯维恩—鲁亚洲人自我认同**文化适应**量表 (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 Scale) (Suinn, Ahuna, & Khoo, 1992)。目前, 越来越多的批评指出这样的量表没能适当地区分积极参与两种文化群体的人和对两个群体活动都不怎么参与的人。例如, 在回答“你和社区中什么人联系”时, 回答是一个五点量表, “与盎格鲁群体和亚洲群体交往相等”得分为3, 这使远离两个群体的人和积极参与两个群体的人发生混淆。在回答同一问题时, “几乎只有盎格鲁、黑人、西班牙人和其他非亚洲群体”得5分, 这会识别出积极避开自己族群的人。由于这些不合理之处, 这份量表的得分不可能预测社会文化适应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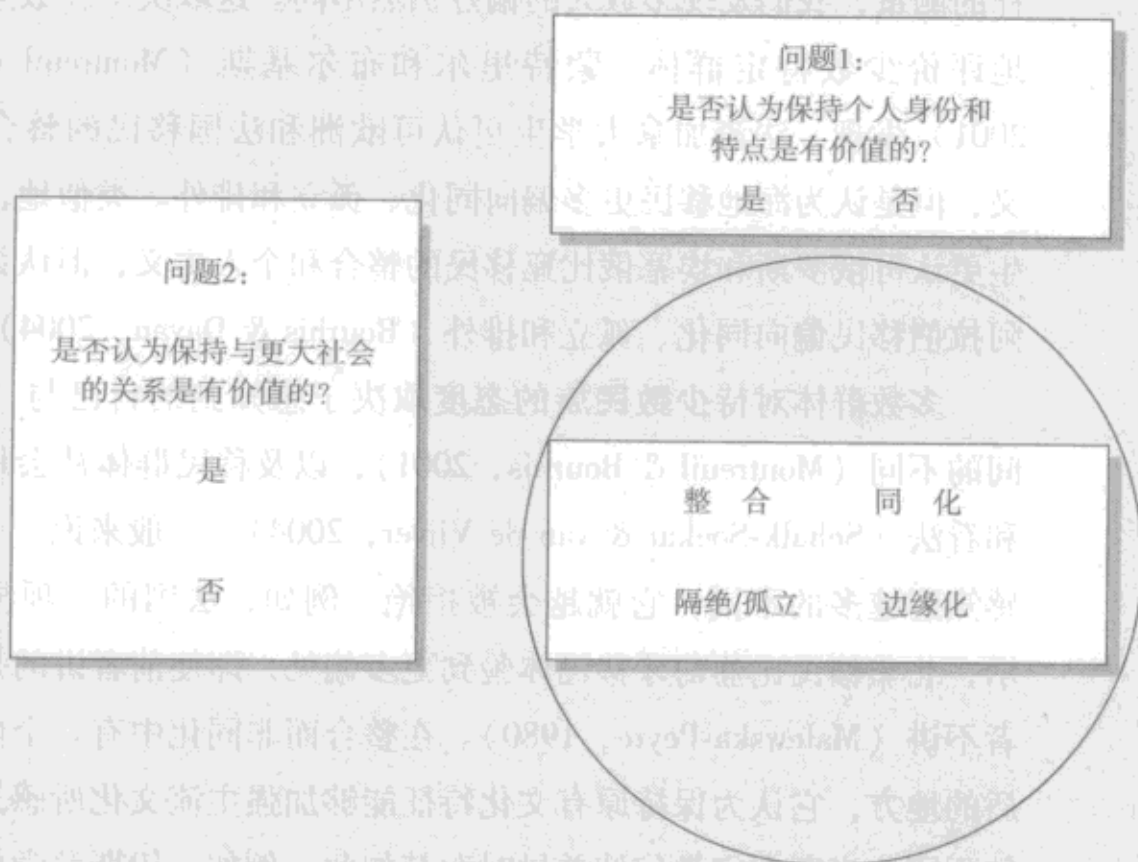
贝里 (Berry, 1997) 普及了另一种**文化适应**的模型, 如专栏 11.4 所描述, 这一模型现已多次被多国研究者采用。基于移民者力求保持自己原有文化特点和想要参与大众文化的程度, 他区分了四种**文化适应**策略。贝里确认出大量因素能导致特定移民采用这四种**文化适应**策略中一种或多种。所有的移民在刚到达他们所选择的目的地时都面临相当大的困难。最明显的困难是语言能力、失去以前的支持网络、需要吃、住和工作。如今大量的研究报告指出符合“整合 (Integration)”类别的移民在不同调适测量中得分最好, 而偏爱同化者要比偏爱分离和边缘化者得分更好。然而, 尽管人们相信这些假设得到了很好的支持 (Berry & Sam, 1997), **文化适应**风格和适应性测量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研究之间的联系程度不同, 而且也并不总支持所预测的方向 (Rudmin, 2005)。整合也许真的是文化适应的最佳风格, 如果这个判断正确, 我们需要更清楚地明白为什么所使用的测量没能得出更清晰的结果。接下来我们讨论几个可能的原因。

在前面段落中使用动词“偏爱 (favour)”反映贝里描述他的模型的方式。如专栏 11.4 所示, **文化适应**是通过移民的价值观来定义的。然而, 移民很少能完全自由选择在其目的地所能占据的位置, 对他们开放的位置受到主流人口态度、东道国的政策和他们能得到的资源的限

制。本章之前重点指出,主流人口并不总是欢迎他们认为的外群体移民,并且只有当移民接受实质地位丧失和进入一个比在原来国家更低贱的角色时才愿意接纳他们。移民通常也比较倾向接受他们自认和自己差异不大的少数群体。

专栏 11.4

贝里的文化适应策略类型学



资料来源: Berry (1997)。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些问题,最近研究者采用了贝里早先所倡导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主流国家和移民群体的偏好。范奥登霍芬等 (Van Oudenhoven, Prins, & Buunk, 1998) 发现,荷兰的摩洛哥和土耳其移民都偏好整合,而大多数荷兰被试偏好同化,但也喜欢整合。扎哥夫卡和布朗 (Zagefska & Brown, 2002) 发现,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偏好整合,德国人也欣赏土耳其人的整合。但是,德国被试认为土耳其人偏好分离策略。实际上,其他一些研究也发现德国土耳其人偏爱分离策略 (Pi-

ontkowski, Florack, Hoelker, & Obdrzalek, 2000), 在加拿大的土耳其底层也是如此 (Ataca & Berry, 2002)。德国和以色列的大多数被试各自偏爱从俄罗斯再移民的德国和犹太族的整合, 而芬兰人偏爱重返芬兰的芬兰族人同化 (Jasinskay-Lahti, Liebkind, Horenczyk, & Schmitz, 2003)。

布尔基斯等人 (Bourhis, moise, Perreault, & Senecal, 1997) 建立了测量多数人偏爱的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与贝里的四类法相当, 但加入了第五类: 个人主义。那些认可个人主义选项的人声称移民应当在个人品质的基础上被评价, 而不应在所归属的族群类别上被评价。使用这样的测量, 我们发现多数人的偏好仍然不同。这取决于多数人是否积极地评价少数特定群体。蒙特里尔和布尔基斯 (Montreuil & Bourhis, 2001) 发现, 法裔加拿大学生更认可欧洲和法国移民的整合和个人主义, 但是认为海地移民更多偏向同化、孤立和排外。类似地, 以色列学生更认可俄罗斯和埃塞俄比亚移民的整合和个人主义, 但认为以色列裔阿拉伯移民偏向同化、孤立和排外 (Bourhis & Dayan, 2004)。

多数群体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取决于感知到的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不同 (Montreuil & Bourhis, 2001), 以及移民群体社会地位的判断和看法 (Schalk-Soekar & van de Vijver, 2004)。一般来说, 一个群体被感知到越多的不同, 它就越会被拒绝。例如, 法国的一项早期研究显示, 北非移民比葡萄牙移民体验到更多偏见, 即使前者讲的是法语而后者不讲 (Malewska-Peyre, 1980)。在整合而非同化中有一个内部自相矛盾的地方, 它认为保持原有文化特征能够加强主流文化所感知到的移民的不同, 当存在宗教信仰差异时尤其如此。例如, 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移民的其他宗教活动受到许多欧洲国家多文化政策的支持, 但移民参加这些活动等于公开承认他们的穆斯林身份, 结果导致更多时候穆斯林受排斥 (Kagitcibasi, 1977b)。

在一些国家中, 大多数人的偏好是通过政府实施的政策来反映的。专栏 11.5 提供了一个成人的个人回忆录, 记录了 50 年前一个人从荷兰移民到新西兰的经历, 当时政府的政策鼓励同化。

专栏 11.5

同化压力

“我们……到新西兰时官方的文化是‘同化’。我们不是荷兰人，政府叫我们‘新新西兰人’。我们照单全收，但是我们的荷兰口音不让我们这么做。我们极力想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的父母永远地离开了荷兰，为了帮助我们适应，在家要说英语。在我们自己眼中我们是‘新西兰人(kiwis)’，虽然我们显然是外国人，我们父母的口音让人难堪，当后来从以前同班同学那里得知我们也有口音时我感到震惊。我们讨厌被贴上荷兰人的标签。”

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我们就应该那样。在学校和其他荷兰孩子有种朋友的感觉，但你不能太过亲近他们，荷兰孩子的到访更像表亲们而不是朋友们。后来我意识到这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别人如何定义我们并使我们的态度得到改变。它就像时间的过继(adoptions of the time)——忘记你的过去和你其他的身份，你现在也和我一样，别和你以前的那类人一起出去玩。我羞愧承认这一点，但荷兰口音仍然在我脑中上了警钟。荷兰俱乐部和那些自称为荷兰人的人让我紧张。我的防御增加了，但不如我以前的防御多，因为我已经回到荷兰。在那里人们正常、放松而不强迫任何人。”

资料来源：De Bres (1997)。

测量的问题

尽管贝里的策略类型的确抓住了移民经历的重要方面，目前对于它的争论关注另一方面，即如何最有效地测量这些取向。四种文化适应策略典型的评估方式是询问被试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一组陈述句，每个陈述包括定义这些策略的两个元素。例如，蒙特里尔和布尔基斯(Montreuil & Bourhis, 2001)使用的一个陈述是“移民应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吸收魁北克文化”。这是作者用于测量整合偏好的三个陈述之一。这样的项目包含两个分开的元素，使被试难以回答，因为他们同意句子的一半而对于另一半则不那么同意。定义每个策略的问题之间的重叠也意味着测量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Rudmin, 2005)。

代表边缘化的项目甚至有更多问题，因为研究者要求被试回答他们

是否同意两个形式上否定的陈述，“移民不应做 X 和移民不应做 Y”。在一些语言中，像中文，对否定疑问句表示赞成用“是”，但其他包括英语在内的语言，对否定疑问句表示赞成用“否”。例如，问说英语的人“穆斯林移民不应开设伊斯兰学校吗？”如果他们同意不应当开设，他们的回答是“否”。混淆的问题很显然。阿伦兹—托斯和范德维弗尔（Arends-Toth & van de Vijver, 2003）从土耳其裔荷兰人中的学生和成人中取样，比较这类测量和一次只问一个问题的简化测量之间的差别，结果发现，在心理测量上简化项目更令人满意。今后的研究将会从这种改善的测量中获益。

在文化适应研究中更深的迷雾

如果我们要对文化适应过程有更好的理解，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些更深入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要讨论三个这样的问题。首先，如第 1 章中专栏 1.1 所示，尽管一些其他国家事实上相对总人口有更高的移民百分比，目前世界上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也是霍夫施泰德所认为的高度个人主义的国家，但大多数移民是从更为集体主义的国家涌来。这样的文化对比是否让我们对文化适应有一种不完全和歪曲的印象？当人们从一个个人主义国家移民到另一个个人主义国家或者从一个集体主义国家到另一个集体主义国家时，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信息很少。

范奥登霍芬等（Van Oudenhoven, van der Zee, & Bakker, 2002）寻找到了 50 年前从荷兰郊区弗里斯兰地区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人们，其中的大多数成功地完成了整合。然而，他们发现更高比例的人既不保持与荷兰文化的联系也不参与主流的活动。根据贝里的模型，这些被试应被分类为边缘化，根据预测他们会适应不良。然而，研究者发现他们对新生活感到满意，与其他移民相比，更少地报告适应困难。范奥登霍芬等人认为，这些移民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意味着他们更重视他们的独立，他们以此例证了第五类文化适应策略“独立（independent）”。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个国家内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的区别。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有许多不同的少数群体，并且在南非、中国香港、以色列和美国西南部地区，“各少数群体”实际上在数量上是大多数。在这样的一些地区，特定群体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与原有文化或者与主流文化保持联系的选择。例如在以色列，宗教归属和种族归属交织在一起，使很多居于少数派地位的群体处于两难境地。霍伦齐克（Horenczyk, 2004）不仅测量群体成员的偏好策略，还测量了其他群体想要他们选择的策略，以此澄清了这种困境。他研究了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他们倾向于与穆斯林阿拉伯人分离，但他们却认为对方想与他们整合或同化。相反，基督教阿拉伯人偏好整合犹太人，但认为犹太人更希望远离他们。在一个社会关系中，一个人的选择不仅是个人喜好的问题，还受到其他群体成员喜好的限制。

第三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关系到移民群体适应基础的评估。很少有研究包括了非移民群体的比较。没有非移民群体调适数据，正确评估移民数据的意义就会非常困难。乔加斯等人（Georgas, Berry, & Shaw, 1996）做了一项家庭认可价值观的测量，测量对象有郊区和城市希腊人、移民到德国、荷兰、加拿大的希腊人以及英裔加拿大人。大多数希腊人认可家庭价值观，特别是那些仍在希腊的希腊人，而欧洲裔的加拿大人认可程度最低。所有样本中越年轻的被试认可家庭价值观的程度越低。移民加拿大的希腊人比移民德国和荷兰的希腊人表现出更强的家庭价值观保持力。这与乔加斯等人的预测相符，因为加拿大政府的政策偏向整合，本土价值观在那里被更多地保留。阿塔加和贝里（Ataca & Berry, 2004）分别在土耳其和加拿大两个国家调查了土耳其已婚夫妇以及加拿大的已婚夫妇。在加拿大的土耳其已婚夫妇偏爱分离（与加拿大文化分离而不是夫妻分离！）。他们在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测量的得分均低于加拿大夫妇，同样也比在土耳其的夫妇在社会文化适应上得分低。研究显示，整合策略是对高社会文化适应的一个显著预测因子，而边缘化预测了较差的心理适应。这项研究很有价值，因为它关注夫妻，并且家庭关系的重要性经常体现于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提供安全基础，如我们将在下节看到的那样。

文化适应的过程

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研究者通过调查移民到一个国家的从过去到现在的几代人，试图处理这个由时间积累所提出的挑战。不幸的是，这只解决了部分问题，因为在历史上的不同时间点移民出于不同的原因到一个国家，在到达该国后，多数群体给予的反应类型也不相同。因此他们彼此之间不可直接相比。由于缺乏长期跟踪研究，我们最多只能获得各种过程的快照。其中有代表性的几项：一个单身成人到达，几经耽搁后找到工作；一对夫妇到达，一人找到工作一人待在家里；举家到达，父母中一人有工作，孩子们开始上学；举家搬到已经有亲戚和同国人居住的社区；一对夫妻到达时已经有一人成为该国的公民。以上每种不同的情景都引出不同的文化适应过程。

这些情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是相对私人的基于家庭的环境和相对公众的工作和学校环境两者之间的对比。阿伦兹—托斯和范德维弗尔 (Arends-Toth & van de Vijver, 2004) 预测文化适应过程在公众场合要比在私人场合更快，并且文化适应策略在两个场合可能不同。他们发现，荷兰主流群体偏爱对土耳其裔荷兰移民使用同化策略，不论在公众还是私人场合都是如此；但土耳其裔荷兰人偏爱在公众场合使用整合策略而在私人场合使用分离策略。

文化适应过程最关键的点是移民父母及其子女之间的界限。尽管在家庭领域偏爱分离策略，但学校教育鼓励更多的综合性同化或整合。菲烈特和肖恩富拉格 (Phalet & Schonpfulg, 2001) 指出，在德国的移民父母比在荷兰的移民父母更成功地将成就价值观传给子女，而土耳其父母在这一点上优于摩洛哥父母。在这些样本中认可集体主义的父母在成功价值观传递上最为成功。然而，通过对德国的四个移民群体和以色列的一个移民群体的更广泛测量，诺克 (Nauck, 2001) 提出了不同文化适应的指标，诸如保留原有的语言、民族身份认同，以及依靠自己拥有的基于民族的网络，且相互之间没有正相关的关系。所得出的测量结果与移民经验之间的结论呈现出显著的不同。

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第二代年轻人的关键作用使一群研究者发起了民族文化青年国际比较调查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urvey of Ethno-Cultural Youth, ICSEY)。这项调查从9个国家中的数个移民群体中分别取样, 调查的全部结果还没有出版, 但萨姆 (Sam, 2003) 已经报告了来自挪威的初始数据。他从越南、智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四个民族成人中取样 500 多名被试, 发现每一项调适的标准都是通过一组不同的预测因素来解释的。解释生活满意度的是传统家庭结构、对分离策略的偏好以及对挪威人身份和本民族特性的双重认可。相反, 预测积极心理健康状况的是对同化策略和低民族特性的偏好。预测积极自尊的是一种对边缘化策略的抗拒。更广大的 ICSEY 调查研究会帮助我们澄清这些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挪威特异性或者在其应用上更加具有泛文化性。

更进一步, 一项比较加拿大出生的南亚人和欧洲裔加拿大人的择偶偏好的研究说明了文化保留的过程。南亚人非常强调一些在印度传统上偏好的品质, 如良好的社会阶层、家族名望、嫁妆、父母满意以及门当户对 (Lalond, Hymie, Pannu, & Tatla, 2004)。对这些特点的偏爱受到被试依赖型自我诠释水平的中介, 越是属于依赖型自我诠释, 被试的偏好越强烈。在南亚样本中对传统品质的偏爱也受到家庭纽带测量的中介。

在一个同样关注家庭角色的研究中, 罗森塔尔和费尔德曼 (Rosenthal & Feldman, 1992) 对比了移民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国人, 另外还包括中国香港的一个控制组。在家中保持中国文化习俗这一点上, 第一代人中有所下降, 但在下一代没有继续下降, 然而民族身份认同一点都没有下降。这个发现与整合策略相符, 即在私人场合保持中国传统习俗, 而在公共场合则入乡随俗。但是这次研究没有包括对实际的文化适应策略的测量。

在新西兰, 对几代同堂的中国家庭对话模式的详尽分析为我们找到一种平衡的方法提供了线索。恩格等人 (Ng, He, & Loong, 2004) 找到他们称之为“中介行为 (brokering)”的例子, 换句话说, 就是鼓励家庭成员用对方能明白的语言进行交流。孩子可以用英文来描述他某天在学校取得的成就。父母则会鼓励他用中文向爷爷辈的人解释这个成就, 以至于所有人都能分享这些信息。在一项更早的研究中, 恩格等人

(Ng, Loong, & He, 2000) 发现, 在文化适应更少的家庭中, 针对整个家庭评论的比例更高; 而在文化适应多的家庭中, 针对个人评论的比例较高。因此, 各种交流模式上的微妙差异体现在文化适应的整个过程中, 甚至有时候促进了文化整合的整个过程。

其他一些因素可能与社会文化适应有关, 虽然很难知晓应该把这些因素看成是作用于原因还是作用于结果。库尔曼和罗农—艾伦 (Kurman & Ronen-Eilon, 2004) 测试了以色列主流信念的知识, 而梁觉和彭迈克 (Leung & Bond, 2004) 的社会公理调查预测了在以色列的埃塞俄比亚和俄罗斯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有趣的是, 移民信仰与移民认为的多数人的信仰之间的差距, 而非二者真正信仰的差距, 更强烈地预测了积极适应。山田和辛格利斯 (Yamada & Singelis, 1999) 预测, 夏威夷的少数民族中, 在整合上得分高的人 (他们所用的术语是双文化主义) 是那些在独立型自我诠释和依赖型自我诠释得分上都高的人。他们的假设得到了支持。

谁进行文化适应

在评估研究者完成了什么文化适应时, 有必要回头思考拉德菲尔德等人 (1936) 对文化适应的定义。这一定义具体说明了文化适应涉及到接触中的一方或双方文化群体的演变。迄今文化适应研究几乎完全聚焦于移民做出的改变。主流群体以什么方式来适应不断增多的异族? 在第 12 章我们讨论与国民整体变化有关的证据, 但我们很少有证据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对此类变化的影响。在此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接触假设的检验来理解多数人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应。

接触假设

决定文化适应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当然是与多数群体的接触程度和质量, 不论是通过人际交往或者媒体接触都是如此。根据偏见和内群体忠诚的研究, 与其他群体的成员有接触并不保证与他们的关系足够改

善。对人际和群体间接触类型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接触假设首先由奥尔波特（Allport, 1954）提出，他认为，在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在受到权力机构的批准和鼓励的情况下，在接触是合作的而不是竞争的情况下，以及在接触足够长的时间以使双方互相了解的情况下，接触会产生好的结果。佩蒂格鲁和特鲁普（Pettigrew & Tropp, 2000）报告了一项关于200项接触假设研究的元分析，其中一些关于文化间的接触。他们认为接触假设得到了支持，但重要的是确定参与的人对接触是如何理解的。例如，双方可能对一系列接触是否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看法不同。与移民接触有关的关键环境（例如学校教育和工作场所）可以提供那些被权力机构许可的深入与合作性接触。在达成地位平等这一点上可能有更多的问题，即使此平等是在政府或制度性政策予以强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当前不断提高了移民率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政府如何保证创造出这类接触，以便最好地利用移民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并减少群体间的偏见。在高移民的国家，选择多元文化主义或者同化主义政策受到了政治聒噪和媒体特别事件的影响。在研究不同政策及其实施结果方面，心理学家仍将继续发挥其作用。

小 结

我们的身份植根于我们所隶属的群体以及我们比较这些群体、民族群体和其他相关群体的方式中。我们保持着对种族群体和国家的刻板概念，这对指导我们与其他成员的关系很有价值，但在与相反的证据抵触时可能会造成偏见。我们不清楚是否某些文化的成员比其他文化成员对外群体更持拒绝态度，也不清楚是否有某种文化群体对维护自己荣誉的防卫看得特别重要。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关注对少数群体偏见水平的决定因素更为重要。偏见从感知到的威胁和维持现有社会主导方式的渴望中滋生出来。

移民为跨文化心理学带来最大的挑战。贝里的四项心理文化适应策略引领了这一领域的发展，但我们需要更好的测量工具，也要更全面地

关注东道国的态度和政策。成功的**文化适应**取决于移民与其东道国人口在偏好策略上面的成功匹配。整合似乎是最有效的,虽然它带来一些进退两难的问题。在我们作更坚实的结论之前,需要进行包含控制组和取样更广泛的研究。家庭为**文化传承**和**文化适应**过程提供了基础。能否成功跨越偏见并战胜**文化适应**中的其他困难,取决于是否存在足够的机会促使移民和东道国成员之间进行广泛的接触,而这些是通过各项社会规范和政策来维持的。

拓展阅读

1. Berry, J. W. , & Sam, D. L. (1997).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In J. W. Berry, M. H. Segall, & C. Kagitcibasi (Eds.)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nd ed. , Vol. 3, pp. 291 - 326).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2. Chryssochoou, X. (2004). *Cultural diversity: Its social psychology*. Oxford, UK: Blackwell.
3. Sam, D. L. , & Oppedal, B. (2004). Acculturation as a developmental pathway. www.wvu.edu/~culture
4. Schoenpflug, U. (2002). Acculturation, ethnic identity and coping. www.wvu.edu/~culture
5. Ward, C. , Bochner, S. , & Furnham, A. (2001). *The psychology of the culture shock*. Hove, UK: Routledge. Chapter 9 and 10.

思考题

1. 你怎样解释你对自己国家的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并怎样理解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对你的国家的人的看待方式?
2. 荣誉文化的概念如何增进我们对集体主义的理解? 你们的文化根源中荣誉的基础是什么?
3. 评估贝里的文化适应四类策略的用途。如何改善和拓展这种分类?
4. 非移民群体的比较在文化适应研究中的价值何在?

在我们这个时代，错位（dislocation）是正常的而非异常的。但即使在那些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境中，即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度过一生，生活中惊人的变迁也会经常提醒我们，自己已经不再是标准和中心。而且没有一个地理的中心能把世界集中到一起，散发出真实事物的诱惑。[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翻译中迷失》（*Lost in translation*），1989]

在过去的数十亿年中，地球上的生物在缓慢地进化中发展出无数种的生命形式。各种生命形式，只要能在当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就能通过基因遗传得以繁衍。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人类比其他物种更好地使用了一种进化的辅助方式，它补充而非替代了基因传递。通过言谈和书写的过程，一代人的发现能传递给后代，无论这是经过父母训练、学校教育、媒体接触还是同伴压力来完成的。一些迹象表明，黑猩猩能把发明保持并传递给其群落中的其他成员，这使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黑猩猩文化，随着时间推移，更多发明产生了，这些不同的文化可能会更加分化（Byrne, Baranard, Davidson, et al., 2004; Castro&toro, 2004）。

然而，文化形成的这种进程在人类社会中更为广泛。人类受到各种文化演变（cultural evolution）过程的影响，而各种文化演变的过程远比达尔文式进化中的那些过程发展迅速。我们今天的生活与500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已大相径庭了，而且没有人能够说出现在的社会体系与500年后存在的社会体系有什么样的差异。基因遗传在何种程度上限制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可能性，这还有待于我们去发现。

趋同与现代性

在前几章中，通过关注不同的社会现象，我们探讨了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的环境和有限制的接触导致文化多样化的过程。在第10章和第11章中，我们回顾了一些证据，证明增加接触更可能使我们发展出整合的、多元文化的国家（integrated multicultural nation），而非霸权的、单一文化的国家（hegemonic monocultural nation）。但是现在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过程正在发生，而且一些人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日益增长的全球化阻碍了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在本章中，我们将关注一些支持或反对文化同质化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者们对他们称之为现代的研究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他们把注意集中在工业化带来的规则以及随之发生的社会的城市化。例如，克尔等人（Kerr, Dunlop, Harbison, & Myers, 1960）断言：“工业主义最终会引导我们所有人进入一个共同的社会，在那里意识形态将不再重要”（p. 12）。在一个对这些观点的系统化测验中，英克尔斯和史密斯（Inkeles & Smith, 1974）调查了6个正经历经济发展的国家的成年人中“现代性”特点的表现，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智利、印度、以色列、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专栏12.1总结了这项研究以及其他在20世纪60~7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所做研究中发现的，在“现代人”身上（与那些不那么现代的人相比较）表现出的特征。

在本书中我们用到的这些术语里，现代人似乎与拥有独立型、而不是依赖型自我诠释的人有更多的共同点。但是，就像杨国枢（Yang, 1988）指出的那样，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几乎没有以一个以上的国家作为样本的，而且实际上这些研究的结果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个国家的历史环境可能影响了其现代性的表现方式。例如，杨国枢（Yang, 1986）把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人格变迁描述为是从他们独特的文化遗产中出现的，他对比了传统的“社会取向的”（social-oriented）性格和现代的“个人取向的”（individual-oriented）性格。在其他方面，他指出了一系列的变迁：从服从他人的倾向到以享受为导向、

专栏 12.1

现代性的 20 个相关特征

拥有个人效能感	认知和行为的灵活性
与亲属融合度较低	未来取向
平等主义态度	场独立
对创新和变迁的开放性	移情和共感的能力
性别平等的观念	对信息的需求
成就动机	喜欢冒险
个人主义导向	非本土导向
独立性或自力更生	世俗化信念
积极参与	对城市生活的偏好
对他人宽容与尊重	学业与职业抱负

资料来源：Yang（1988）。

从拘谨（inhibited）到自主（autonomous）、从柔弱的（effeminate）到富有表现力的（expressive）。这些改变都没有出现在 1988 年他对现代人研究的总结中，因为在对其他国家的研究中并没有反映出这些变迁。

现代性并不是在一个点上的聚敛，而是聚敛在一些平行演化的过程中，此过程会产生出很多将一个人与其他人区分开的特征。现代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模板。此外，我们在第 11 章中曾提到，那些从乡村移居到城市的人，不管他们是在国内移居还是移居至国外，都没有完全改变他们先前的全部价值观与行为。杨国枢（Yang, 1988）认为现代化的聚敛性最好按照他所称为的具体“功能性”适应（specific-functional adaptations）来加以概括。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在工业化的城市而非农业化的乡村中生存，某些适应至关重要，而另一些则无关紧要。为了在工厂或办公室保有一份工作，人们需要拥有以上列举的许多现代性特征；相反，如果只是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中与家人一起生活，则不需要做同等程度的改变。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家庭生活方面的变迁要小于与工作相关的生活方面的变迁。

早期对现代性的研究聚焦于工业化，但工业化并不是引起当代文化变迁的惟一因素。其他社会因素，特别是城市化，使得生活方式发生着重要的改变，这些改变伴随着观念变迁与行为变迁。例如，早期在土耳其进行的一项关于现代化的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中，库查巴莎（Kagitcibasi, 1973）发现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以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与年轻人现代性有关的两个重要因素。我们已经在第1章中强调了全球城市化的重要意义。

在杨国枢（Yang, 1988）对文献进行总结后的近20年中，传媒发展得更加国际化，而且，它们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与其对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巨大。现在，全球85%的电影观众观看美国制作的影片，全球电视机的数量相当于全球人口总数的24%（联合国人类开发计划署，2004）。根据使用一台电视机的通常人数来估算，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广受欢迎的电视频道因此覆盖了大面积的人群。此外，卫星通讯技术使得少数几个频道（如CNN）的节目能被全球接收。广播电视公司除了模仿其他公司制作的热门节目来创造自己的节目外，也会相互之间购买电影胶片和节目。渐渐地，这种媒体作品来源的集中化使人们更易于接受“现代的”价值观，而拒绝那些本土的、“落伍的”价值观。这种标准化媒体的形式与内容是西方化的，而且媒体的渗透力随着国家的财富水平而增强。所以，由大众传媒引起的价值观与其他心理变迁不仅强化了直接由经济现代化引起的变迁，还对那些没有直接参与财富获取的地区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冲击。

例如，博斯基等人（Boski, van de Vijver, Hurme, & Miluska, 1999）给波兰、美国、芬兰和荷兰的学生观看一段录像片。录像中有许多波兰人相互问候的片断。其中，一些男性（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通过亲吻女性的手来表示问候。从几百年前起，这就是波兰的一个传统惯例，但事实上，这个片断是在1994年录制的。研究者要求被试估计这个片段的录制时间并评价他们的典型性。波兰被试估计这个片断是当代的，与其他国家的被试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个片断能够代表他们熟悉的场景。非波兰国家的被试估计这个片断拍摄于7至9年前，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些片断不具有现代行为的代表性。10年以后，在波兰吻手礼仅限于在更正式的场所中出现，就像英国男士不再以脱帽向

女士致敬（如果他们带着帽子的话）一样；圣诞节在非基督教国家的日本也成为节日，在土耳其圣诞树已经成为了新年树；巴西的搏击术——卡波耶拉（capoeira）受到波兰学生（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学生）的欢迎。这些变迁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变迁并不能归因于工业化，他们似乎与媒体的全球化有关。这些变迁可以被视为一个标志，随着时间的变迁，一种特殊的行为会产生新的意义，一种曾经是“现代”和流行的行为在以后变得不再“现代”和流行。因此，它们可能并没有直接指出一种潜在价值观的变迁，而是反映了一种持续的、显得现代和时尚的期望。更标准化的媒体的内容开始定义人们如何以一种现代的方式行动。因此，库查巴莎（Kagitcibasi, 1996b, p. 97）指出的现代化理论中的“聚敛”预言可能确实发生了，不是因为工业化要求人们有更多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因为独立型自我诠释是心理健康的表现，而是因为西方的模式作为一种理想榜样在世界其他国家得到了传播。

在这一章中我们回顾了迄今为止各种对现代性加以认定的尝试，这给我们提供了初步方向。但是，如果想要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我们需要在一段适当的时期中收集的数据。这对于区分个体层面的变迁和国家层面的变迁也十分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即使个体并没有表现出变迁，国家层面的变迁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在代与代的更替中发生尤为典型，特别是当年轻的一代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习得了与先辈们不同的价值观时更是如此。实际上，个体层面的变迁经常发生，当它们在某一区域蔓延时，则会加速国家层面的变迁。

对国家层面的变迁，霍夫施泰德（Hofstede, 1980）已经做出了初步的揭示。为他的经典研究提供数据的第一次调查是从1967年至1969年间进行的，而第二次是1971年至1973年进行的。霍夫施泰德对比了两段时间所获数据的国家层面的平均数，发现在两次研究的19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在反映个人主义的项目上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在这四年中，这18个国家的国家财富也都发生了增长。剩下的第19个国家是巴基斯坦。在这段时期中巴基斯坦的国家财富发生了下降，而霍夫施泰德指出该国的个人主义得分也发生了下降。造成这些变迁的原因可能有许多，包括IBM公司内部发生的一些事件。然而，这项研究促使我们对长远时期内，财富可能对国家层面的个人主义产生影响的因果效应进

行深入探索。虽然霍夫施泰德在调查的其他项目上也发现了显著的变迁,但这些变迁比较小,而且与其他国家层面的维度不存在相关。

霍夫施泰德发现的变迁揭示了对理解当代文化变迁有着关键作用的另一点。早期的研究者们对现代性的研究聚焦于经济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其中潜在的假设是文化变迁在这类国家中最显著。发展中国家被描述成以某种方式“追赶”富裕国家中相对静态的文化。但是,在霍夫施泰德研究的19个国家中,个人主义水平增长最多的国家实际上是英国。虽然这个特殊的结果不能被重复验证,但它告诫我们,如果想得到一个关于当前发生的各种变迁的整体蓝图,则我们需要进行广泛的取样。专栏12.2呈现了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在一个并非那么非典型的(not-atypical)英国村庄中的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1939年,这个村庄是一个以农业为生的社区,包括农民、农业工人和为了维持地区人口

专栏 12.2

一个英国小村庄变迁中的面貌

职 业	工作人数, 1939	工作人数, 2000
农 民	4	3
农业工人	25	6
家政工人	9	1
公共部门职员	5	1
商业企业雇员	3	1
医务人员	2	1
教 师	2	1
警 察	1	1
餐饮业人员	2	5
艺术家/手工艺者	1	4
企业家	1	7
专业人士	0	15
从业者总计	55	46

资料来源: Gainsborough (2000)。

而工作的人。到了2000年，这个村庄成为一个住宿地，居住着在家工作和往返于附近城镇的专业人士。这些变迁并不单纯是移民产生的结果，它还反映了在这两个历史的时点上职业角色上的变迁。

英格尔哈特项目

社会科学家们在过去20年中的协同合作使其对文化变迁的全面理解成为可能。这要归功于对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人样本就各个话题上的意见所做的定期调查。在这个方向上的第一项工作是始于1970年的欧洲民意调查（“Eurobarometer” survey）。这个调查持续至今，随着欧盟成员国的增加，调查中包含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也是一项类似的覆盖大量国家的调查研究，在1981年开始时包含了22个国家，在1990~1993的第二次调查中扩展到了43个国家，其中每个国家中抽取了1000个被试。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GDP指数最高的国家为瑞典、日本、瑞士，GDP指数最低的国家为中国、印度、尼日利亚。这项调查中的许多原始数据在互联网上作为一种免费资源提供给研究者（<http://wvs.isr.umich.edu>；www.worldvaluessurvey.org；http://www.europa.eu.int/comm/public_opinion），而且最近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国家平均数也可以从书上获得（Inglehart, Basanez, & Moreno, 1998）。前几章中我们所讨论的多国研究中有一些就是从这个途径获取数据，但关注的都仅是在某一个时点上收集的数据。

首先使用这些数据对文化变迁进行研究的人是美国的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97），最初他接触这个领域是为了理解选举模式的变迁。在20年的研究过程中，他的研究涉及更广的一些领域。英格尔哈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全球价值观有两种而非一种形式的变迁。首先，他确认了在早期现代性调查中所描述的变迁类型；其次，他确认了特别出现在富裕国家样本中的一组“后现代”的价值观。在经济有充分保障、政局十分稳定，以至于人们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环境中，后现代价值观就可能出现。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概念已经

被社会学家们所广泛讨论，但还很少受到心理学家的重视。

对于后现代性的特点，现在几乎还没有一致的界定。就当前的研究目的而言，可以用英格尔哈特提出的一组“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价值观来界定后现代性的概念。后物质主义包含了当前争论中的各种后现代性概念的一些核心要素。为了验证他的构想，英格尔哈特在数据库中选择了与这些概念有关的项目，对这些项目实施了泛文化的（pan-cultural）个体层面的因素分析和基于国家均值的国家层面的因素分析。每个层面的分析都得出两个相似的因子。这使他有理由在两种层次上对结果作进一步探索时都可以使用相同的概念。第一个因子被称为理性合法权威（Rational-Legal Authority）对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这一因素的理性合法一极对应的是现代性，以在成就动机、节俭、决断力、对政治有兴趣和接受堕胎这几个项目上的高负荷来加以定义。第二个因子被称为幸福（Well-being）对生存（Survival）。在之后的简单描述的分析中，幸福这一极被重新命名为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而且用来定义它的具体项目也发生了改变。根据最新的定义，对以下几个项目的赞同定义了生存这一极，对它们的否定则定义了后物质主义、自我表达这一极（Inglehart & Baker, 2000）：

- 被试把经济与人身安全放在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之前优先考虑。
- 被试描述自己并不是很快乐。
- 从来没有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经历，也不想要签署一份请愿书。
- 不认同同性恋的正当性。
- 信任他人时需要小心谨慎。

英格尔哈特分析的数据库比霍夫施泰德和施瓦茨所采集的都要大，超过了165 000个被试。它包括了更广泛的项目，并且来自于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样本。英格尔哈特划分的维度与霍夫施泰德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以及国家财富（人均GDP）呈正相关，这和我们根据他的模型所得到的预期一致。GDP与它们的相关比GDP与个人主义的相关更大，与理性合法权威的相关为+0.60，与自我表达价值的相关为+0.78。实际上，我们已经在第4章中提到了迪纳和奥施（Diener & Oishi, 2004）的主观幸福感和国家GDP的联系。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

分越高的国家中，国民体验到的快乐越多。类似的高相关也出现在幸福与施瓦茨（Schwartz, 2004）的自主性在国家层面的得分上。对幸福、个人主义和自主性的联合因素分析产生的首要因素解释了78%的总体方差（Inglehart & Oyserman, 2004）。

随着时代变迁的价值观

在确定了用来测量变迁模型的恰当维度后，英格尔哈特对1990年和1981年两次调查中的得分进行了比较。只有参加了两次调查的21个国家才可能进行比较。对于每个国家，从赞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数百分比中减去了赞同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数百分比。专栏12.3显示，在21个国家中，有19个国家赞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口百分数出现了上升。虽然，在其中的11个国家中，物质主义者仍多于后物质主义者，但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发展的趋势。21个国家中变迁的大小不同，但并没有发现在较贫穷国家中的变迁要显著大于富裕的国家。在南非发生的巨大的反向变迁可能是由于9年中在那里广泛发生的暴力事件和不稳定局势所造成的。

为了对这些变迁有更充分的理解，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97）又回到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库中，并寻求其中是否包含了与支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正相关的特定行为项目或报告。他认定了40个这样的项目，其中许多和政治参与的形式有关，这些是调查制作者最初关心的问题，因此它们被包括在调查之中。为了获取对后物质主义变迁的尽可能广泛的概括，英格尔哈特然后确定了在21个国家中每个国家趋向和远离后物质主义的变迁的比率。专栏12.4显示出，在21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变迁确实是朝着预期的方向的。然而，在阿根廷、匈牙利和南非的变迁趋势却与之相反。英格尔哈特指出，这3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都经历过政变，而专栏12.3中其余的国家没有。

专栏 12.3

赞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百分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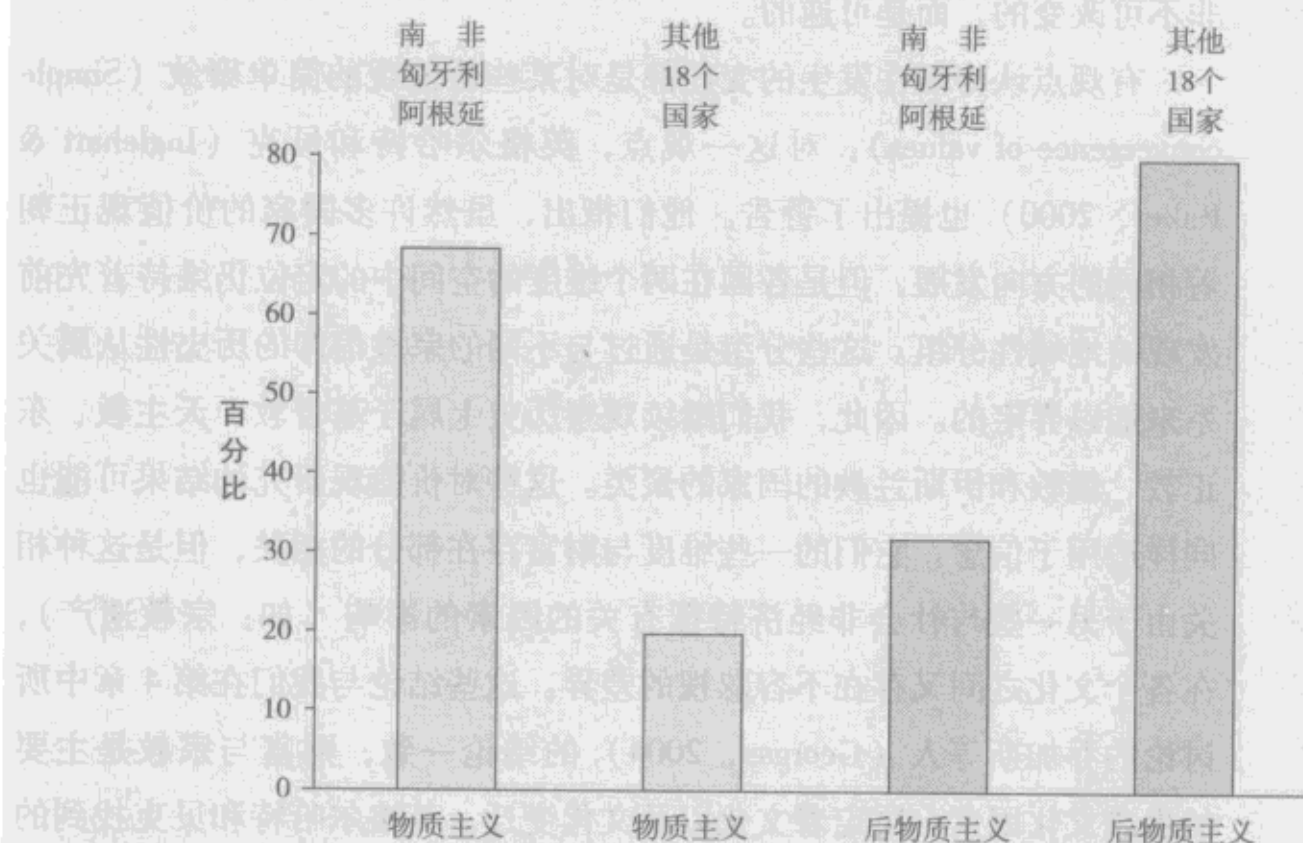
国 家	1981 年	1990 年	净移距
芬 兰	21	23	+2
新西兰	-2	26	+28
加拿大	-6	14	+20
冰 岛	-10	-14	-4
瑞 典	-10	9	+19
西 德	-11	14	+25
英 国	-13	0	+13
法 国	-14	4	+18
比利时	-16	2	+18
南 非	-16	-33	-17
墨西哥	-19	-14	+5
爱尔兰	-20	-4	+16
阿根廷	-20	-6	+14
挪 威	-21	-19	+2
美 国	-24	6	+30
日 本	-32	-19	+13
韩 国	-34	-34	0
意大利	-39	7	+46
西班牙	-41	-6	+35
北爱尔兰	-45	-7	+38
匈牙利	-50	-41	+9

资料来源: Inglehart (1997), 表中数据指的是那些赞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减去那些赞同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结果。

对专栏 12.4 中结果的另一种解释是,南非、匈牙利和阿根廷在当时英格尔哈特研究的 21 个国家样本中是最贫穷的国家。虽然在 1990 年使用的样本中还包括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但 1981 年调查的范围十分有限。因此,英格尔哈特在这 3 个国家中发现的情况也有可能出现在其他较贫穷的国家中,而不论那些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否经历过这种动乱。为了检验事实是否如此,我们还需要考虑从其他来源获取的数据。

专栏 12.4

表现出朝向和远离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项目的百分比 1981~1990



资料来源: Inglehart (1997)。

最近,研究者使用了更多的国家作为样本,研究的持续时间也变得 longer,以对这些推论加以检验。英格尔哈特和贝克 (Inglehart & Baker, 2000) 使用了 1995 年至 1998 年针对 65 个国家做的第三次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数据。在这个扩大了样本中他们发现,国家层面上有 24 个项目的平均数与传统对理性合法的维度相关,有 31 个项目与生存对自我表达的维度相关。显然,这些维度的产生并不是由一两个项目的措辞

属性来加以界定的。在早期研究中认定的发展趋势 (directional trends) 得到了证实。在这个扩大了样本中, 英格尔哈特和贝克能够说明, 从传统权威到理性合法权威的变迁与农业工人的低百分比和工业工人的高百分比相关。另一方面, 对后物质主义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认同与服务性行业雇佣劳动力的百分比的相关为 +0.72。

同样地, 他们在这些国家中也发现了少数几个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国家。朝着远离世俗理性权威机构发展的情况出现在南非、巴西、阿根廷和保加利亚。朝着远离自我表达发展的情况出现在俄罗斯、白俄罗斯、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在这段时期中, 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经济困境。在这些国家中发现的结果表明, 目前的总体发展趋势并非不可改变的, 而是可逆的。

有观点认为现在发生的变迁都是对某些价值观的简单聚敛 (Simple convergence of values), 对这一观点, 英格尔哈特和贝克 (Inglehart & Baker, 2000) 也提出了警告。他们指出, 虽然许多国家的价值观正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 但是各国在两个维度的空间中的定位仍维持着先前发现的地域性分组。这些分组是通过与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历史性从属关系来加以界定的。因此, 我们继续观察历史上属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的聚类。这些对价值观研究的结果可能也同样适用于信念, 它们的一些维度与财富存在部分的相关, 但是这种相关由于另一些与社会非经济特征有关的因素的影响 (如: 宗教遗产), 在各个文化之间又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这些结论与我们在第4章中所讨论的乔加斯等人 (Georgas, 2004) 的结论一致, 财富与宗教是主要的生态文化因素, 决定着文化以及文化变迁。英格尔哈特和贝克找到的一些证据也表明, 当去除一部分其他影响因素时, 经历过一段时期的共产主义统治会对现在信奉的价值观产生显著的影响。

关于文化变迁的其他数据来源

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显然是目前文化变迁研究中所能使用的最全面的资料。尽管如此, 没有一项单一的调查可以包括所有的方面, 而这

个数据库的缺点就在于它的样本不能代表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其中只有3个非洲国家有关于变迁的数据，而阿拉伯国家则一个也没有。它的另一个缺点就是，在65个国家中只有11个国家所进行的关于变迁的调查超过了9年的时间。

近来，艾伦等人（Allen, Ng, Ikeda, & Jawan, 2004）声称他们对8个国家的文化变迁做了一项超过20年的调查。他们的调查主要汲取了恩格等人（Ng, Hossain, Ball, & Bond, 1982）提出的价值观调查。在早期的研究中，来自于9个东亚及太平洋国家的学生完成了一份40个项目的罗基奇价值观调查（Rokeach Value Survey）。这一工具为后来著名的施瓦茨价值观调查提供了基础。从1982年的数据中确定了两个价值观维度：顺从（Submissive）对“狄奥尼索斯”（Dionysian）价值观*以及内在力量（Inner Strength）对物质主义（Materialistic）价值观。前一个维度与特定的兴趣有关，代表顺从价值观的例子有服从、礼貌和强调国家安全。代表“狄奥尼索斯”的价值观则首肯令人兴奋的生活和成熟的爱。

在对文化变迁的测量中，艾伦等人（Allen et al., 2004）寻找与先前取样时来自相同国家、相同学校、学习相同课程的学生作为样本，并要求他们完成相同的调查。在一些国家中的确可以这样做，而在其余的国家中他们使用了可以获得的最相似的样本。在最初被取样的9个国家中，他们收到了来自8个国家的数据。对新数据的分析发现，两个价值观维度中的前一个可以部分地概括这些数据，但是第二个维度不行，因为它有一个不同的结构。因此，他们对第一个维度上的变迁分数进行了计算。结果显示，那些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的学生，他们在1982年就偏向于认同“狄奥尼索斯”价值观，到了2002年这种倾向变得更加强烈。来自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学生，他们在1982年处于“狄奥尼索斯”和服从的中间位置，但是到了2002年，则向“狄奥尼索斯”这一端移动。相反，在剩下的3个国家，孟加拉、马来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学生们本来就具有服从的价值观，到了2002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通过对不同富裕水平国家的取样研究，艾伦等人发现，价

* 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最早使用酒神精神来象征生命冲动——译者注

价值观的变迁是两极化的，而非朝向单一的方向。关于“狄奥尼索斯”价值观和英格尔哈特的自我表达价值观的联系，我们只能做一个推测，但是他们至少存在部分的重合。在这两项研究中，当我们比较样本中最富裕的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时，可以发现它们中的价值观朝相反的方向变迁。

英格尔哈特和艾伦等人都强调对他们所发现的变迁的各种原因做出测量。国家财富和存在于它们之中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之间存在巨大联系，但关键问题是我们能否确定这两者之间的某种因果联系。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97）利用可获取的测量工具建立了一个四个项目的指标用来测量成就动机。研究显示这个指标能很好地预测在他取样的 43 个国家中发生的经济增长。然而，由于这个成就动机指标数据的收集和价值观变迁的测量是在同一时期，因此它只能说明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关，而不能说明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在第 4 章中我们已经提到，霍夫施泰德（Hofstede, 1980）运用了一种较好的方法——交叉滞后平面分析（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这种方法在前后两次测量研究者感兴趣的两个变量，通过探索这些测量结果间的相关，可以推测出变量间的哪一种因果联系是更有道理的。霍夫施泰德推断，财富引起了个人主义的发展，而非个人主义引起财富的增长。艾伦等人（Allen, 2004）使用了一个类似的方法，发现在 1982 年测量的价值观未能预测各国在 2002 年的人均 GDP 水平，但 1982 年的 GDP 水平却能够预测 2002 年的价值观变迁。至此，霍夫施泰德的推论得到了支持。

财富对文化变迁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个简单的陈述带给我们的问题是这一变迁是如何发生的。艾伦等人提出，一个国家的财富至少影响了个体在童年期形成的一些价值观。为了检测这个假设，他们计算了每个国家从 1959 年至 2000 年间每隔一年的国家人均 GDP 和对“狄奥尼索斯”价值观的认同间的相关。就像预期的那样，1982 年的价值观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的 GDP 的相关最为密切，这段时期正是被试一生中的前 10 年；同样，2002 年的价值观与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的 GDP 相关最大，这也是 2002 年被试一生中的前 10 年。这种数据分析的结果提供了许多可能的因果机制，鼓励我们检验家庭动力学（family dynamics）和早期学校教育的影响。例如，可以假设财富影响了

家庭动力学发展的形式，或者它影响了儿童是否能够上学，又或是它影响了儿童接触更多的全球化媒体。

政治变迁与文化变迁

一种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变迁的方法就是检查近几十年中的一些主要政治变迁所产生的后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事件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有很大测量尺度但缺乏良好控制的现场实验。我们可以仔细地看一下这三个例子：德国的统一，香港回归中国，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奥廷根等人（Oettingen, Little, Lindenberger, & Baltes, 1994）在1989年，也就是德国再统一后不久，对东柏林和西柏林学童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 perception）和学业表现（school performance）作了比较。那些在东柏林的学童比西柏林学童较少感受到自身能力对他们成就水平的影响，但是东柏林的学童所知觉到的效能感和实际的学业等级有很强的相关。奥廷根等人提出，这些差异是由不同的教学方式所引起的。在东柏林，学生在课堂上会接收到基于教师评价的公开的行为反馈。而在西柏林，影响自我效能感和学业等级的因素有很多，因此这两者间的相关就比较小。进一步的研究中，利特尔等（Little, Oettingen, Stetsenko, & Baltes, 1995）在莫斯科和洛杉矶的学童中也收集到类似的数据。和预期的一致，在莫斯科发现的学业等级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相关与东柏林相似，而在洛杉矶发现的相关比西柏林的更小。

在德国统一后的数年中，这个研究小组继续在柏林的学童中取样研究，这时柏林的教学方式沿袭了原来西柏林的方法。他们发现东柏林的学童体验到的自我效能感依然较低，但是自我效能感和学业等级间的相关已经降低到西柏林发现的水平（Little, Lopez, Oettingen, & Baltes 2001）。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弗里斯等人（Frese, Kring, Soose, & Zempel, 1996）通过对德国工厂的工人进行重复的调查，发现前民主德国工人的主动性逐渐增长，并达到了前联邦德国工人的水平。因此，这些研究证明了政治变迁能够产生文化变迁。

1997年香港从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下回归，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这也给研究者们提供了开展价值观研究的机会。中国香港政治地位的变迁保证了它依然能够实行自治，因此这些变迁并没有在前东德发生的变迁那么极端。当身份发生变迁时，香港的中国人所需面临的问题是继续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香港中国人，还是更多地把自己看作一个中国人。在变迁的政治背景中，选择如何进行自我认同可能是理解文化变迁的关键，因为这些认同会影响人们与什么样的人交往，继而决定他们将面对何种类型的影响。那些变得更加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人，相对于现代性的价值观来说，更喜欢儒家价值观，他们会把人性看作是固定的而非变动的（Chiu & hong, 1999；Hong 等人，1999；Lam 等人，1999）。因此，政治变迁为价值观变迁创造了可能。

第三个由政治变迁引起文化变迁的例子是中国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回顾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张雷等人（Chang, Schwartz, Dodge, & McBride-Chang, 2003）提出：在中国，与多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家长权威性较低，他们更关注自己子女在学校中的表现，而独生子女们更自我中心、好胜、外向。张雷（Chang, 2004）对 328 个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家长进行了访谈，询问他们希望在自己孩子身上表现出的社会行为。只有 24% 的家长认同中国传统的“好孩子”行为，如：自制、服从和听话。相反，87% 的家长认同“亲社会领导”行为，如：交友、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以及成为领导。更惊人的是，在家长喜欢孩子表现出的行为上或家长认为成问题的行为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性别差异。当问及他们的养育行为是否受到集体主义与自我约束这样的儒家思想指导时，没有一个家长认为自己是这样的。某些结论毫无疑问地反映了我们在本章中所讨论的现代化趋势。然而，性别差异的明显降低更可能是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

我们回顾的关于政治变迁的研究中显示了一些显著的文化效应。然而，另一些研究并没反映出这些效应。西尔伯瑞森和威斯纳（Silbereisen & Wiesner, 2002）回顾了大量关于德国统一的研究。他们的结论反映了杨国枢（Yang, 1988）的特殊功能性适应的概念，也就是说，政治变迁确实造成了文化变迁，而这些文化变迁也正是应具体体制变迁的要求而产生的。柏林学童对统一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教学方式变迁的应对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政治变迁没有产生如此直接

的效果。例如，青少年初恋的时间选择上就没有表现出受到政治变迁的影响。此外，西尔伯瑞森和威斯纳（Silbereisen & Wiesner）举出了几个例子，来说明当文化模式一旦建立就可能一直保持，甚至产生它们的最初原因已经消失了也依然如故。Jugendweihe（青少年成年仪式）* 最初起源于共产主义东德，但现在依然很受欢迎，这可能是因为尽管经济状况恶化，它还是给社交活动和庆典活动提供了机会。在对德国再统一的影响的研究进行评价时我们必须牢记，可能在研究之前变迁就已经产生了。统一之前，前东德就有许多地方的人在私下收看前西德的电视频道，这可能导致青少年价值观的一些变迁。现场研究作为一种确定因果联系的研究方法有它的局限性。

家庭与文化变迁

我们已经在第5章中讨论了家庭在保持文化连续性中的作用。考虑到当前的全球变迁，我们需要讨论，家庭的影响与以前相比是否有所减小。在欧洲和北美洲许多国家，未婚妈妈生育孩子的数量巨大并不断增长，并且许多孩子在单亲家庭中成长。另外，在许多**依赖型家庭模型**已经盛行了很多代的国家中，学校教育变得更加普及。这些社会变迁都为社会化提供了其他的资源。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97）在他的分析中预测，后现代价值观的兴起将使家庭重要性弱化。但这种预测并不符合有关数据。在19个被调查的国家中的16个国家，赞同“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既有父亲又有母亲的家庭”这一说法的百分比在1981年至1990年间出现增长。其他调查项目也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英格尔哈特解释，产生这样的结果是由于公众意识到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产生社会病态行为（social pathology）。这些知识本身来源于日益普及的心理学知识，而这些心理学知识离不开现代经济社会中广泛采用的教育课程。

与其把家庭破裂简单地视为文化变迁的一个原因，还不如把家庭视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主体，它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发展过程是平行

* 此处为德语，指原东德十四岁少年举行的成年仪式——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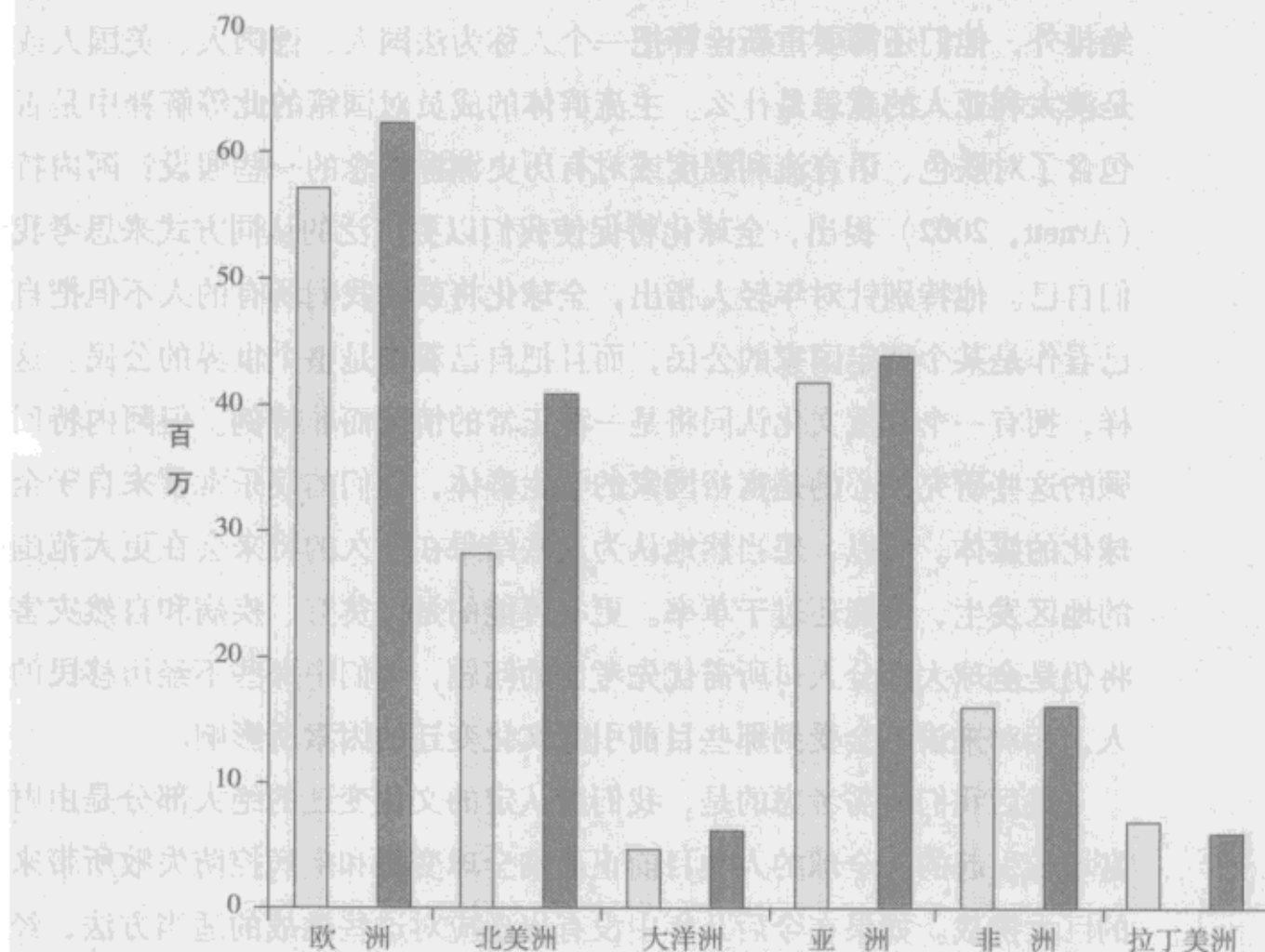
的。在第5章中，我们已经给出了**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型**出现的证据。这个模型断言，家庭成员中物质依赖的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情感的疏远（Kagitcibasi, 1990, 1996b）。一个在16个国家中的家庭关系研究证明了这项预测。乔加斯等人（Georgas, Mylonas, Bafiti, & Poortinga, 2002）发现，在较贫穷和较富裕的国家中，家庭成员间的联系频率并不存在差异。在较富裕的国家中，家庭成员间的地理位置较分散，他们间的交流更多使用电话或电子邮件。而在较贫穷的国家中，家庭成员的交流更多是面对面的。这些结论不仅适用于小家庭，也适用于大家庭。最近，有一项对27个国家的研究（Georgas, Berry, van de Vijver 和 Poortinga, 2006）也证明了家庭中物质依赖与情感依赖的区别。研究表明，集体主义国家家庭中的物质依赖更强烈，但情感依赖在任何国家的家庭中都很重要。在现代，家庭提供给人们的功能是有弹性的。

移民与文化变迁

至此，在本章中我们主要从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两方面检验了文化变迁。但目前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移民。在第11章中，我们主要关注了移民经历，然而就像我们在那里提到的，**文化适应过程**不仅仅在移民者中发生，在主流群体中也会发生。为了对这种文化变迁进行调查，我们必须考虑两个与移民相关的因素。第一，当英格尔哈特分析各国的国家代表性样本的数据时，1990年样本的民族同质性没有1981年的高。在第1章中，我们列出了每年移入和移出特定国家的移民比率。专栏12.5给出了一个较长时期内各个大陆的移民情况的清晰图表。欧洲拥有的移民人数最多，但相比北美洲1300万的增长量，它在过去10年中的增长量仅为500万。多数来自集体主义国家的移民移入到更富裕的国家，他们不太可能对这些国家后现代价值观的增长做出很大的贡献，更有可能的是，他们的出现掩盖了那些国家主流群体中存在的更强烈的后现代价值观效应。

专栏 12.5

各大州的移民人数，1990年和200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类开发计划署，(2004)。浅灰色为1990年，深灰色为2000年。拉丁美洲的数据包括了加勒比海地区。

更重要的是，在原来的同质性群体中，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带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给主流群体带来了挑战。正如1997年中国香港人的例子，主流群体的成员发现自己在认同方面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选择，他们应该接受一种更包容的多民族的认同（inclusive multi-ethnic identity）呢，还是一种更排外的民族限制的认同（exclusive ethnically-restrictive identity）？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主流群体坚持排外的认同会给少数群体造成问题，而且它只是拖延而非解决了怎样定位文化差异这个眼前的问题。一些国家的政府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多民族状况后，已经找到了方法，以鼓励人们接受包容的多民族的认同。例如，在比利

时, 90% 人现在把自己看作是法兰德斯人或华隆人和比利时人, 而 75% 的居住在西班牙的人把自己看作是既有地区身份又有西班牙身份的人 (联合国人类开发计划署, 2004)。

面对移民群体在自己国家中的出现, 主流群体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拒绝排外, 他们还需要重新诠释把一个人称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或是澳大利亚人的意思是什么。主流群体的成员对国籍的此等解释中是否包含了对肤色、语言流利程度或对有历史渊源概念的一些假设? 阿内特 (Arnett, 2002) 提出, 全球化将促使我们以更广泛的认同方式来思考我们自己。他特别针对年轻人指出, 全球化将鼓励我们所有的人不但把自己看作是某个特定国家的公民, 而且把自己看作是整个世界的公民。这样, 拥有一个双重文化认同将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非特例。但阿内特回顾的这些研究关心的是富裕国家的学生群体, 他们的娱乐常常来自于全球化的媒体。所以, 想当然地认为这些结果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更大范围的地区发生, 可能还过于草率。更有可能的是, 贫穷、疾病和自然灾害将仍是全球大部分人口所需优先考虑的问题, 他们中那些不经历移民的人, 相对来讲不会受到那些目前引起文化变迁的因素所影响。

最后我们所需考虑的是, 我们所认定的文化变迁的绝大部分是由财富增长引起的。全球的人类目前正面临全球变暖和疾病防控失败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如果在今后几年中没有出现应对这些挑战的适当方法, 经济财富的倒退将带来后现代价值观的崩溃以及一种适应逆境时期的价值观产生。我们已经指出, 经历了特殊动乱和经济萧条的国家中的价值观将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历史不会倒退, 将来也不可能是现在的简单外推。

小 结

早期的研究把现代性等同于工业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的发展。最近的研究证明, 财富是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它在较富裕和较贫穷的国家中会引起不同类型的变迁。通讯革命及全球化与工业化一样, 也是引起变迁的强有力的因素。过去几十年中,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得更突

出，特别是在富裕国家中。价值观类型的变迁最好被看作是应现代社会要求而产生的具体的功能性适应。因此，并非所有的价值观都在变迁。媒体全球化、政治变迁和移民对文化变迁产生了冲击，而家庭在保持文化连续性中的角色已经淡化。在贫穷国家中发生的变迁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而这些国家中的变迁似乎与出现在富裕国家中的变迁不同。

拓展阅读

1. Amett, J. J. (2002). The psychology of globaliz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7, 774 – 83
2.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Yang, K. S. (1988). Will social modernization eventually eliminate cross-cultural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In M. H. Bond (ed.) *The cross-cultural challenge to social psychology* (pp. 67 – 85). Newbury Park, CA: sage.

思考题

1. 讨论具体功能性适应的概念。在成为一个大学生以后，你经历了什么样的适应，为什么？
2. 你怎样理解后现代价值观？在你的国家，你看到哪些后现代价值观的发展证据？
3. 移民是怎样促进文化变迁的？



世事如潮，乘势而上，功成名就。（莎士比亚，《朱利斯·恺撒》）

阅读过前面的章节，你已经熟悉了诸多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这些研究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文化在社会心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也许当我们把这些复杂的素材呈现到你面前时，你就可能已经形成了某些观点。那么，现在我们便和你来讨论这些观点，以此结束本书。

我们大多数人尝试弄清新事物的方法就是把它们与我们熟知的概念框架联系起来。有时这些框架能给我们帮助；但是，如果这些框架不能很好地匹配新事物，它们便会成为理解上的一种阻碍。在此，因为我们没有机会与你的想法进行双向的交流，取而代之，我们打算与你分享一些评论——针对跨文化心理学中某些领域的特定反应方式而做出的评论，而这些领域也是我们与学生和同事们讨论时经常遇到的。我们虽不能断言已经牢牢掌握了理解这些问题的正确途径，但在经过长期的思考后，我们敢说已经获得了相关的经验。下面我们对关于该领域复杂情况的六种经常性反应依次做出评论。

讨论的话题

既然我们在个体层面对信念和价值观已做出有效测量，那么国家层面的测量便没有更多的用处了。

作为心理学家，在研究探索中我们需要一些可使用的社会心理观念

以及它们所提供的支持,这些社会心理构念在许多文化群体中的适用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贯穿本书,我们讨论了许多有用的个体层面的构念。它们从大五人格变量、价值观、信念、自我诠释、总体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到新兴的关注人际关系的构念,如角色复杂性 (role complexity) (McAuley, Bond, & Kashima, 2002), 权威排序 (authority ranking) (Caralis & Haslam, 2004), 择偶偏好 (mate preferences) (Shackelford et al., 2005) 与关系和谐 (Kwan et al., 1997)。我们可以把这些构念当作社会心理学理论大厦的砖石,在预测行为时,把它们的功效与社会化的影响或者情境变量结合起来。

国家层面的构念,如乔加斯等人 (Georgas, 2004) 提出的财富 (affluence) 和彭迈克等人 (Bond, 2004) 提出的社会犬儒主义,是定义我们社会理解和行为的社会化背景的高阶变量,在这些方面,它们与区分群体或组织的一些群体性或组织性特点的概念并没有什么差异。但当这些构念整合到一个如施瓦茨 (Schwartz, 1992) 的价值观这样的综合性理论中时,它们的科学性前景就变得很有吸引力。

我们能通过不同的途径绘制世界文化的地图,这可能是一种美学上的愉悦。然而,像科学中的任何变量组一样,这些文化地图的价值在于它们能帮助我们理解有趣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这些有趣现象的缘起、相关特征和它们的结果,最终表现在个体的社会行为上。所以,举例来说,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历史和生态条件促进了施瓦茨的依附性价值领域,而这一价值领域是与他的其他六个**国家层面**的价值领域相对的;与依附性相联系的政治、社会、家族和人际的意识形态有哪些?在那些更保守的文化中,哪些个体层面的价值观、信念和其他范畴的社会化会更为强烈呢?对于高依附性或低依附性的文化来说,社会过程发生的途径是一样的吗,或者文化的依附性是促进还是抑制了这些过程?

当比较国家文化时,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或者男女性别比例这样的“硬”测量是更好利用的,它们也因其便利价值而得到了广泛应用。文化变量的硬测量提供了与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联结,并以其已经确立了的真理价值吸引着那些已经开始研究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家。

文化“软”测量源于个人测量的集合,测量的是一些关于某人自

己或他所生活的社会的感受 (Bond, 1997b)。霍夫施泰德 (Hofstede, 1980) 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即是通过平均每个国家的自我报告的价值观分数, 并在 40 个国家间进行比较, 最后经因素分析而得出的。通过要求被试评定一个不同但是同样有趣的目标, 费舍 (Fischer, 2004b) 已经表明, 在我自己的文化群体内, 也可以评定施瓦茨的个体层面的价值观。费舍平均了每个国家的这些得分, 并把结果在 9 个国家间进行了比较。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由于这些类型的集合测量来源于个人判断, 并且它们是最近才进入了社会科学的话语, 所以社会科学家在使用它们时总有种不可靠的感觉。

然而, 我们一定不能小瞧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跨文化工作中文化软测量的潜力。我们已经看到, 在建议理解文化的重要途径上, 施瓦茨国家层面的价值观范畴的用途超越了乔加斯等人使用的对财富的整合性硬测量所提供的用途 (2004)。王和彭迈克 (Wong & Bond, 2005) 也证明在解释 30 个文化群体情绪的强度和持续度时, 软测量的预测能力超过了 GNP 的预测能力。看起来有些软测量确实超越了目前硬测量所提供的便利。我们希望随着更多社会心理测量方法的形成, 当前可利用的软测量的范围也将变得更广。随着更多的国家进入科学对话, 在探索国家层面的软测量是怎样增强我们对人类社会行为的理解时, 我们将有更广泛和更有代表性的成套数据可以利用。

一个人可以既是个人主义者又是集体主义者

说可以也行, 说不可以也行。这个答案取决于我们怎样解释和测量这两个概念。越来越多的研究确实报告了看起来矛盾的发现——所谓的集体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个人主义导向。对此的解释是, 随着现代化进程, 国家层面上可能出现了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变 (Georgas, 1999); 或者是有一些社会, 比如日本, 曾被错误地贴上了集体主义的标签 (Matsumoto, 1999; Takano & Osaka, 1999); 再或者就是一些个体既是独立的又是依赖的 (Oysterman et al., 2002)。这里涉及了大量的问题。一些是方法上的, 一些是概念上的, 有时它们又是混合在一起的。例如, 被试取样经常是由大学生组成, 而他们基本上不能代表假定

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学生们倾向于更年轻、受过更多的教育，没有家庭职责等等，这些使他们在研究者看来显得更为个人主义。实际上，进行本国内部的比较时，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地域/城市和农村间也发现了显著的差异（Marshall, 1997; Aycicegi & Harris, 2005）。

随着现代化进程，发生了什么改变呢？如我们在第5章讨论的，库查巴莎（Kagitcibasi, 1997a）区分出了规范性的和关系性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前者指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后者指人际关系。这样，规范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与反对或认同家族/集体对个人很重要的态度有关，而关系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与人际距离或个人的分离/关联状态有关。现代化进程中，似乎发生着从传统和等级的规范性集体主义向更民主的规范性个人主义的转变。这是一个规范性文化的转变，但它并不一定会转化为个体层面上从关联向分离的转变。

因此，就有可能在某些群体中发现看起来冲突的情形。例如，土耳其学生具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但同时也显示了高水平的关联性（Goregenli, 1997）。相似地，文化适应研究显示了西方社会中具有集体主义背景的移民，在公共场所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变得更个人主义，但是在家庭的私人场所仍然具有高强度的相互关联（interconnected）（Arends-Toth & van de Vijver, 2004; Kwak, 2003）。因此，为了避免采取一种有逻辑问题的，同时具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认同的归因，我们需要弄清楚所讨论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是什么类型。但是，由于人类的灵活性和强有力的情境需求对人们所起的作用，同一个人不同的时间和环境里也可能以个人主义或者集体主义风格对待不同的人（Kagitcibasi, 1994）。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根据所出现情况的概率来建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即考虑个人在建构他们的社会行为时，全部行为中出现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风格孰多孰少的可能性（Triandis, 1995, p. 61）。

另一个问题则同时具有概念上和方法上的性质，这个问题与个体层面上独立性和依赖性的测量有关。独立性量表一般包括一些反映自主性和一些反映分离性的项目，它的假设就是这两种特质之间有必然的联系。相反，依赖性量表一般包括测量关联性和自主性缺乏的项目，再次假设它们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如果像我们在本书里所主张的，关联性

和自主性是有区别的和相互独立的概念，那么这些量表实际上应是两维的而不是一维的，因此它们的信度就会降低。特别在集体主义的“关联性文化”中，一些更现代的、城市化的、受过更多教育的人们能够既是自主的又是关联的，但是这些特质在测量中经常被操作化来反映独立性和依赖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能称这些人既是个人主义又是集体主义的吗？我们宁愿说在概念化和操作化方面存在着混淆。我们对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含义或者对赋予这些概念的内容进行更好地理解将会有助于澄清事实。诠释（construal）和测量具体概念，而不是作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样概括性和结论性的分类也许更为有用。

研究者曾过于狭隘地关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为何由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权力距离和财富所组成的文化维度会结出累累硕果？这是有原因的。正如我们所见，财富的改变似乎是当代价值观和行为这两方面改变的主要决定因素。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跨文化心理学对财富的单一关注并不能解释世界上持续的多样性。乔加斯等人（Georgas, 2004）的研究把宗教信仰作为一个文化差异的相关变量，它独立于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相联系的一簇属性。休伊斯曼（Huisman, 1994）对 11 个国家的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被试的自我评价的宗教虔诚性和他们所认同的施瓦茨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在每一类宗教信仰的人群中都发现了非常相似的价值观特征。在传统和保守上得分高的宗教人群在享乐主义和刺激上得分就低。因此，我们不能单一地用经济差异来解释乔加斯等人的研究结果。那些受这种或那种宗教信仰支配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独特性，这一事实必定不是产生于由经济力量驱动的价值观念认同，而是另有缘由。一个可能的缘由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模式，它含有个人的宗教惯例和某个国家为宗教惯例提供的制度性支持，二者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支持系统包括特殊类型的课程和独特的学校教育风格（Hofstede, 1986），宗教惯例所规定的公共假日，媒体报道所提供的价值观以及使各种惯例成为可能的清真寺、庙宇、修院或教堂。

忽视宗教信仰的作用，同时也对作为文化要素的规则（rules）和角

色 (roles) 很少注意, 这些都是当今跨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第4章, 我们提到了盖尔芬德 (Gelfand, 2004) 最近的研究, 他根据“情境限制”的变化来衡量一个国家。高情境限制的文化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规则和角色指定, 但低情境限制文化对异常行为则有较大的容忍度。虽然这个研究的结果还不可用, 但可以证明这些概念与一些存在但是被忽略的价值观维度有共同元素。高情境限制的国家可能在霍夫施泰德的不确定性规避维度和中国文化关系的儒家工作动力维度上得分更高。后一维度的特征是强调履行孝道的角色责任, 它是所有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对上面这些维度的进一步关注也许有助于这个领域的发展。然而, 在我们寻找与文化相关的其他维度时, 我们必须避免这个假设——认为所有的维度与世界上各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都有同等的相关。霍夫施泰德 (Hofstede, 2001) 说明了为什么他的分析中会出现不确定性规避, 而在中国文化关系的分析中却没有出现, 这是因为不确定性规避与西方国家对真理的高度关注有更多相关。相反地, 他认为亚洲太平洋国家与儒家工作动力有更多的相关, 他认为这些国家更为关注美德。他的观点可能对, 也可能错, 但是它强调了同时寻找那些更具有当地主位相关性的方面,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在本书中始终强调这一点。

跨文化心理学家对本土的、主位的研究方法未给予足够重视

我们强调的研究已经被一系列国家间的比较数据所支配, 所用的概念是得自于过去几十年出现的全部概念框架。与此同时, 另一些研究者已经在寻求确定独特的方法, 来理解他们自己国家群体所发生的心理过程。我们已经说过一些主位分析的例子, 特别是来自于日本 (Yamaguchi, 2004)、韩国 (Schmidt-Atzert & Park, 1999)、菲律宾 (Enriquez, 1993)、墨西哥 (Diaz-Guerrero, 1993)、美国南部 (Cohen & Nisbett, 1997) 和中国 (Cheung 等人, 1996) 的一些例子。现在也可以检索到更广泛的由本土心理学家完成的研究 (Sinha, 1997; Kim, Yang & Hwang, 待出版)。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 本土研究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 那些在特定

地域发生的心理过程真的比其他地域独特吗？或者，尽管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其他文化中找到与之相似的心理过程吗？如果主位过程确实比最初认为的更普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指望它们能够对跨文化领域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吗？第二，是否存在更多值得关注的本土化概念或研究领域吗？我们将依次回答这几个问题。

至少有六个例子已经证明了，当把概念的操作性测量整合在更广阔背景下进行研究时，最初被认定为本土的概念已经被证明具有某种程度的效度。山口（Yamaguchi, 2004）对“甘え”（amae）人际关系风格的测量与在美国假设的构念已经显示了显著相关，张等人（Cheung, 2003）关于中国人人际关系的人格维度和科万（Kwan, 1997）等人对人际和谐的测量也是如此。迪亚兹—瓜雷罗（Diaz-Guerrero, 1993）对墨西哥“历史社会文化前提（historic socio-cultural premises）”的测量在土耳其得到了认同（Aycicegi, 1993）。梁觉（Leung, 1987）在中国香港所建立的对“减少敌意”的测量可以作为冲突解决风格的预测指标，这在以色列（Bond et al., 1992）、尼日利亚和加拿大（1993）也显示了显著效应。科恩和尼斯比特（Cohen & Nisbett, 1997）的“荣誉文化”概念在巴西也同样适用（Vandello & Cohen, 2003）。我们也要注意，如果说主流社会心理学中采用的理论和测量方法被认为是由美国本土心理学所组成的，这其中许多概念和测量方法在别处也发现有很强的效用。把美国的研究作为主位研究的重新定义强调了主位和客位研究方法之间的互利。

已经开展的其他许多研究为进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基础。一些研究者已经认定了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独特的价值观。哈米德（Hamid, 2004）在马来西亚开发了一项 budi 价值观的测量。Budi 价值观涉及了慷慨、尊重、真诚和正直。哈米德发现，在马来西亚学生被试中，budi 价值观可以作为施瓦茨的价值观调查项目所解释的方差的补充。博斯基（Boski, 待出版）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和 sarmatism* 是波兰的核心价值观。人文主义的特征为认同人际关系和个人责任，排斥物质主义。这个概念在某些方面与库查巴莎的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定义有共

* Sarmatism 为波兰语，意思为无秩序、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社会享乐主义——译者注

同之处。Sarmatism 起源于过去波兰贵族信奉的价值观，是冲动的自我主张和社会享乐主义的结合物，它与其他应用广泛的价值观测量的联系不是很明确。努儿达霍芬和蒂德贾尼（Noorderhaven & Tidjani, 2001）调查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6个非洲国家的学生是否存在独特的价值观，并与另外8个国家学生的价值观进行了比较。国家层面的分析表明了非洲非常强调宗教的重要性、对规则的尊重、与他人分享的价值观和对人性的悲观态度。虽然这些价值观的某些部分也许并没有包括在更普遍的测量如施瓦茨价值观调查中，但它们仍然会被人们的经验所验证。

虽然可以证明，某些特定的价值观可以解释现有的广泛价值观测量所不能捕获的方差，但是更有可能的是，本土心理学家通过认定独特的规范和角色，比通过认定独特的价值观更能加深我们的理解。这是因为，世界上那些较少被研究过的地区中人们的行为可能较少地由个人价值观支配，而更多地由传统角色要求和生存的必要条件所支配。多尔斯（Dols, 1993）证实了在西班牙社会中存在着被他称之为“不正当规范（perverse norms）”。这些规范被广泛认同但并不通过强制执行。这些规范的存在，可使处于权威地位的人通过选择强制规范还是选择容忍反常行为来最大程度地行使其对别人的自由支配权。尽管还没有关于这些特征的跨文化研究报告，但不正当规范很可能是高权力距离但低情境限制下的文化的特征。在低权力距离的国家里，可能更盛行另一种类型的规范，如费瑟（Feather, 1994）在澳大利亚最早确定的“嫉妒精英症（tall poppy syndrome）”。这个词语描述了个体如果过分自信或成功，他就可能会接受到消极的反应。这种现象在北欧一带国家经常称作“简特法则（jante law）”^{*}（Fivelsdal & Schramm-Nielsen, 1993），在中国香港被称作“红眼病（red eye disease）”（Bond, 1993）。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跨文化中角色和规范的特殊性。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这些决定社会行为的外在共同因素关注太少，这反映了这个学科研究中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偏差（Sampson, 1998）。

* 简特的法则，意指“你不比我好多少”——译者注

跨文化心理学家应该多论证他们研究结果的实际应用

1998 年的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代表大会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culture Psychology) 就跨文化心理学的现状和未来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跨文化心理学学报》发了一期名为“千禧年”的特刊,对这次研讨会做了专题报道。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对跨文化心理学进行评估,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出预测,同时还讨论了跨文化心理学相对未被认识到的应用潜力 (Kagitcibasi & Poortinga, 2000)。尽管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应用方面的探索,但仍然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下面我们分四个标题来讨论这些内容。

提供信息,促进对文化差异性质及其重要性的理解

任何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方面都是提供精确的信息。在这方面跨文化心理学有两个任务。第一,通过出版不同群体的价值观、信念和生活经历有关的实证研究,对种族歧视和国家刻板印象提出挑战,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第二,对那些持文化盲观点的人提出了挑战,这些人主张不存在文化差异或者可以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而对其不予理睬。本书即可以被看作是对这一类型的挑战,即对那些主张在一个单一的文化群体或国家的研究就可以创造有效的心理学的人的挑战。对心理学家而言,更具体的挑战是远离强加式客位心理测量工具,并开发出当地有效的测量工具 (Lonner, 1990; van de Vijver & Hambleton, 1996)。

从跨文化心理学中衍生出的信息和概念可以满足一些特殊的需要,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这些信息和概念。如每年一度的欧洲民意调查引发了欧盟内部的政治争论。35 个国家关于人权定义的文化差异调查 (Doise, Spini, & Clemence, 1999; Doise 2001) 为伦理规范的形成和联合国项目评价提供了一个基础。广告商也已经非常注意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概念,他们的广告瞄准目标群体内盛行的相关价值观,借此吸引受众 (Aaker & Schmitt, 2001; Aaker & Williams, 1998; de Mooij, 1998)。

培训人们跨文化互动的技能

如我们所见,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了需要跨文化有效性的活动中

去。需要为移居国外的商人、留学生、援助和开发工人、旅游酒店业供应商、警官、军事人员、移民和许多其他人提供预备性培训计划，并对培训进行评估（Brislin, 1990; Ward et al., 2001）。提供文化差异信息是必要的，但不能替代达成有效的跨文化互动的实践。如我们在第10章所讲，虽然简要介绍和文化同化培训能够提供信息，但是不同形式的培训却能够增进它们的有效性（Earley, 1987）。培训计划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元素，似乎就是培训期限长短以及这些培训与受培训者将要投入其间的环境的密切相关程度。象征性地投入时间和资源只能达到短期的效果。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工作

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以及在有多元文化的国家比如美国，跨文化心理学在健康和教育方面都有许多应用（Harkness & Keefer, 2000）。我们能够从这些类型的干预中得出的一个普遍教训就是，除非采用文化敏感性的途径，否则就不能取得大的成果。在这种背景下，就更需要那些了解文化的心理学家们的力量，需要他们参与健康、教育、男女平等方面的工作，在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同样需要如此。心理学家能够也应该与健康工作者、儿科医生、教育专家以及其他一起，在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这样的国际机构下工作，对全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文化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从发展中国家儿童得到的益处，比那些儿童从这些社会科学家那里得到的益处要多（Jahoda, 1986）。现在该是偿还这笔债务的时候了——我们要用我们积累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去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在有效运用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心理学时，这是一个可以遵循的方向。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称，这必将在人类和社会性的侧面上对内生（endogenous）（即发生于内部的）的发展做出贡献（Huynh, 1979; Tripathi, 1988）。但这种方法必须围绕文化相关和全人类共享的知识来进行。

要完成这种合作性的联结并不容易。这种情境下的关键问题是，合作中的一方比另一方明显地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薪酬。这些差距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down spiral）（Carr, 2003）。薪酬较少的一方会感到受了不公正待遇并因此减少了他们的贡献，这导致薪酬较高的一方消极

地评价薪酬较少的一方，并试图通过增加他们自己的贡献来进行补偿。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薪酬较少的一方对这个项目的所有权和贡献的减少。除非终止这种循环，否则两个团体都将大失所望，项目也将失败，因为薪酬较少一方的加入是这个项目保持长期成功的关键因素。尽管卡尔（Carr, 2003）的分析是集中在非洲的技术援助工人上，但这对所有类型的跨国企业都同样适用。梁觉等人（Leung, Wang, & Smith, 2001）证实了在中国的合资宾馆也有类似的现象。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对这种互动特征要有足够的先前培训和时刻的警惕，以此来纠正日常人际关系中产生的问题。

心理治疗和咨询的领域存在着同样重要的问题。对病症有效的诊断和治疗需要意识到其产生的文化背景。如果治疗师和咨询师与他们的来访者不是同一文化背景的，那在确定合适的理解和反应文化模式时，他们就需要额外的专业技能训练，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干预（Pedersen 等人, 1996）。

对重要谈判者和决策人的建议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讨论过，近年来旅游者和移民人数大量增长。文化适应过程的研究者应该能够提供重要信息，供制定有关移民和社会关系的政策时参考。虽然近来许多政府对移民准入实施了更多的限制政策，但是现行有效的政策在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却更大了。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都已经根据文化适应研究者的相关工作成果建立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官方政策。

外交和商务谈判是专家意见起关键作用的第二块领域。已经出版的谈判文献倾向于强调发生误解的场合、离奇的翻译错误、非言语线索的误判或谈判风格的互不兼容等情况（Glenn, Wittmeyer & Steveson, 1997）。虽然并没有关于哪些因素能导致谈判成功的报道，但是毫无疑问，对文化见多识广的人更可能取得谈判成功。

在有些情况中，建议更可能是方法上的而不是实体上的。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其员工实行相同培训计划的跨国公司想知道：为什么同样的培训计划在欧洲总是没有在北美和亚洲成功。跨文化心理学家提供的解释是，欧洲的受训者在他们评估培训计划时显示了较低的默许反应偏

差，这与他们的自信型文化社会化过程是相一致的。在重新设计评估形式后，人们便可以更精确地评估这类培训了。

文化差异正在消失，所以我们没有前途

文化差异是否正在消失？关于这个问题是存在争论的。首先，什么是文化？从社会心理学家的视角来看，文化是包括生态和社会的一套共有的约束（constraints）与供给（affordances），它们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通过社会化过程，这些因素在个体“软件”上留下了印记，作为研究的对象，包括价值观、信念、态度、自我诠释、人格因素以及决定人们行为的归因图式。

我们经常通过测量和比较文化在个体心理上的反映来研究文化差异。世界价值观调查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经典例子。如果国家间价值观的差异或者其他的心理测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缩小，有人可能会认为就该项测量来说，文化差异正在减少。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持这个论点。跨越足够的文化群体、并触及一套综合的心理构念，进行有代表性的纵向研究，这也许在遥远的将来才有可能实现。

这些心理结构因素的改变部分依赖于生态和社会条件的改变，这些改变与行为的生物基础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文化群体内和文化群体间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改变正在缩小吗？如财富、民主化、男女比例、土地产量、自然灾害的频率等等，国家之间的这些方面的差异都在缩小吗？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差异没有缩小的话，那么断言跨文化心理学家是在追求日渐绝迹的蜉蝣就没有事实基础了。

此外，这种推理忽视了文化聚敛规则中自反律（reflexivity）的重要作用。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个体民族意识苏醒和独特性的追寻，这看起来好像与之明显相悖。与自由和人权需求的增长相伴，要求保护和尊重文化遗产和传统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同一是镇压性的，有时还是残酷的，如通过宗教迫害和种族清洗，还有日常的排斥，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歧视等国家政策来实现的”（联合国人类发展署，2004，第1页）。作为对这种越来越强烈的不公正意识

的回应：“人们要有公开信奉他们的宗教、说他们自己的语言以及庆祝他们种族或宗教传统的自由，而不用恐惧被嘲笑、被惩罚或机会减少”（联合国人类发展署，2004，第1页）。这些都说明文化意识在觉醒！

这些斗争给现代化的国家带来了挑战，他们既要去管理这些主张，又要保持国家的和谐一致。许多潜藏的信念被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称作一系列“神话”。举例来说，其中一种神话就认为：“人们的民族认同与他们对国家的依附相互竞争，因此，存在着在认可多样性和保持国家的统一性之间的权衡。”联合国报告进一步依次反驳了这些神话，希望改变人们的态度和国家的政策，使之能够在他们的统一国境内认可族群的多样性。

然而，从现在的目标来看，问题在于能否从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萌生出对文化多样性的更大支持。如果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人们对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兴趣将逐步上升。更贴近现在的目标来说，我们也期望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或威胁国家主权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出现对族群问题更多的关注。那些把文化和族群特性作为当代公共话语的一些国家正在商讨这些社会生活领域范围内的问题。我们期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参与到这些主题中来。多样化（diversification）而不是趋同化（convergence）的力量届时也会注入到将来的跨文化研究中：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中国，公元前4世纪）



关键术语表

Acculturation

文化适应：最初用来指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彼此发生的渗透改变。现在更多用来描述移民群体对新文化环境的适应过程。

Acquiescent Response Bias

默许反应偏差：对研究者呈现的大多数或所有的陈述和问题，都给予同意而不是反对的倾向。

Autonomous-relational Self-construal

自主—关系型自我诠释：自我知觉的一个维度，既重视自主行动的能力又强调与他人关系的重要性。

Citizen Mean

公民均值：描述一国普通民众的某种特质的分数，是通过先分析个人层面的数据，然后再累计到国家层面上计算出来的。

Correspondence Bias

对应偏差（也称基本归因错误）：认为一个人在给定情境中的行为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特质所决定，而不是行为发生时的情境类型所致。

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

交叉滞后平面分析：一种用来检测两个变量中一个变量使另一变量随时间发生改变的技术。对两个变量的测量都集中在进行比较的两个时间点上。如果时间点1的变量A预测了时间点2的变量B，但是时间点2上的变量A对时间点1的变量B的预测强度不如前者，那么可以说A对B有因果影响。

Cultural Orientation

文化取向：本书中用来指任何一个变量的测量的常用词汇，普遍用来描述能反映文化特性的个人层面的特质，像自我诠释、价值观或信念。

Cultural Psychology

文化心理学：研究文化的一种途径，它强调个人和他们的具体背景的相关性。这种导向的心理学研究要求主位的研究方法，它并不做出假设，认为结果会导致的因果关系认同或此结果与其他背景中的关系具有可比性。

Culture

文化：一个有诸多定义的概念，能应用于分析社会系统的所有层次。一个系统的文化由对系统中所发生的事情意义的共有理解构成。尽管我们讨论的许多研究是以国家来取样的，但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力求避免把国家看作文化单元。国家有许多文化的特征，但是许多国家文化太多样以至不能认定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文化。最好还是把国家看作为一具有多元文化的系统。

Cultural and Personality

文化和人格：一个早期的研究传统，它假设不同的人格类型可以用来描述整个文化。

Decentring

去中心化：一种翻译程序，试图提供在每个文化中有对等意义的表达，而不是逐字逐句的直译。

Eco-cultural Theories

生态文化理论：预测不同的生态和社会政治环境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化的各种理论。

Ecological Fallacy

生态谬误：认为在不同的分析层面，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仍然相同的错误信念。过去通常指从国家层面关系到个人层面关系的不合逻辑的推断。

Ecological Mean

生态均值：某些变量的国家层面上的平均分。

Emic and Etic Studies

主位和客位研究：主位研究是从研究的直接背景中抽取材料，对其发现的跨文化的普遍性并不做假设。而客位研究是做出一个暂时的假设，认为正在研究的现象是可比较的和普遍的。

Ethnicity/Ethnic Group

族性/族群：根据如血统、肤色和其他特征的标准，来加以界定的亚文化群体，这样的种族划分是存在疑问的。一个人自我认同的种族并不总是与别人认同他（或她）的种族相一致。

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是一种用于探求一个测验或调查的回答中潜在结构的统计方法，这些潜在结构表明了不同项目会得到相似程度的回答，并因此可以聚类成“因素”来测试同一基础性构念。

Family Model of Independence

独立型家庭模型：一种支持后代分离、独立和自主的代际关系系统。

Family Model of Interdependence

依赖型家庭模型：一种特别强调持续的亲缘关系和代际依赖的代际关系系统。

Family Model of Psychology Interdependence

心理依赖型家庭模型：一种对持续的亲缘关系和后代行动的自主性都予以强调的代际关系系统。

Field Dependence

场依存：对某个隐藏在更多刺激的广阔背景中的刺激，相对地不能加以识别。

Field Independence

场独立：识别隐藏在更广阔、更复杂的一系列刺激中某个刺激的能力，以从背景中分离出图案，是一种分析能力的反映。

Imposed-etic Studies

强加式客位研究：在某一种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客位的测量。事先没有评估它的适用性或它的意义是否等值，就应用于其他文化背景的研究的。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独立型自我诠释：强调一个人的自主性和与他人相分离的自我知觉。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Hofstede 的一个国家层面的维度，许多作者用不同的方式对它进行定义。与个体文化中各种群体依附关系的可转移性相比，它的核心成分关注的是集体文化中群体依附关系的持续性。一些作者也在个人层面运用这些结构，来反映分离—关联、独立—依赖以及对个体或群体忠诚度的支撑。

Individualism-level Studies

个人层面的研究：把每一个被试的数据当作一个单独的个案的研究方法。

Indigenous Psychology

本土心理学：一种主位的研究方法，它的目标是运用本土形成的而不是主流心理学提供的概念，来成功地理解一个特定的国家或文化。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依赖型自我诠释：强调一个人与他人相互联系自我知觉。

Meta-analysis

元分析：概括一系列相关研究结果的统计技术。即使各种研究使用的是不同的测量量表，但是每个量表还是能被分析产生一个“效应量”。无论所运用的是何种测量，效应量是因变量的变化减去任何控制或比较组中所发现的改变。

Moderation and Mediation

调节和中介：调节变量的出现会增加或减少另两个变量之间关系强度。中介变量的出现则部分或全部地解释另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跨文化心理学中，中介变量是典型的文化取向的测量，它有时能够解释在不同国家样本之间所认定的差异。

National-level Studies

国家层面的研究：每一个国家的样本中可获取变量的所有数据先平均，再把每个国家当作一个案来分析的研究方法。

Nomological Net

基则网：新的测量和现有测量之间的关系网络。这个矩阵可用来评价新测量的效度。

Population Mean

总体均值：总体在某些测量上的个人层面的均值分数。然而，如果之前没有在每个总体内单独地构建测量的结构，就相互比较两个或多个国家的均值分，这样的比较很可能是无效的。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心理适应（在文化接触时）：一些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对新文化背景的适应，反映在新到移民的主观经验报告中，比如测量他们的焦虑紧张、抑郁和人际关系障碍。

Post-modernity

后现代性：最早在一些较富裕的国家中确定的一套价值观和行为。后现代性代表了一种生活上的进步，不再被工作紧迫和金钱缺乏所支配。它包括更多的享乐主义、政治及道德的自由主义、对环境的关注和寻求独特的自我表达。

Race

人种：日常话语和社会知觉中经常用到的词语，但是它没有什么能够站得住脚的生物学基础。本书中我们更愿意将它称为种族。

Reliability

信度：从技术意义上讲，心理学家在两个方面用这个词来描述测量。第一，对组成一个量表的各个项目，所采用的回答方式是否相互一致？比如，内部项目一致性。第二，当相同的被试在稍后的时间参加相同的测量，他们是否得到相同的分数？比如，测验—重测一致性。

Smallest Space Analysis

最小空间分析法：一个与因素分析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统计技术，它

并不需要做一样格外严格的统计假设。该技术只适用于顺序变量的测量而不是等距变量的测量。

Social-cultural Adaptation

社会文化适应：通过学习当地社会系统的运转和获得必要的技能和方式，以在不熟悉的文化情境中完成一些事务，从而去适应新的文化背景。

Unpackaging

拆包装：跨文化研究者所用的一个隐喻。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彼此不同，通过对文化取向采用更具体的测量，研究者有时会显示这个具体的测量能解释他们发现的文化群体之间的差异。该技术能排除对差异的其他可能解释，也经常用来指对更普遍的重合特质或解释的揭示。

Validity

效度：一个测量能测量到它所要测量的特质，而不是测量到那些它不去测量的特质的程度。

Value of Children

子女价值（观）：一个家庭对拥有子女的价值观类型，换句话说就是子女对父母或家庭所提供满足的类型。子女的经济或实用价值与情感满足的价值或父母抚养孩子的体验价值形成对照。

Within-subject Standardization

被试内标准化：跨文化心理学家用来减少默许或反应偏差的一个程序。每个被试对每一特定项目回答的得分都要经过他在所有项目上的反应平均分所校准。只有当调查包括了一个广泛的项目并期望产生相互独立的答案时，才能使用此程序。这项技术与研究者有时因为别的目的而采用的其他的标准化有着重要不同，弄清楚这点很有必要。举例来说，在对两个样本采取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打算要对两个样本的分数加以对等化，这时就会采用样本内标准化。

参 考 文 献

- Aaker, J., & Schmitt, B. (2001). Culture-dependent assimil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elf: Preferences for consumption symb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2, 561-76.
- Aaker, J., & Williams, P. (1998). Empathy versus pride: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appeals across culture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5, 241-61.
- Abe, J.A.A. (2004). Self-esteem, perception of relationships and emotional distress: A cross-cultural stud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1, 231-47.
- Abel, T.M., & Hsu, F.L.K. (1949). Some aspects of the personality of Chinese as revealed by the Rorschach test. *Rorschach Research Exchange and Journal of Projective Techniques*, 13, 285-301.
- Abrams, D., Ando, K., & Hinkle, S. (1998).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 to the group: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subjective norms as predictors of workers' turnover inten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4, 1027-39.
- Adair, W.L., Okumura, T., & Brett, J.M. (2001). Negotiation behavior when cultures coll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 371-85.
- Adorno, T.W., Frenkel-Brunswik, E., Levinson, D.J., & Sanford, R.N.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Agarwal, R., & Misra, G. (1986). A factor analytic study of achievement goals and means: An Indian 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1, 717-31.
- Albert, R.D., & Ha, I.A. (2004). Latino/Anglo-American differences in attributions to situations involving touching and sil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8, 253-80.
- Albright, L., Malloy, T.E., Qi, D., Kenny, D.A. et al. (1997). Cross-cultural consensus in personality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270-80.
- Al Issa, A. (2003). Sociocultural transfer in L2 speech behaviors: Evidence and motivating fac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7, 581-602.
- Allen, M.W., Ng, S.H., Ikeda, K., Jawan, J.A., et al. (2004). 'Two decades of cultural value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ight East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 nations'. Paper given at the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Xi'an, China.
- Allik, J., & McCrae, R.R. (2004). Toward a geography of personality traits: Patterns of profiles across 36 cultur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4, 13-28.
- Allport, G.W.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Allport, G.W., & Odbert, H. (1936). Trait names: A psycho-lexical stud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47 (1), (whole No. 21).
- Altemeyer, B. (1988). *Enemies of freedom: Understanding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Ambady, N., Koo, J., Lee, F., & Rosenthal, R. (1996). More than words: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politeness in two cultur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996-1011.
- Amir, Y., & Sharon, I. (1987). Are social psychological laws cross-culturally valid?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8, 383-470.
- Andersen, P.A., Hecht, M., Hoobler, G.D., & Smallwood, M. (2002).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 In W.B. Gudykunst & B. Mody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88-106). Thousand Oaks, CA: Sage.
- Andolšek, D.M., & Štebe, J. (2004). Multi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work values and commit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4, 181-208.
- Archer, D., & Gartner, R. (1984). *Violence and crim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Archer, J. (in press).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physical aggression between partne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 Arends-Toth, J., & van de Vijver, F. (2003). Multiculturalism and acculturation: Views of Dutch and Turkish Dutch.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249–266.
- Arends-Toth, J., & van de Vijver, F. (2004). Domains and dimensions in acculturation: Implicit theories of Turkish Dut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8, 19–35.
- Argyle, M. (2001).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at Oxford. In G. C. Bunn, A.D. Lovie, & G.D. Richards (Eds.), *Psychology in Britain: Historical essays and personal reflections* (pp. 333–43). Leicester: BPS Books.
- Argyle, M., Henderson, M., Bond, M.H., et al. (1986). Cross-cultural variations in relationship ru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1, 287–315.
- Aries, P. (1962).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 (R. Baldick, Trans.). New York: Knopf.
- Arnett, J.J. (1992). Reckless behavior in adolescence: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Review*, 12, 339–73.
- Arnett, J.J. (2002). The psychology of globaliz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7, 774–83.
- Aron, A., Aron, E.N., & Smollan, D. (1992).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personal close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596–612.
- Asch, S. (1956).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70 (9), (whole No. 416).
- Ataca, B., & Berry, J.W. (2002). Psychological, sociocultural, and marital adaptation of Turkish immigrant couples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7, 13–26.
- Ataca, B., & Berry, J.W. (2004). 'Comparativ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mong Turkish immigrants in Canad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Bogazici University, Istanbul.
- Au, K. (1999). Intra-cultural variation: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30, 799–812.
- Au, K. (2000). Intra-cultural variation as another construct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 study based on secondary data of 42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6, 217–38.
- Au, K., & Cheung, M.W.L. (2002). Consequences of intra-cultural vari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job autonomy in 42 countries. In P. Boski, F. van de Vijver, & A.M. Chodynicka (Eds.), *New direction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pp. 261–77). Warsaw, Poland: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 Au, T.K. (2004). Making sense of differences: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al reality. In S.H. Ng, C.N. Candlin, & C.Y. Chiu (Eds.), *Language matters: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pp. 139–53).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Aycan, Z., Kanungo, R.N., Mendonca, M., You, K., Deller, G., Stahl, G., & Kurshid, A. (2000). Impact of culture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ractices: A ten country comparison.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9, 192–221.
- Ayçiçeği, A. (1993). 'The effects of the mother training program'.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Bogazici University, Istanbul, Turkey.
- Ayçiçeği, A., & Harris, C.L. (2005). Variations i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mong Turkis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immigrants to North Americ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6, 77–83.
- Aydin, B., & Oztutuncu, F. (2001). Examination of adolescents' negative thoughts, depressive mood, and family environment. *Adolescence*, 36, 77–83.
- Bandura, A. (2002).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in cultural context.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1, 269–90.
- Barry, H., Child, I., & Bacon, M. (1959). Relation of child training to subsistence econom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1, 31–63.
- Bartholomew, K., & Horowitz, L.M. (1991). Attachment styles in young adults: A test of a four categor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2, 226–44.
- Bass, B.M. (1997). Does the transactional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paradigm transcend organizational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2, 130–9.
- Beauvois, J-L., & Dubois, N. (1988). The norm of internality in the explanation of psychological ev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 299–316.

更多参考文献请登录 www.ncc-pub.com/t/kwhshx1x。

译 名 对 照

Abrams, D.	艾布拉姆斯	Bardi, A.	巴蒂
Adair, W. L.	阿代尔	Bartlett, C.	巴特莱特
Adorno, T. W.	阿多诺	Bechts, M. C.	贝克特
Al Issa, A.	阿尔·伊萨	Benedict, R.	本尼迪克特
Albert, R. D.	阿尔伯特	Bennett, A. B.	本尼特
Albright, L.	奥尔布莱特	Berger, P. L.	贝格尔
Allen, M. W.	艾伦	Berger, P. L.	伯格
Allik, J.	艾里克	Berno, T.	贝诺
Allport, G. W.	奥尔波特	Berry, J. W.	贝里
Ambady, N.	安拜蒂	Binet, A.	比奈
Amir, Y.	阿米尔	Blau, G.	布劳
Andolsek, D. M.	安多尔塞克	Bochner, S.	博克纳
Archer, J.	阿彻	Bohannon, L.	博安农
Arends-Toth, J.	阿伦兹—托斯	Bond, M. H.	彭迈克
Argyle, M.	阿盖尔	Bordia, P.	博迪
Arnett, J. J.	阿内特	Boski, P.	博斯基
Aron, A.	阿伦	Bosland, N.	博斯兰
Aryee, S.	阿里	Bourhis, R. Y.	布尔基斯
Asch, S.	阿什	Bourne, E. J.	波那
Ataca, B.	阿塔加	Bresnahan, M. J.	布雷斯纳汉
Au, K.	奥	Brett, J.	布雷特
Aycan, Z.	艾肯	Brew, F. P.	布鲁
Aycicegi, A.	艾思赛齐	Brewer, M. B.	布鲁尔
Aydin, B.	艾丁	Brockner, J.	布罗克那
Baker, W. E.	贝克	Brown, A. M.	布朗
Bandura, A.	班杜拉	Brown, J. D.	布朗

Brown, R. J.	布朗	De Vries, R. E.	德弗里斯
Burns, T.	伯恩斯	Deater-Deckard, K.	迪特—德克
Buss, D. M.	巴斯	Den Hartog, D. N.	邓哈托格
Cairns, D. R.	凯恩斯	Dennis, T. A.	丹尼斯
Campbell, D. T.	坎贝尔	De-Raad, B.	迪拉德
Carment, D. W.	卡门特	Derlega, V. J.	德莱加
Carroll, L.	卡罗尔	Deshpande, S. P.	德实庞德
Cashmore, J. A.	卡什莫尔	Deutsch, M.	多伊奇
Cavill, S.	卡维尔	Diaz-Guerrero, R.	迪亚兹—格雷罗
Chan, H. L.	陈	Dibiase, R.	迪比亚斯
Chan, S. C. N.	切恩	Dickson, M. W.	狄克森
Chan, S. K. C.	陈	Diener, E.	迪纳
Chang, L.	张雷	Dodge, K. A.	道奇
Chao, R. K.	曹	Dols, J. M. F.	多尔斯
Chasiotis, A.	查西奥提	Doi, T.	多伊
Chen, C. C.	陈昭全	Duenas, G.	迪纳斯
Chen, Y. R.	陈	Dugan, S.	杜根
Cheung, F. M.	张妙清	Durkheim, E.	德克海姆
Cheung, M. W. L.	程	Dwairy, M.	德怀瑞
Choi, I.	崔	Earley, P. C.	厄尔利
Chou, K-L.	周	Ekman, P.	艾克曼
Church, A. T.	切尔齐	Elfenbein, H. A.	埃尔芬拜因
Claes, M.	克莱斯	Elron, E.	埃隆
Cogan, J. C.	科根	Ember, C. R.	恩伯
Cohen, D.	科恩	Enriquez, V.	恩里克斯
Cohen, S.	科恩	Ervin, S. M.	艾尔文
Conroy, M.	康罗伊	Esses, V. M.	艾赛思
Coon, H. M.	科恩	Farh, J. L.	樊景立
Costa, P. T.	科斯塔	Feather, N. T.	费瑟
Coulon, L.	库伦	Feldman, R. E.	费尔德曼
Cousins, S.	卡曾	Fey, C.	费
Cuddy, A.J. C.	库迪	Fijneman, Y. A.	桑田
Cukur, C. S.	库克	Fischer, R.	费舍尔
Cullen, J. B.	卡伦	Fiske, A. P.	菲斯克

Fiske, D. W.	菲斯克	Haberstroh, S.	哈伯斯特罗
Fiske, S. T.	菲斯克	Hagendoom, L.	哈根多姆
Flanagan, C. A.	弗拉纳根	Hall, E. T.	霍尔
Forgas, J. P.	福加斯	Hamid, A. H.	哈米德
Frese, M.	弗里斯	Hampson, S. L.	汉普森
Friedman, M.	弗里德曼	Harris, M.	哈里斯
Friesen, W. V.	弗里森	Harzing, A-W.	哈尔金
Fu, G.	傅根跃	Hasegawa, T.	长谷川
Fu, P. P.	福	Hashimoto, K.	桥本
Fu, V. R.	福	Haslam, N.	哈斯拉姆
Furnham, A.	弗海姆	He, W.	何
Gabrenya, W. K.	加布雷亚	Heider, F.	海德
Gabrielidis, C.	加布里利迪斯	Heine, S. J.	海因
Gannon, M. J.	加依	Henri, V.	亨利
Gass, S. M.	加斯	Herskovits, M.	赫斯科维茨
Gausden, J.	高斯登	Hill, K.	希尔
Geertz, C.	格尔茨	Hinkle, S.	辛克尔
Gelfand, M. J.	盖尔芬德	Hodes, M.	霍德斯
Georgas, J.	乔加斯	Hofer, J.	霍弗
Gergen, K. J.	格根	Hoffman	霍夫曼
Giles, H.	伊莱斯	Hofstede, G.	霍夫施泰德
Gire, J. T.	盖尔	Hogan, R.	霍根
Glick, P.	格里克	Holland, R. W.	霍兰
Goffman, E.	戈夫曼	Holtgraves, T.	霍尔特格雷夫
Goldberg, L. R.	古德伯格	House, R. J.	豪斯
Goodnow, J. J.	古德诺	Huang, X.	黄
Goody, E. N.	古蒂	Hui, C.	惠
Graham, J. A.	格雷厄姆	Huntington, S. P.	亨廷顿
Greenfield, P. M.	格林菲尔德	Huismans, S.	休伊斯曼
Greenholz, J.	格林赫兹	Imamoglu, E. O.	伊麦莫格鲁
Gudykunst, W. B.	古迪昆斯特	Inglehart, R.	英格尔哈特
Gunnoe, J.	冈诺	Inkeles, A.	英克尔斯
Guthrie, G. M.	格斯里	Ishii, K.	艾什
Ha, I. A.	哈	Jackson, J. S.	杰克逊

Ji, L. J.	吉	Lee, Y. T.	李
Jones, D.	琼斯	Lehman, D. R.	莱曼
Jose, P. E.	乔斯	Lehmann, A.	莱曼
Kagiticibasi, C.	库查巴莎	Lenneberg, E. H.	莱恩伯格
Kalin, R.	卡林	Leung, K.	梁觉
Kanagawa, C.	卡纳加瓦	Levine, R. V.	莱文
Karau, S. J.	卡劳	Levine, T. R.	列文
Kashima, E. S.	鹿岛	Levinson, J. D.	莱文森
Kashima, Y.	鹿岛	Lewin, K.	勒温
Katigbak, M. S.	凯提贝克	Li, H. Z.	李
Keller, H.	凯勒	Liese, L. H.	莱斯
Kennedy, J. C.	肯尼迪	Lim, F.	利姆
Kerr, C.	克尔	Lin, C-Y. C.	林
Khan, N.	卡恩	Lind, E. A.	林德
Kickul, J.	基库尔	Lindsey, D. T.	林赛
Kim, M. S.	金	Linssen, H.	林森
Kim, Y.	金	Li-Ripac, D.	李一瑞派克
Kirkman, B. L.	柯克曼	Little, T. D.	利特尔
Kitayama, S.	北山	Liu, J. H.	刘豁夫
Kluckhohn, C.	克拉克洪	Lo, S.	罗
Kmmelmeier, M.	凯默梅尔	Lonner, W. J.	罗那
Ko, J. W.	高	Lynn, R.	莱恩
Kohn, M. L.	科恩	Malinowski, B.	马利诺夫斯基
Kroeber, A. L.	克罗伯	Man, D. C.	曼
Kuhn, M. H.	库恩	Mandal, M. K.	曼德尔
Kuhnen, U.	库恩	Markus, H. R.	马库斯
Kurman, J.	库尔曼	Marriott, H.	马里奥特
Kwak, K.	克瓦克	Marsh, A. A.	马尔什
Kwan, V. S. Y.	科万	Mascolo, M. F.	马斯洛
Lam, S. S. K.	拉姆	Masson, K.	梅森
Lamm, B.	拉姆	Masuda, T.	增田
Lau, S.	劳	Matsumoto, D.	松本
Lawson, S.	劳森	Maznevski, M.	马兹奈夫斯基
Lee, K.	李康	McAndrew, F. T.	迈克安德鲁

McArthur, L. Z.	麦克阿瑟	Noels, K.	诺埃斯
McAuley, P.	麦考利	Noorderhaven, N. G.	努儿达霍芬
McClelland, D. C.	麦克利兰	Norenzayan, A.	诺伦扎扬
McCrae, R. R.	麦克雷	Norman, W. T.	诺曼
McDougall, W.	麦独孤	Nsamenang, A. B.	桑目南
McFarlin, D. B.	麦克法林	Odbert, H.	奥德波特
McPartland, R.	迈克帕特兰	Oettingen, G.	奥廷根
Melech, G.	梅里齐	Oetzel, J. G.	奥策尔
Meyer, J. P.	梅耶	Oguri, M.	奥格瑞
Milgram, S.	米尔格兰姆	Ohbuchi, K.	欧布基
Miller, J. G.	米勒	Oishi, S.	奥诗
Mischel, W.	米切尔	Orano, P.	奥雷诺
Montiel, C. J.	蒙蒂尔	Osgood, C. E.	奥斯古德
Montreuil, A.	蒙特里尔	Oyserman, D.	奥伊斯曼
Moos, R. H.	莫斯	Oztutuncu, F.	奥兹图坦库
Morelli, G. A.	莫雷利	Park, H. S.	帕克
Morling, B.	莫林	Peabody, D.	皮博迪
Morris, M. W.	莫里斯	Pearce, P. L.	皮尔斯
Morrison, E. W.	莫里森	pearson, V. M. S.	皮尔逊
Moscardo, G.	莫斯卡多	Pelto, P.	佩托
Moscovici, S.	莫斯科维奇	Peng, K. P.	彭凯平
Mosquera, P. M. R.	莫斯奎拉	Pennebaker, J. W.	佩内贝克
Muensterberger, W.	米恩斯腾伯格	Peterson, M. F.	皮特森
Mundy-Castle, A. C.	芒迪—卡斯尔	Pettigrew, T. F.	佩蒂格鲁
Munene, J. C.	穆尼尼	Phalet, K.	菲烈特
Munroe, R. L.	芒罗	Piaget, J.	皮亚杰
Muramoto, Y.	村本	Pike, K.	派克
Murray, H. A.	默里	Pittam, J.	皮塔姆
Nakazato, H.	纳卡扎多	Poon, J. M. L.	普恩
Nauck, B.	诺克	Poortinga, Y. H.	普尔廷加
Nelson, G. L.	尼尔森	Poppe, E.	波普
Nelson, M. R.	尼尔森	Pratto, F.	普雷托
Ng, S. H.	恩格	Proust, M.	普鲁斯特
Nisbett, R. E.	尼斯贝特	Ralston, D. A.	罗尔斯顿

Ramirez-Esparza, N.	拉米雷斯—艾恩帕沙	Schonpfulg, U.	肖恩富拉格
Rao, A.	劳	Schwartz, S. H.	施瓦茨
Ravlin, E. C.	拉夫林	Sedikides, C.	塞迪基德
Redding, S. G.	雷丁	Segall, M. H.	西格尔
Redfield, R.	拉德菲尔德	Seki, K.	关市
Redford, P. C.	雷德福特	Semin, G. R.	塞明
Remland, M. S.	雷姆兰德	Shackelford, T. K.	沙克福特
Rivers, W. H. R.	里弗斯	Shah, A. A.	沙
Roberts, J. M.	罗伯茨	Shapiro, D. L.	夏皮罗
Roe, R.	罗伊	Sharon, I.	沙龙
Rohner, R. P.	罗那	Shavitt, S.	谢维特
Rokeach, M.	罗基齐	Sherif, M.	谢里夫
Ronen-Eilon, C.	罗农—艾伦	Shoda, Y.	索达
Rosenfeld, H.	罗森菲尔德	Shuter, R.	舒特
Rosenman, R. H.	罗森曼	Shweder, R. A.	施韦德
Rosenthal, D. A.	罗森塔尔	Sidanius, J.	西达纽斯
Ross, E. A.	罗斯	Silbereisen, R. K.	西尔伯瑞森
Rothbaum, F.	罗森鲍姆	Singelis, T. M.	辛格利斯
Rotter, J. B.	罗特	Smith, P. B.	史密斯
Rousseau, D. M.	鲁索	Sommer, S. M.	萨默尔
Ruback, R. B.	鲁巴克	Spielberger	斯皮尔伯格
Rusbult, C. E.	鲁斯布尔特	Spreitzer, G. M.	斯普雷泽
Russell, J. A.	拉塞尔	Stalker, G. M.	斯塔克
Sachedv, I.	萨奇夫	Stebe, J.	斯蒂伯
Sagiv, L.	萨齐夫	Stephan, W. G.	斯蒂芬
Sam, D. L.	萨姆	Stewart, S. M.	斯图尔特
Sanchez-Burks, J.	桑切斯—伯格	Sussman, N.	萨斯曼
Sawyer, J.	索耶	Sweeney, P. D.	斯威尼
Schalk, R.	沙尔克	Tafarodi, R. W.	塔法罗帝
Scherer, K. R.	谢勒	Tajfel, H.	塔杰夫
Scheu, U. D.	朔伊	Tarde, G.	塔得
Schimmack, U.	施马克	Thomas, D. C.	托马斯
Schmidt-Atzert, L.	施密特—艾特泽克	Tidjani, B.	蒂德贾尼
Schmitt, D. P.	施密特	Ting-Toomey, S.	廷—图米

Tinsley, C. H.	廷斯利	Ward, C.	沃德
Tornatsky, L. C.	托纳特斯基	Wasti, S. A.	瓦斯蒂
Trafimow, D.	特拉菲莫	Watson, O.	华生
Trapnell, P. D.	特拉普内尔	Watson, W. E.	华生
Triandis, H. C.	特里安迪斯	Weldon, E.	韦尔登
Triplett, N.	特里普利特	Wheeler, L.	维勒
Trommsdorff, G.	特罗姆多夫	Whiting, B. B.	怀廷
Trompenars, F.	特罗姆皮那斯	Whiting, J. W. M.	怀廷
Tropp, L. R.	特鲁普	Wiesner, M.	威斯纳
Uleman, J. S.	乌尔曼	Wiggins, J. S.	威金斯
Urry, J.	厄利	Williams, A.	威廉斯
Uskul, A.	厄斯库	Williams, K. D.	威廉斯
Van de Vijver, F. J. R.	范德维弗尔	Witkin, H. A.	威特金
Van de Vliert, E.	范德弗列特	Wong, S. S. W.	王
Van der Zee, K.	范德齐	Wordsworth, W.	华兹华斯
Van Hemert, D.	范赫梅特	Wundt, W.	冯特
Van Nimwegen, T.	范尼姆威根	Yamada, A. M.	山田
Van Oudenhoven, J. P. L.	范奥登霍文	Yamaguchi, S.	山口
Vandello, J. A.	范德罗	Yang, K. S.	杨国枢
Varonis, E. M.	瓦罗尼斯	Yao, X.	姚
Veenhoven, R.	维恩霍芬	Ying, Y. W.	英
Verkuyten, M.	维库伊腾	Yu, A. B.	余安邦
Vingerhoets, A. J. J. M.	维根霍茨	Yuki, M.	有纪
Viswesvaran, C.	维斯维瓦让	Yukl, G. A.	尤克尔
Vygotsky, L. S.	维果斯基	Zagefka, H.	扎哥夫卡
Wallbot, H. G.	沃尔玻特	Zangwill, I.	赞格威尔
Wang, L.	王垒		

新华书店
PDG

后 记

终于把这本书翻译完成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第一次和这本书相遇，是在 2006 年 7 月的希腊——第 18 届国际跨文化心理学大会上。也是在那次会议上，和本书的两位作者 Peter Smith 及 Micheal Harris Bond 相遇。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好，和两位作者谈及翻译本书的想法，得到他们的热烈反响。在那一年的秋季学期，我第一次尝试用这本书给研究生做教材。使用下来效果非常好。这更坚定了我翻译本书的想法。我开始带着研究生团队一起来做这项艰巨的工作。

跨文化译著的艰难性在于它涉及文化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再加上本书是一本研究性的学术著作，又有一定的深度，三位作者的语言习惯各不相同，翻译过程充满艰辛。在我们定期的讨论会上，大家常常会就一个词的涵义争得面红耳赤，因为它在不同的章节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另外，从语言的多样性看，这本书涉及英语、日语、韩语、菲律宾语、中文等的词汇。尽管读者不一定需要懂这么多语言，但作为译者，想要准确了解其含义，还是需要深入学习。除了跟作者深入沟通，我还请教过各个国家的人士。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由于国内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术语没有约定俗成的翻译。这给我们增添了很大难度。我的案头堆了高高的参考书，但有时还是查不出一些词的中译名称。有些名词即便有中文解释，但名词不统一，使用也相当混乱。为此，我们每一个词都经过反复考虑。有一些名词的翻译在此做说明：individual-level 我们在书中翻译成“个体层面”，但它其实与“个人层面”没有任何区别；self-construal 我们在书中翻译成“自我诠释”。最初我们所用的名词为“自我解构”，听上去比较好听，但回到作者的定义中，并没有“解”和“构”的含义，

反复考虑后，用了“自我诠释”，不一定最佳，但比较贴近作者所用的意义。还有 *unpack*，我们最后翻译为“拆包装”。最初我们用“解构”这个比较哲学化的术语，但作者本意是一个比喻，是把事物回归到本来的面目，我们最终用了一个不是很文学化的词。

我还想感谢我的研究生团队和 Bond 教授的研究生廖原。目前和大家见面的这本书，已是我们的第八稿。我们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在大家一起学习这本书的过程中，初稿由每位译者独立完成，分工如下：前言和第 1、10 章，王佳蕾；第 2、8 章，严文华；第 3、5 章，权大勇；第 4 章，廖原；第 6 章，李纳娜；第 7 章，韩璐；第 9 章，曾斌；第 11 章，黄慧莹；第 12 章，张晶晶；第 13 章，郑世彦。然后第二稿由另一位成员进行校阅，提出修改意见，第三稿由翻译者根据修改意见完成修订。第四稿是由我通读一遍，提出修改意见。第五稿是由权大勇逐字逐句根据原文进行审阅，关注于忠实原文。第六稿由我再次审阅，关注于语言的流畅、准确，并开始统稿。第七稿请 2008 年级研究生进行挑剔性阅读，把看不懂的地方、含义模糊的地方挑出来。他们是：邱婧婧、梁嘉歆、黄文虎、黄天翼、徐帅哲和赵晓晨。第八稿是我根据挑剔性阅读的反馈进行调整和修改，并最后完成格式的统一。邱婧婧参与了统稿工作。

感谢新曲线的陈浩莺，是她和同事慧眼识珠，决定出版这本书的中译本。感谢常玉轩，在编辑中的精益求精，不仅拥有一双鹰眼，发现了原著中的错误，而且把书中所有的人名译成中文。工作量巨大。每一本好书的背后，总有很多人的付出。

这项工作历时两年，期间使用本书作为教材三次。这期间所花的时间、精力无数，习惯了自己写文章时的行云流水，在翻译过程中不时要停下来琢磨词的含义和原作者的心思，非常受限制。以我的完美主义风格，如果不是交稿的最后期限已到，我还会不断地琢磨，力求做得更精细。甚至审阅清样的过程也比预期的时间长，权大勇用“读出声”的方式来检查句子的通畅性，我则细细地字字句句看过，及时修正一些关键点，如正负号、把人名误以为国名后，我很庆幸没有让这些错误和读者见面。即使这样，仍然会存在不完美和错误。欢迎读者朋友们给我们反馈。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相信。我们所花的时间，是为很多中国读者节省时间，让他们更快地吸收知识。我们也希望这本译著是一个起点，能让更多的人从这里走向世界，让国际学术界更了解中国。

严文华

2008 年 10 月于丹桂飘香的上海

